《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学术顾问委员会

名誉主任：李铁映

主　　任：王忍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齐世荣　朱庭光　金冲及　阎明复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慎明　郭永才

副 主 任：何秉孟（常务）　沈志华

郑异凡　李正乐　谢寿光

执行总主编：沈志华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明*　于　沛　王　正　石　泽

叶　军　叶书宗*　刘　逖　刘仲亨*

邢广程　孙凌齐*　沈志华*　吴　伟*

杨存堂*　杨建国　金　雁　郑异凡*

张盛发*　赵国顺*　闻　一　姚　海*

徐天新*　薛衔天　戴隆斌*

秘　　书：方　琼

编　　务：罗淑娴　闻　静　胡甫强　宗　静

注：*为分卷主编。

· 本课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
· 本《选编》为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 本课题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 本《选编》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本档案《选编》仅供下列读者、单位阅读和收藏：

- 省、部、军级党政领导干部，宣传理论部门及外事部门局级以上干部；
- 从事苏联东欧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或教学的具有正高以上职称的人员；
-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以上图书馆、档案馆，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社会科学院及党校图书馆。

编 者 的 话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称《选编》）是一部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选编而成的大型文献集。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国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底70余年间大量历史档案，引起国际理论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档案材料也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展开了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选编》课题组并于同年8月将《选编》作为院“九五”重点研究课题正式立项。项目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能尽快翻译、出版，199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课题组的领导，同时加大了资助力度。几年来，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各国有关俄国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并分赴俄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国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力量，将其中的万

余件档案译成中文；编委会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加工成为数百项专题并分别编成34卷（包括总目录1卷），总计近2000万字。现在，这一对于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苏联兴亡史、研究俄罗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终于结项。

历史档案是记录历史事实的文字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某一件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需要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判断的。因而不可认为凡是档案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档案材料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苏联历史中各个不同时期，出自于不同人之手，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往往还出现关于同一件事而说法迥然不同的材料；再者，哪些材料应该公布，哪些材料不应该公布，也都取决于档案持有者的某种需要。俄罗斯解密并公布苏联时期部分历史档案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管理虽在法律上规定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服从于一定政治目的。叶利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8～119页。

为对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进行审判提供证据，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大量没有达到解密期限的文件；为调整与某些国家关系开放了大量涉外事件的文件；俄国国内的大小刊物在追求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之下，争相刊登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档案文件。因此，我们现在所编纂的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者去判断。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值此《选编》问世之际，编委会深感本书年代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广，造成编译上巨大困难。工作中我们力求坚持严谨作风，译文力求严格忠实于原文，体例力求清晰，便于查阅，编者注释只在于辅助说明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背景。虽然如此，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2001 年 12 月

体 例 说 明

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共34卷（包括总目录卷1卷），收入自80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俄国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10000余件，文献上限为1917年初，下限至90年代初。

二、本《选编》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有些选自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包括少量的英文刊物），还有些是国外学界同仁赠与的。

三、本《选编》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卷，每卷分若干专题，各个专题内的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最后一卷为全书总目录卷，总目录按全部所选文献的时间顺序编排，并标注卷次和页码。为便于读者查阅，同时编有全书专题的总目录。

四、本《选编》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标题是原有的。档案原件中有批注或划线的地方，凡能辨识者均予以保留或加注说明。

五、文件所标的档案编号只是为便于核查原文由编者所加的收藏编号。

六、凡人名、地名、书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称及专门用语等，均参照以下工具书翻译：《列宁著作译名汇编》、《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编）等。必要时采取音译和或加注说明。

本卷前言

编入本卷的档案共分为29个专题，主要是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主政年代的问题。

本卷档案从内容上看，涉及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涉及这方面的专题有："关于斯大林和朱可夫的历史评价问题"（1966年3月至1968年11月），"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一）"（1968年2月至1982年6月），"泛俄罗斯主义问题"（1968年4月至1982年8月），"涅托赴韩国旅行问题"（1971年9月），"对索尔仁尼琴的严密监视"（1972年6月至1974年1月），"关于剥夺罗斯特洛波维奇国籍的问题"（1974年3月至1978年12月），"'护卫'号反潜舰兵变事件"（1975年11月至1976年7月），"关于勃列日涅夫寿辰及其著作"（1976年11月至1986年8月），"斯涅吉廖夫放弃苏联国籍问题"（1977年7～12月），"关于恢复顿斯科伊修道院问题"（1982年10月至1983年1月），"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社会矛盾与冲突"（1985年3月至1991年12月），"关于出版古米廖夫学术著作的争论"（1987年3～6月），"思想理论和党组织工作状况"（1988年3月至1991年8月），"关于历史案件的平反（二）"（1988年12月）。

本卷档案反映的另一重要问题是苏联社会的民族矛盾。反映这方面问题的专题有"关于克里木州划归乌克兰共和国"（1954年

1~2月），“车臣－印古什移民风波”（1955年5月至1973年5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事件”（1988年2月），“第比利斯的动荡”（1989年4月至1990年4月）。

此外，还编入了大量反映苏联解体前这20多年里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问题的档案，如“苏联与越南战争问题（一）”（1966年7月至1973年6月），“苏联与巴黎‘五月骚动’事件”（1968年5月），“苏意两党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分歧”（1968年11月），“苏联对外国政府或组织的援助”（1969年8月至1988年3月），“苏联与瓦文萨的意大利之行”（1981年1月），“裁军和禁止核试验”（1981年2月），“阿富汗战争及其后果”（1981年3月至1990年1月），“苏联最后十年的对外关系”（1981年3月至1991年6月）。

反映苏联社会在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问题的专题有“战后农民生活”（1947年2~8月），“农业生产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1965年2月至1975年4月），“60年代的水资源保护”（1965年6月至1967年12月）。

叶书宗

2001年2月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主要编辑出版发行人

出 版 人：谢曙光
编 审 人：刘仲亨　陆象淦
发 行 人：胡鹏光　王　菲

编辑主任：程晓燕　许春山
编　　辑：章若男　陈云卿　徐文渊　周绍珩
封面设计：孙元明
内文设计：范　迎
责任印制：盖永东
编　　务：宗　静

目　　录

本卷前言 …… 30－1

战后农民生活

（1947 年 2～8 月）

专题说明…… 30－1

№03679 罗斯托夫州检察长关于农民强行购买小麦给苏联检察院的特别报告（摘录）
（1947 年 2 月 22 日） …… 30－2

№03677 农庄庄员伊万诺夫关于偷窃土豆的供词（摘录）
（1947 年 6 月 9 日） …… 30－3

№03678 布勃列依请求出卖公债致什维尔尼克的信
（1947 年 7 月 5 日） …… 30－5

№11736 对伊万诺夫偷窃土豆案的判决
（1947 年 7 月 19 日） …… 30－6

№11737 对伊万诺夫偷窃土豆案上诉的裁决
（1947 年 8 月 6 日） …… 30－8

关于克里木州划归乌克兰共和国

（1954年1～2月）

专题说明 …… 30－10

№03993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的会议纪要（节选）（1954年1月25日） …… 30－11

№03994 苏共中央关于将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的决议草案（1954年1月25日） …… 30－13

№03996 苏斯洛夫和佩戈夫关于呈请批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的程序给赫鲁晓夫的报告（1954年2月1日） …… 30－14

№03997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审议俄罗斯和乌克兰联合报告的会议程序的建议（1954年2月1日） …… 30－15

№03998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关于克里木州归属问题的决定（1954年2月5日） …… 30－17

№03999 普扎诺夫关于克里木州归属问题致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报告（1954年2月5日） …… 30－18

№04000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克里木州归属问题的会议纪要（1954年2月5日） …… 30－19

№04001 俄罗斯和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克里木州归属的联合决定草案（不早于1954年2月5日） …… 30－21

№04002　伏罗希洛夫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给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通报
（1954 年 2 月 7 日）…… 30－23
№04004　塔拉索夫和济明关于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决定给伏罗希洛夫的报告
（1954 年 2 月 9 日）…… 30－24
№04005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克里木州归属问题的决定（1954 年 2 月 13 日）…… 30－25
№04006　科罗特钦科和尼日尼克关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给伏罗希洛夫的通报
（1954 年 2 月 15 日）…… 30－27
№04007　第三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 35 次会议纪要
（1954 年 2 月 19 日）…… 30－28
№04008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讨论克里木州归属问题的会议速记记录（1954 年 2 月 19 日）…… 30－30
№04009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联邦转归乌克兰”的命令
（1954 年 2 月 19 日）…… 30－39

车臣－印古什移民风波

（1955 年 5 月至 1973 年 5 月）

专题说明 …… 30－40
№06984　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就埃基巴斯图兹有斗殴情况向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
（1955 年 5 月 17 日）…… 30－41

№06985　内务部长杜多罗夫就车臣局势向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1957年2月15日）…… 30－43
№06986　达哈达耶夫集体农庄关于与车臣人的矛盾致布尔加宁的信（1957年4月1日）…… 30－45
№06987　杜多罗夫关于制止无组织移民情况致苏共中央书记别利亚耶夫的信（1957年4月8日）…… 30－47
№06988　杜多罗夫关于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要求移民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4月16日）…… 30－49
№06989　车臣－印古什新农业区俄罗斯村民致苏联政府的申诉书（1957年4月24日）…… 30－50
№06990　杜多罗夫关于移民新情况致勃列日涅夫的报告（不早于1957年4月）…… 30－54
№06934　波列欣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5月15日）…… 30－57
№06935　丘拉耶夫就车臣人擅自移民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6月4日）…… 30－63
№06991　阿尔萨努卡耶夫关于通行证发放问题致布尔加宁的信（1957年9月27日）…… 30－67
№13000　别洛夫就阿尔萨努卡耶夫来信处理情况给亚斯诺夫的报告（1957年10月4日）…… 30－71
№06994　亚斯诺夫关于特别身份证制度给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1958年10月27日）…… 30－73
№06995　杜多罗夫关于特别身份证制度给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1958年11月26日）…… 30－74
№06993　诺斯科夫对施瓦尤克案件所做的结论（不早于1958年12月15日）…… 30－75
№06936　奥尔洛夫转交苏共中央的关于车臣和印古什居民的调查报告（1959年8月28日）…… 30－80

№06937　谢列平就车臣与当地居民不和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9年9月9日）…… 30－88
№11738　波列欣关于下发戈尔舍涅瓦报告给苏共中央的通报（1959年9月15日）…… 30－90
№06996　哈吉耶夫关于车臣移民安置问题致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的报告（1960年3月31日）…… 30－91
№06992　涅兹韦茨基关于伊萨耶夫案件的报告（1960年6月25日）…… 30－94
№06938　季托夫和拉普钦斯基关于车臣人安置情况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63年10月2日）…… 30－99
№06939　波列欣关于车臣居民迁移情况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63年10月2日）…… 30－103
№06997　帕卡洛夫关于斗殴事件给布利诺夫和捷列霍夫的报告（1964年10月6日）…… 30－105
№06998　车臣人小组关于制止镇压致赫鲁晓夫和鲁坚科的电报（1964年10月16日）…… 30－107
№06940　安德罗波夫关于车臣治安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73年2月13日）…… 30－108
№06941　苏共中央关于处理格罗兹尼民族纠纷的决议（1973年3月13日）…… 30－113
№06942　安德罗波夫关于强化车臣地区安全机构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73年5月25日）…… 30－114

农业生产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

（1965年2月至1975年4月）

专题说明…… 30－115
№03647　莫伊谢耶夫就苏联农业状况给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信（1965年2月1日）…… 30－116

№03648　斯塔罗夫斯基就苏联经济统计资料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1965年7月24日）　… 30－122
№03649　叶若夫关于美苏收入比较向列别金斯基提供的统计资料（1966年12月21日）　…… 30－125
№03651　斯塔罗夫斯基关于工人实际工资给柯西金秘书处的统计报告（摘录）（1970年11月24日）　…… 30－127
№03652　比丘金关于苏维埃非黑土带农业发展给巴伊巴科夫的工作报告（1975年4月4日）　…… 30－128

60年代的水资源保护

（1965年6月至1967年12月）

专题说明…… 30－136
№03708　国家计委关于水资源保护问题答霍洛德科夫问（1965年6月15日）　…… 30－137
№03709　采油工业部为保护水资源给各企业和部门组织领导人的通函（1967年12月9日）　…… 30－141

关于斯大林和朱可夫的历史评价问题

（1966年3月至1968年11月）

专题说明…… 30－143
№06965　西蒙诺夫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致勃列日涅夫的信（1966年3月23日）　…… 30－144

№04385　安基宾科关于朱可夫受到歧视给基里连科的信（1968年8月22日）…… 30－147
№04386　安基宾科关于要求正确评价朱可夫致基里连科的信（1968年8月23日）…… 30－149
№04387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就安基宾科信的处理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11月27日）…… 30－151

苏联与越南战争问题（一）

（1966年7月至1973年6月）

专题说明…… 30－152
№06763　海运部就向越南运送物资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66年7月18日）…… 30－153
№06764　外交部关于向越南派遣志愿人员向苏共中央提供的背景资料（不早于1966年7月9日）…… 30－157
№06765　谢尔巴科夫与范文同关于苏越关系的谈话纪要（1970年8月28日）…… 30－160
№06766　苏联驻越使馆关于越美接触情况给苏联政府的报告（1971年9月1日）…… 30－163
№06767　葛罗米柯与基辛格就解决越南问题举行的会谈纪要（1972年5月27～28日）…… 30－168
№06768　谢尔巴科夫关于黄文进通报美越谈判情况给苏联政府的报告（1972年12月27日）…… 30－172
№06769　基辛格关于北越违反协定转交多勃雷宁的通报（不晚于1973年5月9日）…… 30－176
№06770　谢尔巴科夫关于黄文进通报“联合公报”签署情况给苏联政府的报告（1973年6月14日）… 30－179

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一）

（1968年2月至1982年6月）

专题说明…… 30－182

№03684　格里高连柯就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问题致卡达尔、罗歇、隆哥的信（1968年2月13日）…… 30－183

№04388　奥夫恰连科就乌克兰巡回演出状况致苏共中央的信（1969年5月12日）…… 30－190

№04390　斯克里亚罗夫就乌克兰巡回演出的内容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9年5月27日）…… 30－192

№04389　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乌克兰巡回演出状况的调查结果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9年5月27日）… 30－195

№04391　苏共中央文化部就乌克兰巡回演出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9年7月14日）…… 30－196

№06204　安德罗波夫关于“私下出版物”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70年12月21日）…… 30－197

№06203　苏共中央关于“私下出版物”问题的决议（1971年1月15日）…… 30－201

№06245　同意格里高连柯因私赴美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1977年11月14日）…… 30－202

№06242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邀请《新社团》杂志编辑部访苏的决定（1981年1月27日）…… 30－204

№03351　安德罗波夫就神秘主义教派活动情况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81年前后）…… 30－206

№11738　安东诺夫等人关于为西科尔斯基恢复名誉致苏共中央的信（1982年3月17日）…… 30－208

№04379　扎哈尔琴科关于为西科尔斯基恢复名誉致苏共中央的信（1982年3月17日）…… 30－211
№04380　谢尔巴科夫等关于为西科尔斯基恢复名誉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82年4月29日）…… 30－212
№06244　苏共中央文化部关于莫斯科小型文艺节目剧院演出状况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82年6月7日）…… 30－214
№06183　叶戈罗夫就出版昂纳克回忆录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82年6月14日）…… 30－216

泛俄罗斯主义问题

（1968年4月至1982年8月）

专题说明…… 30－219
№04564　安德罗波夫关于审理全俄罗斯社会基督教人民解放联盟成员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4月16日）…… 30－220
№04565　安德罗波夫就伊万诺夫和谢马诺夫的反苏活动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81年3月28日）…… 30－224
№04566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关于免除谢马诺夫现任职务的报告（1981年4月22日）…… 30－228
№04567　费多尔丘克关于谢马诺夫的反苏活动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82年8月4日）…… 30－229

苏联与巴黎“五月骚动”事件

（1968年5月）

专题说明…… 30－231

№08933　佐林与普利桑尼埃就法国政局的会谈纪要（1968年5月20日）…… 30－233

№08671　佐林与罗歇及杜克洛就法国国内形势问题的谈话纪要（1968年5月21日）…… 30－239

№08672　佐林与居约关于法国国内局势的谈话纪要（1968年5月30日）…… 30－243

苏意两党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分歧

（1968年11月）

专题说明…… 30－246

№06969　苏共与意共代表团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会谈记录（1968年11月13～14日）…… 30－247

苏联对外国政府或组织的援助

（1969年8月至1988年3月）

专题说明…… 30－266

№07010　安德罗波夫就拨款支持印度穆斯林游行示威致苏共中央的信（1969年8月29日）…… 30－267

№06243　安德罗波夫请求支持美国“黑豹”组织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70年4月28日）…… 30－268
№07011　乌里扬诺夫斯基就支持乌拉圭等国党的经费致苏共中央的信（1975年1月20日）…… 30－270
№06065　卡济米罗夫转送尼加拉瓜领导人与恩德尔斯谈话简介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81年11月2日）…… 30－271
№06067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建立支援左派工人组织基金会的决定（1981年12月9日）…… 30－276
№11739　苏共中央关于1981年度基金开支情况和建议批准1982年度基金的通报（1981年12月9日）… 30－278
№06078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向越南、老挝内务部提供无偿援助致苏共中央（1988年3月9日）…… 30－280
№11740　拉林关于向越南、老挝内务部提供无偿援助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88年3月16日）…… 30－282
№11741　苏共中央关于向越南、老挝内务部提供无偿援助的决定（1988年3月28日）…… 30－284

涅托赴韩国旅行问题

（1971年9月）

专题说明…… 30－287
№04561　体委关于涅托前往韩国旅行问题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71年9月13日）…… 30－288
№04562　斯克利亚罗夫就涅托至韩国旅行问题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71年9月21日）…… 30－291

对索尔仁尼琴的严密监视

（1972年6月至1974年1月）

专题说明…… 30－292

№06189　安德罗波夫就索尔仁尼琴离婚问题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72年6月21日）…… 30－293

№06191　安德罗波夫关于索尔仁尼琴离婚案的报告（1972年8月8日）…… 30－295

№06190　马利沙科夫关于索尔仁尼琴离婚案上诉情况的报告（1972年9月1日）…… 30－296

№06194　安德罗波夫关于《索尔仁尼琴文集》出版情况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72年11月27日）…… 30－297

№06192　安德罗波夫关于索尔仁尼琴打算再婚致中共中央的报告（1972年12月6日）…… 30－299

№06193　安德罗波夫关于索尔仁尼琴为儿子洗礼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72年12月30日）…… 30－300

№06195　安德罗波夫就索尔仁尼琴支持者反社会活动的报告（1973年11月14日）…… 30－301

№06196　别利亚耶夫关于对丘科夫斯卡娅的处理情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74年1月15日）…… 30－304

关于剥夺罗斯特洛波维奇国籍的问题

（1974年3月至1978年12月）

专题说明…… 30－305

№07622　罗斯特洛波维奇关于出国申请给勃列日涅夫的信（1974年3月29日）…… 30－307

№07623　大剧院演员要求驱逐罗斯特洛波维奇致勃列日涅夫的信（1974年4月5日）…… 30－308
№07624　苏联文化部关于同罗斯特洛波维奇谈话情况致苏共中央的信（1974年5月12日）…… 30－310
№07625　阿勃拉西莫夫关于准许罗斯特洛波维奇及其家人出国演出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4年5月20日）…… 30－313
№07626　安德罗波夫关于罗斯特洛波维奇启程时的情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74年5月31日）…… 30－315
№07627　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关于罗斯特洛波维奇在国外行为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4年11月16日）…… 30－317
№07628　波波夫关于延长罗斯特洛波维奇护照有效期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74年12月16日）…… 30－319
№07629　绍罗和阿勃拉西莫夫关于延长罗斯特洛波维奇护照有效期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4年12月31日）…… 30－321
№07630　安德罗波夫关于罗斯特洛波维奇在国外行为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75年5月8日）…… 30－323
№07631　安德罗波夫等关于对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的措施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6年11月）…… 30－327
№07632　苏驻美大使馆关于罗斯特洛波维奇信件致苏共中央的电报（1977年3月22日）…… 30－330
№07633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华盛顿来电的决议
（1977年3月24日）…… 30－331
№07634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禁止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在苏联巡回演出的决议
（1977年10月19日）…… 30－332

№07635　维什涅夫斯卡娅和罗斯特洛波维奇要求延长护照期限致勃列日涅夫的信
（1978年2月1日）…… 30－336
№07636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取消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苏联国籍的决议
（1978年3月14日）…… 30－337
№07637　维什涅夫斯卡娅和罗斯特洛波维奇关于被取消国籍致勃列日涅夫的信（1978年3月17日）… 30－341
№07638　苏驻法大使馆关于同罗斯特洛波维奇谈话给苏共中央的通报（1978年3月28日）…… 30－344
№07640　柯西金关于取消罗斯特洛波维奇国家奖金和列宁奖金获得者称号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8年12月7日）…… 30－347
№07639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取消维什涅夫斯卡娅和罗斯特洛波维奇的苏联国家奖励的命令
（1978年12月11日）…… 30－348
№07641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取消罗斯特洛波维奇国家奖金和列宁奖金获得者称号的决议
（1978年12月15日）…… 30－349

“护卫”号反潜舰兵变事件

（1975年11月至1976年7月）

专题说明…… 30－351
№07003　格列奇科关于“护卫”号反潜舰部分人员的违纪行为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5年11月10日）…… 30－352

№07004　戈尔什科夫等就“护卫”号事件的调查情况致格列奇科报告（1975年11月17日）…… 30－353
№07005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萨布林案件”的诉讼程序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76年7月14日）…… 30－362

关于勃列日涅夫寿辰及其著作

（1976年11月至1986年8月）

专题说明…… 30－363
№07001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勃列日涅夫70寿辰庆祝活动决议（不早于1976年11月30日）…… 30－364
№06206　雅科夫列夫关于停止销售国家领导人书籍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86年8月6日）…… 30－367

斯涅吉廖夫放弃苏联国籍问题

（1977年7～12月）

专题说明…… 30－371
№06175　斯涅吉廖夫就放弃国籍致苏联政府的公开信（1977年7月29日）…… 30－372
№06174　安德罗波夫关于制止斯涅吉廖夫犯罪活动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77年9月19日）…… 30－375
№06176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斯涅吉廖夫案件侦查过程的报告（1977年12月2日）…… 30－377

苏联与瓦文萨的意大利之行

（1981年1月）

专题说明…… 30－379

№06055　波诺马廖夫关于瓦文萨意大利之行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81年1月13日）…… 30－380

№11742　苏共中央关于瓦文萨意大利之行的决议（1981年1月14日）…… 30－382

裁军和禁止核试验

（1981年2月）

专题说明…… 30－386

№06056　科尔尼延科关于裁军和禁止核试验与皮尔逊的谈话记录（1981年2月6日）…… 30－387

阿富汗战争及其后果

（1981年3月至1990年1月）

专题说明…… 30－392

№06058　葛罗米柯与弗罗曼－缪里斯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谈话记录（1981年3月20日）…… 30－394

№06059　加夫里洛夫与佩斯考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谈话（1981年4月10日）…… 30－399
№06060　葛罗米柯与恭萨尔威斯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谈话（1981年5月14日）…… 30－401
№06061　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阿富汗问题的会议记录（1981年6月4日）…… 30－404
№06066　里特尔在美国国会上就阿富汗问题的发言简介（1981年6月25～26日）…… 30－407
№06062　科尔尼延科与弗罗曼－缪里斯就阿富汗问题的谈话纪要（1981年9月14日）…… 30－409
№06069　国家计委关于在塔吉克建造医院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83年9月1日）…… 30－416
№11743　布连科夫关于为阿富汗提供医疗服务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83年9月8日）…… 30－418
№05621　戈尔巴乔夫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声明（摘要）（1988年2月8日）…… 30－420
№05622　关于阿富汗问题政治解决的协议（摘要）（1988年4月14日）…… 30－421
№05624　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特赦前驻阿富汗苏军全部犯罪军人的决定（1989年11月28日）…… 30－422
№05623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对苏军进驻阿富汗政治评价的决议（1989年12月24日）…… 30－423
№06072　苏联政府就向阿富汗提供军事援助给苏联驻阿大使的指示（不晚于1990年1月）…… 30－424

苏联最后十年的对外关系

（1981年3月至1991年6月）

专题说明…… 30－426

№06057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勃列日涅夫会见各党领导人的总结（1981年3月12日）…… 30－427

№06063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勃列日涅夫会见各党领导人的总结（1981年9月17日）…… 30－431

№06064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同各党领导人会谈的总结（1981年10月29日）…… 30－435

№06068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接待各国领导人情况的讨论记录（1982年5月20日）…… 30－443

№06070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韩国飞机事件等问题的讨论记录（1983年9月8日）…… 30－449

№06071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处理美国入境飞机等问题的讨论记录（1983年11月24日）…… 30－453

№06967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美国新霸权主义的决议（1986年9月4日）…… 30－456

№06074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美国驱逐苏联工作人员的讨论记录（1986年10月22日）…… 30－461

№06073　扎伊科夫等人关于恢复核试验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86年12月8日）…… 30－466

№06077　切布里科夫关于授予米尔克苏联英雄称号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87年11月27日）…… 30－470

№06079　卡普托关于更新保密总局技术装备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88 年 12 月 6 日）…… 30－473
№11744　苏共中央关于保密总局特工机关技术保障的决定（1988 年 12 月 15 日）…… 30－475
№06080　克留奇科夫就纳吉当年在苏活动的档案材料问题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89 年 6 月 16 日）…… 30－476
№06081　布鲁捷茨和斯洛博佳纽克关于美国向立陶宛提供人道援助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90 年 8 月 23 日）…… 30－479
№06082　马纳延科夫关于举行全军党代会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91 年 3 月 2 日）…… 30－481
№11745　法林就埃塞俄比亚的局势及苏联的对策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91 年 5 月 16 日）…… 30－482
№11746　祖耶夫关于卡尔迈勒返国致苏共中央的信（不早于 1991 年 6 月 19 日）…… 30－487

关于恢复顿斯科伊修道院问题

（1982 年 10 月至 1983 年 1 月）

专题说明…… 30－488
№06945　皮缅为恢复顿斯科伊修道院致勃列日涅夫的信（1982 年 10 月 18 日）…… 30－489
№06946　为恢复顿斯科伊修道院勃列日涅夫致杰米契夫等人的信（1982 年 10 月 18 日）…… 30－491
№06947　关于顿斯科伊修道院历史和现状的报告（1982 年 12 月 14 日）…… 30－492

№06948　杰米契夫等为移交顿斯科伊修道院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82年12月29日）…… 30－494
№06949　契尔年科关于执行移交顿斯科伊修道院的命令给齐米亚宁的指示（1982年12月29日）…… 30－495
№06950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皮缅请求的决议（摘录）（1983年1月4日）…… 30－496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社会矛盾与冲突

（1985年3月至1991年12月）

专题说明…… 30－497
№05610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坚持二十六大方针的讲话（摘录）（1985年3月11日）…… 30－498
№05611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关于继承二十六大方针的讲话（摘录）（1985年4月23日）…… 30－500
№05615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加强同酗酒作斗争的命令（摘录）（1985年5月16日）…… 30－501
№06075　检察院关于鲁斯特刑事案件调查结果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87年7月31日）…… 30－503
№11747　克拉夫佐夫关于发表刑事统计材料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87年9月17日）…… 30－505
№06076　拉林等人关于在公开报刊上发表刑事统计的某些材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不早于1987年9月17日）…… 30－507
№05618　安德列耶娃谈坚持社会主义原则（1988年3月25日）…… 30－510

№05616　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关于公开性》的决议（摘录）（1988年7月1日）…… 30－512
№04430　莫奇利尼琴科就各级官员对精简党中央机关干部的态度致戈尔巴乔夫的信（不晚于1988年9月29日）…… 30－514
№03686　萨哈罗夫就苏联面临的问题在苏联第一次人代会上的发言（1989年6月9日）…… 30－516
№04429　科诺托普就民主化与公开性问题致戈尔巴乔夫的信（1989年6月15日）…… 30－519
№03688　各地代表要求改善民族关系给苏共中央九月全会的信件（不晚于1989年8月）…… 30－522
№05629　苏联人民代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摘录）（1989年12月）…… 30－527
№05617　沃尔霍夫斯基谈“自行出版物”（1990年）…… 30－530
№03980　吉连科等人就采取紧急措施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90年3月5日）…… 30－531
№03981　苏共中央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的决定（1990年3月6日）…… 30－532
№03689　梅利尼科夫就新库兹涅茨克独立工人运动和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果致戈尔巴乔夫的信（1990年5月8日）…… 30－535
№05627　俄罗斯联邦人代会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速记记录（1990年5月29日）…… 30－540
№05631　“苏共民主行动纲领派”关于将苏共财产移作公用财产的决议草案（摘录）（1990年8月4日）…… 30－542
№05632　波洛兹科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991年1月）…… 30－544

№05633　1989年俄罗斯联邦各行政区居民民族成分调查结果（不晚于1991年2月10日）…… 30－546
№03982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各级党委会和党的机关生产经营活动问题的决定（1991年7月11日）… 30－548
№03690　戈尔巴乔夫关于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的申请（1991年9月24日）…… 30－551
№03691　关于独立国家联盟的条约草案（1991年11月）…… 30－552
№03692　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共和国首脑声明（1991年12月8日）…… 30－560
№03693　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1991年12月8日）…… 30－561
№04066　斯米尔诺夫关于不赞成发表列宁文件致苏共中央的信（1991年12月14日）…… 30－565
№13001　独立国家阿拉木图宣言（摘录）（1991年12月23日）…… 30－568
№0369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宣言（1991年12月26日）…… 30－570

关于出版古米廖夫学术著作的争论

（1987年3～6月）

专题说明…… 30－572
№03224　古米廖夫关于学术著作被禁止出版致卢基扬诺夫的信（1987年3月10日）…… 30－573

№03225　齐赫文斯基就古米廖夫的著作出版问题致苏共中央的信（1987年4月30日）…… 30－575
№03226　利哈乔夫等就古米廖夫的著作问题致雅科夫列夫的信（不晚于1987年6月3日）…… 30－579
№03227　格里戈里耶夫和斯克利亚罗夫就出版古米廖夫的著作呈苏共中央的报告（1987年6月3日）…… 30－581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事件

（1988年2月）

专题说明…… 30－584
№07045　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局势的会议记录（1988年2月28日）…… 30－586

思想理论和党组织工作状况

（1988年3月至1991年8月）

专题说明…… 30－611
№07012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国内不安定情况的汇报（1988年3月21日）…… 30－612
№03654　苏共中央关于改革问题的全苏思想理论工作者会议速记摘录（1990年10月11～13日）…… 30－614
№03983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俄罗斯联邦党组织工作的通报（1991年8月13日）…… 30－619

关于历史案件的平反（二）

（1988年12月）

专题说明…… 30－623

№03685　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1988年12月25日）…… 30－624

第比利斯的动荡

（1989年4月至1990年4月）

专题说明…… 30－638

№07586　帕季阿什维里就第比利斯局势致苏共中央的电报（1989年4月7日）…… 30－639

№07587　帕季阿什维里就第比利斯局势致苏共中央的电报（1989年4月8日）…… 30－641

№05634　苏联内务部部队关于驱散人群的作战命令（摘录）（1989年4月9日）…… 30－643

№07588　帕季阿什维利关于使用武力致苏共中央的电报（1989年4月9日）…… 30－644

№07589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使第比利斯局势正常化措施的决议（1989年4月10日）…… 30－646

№07590　卡普托等人关于下发维护法制的通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89年4月10日）…… 30－647

№07591　帕夫洛夫建议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第比利斯事件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89年4月29日）…… 30－649
№07592　苏共中央关于第比利斯事件的决议（1989年4月29日）…… 30－651
№07593　卢基扬诺夫关于转交格鲁吉亚电报给博尔金的便函（1989年12月5日）…… 30－652
№07594　诺维科夫关于转交格鲁吉亚电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89年12月6日）…… 30－653
№07595　苏联人代会委员会关于第比利斯事件的决议（1989年12月9日）…… 30－654
№07596　吉连科关于致格鲁吉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全体劳动人民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90年4月4日）…… 30－681

【专题说明】

战后农民生活

（1947 年 2～8 月）

本专题选编了几份涉及战后苏联普通农民日常生活状况的档案。战争给苏联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加上 1946～1947 年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这里虽然只是偷窃土豆一类琐碎的生活小事，却也真实地反映了 1947 年苏联农村社会状况的一个画面。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赵宏、陈俐佩翻译）

№03679

罗斯托夫州检察长关于农民强行购买小麦给苏联检察院的特别报告（摘录）

（1947年2月22日）

机密

1947年2月3到4日间的夜里，罗斯托夫州马丁诺夫区Б－奥尔洛夫卡村村民贡恰洛夫（1923年生，1942年加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村图书馆负责人）得知切特廖赫雅尔斯克村村民基里琴科家中有小麦。收工后，贡恰洛夫来到基里琴科家中要求购买小麦，并扬言，如若拒绝，就要将他打死并抱走小麦。

贡恰洛夫抓起一把小榔头和300卢布来到基里琴科家。贡恰洛夫购买小麦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后来贡恰洛夫又向对方讨要面包充饥，也同样遭到了拒绝。接着贡恰洛夫便举起小榔头照着基里琴科的头部连击4下，将基里琴科打死。随后他将30公斤小麦装进口袋还顺手拿了基里琴科一双毡靴而逃之夭夭。

№03677

农庄庄员伊万诺夫关于偷窃土豆的供词（摘录）

（1947 年 6 月 9 日）

就对我提出的口头审讯，我可以提供如下情况：因为当时我家里没有面包和土豆，已揭不开锅，因此便决定去偷盗什克维尔村苏维埃“什克维尔托夫劳动者”集体农庄地里的土豆。1947 年 6 月 5 日夜里 10 点钟，我去了这个农庄的土豆地里，大约花了两个钟头，在 0.05 公顷的地里挖得大约 16 公斤小土豆块，用军大衣下摆包回家，让妻子安娜·叶戈洛娃煮熟给全家人充了饥。1947 年 6 月 6 日，也是在夜晚大约 10 点钟左右，我带着一把折叠刀去砍作篱笆用的树条，我把砍好的树条放在树丛中，想顺便再挖点儿土豆充饥，便又来到“什克维尔托夫劳动者”农庄的那块土豆地里。挖了大约 20 来个土豆后，集体农庄的护田人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夫跑到我跟前，他二话没说，举起手中的大草叉打在我肩上，紧接着又试图用草叉刺我的腹部，因此我就用随身带来的折叠刀向他刺了两下。我没有见刺到了他的什么地方，因为我当时已处在狂怒之中，伊格纳季耶夫被我用刀刺伤后便扔掉草叉，向名叫瓦西里的人呼救，而我把挖的 20 来个土豆抛在了原地便向家中跑去。

我跑回家，把折叠刀放到了我和全家人居住的浴室的长凳上，便去睡觉了。这时，我妻子和孩子们都在睡觉，我什么也没有对他们讲。第二天，即 1947 年 6 月 7 日，“什克维尔托夫劳动者”农庄

主席博布洛夫来了，随他同来的还有谢苗·沃龙佐夫。他们将我带到他们农庄，然后，区段最高负责人把我送到了内务部波尔霍夫区分局。

从前我并没有进行过偷盗活动……

№03678

布勃列依请求出卖公债致什维尔尼克[①]的信

（1947 年 7 月 5 日）

我今年 73 岁，55 年工龄，现在既得不到面包，也得不到别的食品。每月养老金只有 150 卢布，妻子已经过世，岳母还得由我赡养。

我的处境极端艰难，贫病交加。我曾写信给苏联财政部长，请他准许我将自己面值 2340 卢布的公债券卖给拉宾斯克区储蓄所，然而国家劳动储蓄银行管理总局给我答复说这是不可能的。

根据苏联宪法第 120 条和我所处的困难情况，我请求您下令将我借贷给国家的现款归还予我，以挽救我和家人不致饿死。

此外，请求您把我们两个老年人安顿到一家养老院。

1947 年 7 月 5 日

① H.M. 什维尔尼克，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1736

对伊万诺夫偷窃土豆案的判决

（1947年7月19日）

判　决　书

普斯科夫州法院刑事审判委员会以俄罗斯共和国的名义，于1947年6月9日开庭公开审理了控告伊万诺夫的诉讼案件。

伊万诺夫，伊万·伊万诺维奇，1894年出生，普斯科夫州普斯科夫区扎波里耶村人，俄罗斯族，小学文化程度，非党群众，已婚，无前科，农庄庄员，作案前无固定职业。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7年6月4日发布的关于“追究盗窃国家及社会财产行为刑事责任法”第四条有关规定，听取了被告人的辩解、证人证言、双方辩论，以及审理了案件材料之后，本法庭判决如下：

伊万诺夫于1947年6月5日夜间在集体农庄田里偷挖下种的土豆约5普特。1947年6月6日伊万诺夫第二次盗窃农庄田里的土豆时，被集体农庄生产队长伊格纳季耶夫当场抓获。伊万诺夫被抓时曾进行反抗，刺了伊格纳季耶夫两刀，受害人身体受到轻伤，未危及生命，也未被致残。

伊万诺夫本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证人们的证言以及有关此案的材料也都充分证明伊万诺夫犯罪事实。根据1947年6月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公布的法令第四条有关规定，伊万诺夫的行为已

构成犯罪。依据上述事实刑事诉讼法第 319 和 320 条规定，法庭委员会宣判如下：

根据 1947 年 6 月 4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公布的关于“追究盗窃国家和社会财产行为刑事责任法”第 4 条有关条款，判处伊万诺夫，伊万·伊万诺维奇在劳改营监禁 15 年，剥夺权利 3 年，鉴于本人一无所有，免于没收财产。

犯人伊万诺夫应向普斯科夫法律咨询处缴纳辩护金 150 卢布。案件诉讼费用列入国家开支项目。服刑期从 1947 年 6 月 10 日判决前的拘押期算起。根据原定强制措施对其执行监禁……

№11737

对伊万诺夫偷窃土豆案上诉的裁决

（1947年8月6日）

裁　　决

1947年8月6日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刑事案件审判委员会裁定：

普斯科夫州法院1947年7月19日的判决有效，驳回伊万诺夫的上诉，维持原判。

附　录

伊万诺夫的上诉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7年6月4日公布的法令，被判处15年徒刑的伊万诺夫，伊万·伊万诺维奇就普斯科夫州法院1947年7月19日的判决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委员会提起上诉。

上　诉　状

我认为普斯科夫州法院对我的判刑过分严重，应当从轻量刑，

其理由如下：

法院已查明，我曾居住在拉脱维亚并为那里的一个雇主打工当马夫。5月份，降低了我孩子们的口粮定量，我感到生活艰难，于是我决定返回我的故土加入农庄。1947年5月26日我回到了家乡，立即递交了申请书，请求吸收我加入集体农庄，同时还请求给我救济，因为我有三个7～10岁的孩子。我自己是卫国战争二级残废军人，而家中一无所有，无法生存。鉴于此种情况，我不得已进行了偷窃，为了保住孩子们的生命，走上了犯罪道路。

法院在量刑时未曾考虑到我个人和家庭的具体情况，判处我监禁15年有期徒刑并剥夺了我的自由。

我请求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刑事案件审判委员会给我最大限度地从轻量刑。

【专题说明】

关于克里木州划归乌克兰共和国

（1954 年 1～2 月）

本专题选编的是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档案文件。克里木州位于黑海北岸的克里木半岛，面积 2.7 万平方公里，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人口约 200 万。1921 年 10 月成立克里木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属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辛菲罗波尔市。1945 年 6 月撤销自治共和国建制，改为州建制。

解决克里木州的归属问题，显然是考虑到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的稳定，事情本身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工作程序中一个很简单的过程，但收入本专题的 15 份文件则充分反映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苏联决策中所处的地位——一名副其实的橡皮图章。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李酉生、赵英杰、高增训翻译）

№03993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的会议纪要（节选）

（1954 年 1 月 25 日）

主持人：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与会者：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尼·亚·布尔加宁同志、拉·莫·卡冈诺维奇同志、阿·伊·米高扬同志、马·扎·萨布罗夫同志、米·格·别尔乌辛同志。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成员尼·米·什维尔尼克同志、潘·康·波诺马连科同志。

苏共中央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同志、彼·尼·波斯佩洛夫同志、H.H. 沙塔林同志。

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问题

1. 批准会议所采纳的修正案，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命令草案。

2. 认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专门会议审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报告是适宜的。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尼·赫鲁晓夫

№03994

苏共中央关于将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的决议草案

（1954 年 1 月 25 日）

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命令草案（附后）。

附　录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命令草案

考虑到克里木州居民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居民之间的经济共同性和经营的适宜性，以及历史上形成的文化联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决定：

批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报告。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克·伏罗希洛夫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　尼·佩戈夫

№03996

苏斯洛夫和佩戈夫关于呈请批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的程序给赫鲁晓夫的报告

（1954年2月1日）

兹呈请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审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报告举行会议程序的建议①。

米·苏斯洛夫

尼·佩戈夫②

① 见本专题№03997文件。

② 文件上有维·米·莫洛托夫的批注："已报告赫鲁晓夫同志，无异议。维·莫洛托夫。1954年2月2日"。

№03997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审议俄罗斯和乌克兰联合报告的会议程序的建议

（1954 年 2 月 1 日）

1．今年 2 月 19 日下午 5 时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大厅召开主席团会议。

2．邀请参加主席团会议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方面的人员有：塔拉索夫同志①、济明同志②、亚斯诺夫同志③；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方面的人员有：科罗特钦科同志④、格列丘哈同志和尼日尼克同志；克里木州方面的人员有：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塞瓦斯托波尔市苏维埃主席。

3．在会议开幕时由伏罗希洛夫同志宣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报告将提交主席团审议。

该问题经审议后，先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

① 尼古拉·尼基弗罗维奇·塔拉索夫，1942 年加入苏共，时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②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济明，苏军将领，卫国战争时曾任歼击航空兵师长，时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③ 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亚斯诺夫，1925 年加入苏共，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

④ 杰米扬·谢尔盖耶维奇·科罗特钦科，1918 年加入苏共，1947 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时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

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塔拉索夫同志发言，随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科罗特钦科同志发言并宣读上述两个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定。

根据塔拉索夫同志和科罗特钦科同志的发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发言赞同并支持所提出的这一建议。（伏罗希洛夫同志建议可考虑让什维尔尼克同志、库西宁同志①、费多罗夫同志② 和拉希多夫同志③ 在主席团会议上做简短发言支持所提交的这一建议。）

问题讨论结束后宣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命令草案。

命令通过后伏罗希洛夫同志做简短发言，阐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做出的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决定的意义。

塔拉索夫同志、科罗特钦科同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发言将另行呈报。

4．今年2月20日在报刊杂志上刊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的公告，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命令及塔拉索夫同志、科罗特钦科同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在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

尼·佩戈夫

---

① 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1904年起成为苏共党员。192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

②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费多罗夫，卫国战争时任沃伦州委第一书记，兼乌克兰游击兵团司令。1943年授少将军衔。时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③ 沙拉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1939年加入苏共，曾任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时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03998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
关于克里木州归属问题的决定

（1954 年 2 月 5 日）

于莫斯科市

考虑到克里木州在领土上有依靠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需要，克里木州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间经济的共同性及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决定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恰当的。

请求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议关于将克里木州交给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一问题，同时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交相应的报告。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阿·普扎诺夫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И. 格鲁兹杰夫

№03999

普扎诺夫关于克里木州归属问题致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报告

（1954年2月5日）

考虑到克里木州在领土上有依靠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需要，克里木州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间经济的共同性及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审议了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问题。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认为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联邦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恰当的，并请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议该问题，同时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呈送相应的报告。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　阿·普扎诺夫

№04000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关于克里木州归属问题的会议纪要

（1954 年 2 月 5 日）

会议主持人：塔拉索夫

与会者：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安德列耶娃同志、达尼洛娃同志、谢柳金同志、齐列姆皮隆同志、谢尔巴科夫同志。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济明同志。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布津娜同志、拉达诺夫同志、潘季科夫同志、普什诺娃同志、索科洛夫同志、斯捷潘诺娃同志、茨韦特科娃同志、亚斯诺夫同志。

俄罗斯联邦司法部部长鲁比切夫同志。

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院长比丘科夫同志。

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巴拉诺夫同志。

克里木州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波诺马连科同志。

塞瓦斯托波尔市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索斯尼茨基同志。

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问题

考虑到克里木州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共同

性，领土相邻及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

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本决定呈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塔拉索夫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　济明

№04001

俄罗斯和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克里木州归属的联合决定草案

（不早于1954年2月5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

考虑到克里木州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共同性，领土相邻以及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可以支持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请求，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将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符合进一步加强伟大的苏联各族人民友谊的利益，符合俄乌人民间拥有长久历史以及在反对压迫者和蓄意侵犯俄乌领土的外国占领者的共同斗争中所凝结的兄弟联系和相互支援的利益。从1654年乌克兰与俄罗斯统一之日起俄乌人民兄弟般的联盟和友谊得到了加强和锤炼。现在俄乌人民同苏联各兄弟民族一道共同为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我们请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定。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

№04002

伏罗希洛夫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给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通报

（1954 年 2 月 7 日）

根据中央委员会决定，今年 2 月 19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举行会议审议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问题。

2 月 20 日将就其他日常工作问题举行主席团会议。

现将主席团会议的议事日程和材料发送你们。

请予同意。

克·伏罗希洛夫

№04004

塔拉索夫和济明关于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决定给伏罗希洛夫的报告

（1954年2月9日）

考虑到克里木州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共同性，领土相邻及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恰当的。

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符合苏维埃国家的共同利益，将有助于乌克兰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乌俄人民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兄弟般联系的进一步加强。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于1954年2月5日做出决定，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现将决定呈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塔拉索夫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　济明

№04005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关于克里木州归属问题的决定

（1954 年 2 月 13 日）

于基辅市

在讨论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递交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议的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报告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方面认为，基于克里木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共同性，领土相邻及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将克里木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完全合理的，也是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对乌克兰人民无限信任的证明。

乌克兰人民衷心感谢并热忱欢迎将克里木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定。这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关心进一步加强俄乌人民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兄弟般联系的又一体现。乌克兰政府将对克里木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克里木州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福利予以应有的关注。

遵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报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决定：

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科罗特钦科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　尼日尼克

№04006

科罗特钦科和尼日尼克关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给伏罗希洛夫的通报

（1954 年 2 月 15 日）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 1954 年 2 月 13 日就有关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问题作出决定，现将其呈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科罗特钦科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　尼日尼克

№04007

第三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35次会议纪要

（1954年2月19日）

会议主持人：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与会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М.П. 塔拉索夫同志[①]、М.С. 格列丘哈同志、Ш. 拉希多夫同志、Т. 库拉托夫同志、Н. 多德胡多耶夫同志、Ф.Г. 勃罗夫科同志、М.П. 帕皮扬同志、А. 萨雷耶夫同志、О.В. 库西宁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尼·米·佩戈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А.А. 安德列耶夫同志、А.Д. 巴吉罗夫同志、布琼尼同志、瓦加波夫同志、达尼亚洛夫同志、Я.Э. 卡伦别津同志、列别杰瓦同志、З. 穆拉托夫同志、米·安·苏斯洛夫同志、兹·特·费奥多罗夫同志、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尼·米·什维尔尼克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书记А.Ф. 戈尔金同志。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杰·谢·科罗特钦科同志。

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格·马·奥佐林同志。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格·瓦·济明同志。

---

① 原文如此。经查核，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的是Н.Н. 塔拉索夫。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 B.E. 尼日尼克同志。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会议副主席 B.A. 马斯洛夫同志。

克里木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П.Н. 利亚林同志。

辛菲罗波尔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Н.Н. 卡特科夫同志。

塞瓦斯托波尔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С.Ф. 索斯尼茨基同志。

大家听取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报告。

会上发言的有：塔拉索夫同志、科罗特钦科同志、什维尔尼克同志、拉希多夫同志、库西宁同志、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会议做出决定：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命令[①] 草案（附后）。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克·伏罗希洛夫

① 参见本专题№04009 文件。

№04008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讨论克里木州归属问题的会议速记记录

（1954年2月19日）

克·叶·伏罗希洛夫：我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开幕。

今天我们要审议一项议题，即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报告问题。

还有什么别的建议吗？

（主席团成员们："没有"，"通过"。）

议事日程建议被通过。

我们现转入问题的讨论。请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主席塔拉索夫同志做报告。

塔拉索夫：同志们，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问题已报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议。

众所周知，克里木州位于整个克里木半岛，与乌克兰共和国接壤，是乌克兰南部草原的自然延伸。克里木州的经济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密不可分。从地理和经济方面考虑将克里木州转归兄弟的乌克兰共和国是合理的，也符合苏维埃国家的共同利益。

乌克兰人民自古以来就将自己的命运同俄罗斯人民相联。许多世纪以来他们为反对共同的敌人——沙皇制度、农奴主和资本家以及外国占领者而共同斗争。随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乌俄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更加巩固了，克里木和乌克兰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也更加加强了。

在审议将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共和国的时候，正值苏联各族人民庆祝乌俄统一300周年这一意义重大事件的日子，而乌俄的统一在乌俄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进步作用。

将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共和国符合加强伟大的苏联各族人民友谊的利益，将促进苏维埃乌克兰的更加繁荣，乌克兰的发展也是我们党和政府始终给予极大关注的。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克里木州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们的参与下，审议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关于将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议。

考虑到克里木州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间经济的共同性，领土相邻及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经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同意，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将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合理的。

现在我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4年2月5日的决定提请你们审议和批准。决定如下：

“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问题

鉴于克里木州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经济的共同性、领土相邻及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

席团决定：

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本决定报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

克·叶·伏罗希洛夫：请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科罗特钦科同志发言。

科罗特钦科：同志们！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完全同意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塔拉索夫同志在这里所提出的，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议。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对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在今天的大会上所展示的兄弟般援助的卓越行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鉴于乌克兰共和国和克里木州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共同性，领土相邻和牢固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将克里木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完全合理的，也证明俄罗斯人民对乌克兰人民无限信任和爱戴的最伟大的友好行动。乌克兰人民清楚地知道，同伟大的俄罗斯人民、我们的国家各族人民友好相处就能沿着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沿着自由和幸福生活的道路，沿着共产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苏维埃乌克兰劳动人民牢记并将永远不会忘记，只是由于兄弟般的俄罗斯人民和我们祖国的其他各族人民的友谊、援助、支持，由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经常关心，乌克兰人民才在本民族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繁荣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乌克兰人民同苏联其他各民族的人民一道为完成五年计划，为我们社会主义强国更加强盛而努力奋斗。

今年是乌克兰同俄罗斯统一300周年，特此作为乌克兰、俄罗

斯和全体苏联人民一个盛大的民族节日来庆祝是苏联人民长期友谊的显著体现之一。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请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报告。这项决定将受到全体乌克兰人民的欢迎和感谢。

请允许我向你们保证，乌克兰政府将对克里木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提高克里木州劳动人民物质和文化福利给予应有的关注。

请允许我宣读我们的决定：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报告》的决定。”

在讨论提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议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转归乌克兰的报告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对兄弟的俄罗斯人民慷慨而崇高的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乌克兰人民将会怀着十分满意和万分感激的心情欢迎将克里木转归乌克兰的决定。这是俄罗斯人民对乌克兰人民无限信任和真诚友爱的又一明显的体现，是俄乌人民间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的新见证。

乌克兰政府将会关心克里木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报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

“请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此决定已于今年2月13日通过。”

克·叶·伏罗希洛夫：有谁要发言吗？请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同志发言。

尼·米·什维尔尼克：主席团各位成员同志，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间兄弟友谊的明证。

克里木州作为黑色冶金工业、葡萄种植业、酿酒业、罐头和鱼品工业及畜牧业区，作为优质小麦种植区，它在苏联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克里木州领土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接壤。这一事实决定了克里木州和苏维埃乌克兰共同文化和经济联系的发展。

众所周知，所有这一切都是将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前提。

将面积最大、原料资源丰富、大型工业发达，富含珍贵的天然药用原料的州转让出去，这只有在我们永远从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下获得了解放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办得到。我国一向是把关心人和人的物质文化需求放在首位的。

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最重要的历史性举动将服务于作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部分的克里木州的经济进一步持续发展事业。应当指出，克里木是世界级的疗养地。在它为数众多的疗养院和休养所中有大量的劳动者在这里疗养休息。

克里木在其规模上和药物治疗上是著名的一级疗养地，毋庸置疑，它作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以便更有利地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克里木州将通过扩大种植葡萄、烟草、小麦等有价值的农作物，提高公共畜牧业生产率，使在所有各方面都获得更大规模的发展。

将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将会受到我国人民的欢迎，并使他们受到极大鼓舞。因为他们把这视为共产党英明领导的典范和苏维埃政府对苏维埃乌克兰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关心。

俄乌人民牢不可破的永恒友谊将是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发展的苏联经济进一步巩固的保证。

我完全支持将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议案。

克·叶·伏罗希洛夫：现在请拉希多夫同志发言。

拉希多夫：同志们，将克里木州转归苏维埃乌克兰符合我们伟大祖国的共同利益。这个最重要的具有全国意义的行动将促进乌克兰经济的发展，将使乌克兰和俄罗斯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更加巩固。我们党把苏联各族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充满友谊的大家庭。我们党在自己整个英勇斗争的历程中保存和巩固了苏联人民的友谊，使我们苏维埃国家更加强盛。党教导我们，只要这种友谊还存在并能健康发展，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敌人，对我们来说，都是无所畏惧的。

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正值在全体人民庆祝乌克兰与俄罗斯统一300周年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里，它是共产党致力于发展和繁荣我国人民创造力和精神力量的英明民族政策又一显著的体现。这只有在我们国家才可行，这里没有民族纠纷和民族矛盾。为了全人类的和平和幸福，全体苏联人民生活在和平的创造性劳动的环境当中，对人的关心是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的最高法律。

我热烈支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报告。

克·叶·伏罗希洛夫：请库西宁同志发言。

库西宁：同志们！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的联合报告首先在原则上给予极大的关注。也正是在这方面，它是在我们国家，在国内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实行各兄弟民族牢不可破友谊的列宁主义政策的显著证明。只有在我们国家才能使像俄罗斯这样伟大的民族将一个重要的州毫不犹豫地慷慨地转让给其他兄弟民族。也只有在我们国家才能使得把某些州的领土归属另一个共和国这样最重要的问题毫无困难地经过充分协商，并完全从其合理性、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角度，从苏维埃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各族人民间友谊和信任进一步巩固的利益角度出发得到解决。

只能从这一观点出发来欢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报告。从实际的和政治上的合理性来看，这个报告是完全有道理的。

因此我完全支持这一提案，希望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能批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联合报告。

克·叶·伏罗希洛夫：报告发言的没有了，谁还要发言？也没有。下面请佩戈夫同志宣读建议并发言。

尼·米·佩戈夫：打算通过如下决定："考虑到克里木州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共同性、领土相邻及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

批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报告。”

克·叶·伏罗希洛夫：还有别的意见吗？

（主席团成员：“没有”。）

请对佩戈夫同志刚刚宣读的建议进行表决。赞成的请举手。主席团成员举手表决。请放下。反对的有没有？没有。弃权的有没有？也没有。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议一致通过。

同志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报告所通过的决议，是全联盟各族人民伟大强盛的兄弟大家庭中俄乌人民的团结和牢不可破的友谊进一步巩固。这个具有重大的全国性意义的举动再一次说明，苏联的各主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真正平等和相互理解及尊重各加盟共和国繁荣的相互利益的基础上的。

历史上过去没有，也不可能有国家间的这种关系。过去，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基础是建立在领土争夺，强国企图占领弱国领土的基础上的。只有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条件下，在加盟共和国人民完全相互友好和兄弟般合作的条件下，在管理和经济合理性基础上，各加盟共和国间的领土问题才有这种公正的解决方法。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联邦转归乌克兰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符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整个国家的利益。

克里木州就其历史发展，领土和经济状况，它对整个苏维埃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无论在久远的过去还是不远的过去，敌人不止

一次地企图从俄罗斯割占克里木半岛，利用它掠夺和破坏俄罗斯及乌克兰的土地，建立进攻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事基地。但是俄乌人民在共同的斗争中多次沉重地打击了厚颜无耻的占领者并将他们从乌克兰和克里木赶了出去。经济利益的共同性把乌克兰和克里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已被报告人和发言的同志们雄辩地证实了。克里木和乌克兰之间的文化已有了重大发展并得到深化。克里木州转归乌克兰无疑将会更加巩固这些传统联系。

同志们，这个友好举动发生在苏联人隆重庆祝俄乌统一300周年这一意义重大的历史时刻，这不仅是乌克兰人民的，而且也是全体苏联人民的重大传统节日。各族人民的友谊——是我们伟大的多民族苏维埃国家的基础之一，是我们国家不可战胜的力量和繁荣强大的源泉。我们高兴地知道，俄罗斯、乌克兰和我们辽阔国家的各族人民将会一往无前地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兄弟友谊。让我们伟大的祖国——兄弟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壮大和发展吧！

今天的工作就到此。

我宣布今天的会议闭幕。

№04009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联邦转归乌克兰”的命令

（1954 年 2 月 19 日）

考虑到克里木州和乌克兰间的经济共同性，领土相邻和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

批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木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报告。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克·伏罗希洛夫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　尼·佩戈夫

【专题说明】

车臣－印古什移民风波

（1955 年 5 月至 1973 年 5 月）

本专题涉及的是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恢复后，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重新迁回故地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以及苏共、苏联各级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分析、政策和应对措施等等。所选档案文献的时间从 1955 年 5 月至 1973 年 5 月，整整 18 年，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两任领导人。这 26 份文件反映了车臣人、印古什人在迁移过程中和返回故地后所发生的种种矛盾、冲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意识观念、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苏共、苏联各级政府对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反应不能说不及时，但这些矛盾和冲突远非就事论事所能解决的。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吴玉英、高增训、赵英杰翻译）

№06984

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就埃基巴斯图兹有斗殴情况向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

（1955 年 5 月 17 日）

今年 5 月 15 日 14 时，巴甫洛达尔州埃基巴斯图兹市[①] 的一名通过军事委员部进入煤炭工业的工人同特居地车臣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殴斗。过了一些时候，这个工人来到了被动员服役的工人居住的宿舍，并向他们讲述了所发生的打架一事。此后，30～40 个工人，其中有一部分人喝醉了酒，在街上碰到二个车臣人并毒打他们。赶到出事地点的民警制止了斗殴，而车臣人被带到警察局。

又过了一些时间，由以前当过兵的人组成的工人小组来到警察局，并要求交出被关起来的车臣人。这些当过兵的人在遭到拒绝后便推开警察，强行将车臣人拉到街上并毒打他们。在这以后，有很多居住在城市里的车臣人也被工人们殴打。打架的结果造成三名车臣人被打死，四名被打伤。

为了防止可能的冲突事件，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和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从巴甫洛达尔和卡拉干达向埃基巴斯图兹派出了侦查工作人员小组。

由于采取了措施，秩序完全恢复正常。今年 5 月 16 日，被动

① 埃基巴斯图兹，位于哈萨克共和国境内，1957 年设市，市区人口 8 万多（80 年代）。

员服役的工人们上了班，他们和车臣人之间也再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

正在进行调查，以便查清打架的主谋者并追究其责任。

№06985

内务部长杜多罗夫就车臣局势向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

（1957 年 2 月 15 日）

秘密

苏联内务部报告说，回到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许多车臣人坚决要求把他们安置在那些他们被强制迁出之前的村庄和住所。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和当地居民——阿瓦尔[①] 与达尔金[②] 人之间出现了不正常的相互关系。

在里特利亚布区的莫克索布村，有 32 户车臣人家被临时安置在农村俱乐部。苏共达格斯坦州委书记萨格耶夫同志和苏共里特利亚布区委书记加萨诺夫同志试图把车臣人安置在当地居民——阿瓦尔人的住处。他们请来积极分子，请他们作出榜样，按照自愿让人迁入的原则，每个人接收一户车臣人家。积极分子中谁也不同意这种做法。把一户车臣人家迁入已腾空的房子的尝试，引起了阿瓦尔人的愤慨。约有 100 个打算毒打该车臣人的居民聚集在这所房子附近。由于内务局工作人员的及时制止，没有发生殴打。

此后，一群阿瓦尔人手持棍棒冲向俱乐部，要求撵走村子里的

① 阿瓦尔人，苏联少数民族之一，自称马鲁拉尔人，集中居住在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境内，人口约 50 万，操阿瓦尔语。

② 达尔金人，苏联少数民族之一，自称达尔于人，集中居住在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境内，人口约 30 万，操达尔金语。

车臣人，并威胁要狠揍他们。

根据加萨诺夫同志的指示，第二天，车臣人离开了莫克索布村。

在新农业区，三个车臣人贾努拉利耶夫、多卡耶夫和达达耶夫喝醉了酒，站在文化宫门口，嘴里说着不堪入耳的脏话，不准任何人进入室内。此时，他们还高喊民族主义的口号，其中一人还亮出了刀子并进行威胁。流氓们被逮捕，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在梅日杜列琴区的奇卡洛沃村和新生活村之间的道路上，列宁集体农庄的队长、苏共党员、达尔金人阿斯哈博夫在遇见车臣人帕西尔哈耶夫后，漫骂他并用刀子威胁他。同一天，阿斯哈博夫在用刀子威胁车臣人马哈穆多夫的同时还声称，如果车臣人出现在奇卡洛沃村的集市上，那么就将他们打死。对阿斯哈博夫追究了刑事责任。

内务部正采取措施防止当地居民和车臣移民之间发生冲突。

№06986

达哈达耶夫集体农庄
关于与车臣人的矛盾致布尔加宁的信

（1957 年 4 月 1 日）

我们，以察塔尼赫村达哈达耶夫集体农庄庄员的名义，请求您关注我们的声明。众所周知，前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现在已经恢复，车臣人也正回到自己从前的土地上。在此情况下，令人吃惊的是我们这些已迁移到这同一块土地上的阿瓦尔人处于这样的境地，那就是从前的主人提出要求，并厚颜无耻地抢占了住所和宅旁自留地，还扬言似乎这些财产只是临时属于我们。据此情况就可以想象出，每个人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里的形势是，车臣人和阿瓦尔人之间的民族不和睦正在形成并日益扩大。

135 名车臣人来到我们村，他们中都不去耕耘和不想耕耘由集体农庄分给他们的自留地的，可他们又在那些以前是他们房子周围，或者在那些还在私有制时期属于他们的土地上耕作。庄员们每天都在抱怨车臣人耕种他们的自留地……。庄员们要求我们制止这种非法的事情，但车臣人不听我们劝说，也不承认任何地方政权。

例如在我们的医疗所，一车臣人占用了助产院的房间，把母牛厩养在走廊上，也不听当地组织的任何要求。当传唤他去人民法院时，竟拒绝出庭（在区）。他不服从派来的民警。当民警打算把他带走时，那些车臣人集合起来不让民警带他走。这些扰乱行为也得不到惩罚。

由此可见，组织委员会没有采取或者不能采取任何措施，来解

决这些和许多其他导致民族不睦，直至发展到民族械斗的严重问题。(有理由认为)，即使到将来，这些问题也是无法解决的。考虑到车臣人和居住在此地的阿瓦尔人今后不可能共同生活，我们要求：

1）在最短的时间里将我们迁移走，为此，国家应提供帮助，因为我们在迁移到此地时失去了自己那些比这里车臣人的房子要好几倍的住所，而且我们也不能从这些住所得到任何好处。

2）如果为了我们的再次迁移……[①] 即使只要几个月，……也不要和这些车臣人呆在一起，因为这将导致杀人、抢劫和其他扰乱行为。

人们越来越清楚，这些扰乱行为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车臣人一来到这里便用火枪打伤了庄员的马匹，在车臣人来到以前我们这里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我们将这些扰乱行为写成书面材料交到检察机关，他们也没有采取措施。

我们希望，您能帮助最快解决这个问题和禁止两个少数民族间的内讧。

(签名)[②]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

② 该信是以农庄党组织、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农庄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发出。

№06987

杜多罗夫关于制止无组织移民情况致苏共中央书记别利亚耶夫的信

（1957 年 4 月 8 日）

鉴于车臣和印古什族的前特别移民开始向原籍的大规模无组织迁移，按照您的指示已采取措施立即停止这种迁移。阻止没有组织委员会允许的迁移者进入，并让他们返回原先的居住地。

由于民警道路管理局在地方内务机关的帮助下所采取的措施，到 4 月 8 日早晨为止，车臣和印古什人沿铁路的无组织迁移已被制止。

4 月 5、6、7 日三天内，在喀山、古比雪夫、乌菲姆、南乌拉尔、奥伦堡、塔什干、阿什哈巴德和其他一些路线列车上发现和拘留了 2139 人。给所有被拘留的人员重新办理回程车票，并于 4 月 8 日早晨前将 1876 人随客车送往他们原先的居住地。4 月 8 日 9 时，被拘留人员中没有沿南乌拉尔铁路返回的有 126 人，没有沿奥伦堡铁路返回的有 102 人，没有沿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返回的有 26 人，没有沿鄂木斯克铁路返回的有 9 人。根据民警道路管理局局长的报告，上述人员将随第一趟过往列车遣返。

为了防止特别移民的无组织迁移，今后所有从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开出的旅客列车，都要由交通警察阻截队检查。

根据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内务部长的通知，已采取所有措施不允许雇用前特别移民工作，不取消他们的兵役登记，不注销他们的户口和不向他们出售车票。

此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长卡贝尔巴耶夫同志报告说，现在在共和国各州行政中心聚集了大量被解雇工作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他们变卖家产，并坚决要求返回原籍。

№06988

杜多罗夫关于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要求移民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7 年 4 月 16 日）

秘密

近来有 613 名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试图去高加索时被从列车上揪下来，送往卡拉干达市。

到达卡拉干达市后，他们有 413 名被安置在车站，另有 200 人不愿离开车厢，并要求去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他们声称已卖掉了自己的房子，个人日用品也已寄往高加索了。

在卡拉干达州委大楼附近每天都聚集着大群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拦阻党的州委书记们的汽车，要求把他们送到高加索去。

苏联内务部已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车臣人、印古什人在卡拉干达市制造突发事件。

此外似必须向地方党组织发出指示，采取措施以解决滞留在卡拉干达市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安置和劳动就业。

№06989

车臣－印古什新农业区俄罗斯村民致苏联政府的申诉书

（1957年4月24日）

申　诉　书

我们以居住在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新农业区布科夫卡村的俄罗斯人民的名义向你们申诉。

亲爱的朋友和同志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和伏罗希洛夫，我们，俄罗斯人，向你们，向我们伟大的政府，向这个在争取和平、友谊和民主的斗争中所向无敌的，在我们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可爱祖国的广阔土地上建设共产主义的政府提出申诉，祝愿我们和世界各国的友谊更加巩固，祝愿世界和平，祝愿所有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土地上，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广大土地上的城市和乡村更加繁荣昌盛。

而现在，我们打算向你们讲述关于居住在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土地上俄罗斯人遭受到的命运，以及不断从哈萨克斯坦回来的人们的不友好行为，他们是车臣人、印古什人及其组织委员会。

我们，俄罗斯人，都是在1944年和1945年，1946年和1947年间由苏联政府让我们从各共和国和各州迁居到1944年之前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居住的地方的。除了俄罗斯人外，还有将近15个民

族的居民。俄罗斯人能很快与他们成了朋友，像一家人一样，从事伟大的事业，从事劳动。我们在这个勤劳的兄弟般家庭中生活了12年半。在这12年半的不长时间里，在这些荒芜的土地上，一切都受到破坏，长的全是灌木，既没有一座公共建筑物，也没有一个养畜场。一切都是个体所有。随着俄罗斯人来到这片土地上，我们建立起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清理了那些几世纪以来都没有给俄罗斯人和我们国家带来好处的大片灌木丛。我们建成了水力发电站，在区里建成了文化宫，以及许多公共建筑物，其中包括各行业的商品畜牧场。现今，我们新种植的花园和葡萄园开始开花。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1000公顷土地上，人们开始收获，畜牧业也有了发展。在这12年间，庄员们没有为自己多得到一分钱而劳动。我们勤奋工作是为了将来——为了我们的公共事业。我已经建立起了公共事业。到了1956年，我们按一个劳动日得3卢布得到面包和其他食品。所有村子几乎都是重新建起来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村子甚至在全共和国都能看见。随着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从哈萨克斯坦来到这里，他们粗暴地侮辱我们的成就，嘲笑我们和我们的文化。他们想把我们变成他们的奴隶，他们劝说我们回到那已被我们抛弃、早就忘却了的私有制中。他们经常恐吓我们说，在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领土上，俄罗斯人不仅要留下土地，甚至要留下自己的裤子。他们利用种种借口和恐吓，迫使俄罗斯人搬出住所。他们解释说，这所房子的主人很快就要回来了，他有5个儿子；他是土匪，他要打死你，杀死你。这些俄罗斯人家或者是以300～500卢布变卖房屋和自己的家产，或者躲开，其他人则在车臣－印古什人来到之前扔掉房屋逃跑。我们这里只剩下4名警察连同他们的领导。到今天，警察员额已增加，这一员额不能应付苏联法律的破坏者，同时他们也不能保证居住在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土地上俄罗斯公民的生活。

车臣和印古什人声明，似乎他们从高加索的迁出是不合法的。这是斯大林和贝利亚的错误，因此他们要求从俄罗斯人手中取回自己的房屋和所有他们从前积蓄起来的财产。他们声称，他们在迁出时把所有东西都留在这里，而现在他们强迫俄罗斯人空手跑开，他们还用戏谑的嘲笑口气说，我们的人民很快就要当权了，你们将给我们挖厕所。他们的宣传说，这个政权是用原子弹也炸不掉的。还说，我们车臣－印古什人，大家都应该重新建设自己的良好秩序。我们共和国的所有车臣人，除了规定标准外还应有自己个人使用的马匹、水牛、母牛和绵羊；要杀掉所有毛猪，毁掉葡萄园，将只种植玉米；赫鲁晓夫批准我们所有这一切；土地是我们的，俄罗斯人什么也别想干，俄罗斯人妨碍着我们生存。我们自己能够管理自己的共和国，现在我们将遵守自己古老的高加索法律。从老人到小孩都开始祈祷上帝，推举教士，并说要在教士的领导下创造奇迹，真是不堪入耳。俄罗斯妇女和儿童害怕他们的眼神，因此每天都在发生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事件。

基于上述事实，当前在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我们，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俄罗斯人请求苏联政府给予我们以政府方面的帮助，干预该共和国人们的这些反革命情绪，消除这颗内含反对俄罗斯、反对我们政府的致命毒药的原子弹。

总之，这些人已经竖起了拷刑架，而他们自己还没有弄明白。他们希望在伟大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复辟私有制，还想把共和国变成独立的，独立于俄罗斯人、达格斯坦人和其他人的共和国。哈萨克斯坦没有教育他们，而相反激起他们反俄罗斯人和苏联政府。他们肆无忌惮地在人群中说：反正一样，我们都不同俄罗斯人和达格斯坦人生活一起，二狼不能同穴，要么让我们离开这块土地，要么把俄罗斯人和达格斯坦人从这块土地上赶走。现在大家等待你们的决定和帮助。

我们请你们按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新农业区、布科夫卡村的地址，通知关于由你们提供的政府帮助的结果。

（签名）[①]

① 此处有10个公民的签名。

№06990

杜多罗夫关于移民新情况致勃列日涅夫的报告

（不早于1957年4月）

兹报告，1956年12月底和今年初，由于苏联内务部采取措施防止前车臣和印古什族特别移民向原居住地自行返回，因而他们离开现住地的行动已被制止。

但是，随着春季的来临，上述人员又开始离开居住区；并且不等组织委员会的决定，就出发去车臣－印古什和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在最近时期里，这样的盲流衍成群众性。

今年3月，有404户自行来到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在4月的两天内有80户迁入，现今被阻留在铁路上的还有500多人。

检查表明，这些人员在取消对他们的限制后卖光自己的财产，撤销兵役和其他登记，自行返回原先居住地。

促使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擅自流动的另一原因是经济组织、农机站和集体农庄的领导人通行无阻地解除他们的工作，地方苏维埃机关撤销登记，而铁路行政机关则向他们出售乘行车票。

根据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的通报，前特别移民大量卖自己的财产并准备启程去车臣－印古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结果造成城市和临近车站的乡镇集结了大量游手好闲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

在江布尔市和州的许多地区，约有5000人，或者说有50%以

上的前车臣和印古什特别移民劳动力不去劳动。在东哈萨克斯坦州，约有一半车臣－印古什成年居民不从事公益劳动。在卡拉干达州，30000 车臣和印古什居民中的大部分也不劳动。

游手好闲的车臣和印古什人寻衅滋事，常犯有粗鲁的刑事罪，破坏社会秩序，所有这一切引起劳动者的正义的愤慨。内务机关已采取必要措施制止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刑事犯罪行为，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从那些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返回的许多地区资料表明，前特别移民的无组织大量流入到原先居住地，给安置工作造成了困难。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意按地方权力机关的指示安置，而是要求把他们安置到他们原先居住过的住所。

例如，到达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约 5700 人，拒绝去阿拉吉尔、基洛夫和共和国的其他地区，而要求把他们安置在奥尔忠尼启则市。

据苏联内务部掌握的情报，所有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准备在今年 5～6 月启程去原先居住地。

为了防止车臣和印古什人的无组织迁移，苏联内务部请求：

1．再次向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关于当前特别移民劳动就业的指示，对未经组织委员会允许返回原先居住地者，禁止辞退其工作，不得撤销共青团和兵役登记。

2．委托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组织委员会向全体前特别移民解释清楚，未经组织委员会允许，返回原先居住地者将被认为是违反规定的迁移秩序，将被强行遣送回前居住地。

3．向苏联交通部发出关于出售乘行车票，以及运送车臣、印古什族人返回从前居住地的前特别移民的指示，只有在组织委员会允许时方可办理。

4．允许内务机关拘留那些未经组织委员会允许返回原居住地的车臣和印古什人，将他们从列车、轮船和其他交通工具上赶下来，遣送回前居住地。

№06934

波列欣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7 年 5 月 15 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就地调查表明，苏联共产党车臣－印古什州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6 年 11 月 24 日“关于恢复卡尔梅克、卡拉查耶夫、巴尔卡尔、车臣－印古什民族自治”和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 1957 年 2 月 21 日“关于对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帮助办法”决议执行不力。在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和批准车臣－印古什居民迁移计划之后，这些问题甚至既没有在州的委员会主席团，也没有在党的区委会书记会议上进行研究，乃至到了最近，这项与组织车臣－印古什人劳动就业和迁移有关的工作实际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

在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以后，有 7800 多个车臣－印古什家庭返回到共和国的领土上。虽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多次发出有关迁回居民的劳动就业指示，但到 4 月初，安排就业人员只占有劳动能力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六分之一。党的州委员会及其第一书记雅科夫列夫[①] 同志对车臣－印古什居民的劳动就业问题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针，因而也就没有能够抵制许多地区团体、集体农庄和企业的领导人拒绝接纳车臣人和

① 鲍·巴·雅科夫列夫，1931 年参加苏共。1958 年以后，任吉尔吉斯共和国采购部部长。

印古什人就业和拨给他们个人建房地段的行为。缺乏对这件事情的坚强领导，致使许多州和区团体的领导人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完全弄明白，应该做什么，并且发出了互相矛盾的指示。

劳动就业特别不顺利的情况，发生在约有3000个车臣人家庭居住的脱离达格斯坦的那些区[①]。上述区的领导在这件事情上采取了不正确的方针，但是党的州委员会没有及时予以纠正。直到最近，这些区的集体农庄里，连一个车臣人家庭也没有接收。有些集体农庄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通过了不正确的，有时是带有明显民族主义性质的决定。例如，今年1月14日，在有965人出席的舒拉加特区列宁农业劳动组合的集体农庄庄员全体大会上，竟然通过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全体大会请求苏联共产党达格斯坦州委员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向联盟政府提出关于在达格斯坦苏维埃以及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编成中保留我们区的问题，因为所有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对同车臣人无法共同生活和工作深信不疑，并且坚定不移"。州委书记乌卡罗夫和切尔克维奇同志都出席了集体农庄的会议，但是仍然没有支持接收车臣人加入集体农庄的建议。类似的事实在安达拉尔、里特里亚布·维杰诺和其他区都发生过。

尽管在脱离达格斯坦的那些区，形势已经极不正常，而州委第一书记雅科夫列夫同志却从没有到过任何一个区。

对移民劳动就业问题的不重视和对无论是移民还是当地居民中缺乏应有的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导致了特别是在脱离达格斯坦和北奥塞梯地区的车臣人、印古什人同当地居民之间不正常相互关

① 1944年，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被撤销，该共和国的部分地区被并入达格斯坦－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恢复建制后，这些地区又回到该共和国。"脱离达格斯坦的那些区"即指几度转移归属的地区。

系。有些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不参加社会公益劳动，自私自利，采取不正确的行为，要求归还他们从前的房屋，威胁当地居民，开始购买火枪、马匹，从事投机买卖，对个别公民进行流氓和土匪袭击。地方党和苏维埃机构没有能给这些不正确行为以坚决的回击。

应该指出，在共和国还发生了部分达尔金、阿瓦尔、奥塞梯和俄罗斯居民对移民持有成见的不友好态度。在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还没有回来之前，和车臣人及印古什人无法共同生活的流言蜚语就广泛传播，说什么“强盗来到共和国；不能把他们放进来或者必须离开此地”。由于这种不正确的相互关系，在一些区发生了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打架、斗殴，经常是以这一方和另一方损失而告终。

党的州委员会对共和国许多区的俄罗斯居民开始大规模离境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这样一来，仅在这年春天的一段时间里，就有550个家庭从格罗兹尼市、乌鲁斯－马尔坦和阿奇霍依－马尔坦区出境。

党的州委员会和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组织委员会甚至犯有无组织性，以及与决定成立共和国及车臣－印古什居民迁移有关的其他许多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

考虑到印古什居民迁移的严重困难，车臣－印古什和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苏维埃机关请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组织奥塞梯居民从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纳兹兰向北奥塞梯的迁移工作。但是在研究上述请求之前，该区已开始举行群众性集体农庄会议，并在这些会议上以表决的方法决定迁移问题，指派了派往莫斯科的代表团，签署了一系列决定。所有这一切惊动了居民，许多集体农庄的庄员和农机站的机务人员扔下工作，开始离开该区。这样，从斯大林集体农庄擅自出走了一百多个农户。科斯特－海塔古罗沃农机站的一些拖拉机工作队在春播紧张的几天里没有进行任何播种工作。在莫洛托

夫集体农庄，庄员们开始拆除房屋和集体农庄的建筑物。

很多区在安置车臣和印古什人移民的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是，让他们住在原来属于他们的住所里。这使新旧房主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造成了当地居民的不信任和在许多场合下促使他们出境。

党的州委员会对民族干部的选拔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关心。尽管共和国成立至今已有4个多月，只有极少数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选派到党和苏维埃的机关部门。例如，在党的区委员会和市委员会工作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只有4个，在区执行委员会——3个，在共青团市委员会和区委员会——2个，在农业委员会——5个。到目前为止，共和国也没有出版车臣和印古什文的报纸和作品，几乎没有着手进行准备用民族语言教授车臣和印古什孩子学习。

苏联共产党州委员会主席团在实际工作中不大注意民族共和国工作的特点。在州委全会和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很少注意与成立自治共和国有关的问题。例如，在党的州委员会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情况和措施问题决定》中，一句也没有谈到有关车臣和印古什青年工作问题。共和国的报纸和电台甚至几乎不报道与恢复车臣－印古什民族自治有关的问题。不但如此，报纸甚至不刊登戈尔金① 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成立新的民族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报告。

苏联共产党州委第一书记雅科夫列夫同志和州委员会的其他一些领导工作者没有表现出对工作的应有分寸和灵活，有时错误地对待在组织委员会工作的车臣和印古什人，不大让他们接近州委，不邀请他们出席州委员会，很少吸收他们在报刊和电台上发表意见。

① 阿·费·戈尔金，1916年加入苏共，时为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苏联最高法院院长。

在对待组织委员会委员的态度上雅科夫列夫同志经常表现出缺乏自制能力和粗鲁，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在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逗留期间，我们与党的州委员会一起对克服上述缺点，特别是在对车臣和印古什移民的劳动就业方面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苏联共产党州委员会主席团，我们听取了一些党的区委书记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主席团谴责了舒拉加特区委第一书记阿卜杜拉耶夫同志的错误行为，并鉴于他在对车臣移民劳动就业上不采取措施而给予警告处分。为了具体帮助区委会和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向区派出了党的州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的负责工作人员。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公开了区委第一书记和区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在会上听取了区领导关于执行党的州委员会主席团决议的进程和报告。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到今年 5 月 1 日，7813 个迁入共和国的家庭有 5690 个家庭（9570 个劳动力）已被接受加入集体农庄，并且，他们中部分申请也很快由集体农庄的管理委员会研究。除此以外，安排从事工作生产的有 818 人，农机站——400 人，国营农场——590 人和其他团体及企业——387 人。来到共和国的有劳动能力的车臣和印古什居民的 13070 总人数中有 11760 人安排了就业，或者说是 90%；5668 个农户得到了宅基地，1042 个农户已经有了自己的住房。

考虑到安排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居住和就业的现实可能性，修改了将他们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迁移的计划，同时还制订了奥塞梯居民从纳兹兰区迁往北奥塞梯的工作计划。

由于在脱离达格斯坦那些区的车臣－印古什居民在目前已无法安排和安置，因此决定本市内这些地区的迁移工作不再进行。

已与北奥塞梯和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一起，对在北奥塞梯普里戈罗德区印古什移民的劳动就业共同

采取措施。有380个印古什农户被接收加入该区集体农庄，128人安排到工业部门工作，拟定300个农户有组织地自愿迁入车臣－印古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纳兹兰区的集体农庄。

有关苏联共产党车臣－印古什州委员会工作中的所有上述缺点，由我们向党的州委员会主席团提出意见，同时由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党的机关同州委员会第一书记雅科夫列夫同志面谈 。

苏联共产党州委员会拟定最近在党的州委员会全会上研究执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恢复车臣－印古什民族自治权的决议的进程。

由于俄罗斯联邦许多部不能令人满意地完成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1957年2月21日的《关于帮助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措施》的决议，我们认为必须委托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对完成上述决定加强经常性监督。

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党的机关部副部长　波列欣

№06935

丘拉耶夫就车臣人擅自移民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7 年 6 月 4 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按照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 1957 年 2 月 21 日决议，本年内应将 17000 个车臣和印古什家庭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迁入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最近一段时期，涌入共和国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大增，其中许多人是擅自迁入，而经过批准的移民通常也不住在组委会指定的地区，而是住在自己从前的住处，坚决拒绝到指定的地区居住。这样一来，按计划本年内应向沙利区迁入 1100 家车臣人，实际上目前已经迁入 1700 家左右。类似的情况在其他许多地区都有发生。

大多数外来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这种错误行为，给安置工作和劳动就业造成了混乱，并扰乱了某些地区的迁移工作。

同时还发生了大量这样的事实，即许多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无端挑衅，占领先前属于他们的住所，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流氓攻击，殴打和杀害当地居民。例如，诺扎依－尤尔特区的伊奇恰尔村，车臣人加卡耶夫擅自占据了当地居民库达耶娃的住房。在达赫万村庄，车臣人萨利米尔扎耶夫占据了残疾人加济·马戈缅多夫的住房。在沙利区的波德列斯内村，车臣人阿尔哈诺夫要求腾出现在是女教师赫沃罗斯特同志住的他家原有住房，并用恐吓手段威胁她。今年 5 月 23 日夜间，沙利区的波德列斯内村，几个车臣人擅

自占据了4套住所，这是为少先队夏令营准备的住房。在阿奇霍依－马尔坦区的奥列霍沃村，一户车臣人家擅自住在一所学校里。批准迁入纳乌尔斯卡亚区的29户车臣人家拒绝去该区并擅自占据了格罗兹尼市区正在修理的“化学建筑公司”托拉斯的集体宿舍。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区都有发生。

最近以来，杀害当地公民的事件多起来。5月22日夜间在沙利区的新萨多夫村，一名集体农庄庄员阿瓦人里卡耶夫·巴乌金被杀。杀人嫌疑犯是车臣人穆萨耶夫·赛义德——这所房子的前主人，他已被捕并对他进行了侦查。在得知里卡耶夫被打死的消息后，大批维杰诺区的阿瓦尔人打算去沙利区向车臣人报仇雪恨，由于采取措施才使冲突被及时制止。

在阿奇霍依－马尔坦区的图托沃村庄，由于车臣人和阿瓦尔人为争水浇灌菜园发生争吵，8个车臣人用猎枪开枪射击，打伤3名阿瓦尔居民，一名阿瓦尔女人送命。在纳兹兰区的新阿尔顿村庄的一名印古什人埃塔热夫·伊斯梅尔用火枪打死一名奥塞梯人加耶瓦·加博。

在阿奇霍依－马尔坦区文化宫，三名车臣酒鬼发出民族主义叫嚣，并威胁当地居民：“车臣政权万岁”，“我们要宰俄罗斯人”。

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这些行为导致的后果是，在沙利、乌鲁斯－马尔坦、阿奇霍依－马尔坦、维杰诺、库尔恰洛耶和其他区的很多集体农庄里劳动纪律丧失，庄员们不去上工，而是坚持要把他们连同集体农庄的财产一起迁到其他地方，有些人则停止工作离开共和国。例如，沙利区十月村庄300家农户有140家已经出走。从共和国一共出走了1298家，其中971户是俄罗斯人。

最近以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当地居民寄来的很多信件和电报，请求针对上述事实采取措施和允许俄罗斯人离开共和国。

我们认为必须：

1．将苏联共产党车臣－印古什州委员会和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组织委员会的注意力转移到大力改善车臣－印古什移民的群众性政治工作和生产及劳动就业上来。

为了帮助州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进行这一工作，请在一个月内派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的负责工作人员，内务部副部长，共和国副监察长（名单附后）小组进驻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2．在整顿迁入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居民的安置和劳动就业之前，暂时停止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离开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授权这些地区党的中央委员会与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组织委员会的代表一起，保证今后做好每一批移民迁出的准备，在他们中间进行相应的群众性解释工作，指派护送人员和移民组长，杜绝擅自迁入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3．授权内务部机构和检察机构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遵守迁移秩序加强监督，同时对擅自迁入者采取行政措施，务必使移民分散定居在按组织委员会批准的地区。

加强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内务局警察机构，临时增补人员，将内务部队分队交共和国内务局指挥。

在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所有居民点实行身份证制度，未经组织委员会的允许，禁止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私藏和携带火枪及冷兵器。

4．加强同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对待当地居民态度上所表现出来的暴行、流氓和土匪行为的斗争。在个别情况下，可以进行示范性的开庭审判以及将犯有反社会行为的人员强制迁移到我国遥远的北方地区。

请予以同意。

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党的机关部部长　B. 丘拉耶夫

附　录

派遣进驻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工作人员名单：

1.Б.В. 鲁萨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视察员；

2.А.Г. 梅杰尔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党的机关部指导员；

3.Н.С. 比留科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党的机关部指导员；

4.П.Е. 索茨科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党的机关部指导员；

5.В.С. 米洛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党的机关部指导员，

6.А.Р. 别洛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苏维埃机关部副部长；

7.М.В. 费定，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苏维埃机关部高级指导员；

8.И.Н. 阿布拉莫夫，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副部长；

9.Г.Л. 布里莫维奇，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检察长。

№06991

阿尔萨努卡耶夫[①] 关于通行证发放问题致布尔加宁的信

（1957 年 9 月 27 日）

就在前不久，我们当了带给车臣－印古什居民大灾难的见证人。这场灾难不是自发的，而是由于车臣人和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和领导人在发放向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通行证的错误、欺诈和投机行为造成的。由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组织委员会演出一幕悲剧性的滑稽剧，只有人类历史知道整个民族遭到野蛮掠夺的事件。例如，通行证的发放程序是这样，那就是车臣组织委员会委员的走卒们，正是这些委员，用大量的金钱装满了自己的箱子——每张通行证平均售价 200 卢布。然而，车臣－印古什劳动人民为这种罪恶的欺诈勾当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们将再一次，这已是第二次，成为不幸者和破产者。“即使在贝利亚那个强行迁出的时候，也没有像现在的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组织委员给我们人民造成如此巨大的财产损失”，——车臣和印古什人说。

同时，投机分子和游手好闲者得到允许去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从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组织委员会的委员和领导人那里得到收留和庇护。

受害的人到目前仍然希望，在这些违法行为中有罪的组委会成

① 阿尔萨努卡耶夫，哈萨克农业部总农艺师。

员和组委会主席本人及他在组织迁移工作中的渎职和草率的组织工作将受到严惩。

今年7月，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组委会主席穆斯利姆·盖尔别科夫在其副职托吉耶夫和“受尊敬的”老人们的陪同下来到哈萨克斯坦，才饱尝了自己工作的结果。现在才知道，原来盖尔别科夫和他的亲信们所不安的是，由于投机和欺诈使人民群众在车站和其他地方遭罪，采用什么方法把人们迁移到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保全他们自己，把自己的罪行推在别人身上。他们找到了一条多好的摆脱困境的出路！盖尔别科夫和他的同谋者们，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在共和国需要干部专家问题上投机的同时，利用了认为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时机。

置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暂缓向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迁移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决议而不顾，依据盖尔别科夫下达的任务，副主席托吉耶夫和组委会成员杜库佐夫把所有自己的亲戚朋友编成名册，并把他们（伊斯拉莫夫、埃尔比耶夫、哈姆季耶夫、乌马诺夫及其他人）补上。他们是受过高等专门教育和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专家，所以，恢复中的共和国需要他们；因此，他们已向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申请给这些实际上多半是惟利是图的专家们发放通行证。这样，今年7月18日，由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办公厅，向只居住着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组委会几个领导人的亲属和朋友的所有州执委会发出第31－6号指示，按照组委会的通知允许启程去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工作。其中一条指示规定，仅阿拉木图一个州就向格罗兹尼市迁入15户。顺便还应当指出，地方政权组织（州执委会和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并不检查像特别移民这类人员，而立即签发许可证。

现在，车臣居民中到处散布这样的传闻，每张通知书买卖价是

1000卢布。这些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这些贪得无厌的自私自利者——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组委会成员和他们的同谋者们又一次利用这样的机会，并在这过程中中饱私囊。于是，从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发出了一批又一批个人和集体的“专家”通知书。例如，1957年8月10日发出第1622/29号通知书，由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组委会副主席托吉耶夫签名，将通知去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学校工作的车臣和印古什教师名单发向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列入这张名单的35人中，只有10人在以前曾担任过或偶而担任过教师，而余下的25人则与教师的职务无任何关系。当然，除个别人员以外，这些人不会在学校工作。然而，可以看出，组织委员会将毫不吝啬地用公款向那些由他们通知到任工作的人员支付差旅费。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组委会又一次在居民和工人中制造不满情绪，激起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从个人利益出发，采取对我们来说不适宜的行动，就像组委会在发放通行证时所采取的行动那样。

偶然负责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组委会的盖尔别科夫，用忠实于他的人建立了组织委员会，全然不考虑这些人的业务品质。盖尔别科夫自己被包围在一伙阿谀奉承者、个人名利者、道德败坏者和追名逐利者之中，就像马利萨戈夫、楚季耶夫、……[①]、扬季耶夫和其他人。

天生意志薄弱和没有原则、不具备任何其他方面优良品质的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组委主席盖尔别科夫，实际上在今后也不能够保证完成党和政府在现阶段确定的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运动的任务，因为他不是一个任何国民经济部门的专家。在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

他的思想方面，在他的工作中，可以说，盖尔别科夫主要是依赖老人和族长的“威信”。过去，在担任高加索师政治委员和苏联共产党车臣－印古什州委第二书记时，盖尔别科夫就辜负了党和政府的信任，成为1944年车臣和印古什人迁移工作中的主要罪魁之一。

因此，盖尔别科夫和他的组委会全班人马没有得到，也不会得到车臣－印古什人民的信任和爱戴。依我们的意见，为了事业，拟应当解散这个不能胜任自己任务的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组委会的班子，应该惩罚那些利用职务捞取个人好处的罪人。

我请求你们：1．采取相应措施解决该问题。

2．有关个人问题可召我去莫斯科。

№13000

别洛夫[①] 就阿尔萨努卡耶夫来信处理情况给亚斯诺夫[②] 的报告

（1957 年 10 月 4 日）

苏共党员阿尔萨努卡耶夫从阿拉木图市给尼·亚·布尔加宁同志写了一封声明信，他在信中通报了关于严重扰乱向车臣和印古什人发放迁入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许可证的事实。作者写道，组织委员会的某些人，如果托吉耶夫、杜库佐夫，以及组委会主席盖尔别科夫同志，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以民族专家干部返回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为借口，首先让自己的亲戚朋友返回共和国。除此以外，阿尔萨努卡耶夫写道，某些与发放通行证有关的工作人员，从车臣和印古什人处受贿。

同时，阿尔萨努卡耶夫对组委会现职人员表示不信任，并建议改组组委会的组成和更换组委会主席盖尔别科夫同志。他认为盖尔别科夫是一个意志薄弱和没有原则的人，他在过去的工作中犯有重大过失，甚至有政治错误。

苏维埃机关部已经知道，扰乱车臣和印古什人迁移到自己共和国的秩序，以及部分工作人员在发放迁移证件时所犯的舞弊行为的事实，已在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和苏共中央书记处讨论过，那些犯罪者为此受到了惩治。今年 8 月 12 日，在格罗兹尼市有苏共中

① A. 别洛夫，时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苏维埃机关部副部长。

② 米·阿·亚斯诺夫，1956 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57 年改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7 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

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同志在场举行了党的车臣－印古什州委全体会议，在这个会上讨论了与消除车臣和印古什人返回自己共和国中的缺点有关的问题，在共和国已采取措施整顿好所有这些事情。

至于组委会委员托吉耶夫同志和杜库佐夫同志的过失，党的车臣－印古什州委会已经给予他们严肃的党内处分，并警告他们，如果再出现任何新的扰乱，那么就要撤销其职务，并更严厉地追究其党内责任。

我认为，采取上述措施已经可以了，对阿尔萨努卡耶夫同志声明信的处理到此结束。

№06994

亚斯诺夫关于特别身份证制度给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

（1958 年 10 月 27 日）

秘密

苏联共产党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州委会、苏联共产党车臣－印古什州委会和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提出请求，在纳尔奇克市和毗邻地区的居民点，以及在格罗兹尼市、小格别克市和格罗兹尼地区建立特别身份证制度。

提出这些请求的理由在于：最近以来，向上述城市和居民点涌入了大量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和精神堕落分子，他们游手好闲，破坏社会秩序和进行刑事犯罪。考虑到上述情形，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请求允许在纳尔奇克市和毗邻地区的白河、哈萨尼亚、沃尔内阿乌尔居民点和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水泥和石灰厂，在格罗兹尼市、小格别克市和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格罗兹尼地区建立由苏联部长会议 1958 年 10 月 21 日第 2666～1124 号决议确定的关于公民身份证条例第 40 条款规定的公民身份证限制制度。①

① 文件上有批示：“发至内务部（杜多罗夫同志）、国家安全部（谢罗夫同志）、检察院（鲁坚科同志）和最高法院（戈尔金同志）审定。1958 年 10 月 31 日。弗·科兹洛夫”

№06995

杜多罗夫关于特别身份证制度给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

（1958年11月26日）

秘密

对于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1958年10月27日关于在纳尔奇克市和与其毗邻地区的居民点，以及格罗兹尼市、小格别克市和格罗兹尼地区建立特别公民身份证制度的第572号信件，苏联内务部报告如下：

依据苏联部长会议1958年11月1日的第3631号指示，在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格罗兹尼市和格罗兹尼地区已经依据身份证细则第40条的规定实行了限制。

至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纳尔奇克市和其邻近的居民点，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小格别克市，苏联内务部认为，在那些地方建立特别公民身份证制度是不合适的。

警察机关工作实践证明，在那些或另外一些地方规定特别公民身份证制度并不能减少刑事犯罪。在公民身份证受到限制时不少家庭拒绝登记并怂恿他们中的许多人再次犯罪。从另一方面看，由于规定特别身份证制度而确立的限制，破坏身份证制度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的数量反而大大增加。

№06993

诺斯科夫[①] 对施瓦尤克案件所做的结论

（不早于1958年12月15日）

依照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1958年12月15日的判决：

格奥尔基·马克西莫维奇·施瓦尤克，1914年出生，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马哈奇卡拉市人，俄罗斯族，职员，被捕前（1958年10月1日）是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古捷尔梅斯国营农场主任、水利工程师，受过高等教育，非党人士，有家庭。1948年3月9～10日，由莫洛托夫州克拉斯诺卡姆斯克市区级人民法院第1分院依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09条被判处6年刑期的劳动改造。

依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章第59条第2款1“A”和第59条第2款，被剥夺自由10年（按刑法典的第1条），不剥夺公民权，但没收财产。

法院认定施瓦尤克犯罪事实是：1958年8月27日，积极参加了发生在格罗兹尼市的，由敌对分子和流氓分子挑起的，伴有煽动民族敌对情绪，使用暴力和个别情况下打死人的群众性骚乱，其具体活动为：

1．1958年8月27日，罪犯从古捷尔梅斯市到格罗兹尼市后，得知骚乱一事，便在自己的住宅里以群众动乱参加者的名义起草了

① B．诺斯科夫，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检察院监督国家安全机关侦查处一级检察员。

一份所谓的决议草案。晚上10时，他携带该草案来到苏联共产党车臣－印古什州委会大楼，流氓们正在那里施暴，他把草案分发给骚乱的参加者，于是这份《草案》立即用打字机打出很多份来，并向那些聚集在苏联共产党州委会大楼附近的骚乱参加者宣读。这份由施瓦尤克撰写的《决议草案》，究其内容是具有挑拨性的，用来挑起民族敌对，在草案中提出了侵犯车臣和印古什人民民族权利的要求。

2. 还是在1958年8月27日晚上，罪犯伙同胡作非为的流氓到邮政局，倡议同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接待室通电话，并以闹事者的名义提出了沙文主义性质的要求。

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决定判决从1959年2月9日起生效。犯人的有罪判决是根据法院开庭时审讯平丘克和佩卡尔斯基的证词，以及与案件有关的物证（案件所附的所谓《决议草案》），确定施瓦尤克手迹的字体鉴定文件和结论。

罪犯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并供称："……我不否认自己所做的事情，但认为这些事情不构成犯罪……

……我在公共汽车上听到别人谈话。他们说，由于野蛮殴打化工厂工人而决定举行集会……听到此事后，我充满愤慨，就在家里写了集会决议草案并去了广场。一到广场，我便顺路去党的州委会，在那里我把这份决议草案交给了2名共青团员……

……我在州委会待了大约5分钟，但当我发现在这里无事可做时，便又回到广场上。我一直盼望有一个集会……我在广场上看到人群围着一个满身是血的男子，而我也就不知不觉走进了人群。受害者从人群中向我挤过来，我害怕身上沾上血污，使劲把他推开，便终究还是沾了一身血。我用尽全力挤出人群，又去了党的州委会，在那里碰到了佩卡尔斯基。我和他一起上了3楼，顺路进了第一书记接待室，在那里看见一位将军，他请求把办公室让出来……

我支持这个将军的要求，但人们把我称作奸细……当佩卡尔斯基走到我跟前并建议我离开州委会时，我赞成他的意见，于是我们俩又从大楼来到广场。在广场上我们看见人们举着一面旗帜走到邮政局。我和佩卡尔斯基没有与人群一起走，而是独自走。在邮政局我和佩卡尔斯基走散了，人群把我挤进一间小屋。话务员接通了莫斯科的电话，但当时因为没有一个人去说话，于是我便接过了话筒。我开始同莫斯科交谈，同党中央第一书记接待室交谈。我问他：‘您是否知道格罗兹尼市发生的事，人们等待着莫斯科的代表来这里，应当结束野蛮的杀人行为，事情已到了要求恢复格罗兹尼州和强行迁出车臣人的地步’……

……决议的内容在我个人书写的文章中。文章……是我个人书写的……我认为，我的决议草案不是为了挑起民族敌对。当我到达州委会时，已经是晚上 8 时左右。我没有注意到被打坏的标牌和打碎的玻璃。往里走时，我也没有注意到大楼里发生的事情……在转交决议草案时，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而交出草案之后，我才发现发生了骚乱……没有任何人委托我起草决议草案，也没有任何人委托我同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接待室谈话，是我自己主动同莫斯科交谈的……”

证人在法庭作证：

平丘克：“施瓦尤克对我说，他是自觉参加格罗兹尼市居民游行示威的，认为自己的要求是正义的”。

佩卡尔斯基：“1958 年 8 月 27 日晚上 9 时，我在党的州委会遇到施瓦尤克，我们一同来到第一书记接待室，又从那里去了广场……我和施瓦尤克去邮政局，在那里我们走散了。我在电车上第二次见到他。他告诉我，他把电话打到莫斯科，并同第一书记接待室谈了话。他告诉我说，在格罗兹尼出事了，对此莫斯科回答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施瓦尤克告诉我，他在打电话时通报了自己的姓

名……后来他告诉我说，在广场上有人打了车臣人，并且还说，他写出并转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当我在党的州委会时，不知道是谁告诉我，没有记住是谁，从党的州委会阳台上宣读什么文件，也就是草案，在该草案中提出要求变共和国为格罗兹尼州，要求强行迁出车臣人。这个草案受到人群的认可和赞成……”

在犯人施瓦尤克起草的《1958年8月27日格罗兹尼市劳动者示威决议草案》中指出：“考虑到车臣－印古什居民对其他民族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凶残态度，械斗、杀人、横行霸道和侮辱他人行为，格罗兹尼市的劳动者以共和国大多数居民的名义建议：

1. 从8月27日起，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改名为格罗兹尼州或者多民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2. 允许居住在格罗兹尼州的车臣－印古什居民的数量不能超过居民总数的10%……

……

4. 从1958年8月27日起剥夺车臣－印古什居民与其他民族相比多占有的全部财产。”

1958年8月28日凌晨2点钟，在苏联共产党车臣－印古什州委会大楼发现了上述《决议草案》和用苏联共产党州委会的公文用纸复写的这份《草案》。

法院－精神病院门诊的鉴定，认定了犯罪人施瓦尤克的责任能力。

按照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法院判决的监督程序，考虑到犯罪人的罪行已经证实，判刑有据，量刑适当，本检察员认为没有必要对车臣－印古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提起监督程序，无疑议。

遵照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428条，我认为：

对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法院关于施瓦

尤克一案的判决，放弃监督程序，没有疑义。

将犯罪人施瓦尤克的申诉书和本决定（2份）呈送监察局主管，交俄罗斯联邦检察院刑事案件法院裁定。

对施瓦尤克诉讼案卷送至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部档案管理处继续保存。

№06936

奥尔洛夫转交苏共中央的关于车臣和印古什居民的调查报告

（1959年8月28日）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A.B. 阿里斯托夫同志

根据协商结果，现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司法部部长H.A. 戈尔舍涅瓦同志和司法部一级顾问M.Ф. 奥尔洛夫同志的关于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之行的报告呈上，以了解车臣和印古什居民中的血亲复仇和其他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残余。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　C. 奥尔洛夫

致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
C.Д. 奥尔洛夫同志

报　告

鉴于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收到的有关在车臣和印古什民族中发生的血亲复仇和其他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残余的材料，我们便前往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直接到车臣－印古什人居住的地区了解这些问题。

为此，我们在乌鲁斯－马尔坦和沙利区——车臣人居住的最大

地区，以及在基本上是印古什人居住的纳兹兰区住了下来。

在这些地区，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同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人员，以及各村庄的代表，通常是“长者”，也就是说是在当地居民中最受尊敬的年长者（因年龄和功绩）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会的有：有30～35年党龄的苏联共产党党员；国内战争参加者；红色游击队队员。

根据座谈，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信件中所介绍的情况，已经查明，血亲复仇、收彩礼（以赎金买新娘）、强迫婚姻、一夫多妻制、私设公堂（按伊斯兰的“习惯法”），都要比估计的更加广泛。

同血亲复仇和其他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残余作斗争的问题，对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来说，是迫切的问题。埃卡热夫农业委员会代表盖图基耶夫在给《格罗兹尼工人报》编辑部的文章中写道：“……没有一个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没有尝过血亲复仇的苦果……可见，同这种野蛮的现象作斗争是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共同的事情”。

某些公民的无论是制造，还是突发的杀人行为，或者伤害其他的居民，以及侮辱或损害他人道德或财产的每一件事情，几乎都会引起受害者氏族（家族——几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向杀人者、欺侮者的氏族（家族）宣布血亲复仇。而受害者或其亲属自愿放弃血亲复仇的事情是极其罕见的，而放弃报仇，实现和解，也应该按照当地的风俗举行。由欺侮者氏族一方向另一方负担丰盛的酒宴，而对印古什人来说，除此以外还有“为流血事件交付和解报酬”的规定，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由谁规定的，这种报酬是25000卢布，由杀人者氏族向被杀者氏族支付。悄然放弃血亲复仇的事情一般来说是不常见的，因为这被看做是受害者整个家庭的耻辱。在有些情况下，个别家庭之间的血亲复仇持续几十年之久，事件的时间

太久就不能保障肇事氏族的男人（血亲复仇只在男人中进行）的安全。如果血亲复仇事件持续70年以上，那么就得一代接一代地继续下去。按照现行风俗，报仇并不是一定针对有罪者，也可以针对任何一个男性亲属，即使他对造成不正当行为或冤案没有任何关系。

例如，今年6月在乌鲁斯－马尔坦村庄里，公民塔尤波夫，在报不知什么时候他手上受的轻微刀伤之仇的（假如不是手上的刀疤被他那些经常嘲笑他不敢血亲复仇的同村车臣人发现的话，他早已想不起这点小伤了）同时，于是便决定加害公民塔尔希戈夫（早先打伤他手的那个氏族代表之一）以类似的伤势为报复，塔尤波夫用车轧伤塔尔希戈夫，并在他受伤倒下后抓住他的头去撞石头，造成严重脑震荡。塔尔希戈夫的亲属不是立即将受伤者送到医院救治，而是长时间地抬着他在村子里游行，以便使居民们确信塔尤波夫的残暴行为 。因为没有得到及时医治，塔尔希戈夫由于失血过多，并主要是由于脑震荡死亡。对此事，塔尔希戈夫一家扬言要对塔尤波夫血亲复仇。已经2个多月过去了，塔尤波夫氏族的18个男人，其中包括农业委员会书记塔尤波夫，因害怕遭到牵连而躲起来不敢出去上工。同时还得知，塔尔希戈夫族人跟踪的不是直接肇事者本人，而是农业苏维埃书记，因为后者是塔尤波夫氏族中最有威望的成员，似乎对死者塔尔希戈夫“更具有等价的意义”。致伤塔尔希戈夫的塔尤波夫因此也没有被逮捕。

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和对其起诉还不是血亲复仇的终点。只有肇事者死于监禁的地方，报仇才能中止，因为按当地的理解，好像是“以血还血”。

目前，通过暗中查访某些生活在山村地区公民的方法，得以查明320桩正在继续的流血仇恨事件。但是上述数字无论怎样都远没有反映出该共和国血亲复仇风气的实际普遍程度。

与当地居民的谈话表明，血亲复仇的风气，收彩礼和其他类似的风气，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沉重地压在车臣和印古什人身上。但是，多年以来形成的关于放弃血亲复仇是可耻的以及因此而害怕受到嘲笑的观念妨碍着人民摆脱这些陋习。

例如，纳兹兰区的普列耶夫村公民奥斯卡诺维·马克舍兰、穆罕默德和卡吉别基尔在信中写道："我们是1959年6月28日从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回到故乡的。我们这里有两个血仇杀手——加拉耶夫家的穆赫塔尔和扎布拉尔（都是阿卜杜勒的儿子），居住在阿尔哈斯特村。我们所忍受的这种敌视是很难用语言描述出来的。我们家庭中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绝对没有任何不道德的行为。或者现在干活，或者呆在家中。我们应该在工作中与其他人员交往……而这被搬弄是非的人认为是蔑视印古什人的习惯法。请求您把我们的事情列入应当和解的议事日程表上。"

血亲复仇习俗的泛滥，实际上将整个家庭、家族都与社会隔离开来，妨碍这些家庭从事社会性公益劳动和参加会议、聚会及其他群众性活动。

纳塞尔－科尔特村村民K.C.阿尔谢利戈夫在致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И.А.阿尔马佐夫同志的信中写道："1958年5月7日，我向您讲述了自己自1933年10月4日以来血亲复仇的苦楚，我因此而从小辍学，到现在又被迫离开社会公益劳动。我要活下去，而不顾遭到暗害……由于这些野蛮的规矩，由于个别酒鬼或流氓挑起的血亲复仇却使很多人孤立起来。我们的氏族有20个人，他们都被孤立起来不能参加会议和隆重的节日……"他接着写道，他们不能参加社会公益劳动，不能去电影院、剧场、图书馆和阅览室。"为成千上万的人消除这一耻辱……让人愉快地从事社会公益劳动"。

祖传生活方式的许多陈规陋习在部分车臣和印古什居民中的存

在，证明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群众性解释和教育工作。例如根据纳兹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捷巴耶夫同志承认，关于同血亲复仇的风俗、收彩礼和其他风俗的斗争问题，无论是在村民大会上还是在区的和在村苏维埃的会议上都没有讨论过一次。基层党和共青团的村组织非常少，而在一些村庄里连党员都没有。因此，氏族（家族）的首领在村居民中势力很大。在家族中有不少人赞成放弃血亲复仇的风俗，但仍有一些人同意保留上述风俗。除此以外，还存在着将伊斯兰习惯法置于法院审判之上的非法审讯，这就更加助长了血亲复仇的遗风。

同当地居民的座谈会开得很活跃。几乎所有参加座谈会的人都热切地希望根除这些可恶的残余。在乌鲁斯－马尔坦、沙利和纳兹兰区执行委员会的座谈会上，大约有150人出席（每村或山村2～3人）。有些公民不顾年迈，从离区中心20公里的村庄赶来。约有90人发言谴责上述风俗并提出与之斗争的具体建议。所有发言者一致感谢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注同血亲复仇风俗的斗争。与会者认为目前流行的血亲复仇风俗和收彩礼是车臣和印古什人民的灾难。

例如，在乌鲁斯－马尔坦，公民季莫尔卡耶夫在发言时说："由于血亲复仇而杀人的人都知道，他也会为此而被枪毙，但他还是做这件事。这就是说，不可以用武力来解决，只可以用说服的办法来解决。要所有人民都积极行动行来"……季莫尔卡耶夫接着说："苏维埃政权像父亲关心孩子一样地关心我们。他们看透了我们的心思。谢谢"。

公民沙姆萨托夫说："我们——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很少，少到可以藏在帽子下面的程度，但这种可耻的现象——血亲复仇——也只有在我们这里有。这种可耻的事该结束了。我们来到山村并广泛讲道理，以便使全体人民行动起来。但是宽恕血亲复仇的凶

手（也就是肇事者）不等于不惩治他。应按法律送法庭审讯他”。

公民苏丹诺夫说了下面一段话：“我们与一些敌对国家交界，它们总想和我们打仗，而我们强大的国家却努力与它们友好相处。为什么我们不以我们的国家为榜样呢？在哈萨克斯坦，一个人打死了我的堂兄。杀亲凶手来到这里而我却宽恕了他们。死者有一个儿子。我正在竭力教育他，使他永远不拿刀杀人”。

公民米尔佐耶夫说：“大家都是泛泛而谈，而应该说具体的。我应该杀人，但我当着这个委员会宽恕自己的杀亲凶手。从今以后，他想住在哪儿就住在那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号召其他与会者也这样做”。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但是，很遗憾，他的倡议没有得到响应。因为上面提到的塔尔希戈夫家族的首领也是座谈会的参加者，他虽感谢对有关血亲复仇问题的讨论，但对宽恕塔尤波夫家族的声明没有表态。

与血亲复仇一样，在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仍然广泛流行着诸如强迫姑娘出嫁、抢亲、一夫多妻制这样的风俗。在我们同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谈话时，他们说，彩礼的危害一点也不比血亲复仇给他们带来的危害少。彩礼的数目很大（1万～2.5万卢布），以至许多家庭不得不受到巨大的经济冲击。

座谈会期间提出了不少针对与血亲复仇作斗争的建议。大部分与会者建议建立一个由党的和苏维埃机关代表，以及在居民中最受敬重的当地无党派公民组成的调解委员会，上述调解委员会当着公民的面，对敌视双方进行调解。调解委员会的建立无疑会带来很多好处，可以帮助消除大部分现时存在的血亲复仇现象，这些调解委员会是1928年在印古什自治州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于1928年11月5日《关于同血亲复仇风俗的调解工作》建议建立的。据当地居民反应，该调解委员会在调解敌视家族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同血亲复仇风俗斗争只采取这一种

措施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调解委员会的成立，不能保证不再引起新的血亲复仇的冲突。

必须在居民中开始广泛的解释工作，说明血亲复仇和其他世代因袭的习俗的危害。在居民、特别是在青少年一代中进行经常性的教育工作，要从小学生起培养孩子对血亲复仇的不妥协态度，因为现在有些父母使孩子们养成了奉行血亲复仇风俗的习惯，而学校和社会又不对这种影响用不妥协的态度加以抵制。因而就发生了15～16岁的青少年参与血亲复仇的事件，而他们的亲属蒙受委屈还在他们出生之前。

向血亲复仇风俗和其他与苏维埃道德不相容的风俗发起坚决的打击，拟从苏联共产党州委、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以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车臣和印古什人民发出呼吁书（信）开始。该信中用通俗易懂的方法讲述上述风俗与苏维埃道德的不相容性，它的不合法性以及奉行这些风俗阻碍着车臣和印古什人民的发展和带来的巨大危害。以最最浅显的、具体的实例指明这些道理。在这封信中还应宣布与这些风俗斗争的措施。号召人民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如果同血亲复仇斗争不能成为全体车臣和印古什人民的事情的话，则斗争不会取得胜利。

这样的呼吁书（信）在村会议上，在集体农庄的会议上，在共和国的国营农场、企业、机关和学校广泛讨论。

与此同时，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还应当通过关于建立调解委员会（共和国和区级）的决议，规定其工作程序，并应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1928年11月5日针对该问题的决议相一致。

已经到了同按习惯法非法审讯作斗争的时候了。这些法庭实际上并不是秘密的，因为往往都知道在什么地方和针对什么问题习惯法法庭才开庭，但是由于害怕招致血亲复仇，往往就听之任之。

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领导对血亲复仇风俗盛行表现出极大的不安，并以同血亲复仇斗争为准则提出有关刑事法律的补充建议。其中包括建议依法确定将由于对任何居民实行报仇而拒绝调解的人员永远从共和国境内中迁出的可能性。强制迁出该类人员可连同其家庭全体人员，不论报血仇是个人犯罪，抑或家庭成员也参与报仇。

根据我们的意见，现行刑法（第 194～204 页）已能保证法律系统同祖传生活方式遗迹斗争的需要，再颁布补充法律是不合适的。况且，同血亲复仇风俗和其他不良风俗作斗争光靠惩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主要的是要在居民中做好坚持不懈的教育解释工作。采取刑事惩罚的措施只有在居民受到报复这种必要的特殊场合，并应让居民都知道。

关于从共和国境内永久性强制迁出顽固坚持血亲复仇风俗的人员及其家庭全体人员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一建议会给社会主义的法律带来极大的损害。

有关我们在乌鲁斯－马尔坦、沙利和纳兹兰区举行座谈会的情况，以及关于同血亲复仇和其他祖传生活方式遗迹的风俗作斗争的建议都已经详细地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领导人 И.А. 阿尔乌佐夫同志、А.В. 捷普萨耶夫同志、М.И. 科乌尔罗夫同志，以及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М.Г. 盖尔别科夫同志交谈过。

司法部部长　Н. 戈尔舍涅瓦

司法部一级检察长　М. 奥尔洛夫

1959 年 8 月 14 日

№06937

谢列平就车臣与当地居民不和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9年9月9日）

第2689号—III

绝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兹报告，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7年11月9日关于取消对特别移民限制命令颁布之后，已有10109名车臣人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返回到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土地上，他们主要是分布在共和国的哈萨维尤尔特、巴巴尤尔特和基齐尔－尤尔特区。

尽管这些区给予车臣特别移民生活和劳动就业很大帮助，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仍表示不满，并坚持要求将他们迁移到从前居住的地方——达格斯坦地区的新拉克斯科耶和卡兹别克区，在那些以前属于车臣人的住宅里现在居住着从山区迁移来的拉克人和阿瓦尔人。

例如，今年6月，在卡兹别克区的斯大林阿乌尔村举行的一次解释有关身份证制度的集会上，一名擅自移居此地的苏联共产党党员维季耶夫发言并声明："我们不承认达格斯坦政府的这个决议，我们也不受它的制约。我们出生在这里，我们来到这儿是为了魂归故土。我们应该为此而斗争，去打仗、去死，我们会做到这一点的"。

同月，车臣权威人士乌卢比耶夫和伊萨耶夫在同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谈话时声称，对于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政府以不大的小组形式把车臣人分配到各区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做法是不能同意的，因为它限制“发展他们的民族文化的可能性，不允许学习民族语言，导致车臣民族的灭亡……”

由于车臣人和居住在当地的拉克人和阿瓦尔人之间出现的形势，表现出不健康的相互关系，有时还伴随着动刀子打架和杀人，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活动带来不良影响。

例如，因害怕车臣人的不良行为，从“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十年”国营农场中离职出走了 50 户俄罗斯和其他民族的家庭。

在卡兹别克区斯大林－阿乌尔村，住有 60 户擅自迁居的车臣人的集体农庄里，上工人数缩减到 50%。集体农庄庄员们因害怕当其不在家时，车臣人会抢占他们的房屋而不敢外出上工。

考虑到出现的这种形势，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采取措施，揭露那些进行敌对活动的人员。

我们认为，在车臣人居住的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地区，党和社会团体采取补充措施，以消除车臣人和当地居民之间的民族不和是适当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A. 谢列平

1959 年 9 月 9 日

№11738

波列欣关于下发戈尔舍涅瓦报告给苏共中央的通报

（1959年9月15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工作人员H.A.戈尔舍涅瓦和M.Ф.奥尔洛夫同志关于在车臣和印古什居民中的血亲复仇和其他祖传生活方式残余的报告，已发到苏联共产党车臣－印古什州委员会，以便采取措施。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党的机关部将对克服报告中所指出的缺点实行监督。

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党的机关部副部长　波列欣

1959年9月15日

№06996

哈吉耶夫[①] 关于车臣移民安置问题致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的报告

（1960 年 3 月 31 日）

关于车臣居民从中亚地区迁往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境内的某些问题

由于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民族自治的恢复，以及由于维杰诺、库尔恰洛耶、萨亚萨和诺扎伊－尤尔特等区划归共和国，根据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 1957 年 4 月 12 日第 206 号决议，1957 年内要将 4000 户集体农庄庄员（达格斯坦人）从上述地区迁入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境内。

由于特殊情况，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对俄罗斯联邦及其部长会议的指示，在 1957～1958 年间，从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这些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迁移了 14414 户达格斯坦人（约 6 万人）。

在这段时间里，以前居住在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 4629 户居民中，有 3508 户车臣人从中亚地区返回共和国。除此以外，到 1959 年 1 月 1 日，有 210 户平原地区的集体农庄庄员按计划迁至共和国——山地居民因各种原因仍没有安排好生产经费

① M. 哈吉耶夫，时任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常驻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代表。

而留在原地。

这样一来，就需要给18132户移民安排生产经营和建设必要的文化－日常生活条件。

不平衡的迁移和缺乏必要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1.2万户移民现在不得不住在临时搭建的住所。

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到1960年1月1日已盖起标准移民住房4000套和临时（将来的生产棚子）移民住房5200套，现正在建造4604套标准住房，其中已有50～60%基本建成。

有80%以上的上述移民分别安置（分开居住）在卡兹别克、新拉克斯科耶（前阿乌霍夫）和共和国的哈萨尤尔特（基本上是在市区内）区，给这些本来就只有极有限经济和生产条件的地区造成了人口过剩。

1944年以前，在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内居住着约4700户车臣居民。截止1960年3月1日，共返回了3508户（车臣人），其中有2128户被安置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企业中工作。现在在中亚地区尚有1131户从前居住在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车臣居民。

应该特别指出，许多车臣人家庭，破坏迁移计划和有关法律，未经允许而返回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擅自居住在哈萨尤尔特市、哈萨尤尔特区、卡兹别克区、新拉克斯科耶区和基济尤尔特区，因而在这些地区出现困难情况，一部分迁来的车臣居民既无住房又无工作。由于入迁人口过剩，以及有限的土地和经济条件，这些区也没有力量接收增加的居民，并安排他们劳动就业。

苏联共产党达格斯坦州委会和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关于继续在巴拜尤尔特、基济尤尔特和基兹利亚尔地区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安置并安排车臣居民的建议是正确的，因为上述各区具有相应的经济条件，并且劳动力明显不足。

但是，考虑到大量不能保障住房和基本上不能安排劳动就业的移民，最适当的办法应是停止滞留在中亚地区的车臣居民返回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领土，直到 18132 户移民完全安排好生产业务和劳动就业为止。

№06992

涅兹韦茨基[①]关于伊萨耶夫案件的报告

（1960年6月25日）

按照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法院1958年10月17～18日的判决，伊萨耶夫数罪合并被判处剥夺自由10年。

维克多·叶戈罗维奇·伊萨耶夫，1907年出生，俄罗斯人，受中等教育，非党人士，有前科（1954年，依照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109章被判处剥夺自由3年；1955年，依照1955年9月3日命令被判刑），1941～1943年间在军队服役，有3个成年孩子，在追究责任之前无业。

伊萨耶夫是依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章第58条第10款（剥夺自由10年），刑法典第1章第59条第2款（剥夺自由5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章第59章第7款（剥夺自由5年）而被判决的。

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1958年9月13日裁定判决有效，驳回上诉状。

根据俄罗斯联邦检察院案件结论中可以看出，法院认定伊萨耶夫的罪行是："1958年8月26日，他积极参加了发生在格罗兹尼市的群众性骚乱和同时发生的对政权机关代表施行暴力，殴打公民，以及在某种场合下故意伤害他人。

① 涅兹韦茨基，苏联检察院监督国家安全机关侦查处检察员。

伊萨耶夫在广场上面对胡作非为的人群，发表了诽谤共产党员和苏联人民民主自由的反苏演说，煽动企业停止生产，号召撤销车臣和印古什的民族自治权，唆使混乱的参加者对苏联共产党的成员实施暴行和对身体使用暴力”（摘自判决书）。

在法院受审的伊萨耶夫部分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供认：“1958 年 8 月 26 日，我全天忙于家务。晚上 7 时，我去了八月大街的新百货商店。

在那里我听说，车臣人打死了一名化工厂工人，人们都集合在列宁纪念碑附近表现自己的不满情绪。

我立即把篮子交给妻子跑向广场。

那里确实有一大堆人，许多人发表演说。

在某个人发言后人群中不知谁大叫：‘罢工’。我同样很气愤，并向周围的人说，我要发表演说。人们支持我，把我举起来，于是我就开始演说。

在演说中我讲了车臣人的暴行，讲了杀害行为，……并要求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到场。除此以外，我还讲了假共产党员，并要求惩罚他们。演说完，我便沿列宁桥方向走去，并哭了起来。一个公民向我走来并对我说，他 1941 年就入党了，如果你这样说了，那么就先打我吧。我告诉他，我讲的不是全体共产党员。

现在我认为，我做的演说是未经思考的，也没有看清楚那一天所出现的情况。

目击者供出我的情况是不真实的。当我回家时哭泣的时候，有一个妇女走过来安慰我。

我告诉他，我现在不工作，我有很长的工龄，一切都使我愤慨，比如说不录用我去工作。

我整天呆在家里，做饭、去集市、去商店”。

回答问题：

“我承认我的罪行在于，我发表演讲并愚蠢地说到车臣移民方面，说到假共产党员。

关于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州委的假党员，我没有说过。关于罢工，我也什么都没有说。

8月26日，我喝了2杯葡萄酒和一杯啤酒。我根本就不能喝酒和抽烟。

我不认识目击者，那他们为什么要强加给我不适之词，我真不明白”。

在谈话结束时他说：“我承认我有罪，由于愚蠢犯下罪行。请法院考虑到我的胃病”。

证人在法庭上作证词：

邦达连科（钳工）：“1958年8月26日，我去国家出版图书贸易管理局，看见伊萨耶夫。在广场上，我看见了聚集在一起的人们。我走近些就听见舍佩廖夫同志讲话，他说，不要受人挑拨。

我特别注意伊萨耶夫是因为他开始说关于换了装的白卫哥萨克和其他什么。他的发言不成功，他就离开了。

接着是州委会的工作人员讲话，人们发言，伊萨耶夫再次发言。

人们又一次把他举起来，他又开始讲话。他说，在州委员会中有假共产党员，但这句话我听得不清楚，所以我不能肯定，他讲的是关于州委会的共产党员。我只是只言片语地听了他的发言，因此我无法提供详细情形。我记住了伊萨耶夫的衣服，而且我还注意到，伊萨耶夫喝醉酒了”。

柳比娜（区委会工作人员）：“我能认出伊萨耶夫。1958年8月26日我们在区委开会……会议结束时通知我们说，在广场上发生了骚乱……我刚走到广场就注意到，伊萨耶夫被不知是什么样的人们举起来，而他就开始发言。他说，可以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刻到

来了，打倒假共产党员。他要求中央委员会的人到场和强行迁出车臣人。

这时，又有一个公民被举起来，他们两人中不知是谁说：‘打倒苏维埃政权’。现在，我也许说不出全部情况，但在侦讯中我讲得更详细，我证实我所作的证词。

伊萨耶夫头戴草帽，上身穿西服。在广场上，我不多见伊萨耶夫，但我看到了当人群走到州委会时，人们第二次把他举起来的情景”。

哈赫维阿什维利，1941 年出生，他说：“我是在 8 月 26 日见到伊萨耶夫的，当时广场上聚集 着人群。我是伊萨耶夫发言的见证人。他讲到要强行迁出车臣人，讲到白卫哥萨克，讲到州委会中似乎有假党员。他讲到化工厂停工，他还说，如果保持住红色大锤工厂和其他东西，那么许多事情都可以做到……他建议去邮局与莫斯科联系，他要求领导人从中央委员会来此。

开始的时候，当伊萨耶夫讲到要强行迁出车臣人时还有人听他的，而当他讲其他事情时，则没有人听他的，甚至有人把他扔在地下。伊萨耶夫说，工人受到排挤，终于到他发表意见的时刻了。我对自己所作的证词敢肯定。初起我没有认出伊萨耶夫，后来打听到了，而现在可以肯定，这人就是他”。

塔博洛夫，1943 年生，8 年级学生。他说：“8 月 26 日我在广场上看见伊萨耶夫，现在我能认出他来。那天 6 点钟我去广场，看见我熟悉的警察。他请我帮助赶走那些像我这年龄的所有孩子。我帮助他赶人，就在那里看见人们把伊萨耶夫举在手上，他就开始演讲。

伊萨耶夫在演讲中说到，化工厂正在罢工，还有红色大锤工厂的一部分。

他请人们不要走开并继续听他演讲……他说，当他同白卫哥萨

克作战的时候，还没有见到州委会的工作人员，而现在，在州委会里有假党员。他要求强行迁出车臣人。

他在发言中说，大俄罗斯要站立起来；打算把人群集合起来。

伊萨耶夫的讲话我听得很清楚，因为当他被举起来时，他差一点抓住我的肩膀”。

亚列西科，苏共党员，苏维埃党机关警卫员。他说：“1958年8月26日晚上，我在州委会大楼附近，我听见集会的人群中有喊声‘打倒共产党员，消灭共产党员’。同时他还用手指着州委会说，那里全都是假共产党员。我走向伊萨耶夫，因为这些话都是他说的。我告诉他，我从1941年起就是共产党员，你就先从我打起吧。伊萨耶夫头戴草帽，身穿短袖汗衫。当我听到伊萨耶夫讲话时，他是在州委会的两排树木之间的林间小路上。我认出伊萨耶夫，我肯定自己的证词，我一辈子记着伊萨耶夫的讲话”。

巴拉科夫（苏共党员，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8月26日，我在广场执行公务，那里集合着人群。

很多人发表演说，而我特别注意伊萨耶夫的演讲，以前我并不认识他。

他说：‘打倒共产党员，打倒假共产党员－法西斯分子’。

然后他说，苏维埃政权毁坏了他全部生活。一个公民向他走去并对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就打我吧’。这大约是6～7～8时。伊萨耶夫头戴草帽，其他衣服我没有记住。听了伊萨耶夫的发言感觉到，他是喝醉了。我跟在伊萨耶夫后面很长时间，他总是走在人群中，唆使攻击人群。我清楚地记住了伊萨耶夫，不会搞错的。”

综上所述，犯人提出重新审理他的案子的理由不能成立。

№06938

季托夫和拉普钦斯基
关于车臣人安置情况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3 年 10 月 2 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收到了生活在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车臣人许多来信来电，他们在信中提出意见，说在共和国内车臣族居民的公民权利遭到破坏。他们提出问题，要求允许车臣人迁居到那些在 1944 年之前生活过的新拉克斯科耶和卡兹别克区，废除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决议为这些区确定的身份证制度。写信者请求给予生活在哈萨尤尔特市的部分车臣居民在劳动就业方面的帮助，筹备车臣语广播，恢复出版车臣报纸，在学校开设用本民族语言教授车臣族孩子的附加班级。

按照委托，我们与苏联共产党达格斯坦州委员会和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的领导人一起，就地调查和研究了这些问题。

在 1957 到 1963 年的这段时间里，约有 6389 户、28000 人车臣人从中亚返回共和国。他们分别迁居到以下地区：哈萨尤尔特市——2300 户，哈萨尤尔特区——3736 户，卡兹别克区——163 户和新拉克斯科耶区——150 户。

根据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 1960 年 5 月 4 日《关于帮助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哈萨尤尔特区车臣族居民劳动就业

措施》的决议，在那里建立了两个果品蔬菜国营农场，建设了几个居民新区。用于建设新住宅和给居民购买牲口花费贷款2.4亿卢布，开拨出大量建筑材料。给1769户家庭一次性无偿货币帮助。在所有车臣人住的居民点上都建有学校、医院、商店、俱乐部和其他文化生活设施。大部分车臣居民被安排到哈萨尤尔特区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及哈萨尤尔特市企业就业，他们都有自己的住房，通常是在国家提供贷款帮助和物资保障情况下建成的。有350多名车臣人在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任领导职务。有3名车臣人当选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29名当选市和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代表，135名当选农业委员会代表。

但是，在许多年里，一些车臣人一直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机关提出请求，要求归还车臣人从前的阿乌霍夫斯克区（现为新拉克斯科耶和卡兹别克区的一部分），并允许他们迁移到这些地区的集体农庄。

就地研究这些问题表明，继续向新拉克斯科耶区和卡兹别克区的两个居民点（列宁－阿乌尔，加里宁－阿乌尔）迁移居民已不可能。在这些土地上居住着9000多拉克和阿瓦尔居民，这些居民是19年以前从共和国耕地很少的山区迁移来的，已牢固地定居在现今居住的地方。集体农庄在这些年里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公共事业，用以巩固经济。在新拉克斯科耶和卡兹别克区，不可能增加迁入人员和保障工作，因为那里缺乏工业，集体农庄的耕地面积总共只有9600公顷，本身的人口密度极高，每平方公里40多人。同时，在现今车臣族居民居住的哈萨尤尔特区，人口密度接近每平方公里23人。所有这些情况都已向写信者们详细解释过，并与车臣居民举行过多次座谈。

调查还表明，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在安排车臣族居民劳动和生产就业上存在严重缺陷。在哈萨尤尔特市，约有

1000 车臣人没有就业，尽管在哈萨尤尔特区，那里专门建立 3 个果品蔬菜国营农场，以及许多集体农庄，都有对劳动力的多方需求。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 1960 年 5 月 4 日决议的执行情况不能令人满意。按照该决议规定建设的罐头厂和仪器制造厂没有开始。预定 1962 年开工的缝纫厂，建设安装工作量仅完成 9.5%，改造和扩建制砖厂的工作进展太慢。在车臣居民居住的许多居民点还没有实现电气化、供水、无线电化的设施；没有完成 500 户私人住宅的建筑；面包、煤油和其他商品供应经常中断。

还应该指出，共产党、苏维埃、工会、共青团组织在车臣居民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非常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在哈萨尤尔特市和哈萨尤尔特区的部分车臣居民中存在着酗酒、流氓、盗窃、破坏劳动纪律的事实。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车臣人中一部分民族主义者的某些团体举止不良，在“以车臣人民的名义”发表意见的同时，破坏车臣居民的秩序，组织派遣团，征集钱财和在声明书上集体签字，威胁要自行迁居到新拉克斯科耶和卡兹别克区，制造与当地居民相互关系方面的紧张及不和睦的形势。他们中的有些人作出挑拨性和反苏维埃的声明。但是，地方机关以无原则的宽容态度对待个别车臣族人员的这些行为。

苏联共产党州委员会主席团研究了对车臣居民劳动和生产就业所采取的补充措施问题。作出决议，将在加快哈萨尤尔特市工业企业建设、完善居民点设施和改善居民文化生活服务方面采取措施。

我们还和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苏联共产党州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一起共同研究文件和声明中提出的其他问题。根据苏联共产党州委员会的意见，将苏联共产党哈萨尤尔特生产管理局党委和哈萨尤尔特市委的俄文版报纸翻译成车臣语报纸，每周定

期出版2～3期。苏联共产党州委员会认为，在哈萨尤尔特市和哈萨尤尔特区组建其他语种地方无线电广播的同时组建车臣语广播也是必要的。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苏联共产党州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将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这些和其他问题提出建议。

至于谈到在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取消某种现行的限制车臣族居民公民权利的请求，那么只有建议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对哈萨尤尔特、新拉克斯科耶和卡兹别克区，列宁－阿乌尔、加里宁－阿马尔村中，按照1958年7月16日决议规定从特种移民点迁来的人员，继续保持身份证制度合理性问题再进行研究之后是有可能取消的。依我们看来，限制上述地区移民的措施可以根据苏联现行法律来实施，而接收加入集体农庄——根据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规定予以办理。

我们认为，责成俄罗斯联邦国民经济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北高加索国民经济委员会采取实际措施，加快由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1960年6月4日决议规定的哈萨尤尔特市的缝纫厂建设和其他许多工业设施的建设，也是合理的。

调查结果我们已向苏联共产党达格斯坦州委员会主席团和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报告。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苏维埃机关管理局长　П. 季托夫

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农业经济管理局书记　Г. 拉普钦斯基

№06939

波列欣关于车臣居民迁移情况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3 年 10 月 2 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收到了居住在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车臣人的许多信件和电报，他们在信件和电报中报告说，在共和国内车臣族居民的公民权利遭到破坏，他们提出要求允许车臣人迁居到那些在 1944 年之前他们生活过的新拉克斯科耶和卡兹别克区。信中还提出请求帮助居住在哈萨尤尔特市的部分车臣居民解决劳动就业，以及某些文化生活服务问题。

前往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有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苏维埃机关管理局局长季托夫同志和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农业经济管理局书记拉普钦斯基同志，他们与苏联共产党达格斯坦州委员会和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一起共同就地研究了所提出的问题。

调查表明，继续向新拉克斯科耶区和卡兹别克区的两个居民点（列宁－阿乌尔和加里宁－阿乌尔）迁移居民是不可能的。在这些地区居住着 9000 多拉克和阿瓦尔居民，他们是 19 年以前从共和国的耕地稀少的山区迁移来的现已牢固地定居在这里。在新拉克斯科耶和卡兹别克区，补充增加移民和保障迁入的车臣居民的工作已不可能还在于：那里缺乏工业，耕地面积总共只有 9600 公顷，这里的人口密度极高，每平方公里 40 多人。同时，在现今是车臣族居

民居住的哈萨尤尔特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为23人。

苏联共产党达格斯坦州委员会主席团研究了车臣居民劳动就业和文化生活安排的补充措施问题，拟定了消除现存缺点的实际办法。至于信中提到的关于组建车臣语无线电广播、恢复出版车臣语报纸等问题，那么苏联共产党达格斯坦州委员会和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将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此提出建议。

俄罗斯联邦国民经济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北高加索国民经济委员会采取措施加强哈萨尤尔特市的缝纫厂建设和其他工业设施建设，这些工业设施是由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关于帮助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哈萨尤尔特区车臣族居民劳动就业措施》决议规定建设的。

同时我们认为，建议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对哈萨尤尔特、新拉克斯科耶区和卡兹别克区的列宁－阿乌尔、加里宁－阿乌尔村，按1958年7月16日决议规定，对从特别居民点移来的人员继续保持身份证制度的合理性问题进行研究是完全可能的。

俄罗斯联邦社会保障部长B.C.季库诺夫同志同意这些建议。

季托夫和拉普钦斯基同志对该问题的报告附后。①

请予以同意。

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党的机关部部长　M.波列欣

① 参见前本专题文件№06938。

№06997

帕卡洛夫[①] 关于斗殴事件给布利诺夫[②] 和捷列霍夫[③] 的报告

（1964 年 10 月 6 日）

正像 1964 年 10 月 3 日第 315/C 号专门报告向你们通报的那样，1964 年 9 月 30 日大约 10 时 30 分，在新克拉斯科耶新库尔村，该村的拉克人[④] 农庄庄员大群人马，手持棍棒、铁铲、叉子，企图惩治那些住在村子边缘，在属于列宁集体农庄的土地上盖了房子的车臣人。

由于采取了措施才防止了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虽然如此，还是有两个车臣人——艾达米尔·阿尔霍托夫和扎因丁·阿斯拉纳利耶夫受了轻伤。

人群回到村子的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很长时间不走开，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要把车臣人擅自行动者赶得远远的。10 月 1 日凌晨 1 时，经过长时间的劝说之后，拉克人才各自回家。

通过调查证明，上述冲突起因是车臣族公民强奸新库尔村 16 岁女挤奶员（拉克人）。

此后，在 1964 年 10 月 2～3 日，大约有 400 名车臣人集合成大队，手持棍棒和刀子冲向村子。新库尔村民也打算惩治该村的居

① A. 帕卡洛夫，时任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检察长。
② B.M. 布利诺夫，时任俄罗斯联邦检察院检察长。
③ Г.А. 捷列霍夫，时任苏联检察院监督国家机关侦查局局长。
④ 拉克人，居住在达格斯坦的苏联少数民族。

民，他们之间的冲突幸好被社会治安部和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制止。

10月2日，在新克拉斯科耶区的新丘尔特村附近，手持匕首和刀子的车臣人群袭击了日丹诺夫集体农庄的6名庄员机务人员并致使其受重伤。他们全被送到医院。

针对这些骚乱，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起诉讼，并由安全委员会组成6个调查组进行侦查。

来到事故现场的有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检察长A.Г. 帕卡洛夫同志，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代理主席B.Ф. 卡里博夫同志和公安部长拉祖瓦诺夫同志。

现正在进行仔细侦查，结果将向你们另行报告。

№06998

车臣人小组关于制止镇压致赫鲁晓夫和鲁坚科[①]的电报

（1964 年 10 月 16 日）

对达格斯坦的惩罚组织了大规模逮捕和驱逐居住在新拉克斯科耶地区的无辜车臣人，其目的是迫使他们离开该区。我们请求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没有根据的镇压。

胡季耶夫

卡季罗夫

奥兹达比耶夫

哈桑别科夫

萨拉莫夫

马加马耶夫

佩尔祖卡耶夫

奥尔比耶夫

埃斯卡耶夫

扎伊努拉比耶夫

于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新拉克斯科耶区索克斯科耶

① 罗曼·安德列耶维奇·鲁坚科，1961 年当选苏共中央委员。1953 年起任苏联总检察长。时兼任俄罗斯联邦公安部长。

№06940

安德罗波夫关于车臣治安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3年2月13日）

第283－A号

绝密

特别卷宗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今年1月，对发生在格罗兹尼市的群众性闹事原因初步分析表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高加索自治共和国境内从前迁出去的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其他少数民族，1956年以后返回原来居住地这种形势造成的。由于民族关系紧张导致的骚乱这类群众性闹事，最近几年来在车臣－印古什、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和达格斯坦不止一次发生过。

此外，北高加索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由于车臣－印古什的强制迁移使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内讧的某些缓和只在20年代出现过，当时的居民得到平等权利，解决了土地问题，取消了哥萨克人在北高加索的特权。但是，这些措施还没有根除氏族及伊斯兰教权威的所有制基础和社会地位，它们利用伊斯兰教法典，带头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在集体化的那些年间。民族主义和宗教派别分子经常挑起反社会主义和反苏维埃的演说，在战争年代他们将居民推上了同希特勒军队直接合作，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

民族主义者、伊斯兰教权主义分子、各种个人名利分子至今仍企图利用民族局限性、宗教和氏族残余为个人目的服务。同时，他们在进行教唆，以挑起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其他民族的与他们的群众性迁出有联系的痛苦感情。

目前，三分之二的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居民是从特居地释放后返回的。他们中的不少家庭的亲属和亲近的人，当时曾因参加反苏维埃活动而被追究刑事责任（仅战争期间和强制迁出期间就有 3745 人被捕，有 3078 人因参与匪帮造反而被镇压）。

在 1958 年至 1972 年间，因各种犯罪行为被内务部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有 115455 人，也就是每六个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个人。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服刑期满后就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居住下来。

还应该注意大量没有劳动就业的居民（约 30000 人）以及逃避兵役的人员。顺便说一句，在格罗兹尼群众性闹事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中间，无业人员几乎占了一半。

车臣和印古什居民极度的宗教信仰，他们对伊斯兰教最反动流派——培养对伊斯兰教法典、教长和民族主义传统狂热忠诚的穆里德派[①] 的信赖程度，使形势更加复杂起来。

在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自治共和国，约有 300 个穆里德派的团体从事宗教活动，他们联合着 12000 多名积极的穆里德派分子。伊斯兰教的权威者（教长后代、毛拉、主持人以及其他人物）竭力设法保持和巩固其在各阶层居民中的影响，在青年中从事宗教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共和国学校存在着学生反对无神论的事实；存在着恐吓俄罗斯民族的农村教师和医务工作者。造成一个使

① 穆里德派，伊斯兰教派之一。1817～1864 年高加索战争期间，北高加索山地穆斯林举起圣战的旗帜，反对俄国沙皇的征服。属伊斯兰神秘主义教派。

他们无法在共和国立足的环境。

所有这些分子是传播挑拨性流言蜚语、激起民族间不和睦和民族主义偏见的温床和适宜土壤，尤其是在青年人中，更是如此。

最近几年以来，在激起的类似情绪中，领土问题占据了很大位置。其中，在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就是要求恢复车臣印古什普里戈罗德区，以及在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境内恢复车臣地区。

1972年间，带有明显个人名利主义目的的团体开始在印古什人中特别积极地策动反社会的闹事。他们中有：科斯托耶夫，前苏联共产党党员、前任“裂化工厂”副厂长；卡尔托耶夫，苏联共产党党员、预备役中校；巴佐尔金，苏联作家协会会员；普利耶夫，苏联共产党党员、区执行委员会前主席；奥马尔哈扎耶夫，苏联共产党党员、纳兹兰市医院副主治医生；巴卡耶夫，苏联共产党党员、格罗兹尼糖果十厂厂长；库什托夫，苏联共产党党员、医生、苏联共产党格罗兹尼市委监察委员会委员。值得指出的是，他们中的某些人（例如巴佐尔金）在战争的年代里就表现出了反苏维埃的情绪，而今年1月得到的情报说，他们除了政治性的恶意煽动外，还从事大量外币倒卖活动。

在传播有关普里戈罗德区领土要求的流言中，共和国内的那些从前占据领导职位，而现在在一般工作岗位上的印古什人给了这一团伙以积极的协助。教唆者们为了加剧围绕普里戈罗德区的紧张局势，利用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普里戈罗德区部分领导在处理同印古什居民关系方面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干部配备、劳动就业、公民登记、缺少印古什语的无线电广播和定期出版物，儿童教育困难等等）。

该团伙以“原则性批评”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在生产和文化建设中个别缺点和疏忽为掩护，准备好了一系列

造谣中伤的文件："关于破坏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列宁主义民族政策"，"关于印古什人民的命运"，"民族声明"和"农民声明"。

他们的这些声明书征集到约4000印古什人的签名，签名者基本上都是普里戈罗德区人。他们的做法助长了大部分印古什居民中的不健康情绪，助长了各种对奥塞梯居民不友好的流言蜚语的传播。

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共和国领土上组织侦查工作时就考虑到了所有这些情况，并在调查这些闹事的积极参加者和反社会行动挑唆者时注意到无组织的人群。

当前，正在研究关于追究纳兹兰区散发五月挑唆性的口号人员的刑事责任问题。大约60多名格罗兹尼群众闹事最积极的参加者受到审查，200多人被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传唤。

根据科斯托耶夫团伙与外汇业务有关的单据，对犯罪行为采取了坚决措施，为的是使他们在居民眼中的威信扫地，并以这种方式遮断他们的有害影响。与此同时还在共和国的所有区加强侦查活动，特别是对以前因犯刑事罪被审查的民族主义分子、与穆里德集团有关系的人员、窝藏土匪的人员。

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还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地居民与反苏维埃侨民的联系上，着手揭露和切断在车臣－印古什和北高加索其他自治共和国领土上的反苏维埃中心可能离境的渠道。还在研究由肃反干部来巩固北高加索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的可能性以及加强现有装备的问题。

此外，车臣－印古什的形势继续处于紧张状态：存在着经常不断的挑唆性反社会行为，很多人不顾警告，声明自己决心要争取有利于他们的关于普里戈罗德区的决议。所有这一切都扩大了各民族

之间的不睦，特别是在印古什和奥塞梯民族之间制造冲突，导致不良后果。

因此，在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驻扎特种警察部队，以及研究关于在北高加索共和国领土上重新部署苏联军队的军事分队，以便给予犯罪分子以必要的心理影响的问题都是适宜的。

我们还认为，指派专门委员会再一次研究与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和北高加索其他自治共和国形势有关的材料，并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相应建议也是必要的。

请审阅。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06941

苏共中央关于处理格罗兹尼民族纠纷的决议

（1973 年 3 月 13 日）

第 СТ－74 /45гс 号

特别文件

关于格罗兹尼市反社会的民族主义闹事

12. 授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德罗波夫同志）采取措施，由肃反工作干部巩固车臣－印古什和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机关和加强他们的现有技术装备。

13. 授权苏联内务部（T. 谢洛科夫同志）审核关于加强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和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身份证制度问题。

中央委员会书记

№06942

安德罗波夫关于强化车臣地区安全机构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3年5月25日）

第1191－A

秘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为履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73年3月13日（第СТ－74/45гс号决议第12点）的委托，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增加了车臣－印古什、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编制25名（其中包括军官19名）并以特种技术手段加强了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装备。

在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增设安全委员会第二副主席，加强共和国的部门机构和城市及区的国家安全机关。

还加强了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普里戈罗德区和莫兹多克市分局的侦查人员。

与这些共和国党的机关一同采取措施，用业务熟练的干部充实侦查和侦查技术人员队伍。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专题说明】

农业生产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

（1965 年 2 月至 1975 年 4 月）

本专题选编的文件反映了从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中期，即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前 10 年，苏联农业的生产状况和美苏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对比情况。看起来，不仅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没有解决好苏联的农业问题，就是勃列日涅夫经营了 10 年以后，苏联的农业生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因此，问题的症结显然不在于某个领导人的能力或个别政策的取舍，而是整个经济体制存在着某种难以逾越的障碍。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温玉霞、梁亚妮翻译）

№03647

莫伊谢耶夫[①]就苏联农业状况给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信

（1965年2月1日）

列昂尼德·伊里奇！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

知道你们工作繁忙，但我还是决定亲自给你们写这封信，因为信中要谈的问题，毫无疑问，对我们国家，以至对世界革命运动在今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央统计局刚刚公布的1964年经济状况统计结果，迫使我不得不亲自给你们写这封信。公布的这个统计结果敲了定音鼓。我们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从没有低于70%[②]，农业统计的结果就更难说了。特别让人担忧的是，那些不明智的自吹自擂。吹嘘在过去的一年内已经过分膨胀了的非生产性范围又大大地扩大了，虽然，这是在背后说的，我们早已“入不敷出”。实际用于管理、文化和其他服务方面的经济开支已大大超过了经济承受能力。

我是一个土地问题专家，想就农业情况谈一谈。农业方面目前形成的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时纠正，那将产生无法补救的后果。作出甚微的决议、措施，是改变不了农业这种状况的，我们必须用一年、二年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刺激农业发展的措施，否则农业就可能陷入困境。现在，对农业、农村、农民必须采取重大的

① M. 莫伊谢耶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列宁勋章获得者。

② 原文如此。疑是7%之误。

政治、经济政策的调整，这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那么，迫切要求改变农业政策的必要性从何而来？

这当然是由国内外突出的政治、经济原因所决定。

一、由于斯大林的错误（它们是确实存在的），国内农业产品长期短缺。战后到现在，许多年过去了，我们老老少少对战争仍保持警惕。此前，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曾经饱受战争之苦，如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但战后至今，他们不仅恢复了农业生产，并且很快发展到能向我们出售余粮的地步，真使我们汗颜。而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具有比他们的小农经济更加优越的潜力，然而却没有得到发展。

二、这种经济状况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人民的政治情绪。工业工人的情绪不仅表现在天天抱怨产品的低速增长，而且可能引发可怕的征兆。铁米尔套、新切尔卡斯克[①] 等等事件就是因为当地领导目光短浅、办事马虎所引起的。在农村，不健康的政治情绪的增长表现在，大批劳动者离开农业生产。算一算，如果说国营农场工人的平均工资只达到工业工人平均工资的 2/3，那么，集体农庄庄员的工资则更少了。当然，这也没什么可让人惊讶的。

三、我国农业长期的不景气冲击着世界工人运动。要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对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和世界工人运动的影响作用首先是通过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来实现的。众所周知，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供养了西欧，而现在自己却从西欧进口粮食。由于我们在农业上有困难，所以就不能阻止国外对我们的思想侵蚀。

敌人幸灾乐祸，朋友和盟友中间产生怀疑和动摇，只要回想一

① 铁米尔套，苏联城市，位于卡拉干达州，1945 年前称撒马尔罕镇，60 年代中期人口近 20 万，有钢铁厂、合成橡胶厂。新切尔卡斯克，位于罗斯托夫州的城市，旧俄时代是顿河哥萨克军区的行政中心。60 年代中期人口约 15 万，有机器制造业、化学、食品工业。

下陶里亚蒂的笔记就够了。我们农业的混乱妨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我国农业不成功的原因在哪儿？当然，原因很多。但较大原因是：由于赫鲁晓夫的癫狂行为，他的粗暴的行政命令、操之过急的无根据的计划和建议，造成了农业的困顿。

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造成农业艰难状况3/4的原因在于，我们对商品经济的要求和原则予以粗暴的压制和破坏。党纲领、教科书和许多文章中讲到，社会主义阶段就存在商品生产、城乡商品交换。这就必须考虑和遵守商品经济的原则和规律。而实际呢，实际上商品生产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被破坏了。

实际上：

一、商品经济要求，经济要实现商品的销售。也就是说出售只限于对个人继续扩大再生产时所不需要的产品（如种子、饲料、粮食等），也就是在扩大再生产方面没有很大价值的产品。实际上我们不仅收购真正的商品部分，而且还把用于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产品也收归国有了。尤其是党中央和政府用不理智的汇报和贺词把这种行为看做是一种英勇精神，在报刊上大肆宣扬，这就把我们赶入了死胡同。

二、商品经济意味着产品交换必须遵循最基本的等价交换原则。在1953～1958年期间，我们一边肃清斯大林的错误，一边就恢复等价交换原则做了很多工作，终于取得良好的结果——农业开始走上坡路。很可惜，到了1958年底，却又实行了一系列缺乏根据的措施（如降低某些农产品价格，提高燃料、配件和其他工业产品的价值），使农产品的交换比例下降。这些和赫鲁晓夫的其他一系列做法，导致近年农业上升势头的下降，而决不是气候的原因。赫鲁晓夫的做法某些已得到纠正。但是不应该认为，工业品和农业产品之间应有的等价交换已经恢复。我无法举出这方面的实例，但

我可以说，如果在1928年（当时还没有完全的等价。斯大林对那时的价格这样正确表述“我们从农村得到的东西，就像是贡品”），买1公斤糖，农民就得出售7公斤麦子。而在1962年，买1公斤糖，需要向国家出售14公斤小麦。到现在，买1公斤糖，需要出售15～16公斤小麦。这只是一个例子。你们可以向中央统计局咨询，他们会给你们提供有关农业和工业商品价格变化情况的资料，能提供我们整个革命历史和进程中的资料，也能提供与国外对比的资料。统计资料会向你们表明，与其他商品交换的比例使农业损失更大。

我早已想到，工农业产品应该完全是等价交换。我也明白，我们现在不应拒绝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和流通中收税的办法来吸收农业的部分纯收入用于全民需要。但是在这方面要有分寸，现在的情况是为了有利于农村和农业发展必须改变已形成的不合理比例。

三、等价交换不仅取决于农产品实际价格的水平，而且取决于工业产品价格的水平。这在前面已叙述过。可是为了弄清历史和问题的根源还应该再补充说一下。战前战后我们的农产品销售价从来没有下跌过，相反，还不断地上涨，1953～1958年价格大幅度地上涨。然而，由于大幅度地提高了工业品的价格，所以农产品所占交换比例则越来越小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要使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走上正轨，我们不仅要调整农产品的买卖价格，尤其要调整许多粮食制品的零售价，而且要降低工业制品的价格。

为了使城乡经济关系和商品交换走入正轨，在当今条件下急需做什么呢？我认为，必须做到：

一、考虑到国家的粮食储备对国家的供应和预算的意义，在征购储备粮时必须杜绝专横，并力争给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以稳定的

环境，使经济活动走上最必需的有效、合理的轨道。

1．坚定不移地实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至少在五年内，按每个区每公顷不同的定额向国家出售粮食、肉、牛奶。绝对禁止任何以刑事责任和党纪处分相威胁，在采购产品中超出此定额而给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下达交售任务。

2．确定这些产品的出售定额和范围，必须让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有足以扩大再生产的种子、饲料和粮食。非商品生产区则无需上交粮食。（……）

3．允许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把超出定额的多余的商品按集体农庄市场价格，出售给国家合作社组织。

二、由于国家缩减粮食供应品，所有的农村居民点，包括区中心，都靠集体农庄市场供应。

三、取消国家现在从大城市郊区和工业中心近郊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采购土豆和蔬菜（也许还有牛奶）的不正确做法。

允许这些地区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通过自己在集体农庄商店、货摊、农庄集市，以及合作社、代销点，把这些农产品按商品市场价格出售。（……）

我们不顾经济需求与可能来过分夸大我国的教育事业。当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规模应该扩大，指标应大大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只是我们做得太过火了、太心急了，显然我们在这个方面是入不敷出。无疑，现在的条件变了，但怎么不想想列宁说的话，“要发展经济，必须在所有部门，甚至在学校，节省开支。”

难道在我们国家生活的这一时期需要如此夸大中等教育的作用吗？好像没有受过中等教育，就不能让挤奶工、饲养员、纺织工人和类似的其他工作人员走上工作岗位似的。他们受过七年教育，难道他们的职业知识还不够吗？

相反，由于心理和道德方面的原因，现在很难把正在受中等教

育的青少年列入生产队伍中。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没有拿中等文凭而离开生产劳动，我们为赶上达到这些教育指标而花费了数十亿资金啊?!

高等教育也是如此。不顾经济的能力和社会需求，一味夸大高等教育的作用，让成百上千的朝气蓬勃的居民为此而离开生产劳动岗位，而国家白白地耗费几十亿卢布。

我不是蒙昧主义者，不反对教育，我本人也在高等学校为教学付出了不少力量。但是我是个经济学家，我也清楚，我们抢先走在前面，但步伐却与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协调，那么后果就等于是伤害了经济。

我对农村经济的所有建议，总结为一条——必须客观地恢复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有的议论都认为，这是后退。但这些议论都是死守教条者的不能深思熟虑的结果。迈向共产主义的真正步伐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遵守它的客观规律和要求，从此加快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

当我们拥有了稳固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可是又害怕扩大城乡之间的市场关系。这是很奇怪的。让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发展起来、富裕起来，这才是真正地向共产主义发展。这不但不会妨碍工业的发展，相反，它还会给工业提供原料，给工人提供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就等于推动工业加速发展。

№03648

斯塔罗夫斯基[①]就苏联经济统计资料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

（1965年7月24日）

英国杂志《新闻评论》刊登了一篇文章，其内容是摘自据说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阿甘别吉扬的演讲和报告的片段。文中对苏联经济进行了不正确的评论，在许多地方则是直接的诽谤。

以下举文章中一些基本的论点和实际的资料。

文中论述：

1．中央统计局核定，1963年苏联粮食收成约80亿普特。

实际情况：

1．中央统计局公布资料显示（见《苏联1964年数据》文集），1963年粮食总收入为1.07亿吨（这约等于60.6亿普特）。

文中论述：

3．由于粮食价格的提高，实际收入减少了。

实际情况：

3．实际上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减少，而且增加了。至于零售价，不论是国家还是合作贸易，近几年内都很平稳。以下是相应的资料（对去年的百分比）

① 弗·尼·斯塔罗夫斯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39年加入苏共，1948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局长，1962年起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1962 年	1963 年	1964 年
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			
按一个劳动者计算	104	102	104
国家贸易和合作贸易			
的价格指数	101.7	100.9	99.6
大城市集体农庄			
市场的物价指数	108.8	100.2	105.5

文中论述：

6. 苏联人不想浪费钱，他们宁愿把自己的钱压到木板下藏起来，也不愿买质量低的商品。

实际情况：

6. 在苏联，商品周转率逐年增长，这从以下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

居民并不是把钱压到木板下藏起来，而是把它们储蓄到银行。这从以下数据可以看出：

	1962 年	1963 年	1964 年
储蓄数量			
以百万为单位	52.4	53.5	53.6
储蓄数额			
以十亿卢布为单位	11.7	12.7	14.0

文中论述：

9. 苏联用于国防的费用与美国的相等，但是苏联的经济潜力却比美国小一半。

实际情况：

9. 苏联的军事费用 1964 年为 133 亿卢布，而美国则超过 550 亿美元。在苏联，这仅占国民收入的 7.3%，而美国却占 15%，苏联的国民收入为美国国民收入的 62%，而工业品——65%以上。

文章中还引用了其他的说法，显然是阿甘别吉扬编造的。他说

苏联经济“混乱”，说斯塔罗夫斯基批驳美国对苏联经济的评价而与西方报刊的争论是不正确，说修理汽车用的工人比使用汽车的还要多，说出售给国外的商品是低成本的，说苏联的商品积压已达到西方经济萧条时期的水平。他还说中央统计局把统计材料小心地藏起来，他说从美国杂志上得到的消息要比从中央统计局得到的可靠得多……

中央统计局认为以上做法肯定是有目的的。如果英国杂志上刊登的这篇文章纯粹是作者杜撰出来的，那么英国杂志上的这些谣言则由阿甘别吉场本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别的目的，那么，应该由其他与此相关的作者承担责任。

№03649

叶若夫[①] 关于美苏收入比较向列别金斯基[②] 提供的统计资料

（1966 年 12 月 21 日）

机密

苏联中央统计局对前几天寄给您的统计材料作补充，这些统计材料对苏美两国居民的生活水平进行了对比，是为了制定 1966～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

……苏联和美国 1965 年每个居民对物质财富的需求比值为：

	苏联	美国	苏美的比率
美元（按美国的价格计）			
物质财富总需求量：	564	1542	36.3
其中			
食品（包括酒精饮料）	325	505	64.3
食品（不含酒精饮料）	258	439	58.5
非粮食商品	168	905	18.5

① A. 叶若夫，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副局长。

② Н.П. 列别金斯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

1965年苏联和美国产业工人实际收入

单位：%

	苏联	美国	美苏的比率
	美元		
产业工人月平均工资	121.7	423.2	3.5
退休金、津贴、免费教育、医疗和其他支出费用、优惠	80.2	57.5	0.7
月平均工资加上退休金、津贴、免费教育、医疗等其他支出费用	201.9	480.7	2.4
税	10.0	43.2	4.3
除去税收和增加补充支出费用的月平均工资	191.9	437.5	2.3
考虑到失业(津贴)	191.9	422.1	2.2

№03651

斯塔罗夫斯基关于工人实际工资给柯西金秘书处的统计报告（摘录）

（1970 年 11 月 24 日）

……整个工业工人和职员人数按 1956、1961 和 1968 年 3 月实际附加工资的分配

	工人 %			技术工程师 %		
	1956	1961	1968	1956	1961	1968
整个 3 月在职的所有工作人员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其中包括已取得工资的卢布、戈比低于 40（含 40）	11.1	2.7	1.2	0.7	0.0	0.0
高于 40 到 60	24.3	11.8	1.2	5.4	1.6	0.0
60.01～80	25.0	23.3	15.5	16.2	9.9	3.3
80.01～100	17.3	23.4	23.0	26.3	22.9	10.1
100.01～120	9.8	16.4	19.5	17.2	22.0	14.5
120.01～140	5.4	9.3	14.4	11.9	15.4	16.5
140.01～200	5.3	9.6	18.8	14.6	20.1	35.9
200.01～300	1.4	2.6	5.1	5.4	6.8	15.4
高于 300	0.4	0.9	1.3	2.3	2.2	4.3

№03652

比丘金[①] 关于苏维埃非黑土带农业发展给巴伊巴科夫[②] 的工作报告

（1975年4月4日）

非黑土带包括俄联邦29个州和自治共和国，它拥有俄联邦约一半的工业企业，44%的人口，多达5800万人。

非黑土带同时也是俄联邦最大的农业区，农业用地面积5200万公顷，其中耕地3200万公顷，出产约占俄国40%的牛奶和蛋类，1/3的肉类，一半以上的土豆，43%的蔬菜，以及几乎全部的亚麻制品。非黑土带用占国家10%的农业用地，出产了约15%的农产品。

非黑土带有条件进行大规模农牧产品的集约化生产，根据农业气候条件，本地区突出的特点是属于有保障农业生产地区。虽然土壤养分贫乏，但只要施以足够的肥料，即可获得黑麦、小麦、燕麦、大麦、土豆、亚麻及饲料作物的稳产、高产。著名的农业化学家、院士O.H. 普里亚尼什尼科夫给予非黑土带以极大的关注。他认为，本地区蕴藏着极大的潜能。1929年，他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潜在的十亿》的文章。文章指出，只要给非黑土带施以足够的无机肥，即可获稳产、高产。他说："为避免干旱所造成的可怕后果，有必要在不存在干旱问题的非黑土带额外出产10

① Г.Г. 比丘金，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人员。

② 尼·康·巴伊巴科夫，1939年加入苏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亿普特（约合 1700 万吨）的粮食。”在那一时期，本地区粮食年产量为 1610 万吨，而在当前的“五年计划”中，前四年平均年产量为 2000 万吨。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该地区为落后的农业区。1913 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所有播种面积的 85～90%，而且以黑麦和大麦为主，不过很多地区大面积播种亚麻和土豆。……

苏维埃政权时期，本地区农业生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工业化为本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配备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机械设备提供了可能。到 1940 年，播种面积增加到 450 万公顷（增加 20%），土豆和蔬菜播种面积大大增加，土豆的产量增加了 1.8 倍，达到 2500 万吨。

然而，粮食产量仍徘徊在革命前水平，年产量约占 1600 万吨，牛的存栏数甚至还没恢复到战前水平。……

战前及战后一段时期，大面积农业用地长满了灌木、丛林或变为沼泽，无法再进行农业生产，因此，可耕地面积减少了 790 万公顷（减少 14%），其中耕地面积减少 460 万公顷（减少 13%）。

非黑土带农业生产的恢复落后于苏联其他地区。如果就全国范围来看，早在 1955 年，粮食产量就恢复到战前水平，而在本地区直到 1967 年才达到相应水平。

1954 到 1959 年间，由于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53 年）制订了若干措施，使本地区的畜牧业产品有了提高。这一期间，肉类产量达 9 万吨（增加 8%），牛奶达 98 万吨（增加 10%），鸡蛋 2.8 亿个（增加 8%），毛织品达 1200 吨（增长 6%）。

近几年来，即从 1960 年开始，本地区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减慢，畜牧业的许多产品产量甚至减少了。1964 年的肉类产品同 1960 年相比，减少 178000 吨（减少 12%），牛奶减少 124000 吨（减少 1%），毛织品减少 28%。……

非黑土带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物质技术装备的加强，资金投入的增加，及拖拉机、汽车、收割机、有机肥料供应的增加可由下列资料看出：

年　份	1961～1965	1966～1970	1971～1975（预期）
国家及集体农庄为发展农业生产投入资金（10亿卢布）	6.3	11.7	19.5
供应情况			
拖拉机（千辆）	170	235	287
收割机（千辆）	57	59	70
载重汽车（千辆）	52	102	187
无机肥料（百万吨）	16	40	65

……而从下列资料可看出，蔬菜、粮食、肉类、牛奶及其他产品产量增长情况：（单位：百万吨）

年　份	1961～1965	1966～1970	1971～1974	1966～1970为1961～1965年的百分比	1971～1974为1966～1970年的百分比
粮食	12	17.2	20	143	116
土豆	24.4	28.4	24.8	116	87
蔬菜	3.7	4	4.2	108	105
亚麻纤维制品（千吨）	215	238	190	111	80
肉类（净重）	1.5	1.9	2.2	122	116
牛奶	14.1	17.6	18.2	125	103
鸡蛋（10亿个）	5.5	7.5	11	136	147
毛制品（千吨）	19.4	17.5	17.3	90	98

……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本地区农产品的增长速度减慢，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生产的分散；第二，许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基本资金、无机肥料供应不足；第三，基本生产环节机械化水平低；第四，改良土壤及改造酸性土壤的面积不够。

这期间，非黑土带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此种情况可从下列1973年的统计资料中看出：

	俄联邦非黑土带	白俄罗斯	立陶宛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100公顷的农业用地					
按1965年可比价格计算农产品总产值（千卢布）	30	52	55	44	48
截至年底用于基本农业生产资金价值（千卢布）	37	50	81	72	80
排干沼泽地及灌溉土地面积（公顷）	4	19	48	39	35
国家和集体农庄为发展农业投入资金（千卢布）	8.5	12.5	17.6	14.6	15.9
每百公顷面积上所用能量（马力）	199	243	317	306	328
每公顷耕地面积所施化肥量（普特）	4.2	6.8	7.0	7.6	8.3
每公顷粮食作物产量	13.8	21.9	20.6	20.5	19.5
每头奶牛产奶量（公斤）	2458	2362	3116	2790	3190

……要提高非黑土带农业产量，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应在改良土壤的同时，增加矿物肥料和有机肥料的施用量，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增加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资金投入量及改善它们的劳动动力装

备。只有这样，才能丰收和稳产，并获得农业生产企业利润的稳定增长。

（……）由于无法及时进行田间工作，本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产量损失严重。本地区每位拖拉机手需耕地85公顷，如此重负几乎是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一倍。

机械化水平在种植业整个过程，尤其在畜牧业生产领域内仍保持很低水平。1973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养牛场中利用机械化方式养牛数仅占总数的15%，养猪场则为28～38%。

非黑土带修理厂仍无法及时、高质地完成修理工作，无法为农业装备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1973年本地区9800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只有4500个（占46%）生产单位有标准的技术修理厂，有950个生产单位根本就没有修理厂。

非黑土带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农业机务人员的配备情况也逊于苏联其他地区。如果说俄联邦1974年平均每百辆拖拉机配备拖拉机手为133名，则非黑土带只有116名，本地区1/3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每辆拖拉机配备的拖拉机手不足一人，在有些地区，如阿尔汉格尔斯克、加里宁、科斯特罗马州，有60%～70%的生产单位如此。

1971～1973年期间，本地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拖拉机手只增加了9000人，而这一期间培养的人数却多达24.7万人。

……1974年本地区20～29岁的城市青年人数比例增加到17.8%，而农村则下降为8.9%。……

非黑土带1959～1973年间，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数减少410万（减少34%），其中20～29岁的年轻人减少240万（几乎2/3）。

应当指出的是，农村青年大量涌入城市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相应年龄段男女比例失调。1970年前，首先涌入城市的是在畜牧业中从事繁重手工劳动的妇女，从而使得1970年农村中妇女比例下降

为46%，由此导致了近几年来，农村男青年大量离开农村，仅在1970～1973年，即减少20万，几乎1/4。到1974年初，妇女的比重已增加到52%，而在布良斯克、基洛夫州则高达61%，奥廖尔、图拉州则达58%，这又反过来促使妇女外流，进入其他生产领域。

非黑土带农村人口急剧老化，1959年超过具有劳动能力年龄的人数为14.5%，而1974年则达21.6%。

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加里宁、梁赞和其他州的情况尤其令人担忧。那些州1/3的集体农庄庄员已到退休年龄。

应当指出的是，近年来本地区农村人口减少速度平均每年增加3%，而在1959～1969年间为2%……

和俄联邦其他地区相比，非黑土带农村劳动力流失的增加一方面是由于距离城市和工业企业较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廉价手工劳动力较高的报酬，以及农民对居住和日常生活条件的不满。

1970年，俄联邦非黑土带共有居民点142500个，其中102400个居民点人数不足一百。特别是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伊万诺夫、加里宁、科斯特罗马、雅罗斯拉夫、基洛夫等州的小村庄，80～90%的居民点平均人口只有30～38人。

该地区大约60000多个居民点坐落在距离汽车站6公里以外的地方，49000多个村庄的孩子不得不跑到距离本村3公里或更远的地方上小学。

1970年该地区大约16%的居民点没有无线电转播，26%的居民点没有电视接收设备，大约12%的村庄没有电。

该地区的农村人口通常居住在简陋的私人住房里，而且要靠自己的积蓄来修建。1974年平均每位农村人口公有化住房面积（包括产业工人，在卫生、教育和贸易等战线上工作的人的家庭）为2.3平方米。而在布良斯克、奥廖尔、高尔基等州，以及楚瓦什和

摩尔多瓦自治共和国则仅为1.2平方米，而且只有1/4的公有化住房装备了自来水、地下管道和中央供暖设备，而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科斯特罗马、彼尔姆等州，以及科米自治共和国、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内仅有8～10%的公有住房有这些设备。

该地区农村现有的公共设施系统已无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据计算，1973年该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日常消费额农村只有13.9卢布，城市为27.8卢布。每117个居民点中只有一个修鞋部，每71个居民点中才有1家理发店。

1973年该地区1712家农村地区医院中就有546家（占32%）医院中没有一个正规医生，且坐诊的都为医专毕业生。斯维尔德洛夫、诺夫哥罗德、科斯特罗马、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州医院的编制情况形势最为严峻，60～70%的医院都没有一个医生。

非黑土带所特有条件：地势不平、草木丛生、沼泽密布、过分潮湿，这导致了交通不便，不仅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而且阻碍了劳动条件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内部事实上缺乏硬质路面，因而将产品运往销售机构时，往往受到很大损失，只能收回实际支出的35～40%。

该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工资水平也大大低于俄联邦其他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例如，1973年这里集体农庄每年拖拉机手月工资仅为118卢布，国营农场137卢布，比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低15～25%，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布良斯克州，楚瓦什自治共和国、马里自治共和国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10～25%的农机手月工资低于60卢布。

……该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利润总量也在不断下降，1973年同1970年相比，大约减少了6亿卢布（40%），亏损企业的数量也急剧增加，可由下列表中看出：

	集体农庄			国营农场		
年　份	1965	1970	1973	1965	1970	1973
亏损企业数	134	273	992	992	1022	2066
亏损企业与全部企业的比重	1.9	4.7	18.1	38	29	54

国营农场由赢利转为亏损的数目也逐年增长，1970 年到 1973 年，每个国营农场亏损额增加一倍，而相应赢利额只增长 50%，利润主要来源于专业化养鸡场、养猪场和育肥场。……

1974 年 3 月，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制订的 206 号决议为非黑土带农业发展开辟了新阶段，预计 1980 年该地区农牧业总产值将达 202 亿卢布，比 1975 年增加 11 亿卢布。与第九个“五年计划”18%的增长率相比，将达 25.5%。

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为发展非黑土带农业生产，国家和集体农庄将投入 350 亿卢布的资金，几乎是前三个“五年计划”投资的总和。

……应当指出的是，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该地区农业生产所投入的资金量、机械设备、化肥仍少于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 1975 年所制订的计划。……

【专题说明】

60年代的水资源保护

（1965年6月至1967年12月）

本专题的两个文件表明，至少在60年代初期，苏联已经开始意识到环境污染和水资源的保护问题。这是社会文明前进的标志之一，也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到相当程度才能够加以解决的问题。不过，这里收集的文献只是说明苏联有关部门提出了这一对社会生活将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结局如何尚需要进一步发掘有关文献。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张建成翻译）

№03708

国家计委关于水资源保护问题答霍洛德科夫问

（1965 年 6 月 15 日）

因工业和城市废水造成地表及地下水源日益加剧的污染目前成为需要专门、彻底解决的严峻问题。忽视保护水资源的问题使国家今后将水库用于饮用、保健，甚至用于科技的目的面临着威胁。

水库污染的性质和程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说明大多数城市以及许多工业企业缺乏足够强有力的和技术上完善的净纯设施。在 1763 个城市中，具有废水生物净化设施的仅有 30 个左右，即不足苏联城市的 2%。在现有的工业高度集中的情况下，许多城市由于缺乏集中的城市净化设施，使得许多工业企业废水净化问题极大地复杂化。70%以上的工业废水未经过任何净化直接排入水库，从而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同时也有害于居民健康及其周围的大自然。

苏联部长会议 1960 年 4 月 22 日第 425 号决定《关于整顿利用和加强保护苏联水资源的措施》，禁止验收没有完成保证废水净化无危害措施而排放废水的企业、车间和机组，和允许它们长期或临时投产——不顾这一决定，在许多化工、造纸及其他一些企业中，净化设施的建设远远落后于基础生产工程的建设。

位于恩格斯市的人造合成纤维厂预算建设费为 13160 万卢布，从 1956 年开始兴建，按计划应于 1967 年全部投入生产。但是预算价值为 459 万卢布的全套生物设施建设实际上没有开始。

一系列大型企业、纸浆造纸联合工厂的状况引起人们特别的忧虑。例如，在孔多秋日斯克纸浆造纸联合工厂，1964年1月1日以前在78%即将生产的项目中，得到用于净化设施的投资却不到5%。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纸浆造纸联合工厂，在62%即将生产的项目中，净化设施仅完成19%。

在贝加尔斯克和共青团纸浆造纸联合工厂，净化设施的建设也很落后。

在已建成的企业里废水净化的状况极端不合要求。例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人造纤维厂，自首次向具有很大捕渔业意义的叶尼塞河排水之后的十年期间，每年排入废水16.1百万立方米。同废水一起排入30.2千吨硫酸钠，7.5千吨硫酸，3.9千吨硫酸锌，1千多吨硫化二氢，1260吨苛性钠，361吨对于活的生物体有剧毒的二硫化碳和其他有害物质。这些企业尽管至今尚未确定建设净化设施的规划任务，却仍在不断扩大其生产能力，增加废水排放量。

在企业里，具备净化设施正常的并不能证明废水净化状况良好。……

由于没有大规模地利用和集中排水使净化设施负荷过重，还由于缺少必需的化工试剂和加工废水的专门设施，在很多情况下净化设施工作情况不佳。……

从工业废水中提炼出的贵重物质利用情况不良，同时在将废水送到净化设备之前，缺乏初步的废水处理技术加工，使人们失去了对这些设备能保证净化废水所规定质量的可信度，因而在很多情况下，在采用净化设施之后还要补充规定一些规模相当大，造价相当高的废水池。在不能很好地使用净化设施的情况下，上述废水池就会变成土壤、空气、水库的危险污染源。

1965年2月在伏尔加格勒的一家企业里，由于围挡积蓄大量工业废水的废水池坝决口，伏尔加河相当长的一段水域，发生了水

的毒化和鱼的大量死亡。

浮运木材组织得不好给苏联北部的东北部地区水库的水质带来相当大的损害。由于在通往浮运道路上的木材准备不够（在河绠[①]，在水面分类编排集材场）发生了浮运木材的大量沉没。目前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渔业河流里已沉没 35 万立方米木材。1964 年总共损失大约 300 万立方米木材，其中大部分淹没了。在现今条件下打捞沉没的木材的规模很小，占浮运木材损失总数量的 20% 左右，这就导致了木材进一步堵塞河床。

在秋明州因为浮运木材损失堵塞水库，致使 62 座渔业水库部分或全部不能使用。从木材和树皮中浸滤出的鞣质、树脂和有机酸给鱼类造成导致死亡的影响。

由于大量未净化的工业和城市公用废水排入河流，许多河流被腐烂的有机物沉积和矿物源的沉淀所污染。为了彻底治理污染就必须清理河床，并使提取的沉淀物变为无害。现在处于完全弃置不顾状态中的有莫斯科河、涅瓦河、伊谢季河、米阿斯河、卡泽尼河、托勒茨河、卡利米乌斯河、因古列茨河以及其他一系列河流。

为使国家水库处于规定的卫生状态并保证它们进一步可靠地避免废水污染，根据国家水利工程建筑设计院的预算，需要消耗资金近 44 亿卢布，其中 14 亿卢布用于再建企业的净化设施建设，9 亿多卢布用于现有企业，17 亿卢布用于城市净化设施建设，约 4 亿卢布用于水库保护跨部门工程设施。

用于城市净化设施建设的控制数字［1966～1970 年］预定为 7.9 亿卢布，即需求总额的 46%。规定为实施新建企业净化设备拨出的基建投资数量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实施过程中，工程项目表内没有单列出废水净化工程建设拨款，而是列入用于生产用途工程建

① 河绠，河面上用原木连成的浮栅，以拦截流送的木材。

设的投资总额。至于拨给现有企业用于净化设施建设的资金，那么正如复核表明的，在大部分情况下部门没有预定用于这些目的的资金。同样也没有预先拨出用于建设水库保护跨部门工程的投资。因而，到 1970 年底在拟定的资金拨款内，在最好的情况下保护水的状况将保持在现今水平。……

№03709

采油工业部为保护水资源给各企业和部门组织领导人的通函

（1967 年 12 月 9 日）

在苏共中央 10 月全会（1965 年）之后苏联采油工业部多次审查利用和保护水资源的问题，并作出改善这一工作的决定。……

由于进行组织工作的结果，大多数油田管理局在巴什、古比雪夫、塔特、彼尔姆石油联合企业里，实际上一直在全部将废水注入高效矿层和消耗采矿层。

不允许萨拉托夫石油天然气公司、奥伦堡石油公司及其他这类公司向广阔水域排放未经净化的水。

与此同时检查显示，还有许多部属企业不合理地利用水资源，致使许多水域、大海和河流受到污染，这是因为化学试剂、石油原料、泥浆和对自然环境有害的其他物质流入的缘故。……

秋明石油天然气油田开采已进行了两年，但是没有一个油井安装了必需的设备，致使鄂毕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受到石油、泥浆和其他有害物质的严重污染。

在我国的许多油田中，采用治本的方法以防止水域污染还不够，比如筑防堤以便收集和随后烧掉污染水流的物质。

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石油开采部的油田情况特别差，由于未经净化的废水流入里海，使之污染继续增加，每年与污水同时排放的石油也达数万吨。……

由于石油管道和钻井发生事故，大量石油便周期性地流入里

海。根据土壤改良和水利经济部1966年9月15日到1966年12月9日的数据显示，由于在油田区发生油管事故而使桑纳恰拉海150平方公里的海面受到排出的石油的污染，结果使渔业遭受了145.9万卢布的损失。……

石油工业部再次要求所有石油天然气开采单位和企业的领导必须严格遵守保护水资源的命令，采取紧急措施以防止水域污染并要求每个领导把保护自然当作国家和公民最重要的责任。不允许没有净化设备的工业企业投产，不允许不合理地利用水资源，不允许废水和对植物和动物群有害的生产废料污染水源。

【专题说明】

关于斯大林和朱可夫的历史评价问题

（1966 年 3 月至 1968 年 11 月）

在 1966 年苏共忙于筹备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期间，作家西蒙诺夫致信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关于对斯大林的历史评价问题，并且提出要求了解全部历史的真相。1968 年 8 月苏联一些高级将领借纪念库尔斯克大会战之际，提出取消 1957 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决议，为朱可夫恢复名誉的问题。这两件事都没有结果：勃列日涅夫没有理会西蒙诺夫的信，苏联军方也没有为朱可夫做出新的评价，但这些文件却反映出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联政治生活中的某种动向。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高增训、张廷文、赵英杰翻译）

№06965

西蒙诺夫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致勃列日涅夫的信

（1966年3月23日）

尊敬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在紧张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日子里，我写这封信花费您的时间是因为我对一些事情感到不安，其中包括在格鲁吉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家要求重新评价约·维·斯大林同志的发言问题。

目前，已是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最使我们大家关心的是我们面临的巨大而吸引人的、为继续向共产主义迈进必须工作的经济改革问题。

依我看来，在这一场重大而尖锐的、已经进行并继续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与旧的斗争中，一切保守的、不会按照新方法工作的势力，将不止一次地在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中和恢复他的工作方法的反历史企图中为自己寻找政治依据。

我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多年以来一直被人称为“斯大林分子”，我作为共产党员作家，我将对此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

但，我现在承担更加重大责任是为了正确评价斯大林和他的所谓绝对正确的、我们每个人都与之有关系的崇拜，讲明全部的历史真相。

现在只能就我作为一个作家研究了10年的历史事件中的一部分——过去的战争作例子。我相信，斯大林在战争的进程中做了一切他认为对战争胜利所必须做的事，但这并不能使我忘记他对战争

初期我们遭到的失败和与之有关的不必要的牺牲应负的直接责任。

我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的是，根据我们官方公布的资料，由于斯大林的专横，在战争以前各军区的所有司令员都牺牲了，军区军事委员会的所有委员，所有军长，几乎所有师长、军师的大部分政委、大约一半的团长和大约三分之一的团政委都被解除了职务。

任何一个国家要是在军队干部遭到如此损失之后参加战争都会灭亡。而我们国家在此艰难之后没有覆灭——这是奇迹，创造这一奇迹的是人民和党，而不是斯大林。

斯大林在战争进程中表现了巨大的政治智慧，巨大的坚强性和意志并以此为我们国家战胜敌人作出了极大的个人贡献。关于这一点，既不应该忘记，也不应该避而不说，但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除此以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忘记和不应该避而不说斯大林在战前把国家置于灭亡边缘的罪行。

还有一件事也不能忘记，那就是斯大林在为我们的胜利作出贡献的同时，他在战后又重新着手滥杀干部（列宁格勒案件和其他案件），直到他逝世之前，重演 1937 年镇压干部的危险在国内越来越明显增长。

如果坚决重申党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说过的意见和看法，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公正地回避斯大林在战争期间和在这以前的历史时期的那些功勋。而如果真的回避他在党和人民面前的罪行（这种情况在我们大量的报刊中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那么关于他的实际功勋的所有提法将被认为是为这个重大的历史人物全面恢复名誉，其中包括为他的直接罪行恢复名誉。

依我看来，我们现在必须明确而公开地将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来自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关于对待约·维·斯大林态度上的那种深刻准确的普遍结论，同一系列类似由尼·谢·赫鲁晓夫个人提出的诸如“靠地球仪指挥战争”这种明显的断章取义和不公正

区别开来。

我们没有必要中伤斯大林，也没有必要替他辩白。我们只是需要了解关于他的所有历史真相。

我是属于那种认为了解与斯大林活动有关的所有历史事实，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重要的发现这一人群中的一员。我知道，也有着持相反看法的人们。但是如果是这样，如果这些人不害怕事实并认为所有与斯大林作用有关系的历史事实都将证明有利于斯大林，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害怕了解所有这些事实。

既然党和国家继续开展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那就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依我看来，在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指派一个由党的活动家和党员历史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是正确的，这个委员会要始终不渝地和客观地研究斯大林在所有工作时期工作的所有基本事实，并把自己的初步结论在确定的时间内提交中央委员会全会审议。我明白，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所以这些事实中的一部分也许还可以作为党和国家秘密保持许多年。但是，这个委员会从所有事实的客观研究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依我的看法，以某种形式报告全国人民是正确的。

也许，我用这封信坦率直言并占用您的时间——那就敬请原谅。

致敬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04385

安基宾科关于朱可夫受到歧视给基里连科的信

（1968 年 8 月 22 日）

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基里连科，安德列·帕夫洛维奇同志[①]：

1968 年 8 月 15 日，在莫斯科苏军中央大厦红旗大厅举行了库尔斯克大会战 25 周年军事科学学术大会。许多参加过这次大会战的人都收到了请柬，其中包括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朱可夫元帅。由于两位元帅重病在身未能出席大会，遂给大会发来贺信（全文附后）[②]。

直到大会快结束时，谁也没有宣读两位元帅的贺信，于是开始有人就此向大会主席团提出质询。而大会执行主席伊·赫·巴格拉米扬元帅并不知此事，而当他知道这件事时，或许是受到对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不满的人不健康思想的影响，没有坚持宣读两位元帅的贺信。伊·斯·科涅夫元帅了解到此事后，决定亲自干预，查清对贺信保持沉默的原因。科涅夫元帅在其库尔斯克大会战总结报告中，讲述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在这次历史性会战中的杰出作用。

由于大会主席团没有拿出任何充分的依据，科涅夫元帅坚持必

① 此信上有如下批示："交 T. 萨维金同志阅，并将此信交叶皮谢夫和基里连科同志。" T. 萨维金于 1968～1986 年任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

② 所收集的档案中无此附件。

须公布两位元帅的贺信，大会主席也这样做了。出席大会的代表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两位元帅的贺信。这样，只是在科涅夫元帅的干预下，才防止了一次对举世公认的我国两位统帅的极其危险的伤害和不应有的侮辱。

那么，我为什么要为此给您写信呢？如果认为这起令人气愤的事件是大会主席团部分成员缺乏政治远见或肤浅无知的结果，那么仅限于对这一事实的表述就够了。确实，如果朱可夫同志和华西列夫斯基同志了解到这些，并由于他们身患重病，他们会对类似的攻击做出痛心的反应，而那些肤浅的肇事者在这种情况下又会说些什么呢？

不过也可以从另外一方面考虑，这既不是缺乏政治远见，也不是不学无术，而是那些固执地、盲目地坚持对朱可夫抱有陈旧提法的人们继续对朱可夫同志的歧视和敌意。虽然历史本身早已证实，那些提法对苏联人民崇高的民族感情来说是一种侮辱。

难道现在不是从形式到本质上对过去“十年”遗留的问题划上句号的时候吗？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为了将来吸取教训，红旗勋章大厅里坐着许多元帅、将军、军官——他们都是库尔斯克大会战的直接参加者，但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被邀请到大会主席团，当然这是不近人情和令人痛心的。

我们马上就要面临另一个纪念节日——反法西斯胜利25周年纪念日，我们应该谨慎对待那些届时仍然健在的参战首长们。

退休中将　H. 安基宾科

1968年8月22日

№04386

安基宾科关于要求正确评价朱可夫致基里连科的信

（1968 年 8 月 23 日）

尊敬的安德列·帕夫洛维奇！

在准备向您发出这封信的时候，我事先再次阅读了一些文献资料——现在这一代人正是根据这些资料研究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问题的。苏共中央（1957 年）十月全会决议——关于格·康·朱可夫同志的决议在这份文件中占据重要位置。①

难道您不认为，为了我们党的威信，为了苏联人民对著名统帅朱可夫元帅善良的热爱之情，正式取消苏共中央十月全会（1957 年）对朱可夫同志臆造的指责的时候不是早已到来了吗？

为什么不在朱可夫同志健在的时候做这些事呢?！只有个别人

① 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关于改善苏联陆海军党政工作的决议》中，“苏共中央认为原国防部长格·康·朱可夫同志在最近一段时期，违反列宁主义的党对武装力量领导的原则，执行了一条削弱党的组织、政治机关和军事委员会工作的路线，执行了取消党及其中央和政府对陆海军的领导与监督的路线……

党和政府曾高度评价格·康·朱可夫同志的功绩，授予他苏联元帅的称号，四次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奖给他多种勋章。政治上高度信任：在苏共二十大上，他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又推选他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稍晚又选他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由于格·康·朱可夫同志缺乏党性观念，没有正确理解对其功绩的高度评价，丧失了弗·伊·列宁教导我们的谦虚品德……

鉴于上述原因，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免去格·康·朱可夫同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以及苏共中央委员的职务，授权苏共中央书记处另行安排格·康·朱可夫同志的工作。”（《真理报》1957 年 11 月 3 日，第 307 期）

在这种情况下处境尴尬，但几乎百分之百的党员和全体苏联人民都将感到满意。

敬礼

H. 安基宾科

1968年8月23日

№04387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就安基宾科信的处理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8 年 11 月 27 日）

苏共中央：

退休将军 H.A. 安基宾科对下述事情表示不满：在纪念库尔斯克大会战胜利 25 周年军事学术大会上，只是到了会议结束时才宣读了苏联元帅格·康·朱可夫和亚·米·华西列夫斯基致与会者的贺信。

同时安基宾科还提出关于取消苏共中央十月全会（1957 年）决议中对朱可夫同志指控的部分。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接待了安基宾科同志，并对他做了必要的解释。

已向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主任阿·阿·叶皮谢夫同志介绍了安基宾科同志写的信的内容。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副部长　C. 格拉乔夫

1968 年 11 月 27 日

【专题说明】

苏联与越南战争问题（一）

（1966 年 7 月至 1973 年 6 月）

本专题选编的是关于结束越南战争，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文件。

1969 年，共和党人尼克松在选举中获胜，取代约翰逊，就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面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国际形势变化的现实，对美国的内外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决定从越南撤军，结束越南战争，以堵住美国“日夜流血的创口”。本专题文件反映在越南人民的坚决斗争下，美国被迫从越南无条件撤军的情况。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张廷文、钟平和、高增训翻译）

№06763

海运部就向越南运送物资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6 年 7 月 18 日）

第 1701 /1cc 号

绝密

第 1 份

苏共中央：

根据苏联大使从海防发来的第 690～691 号电报，海运部将报告海上航行的态势和海防港的工作条件。

海军部未曾中断从苏联各港口派遣装载货物的苏联船只开往越南。约有 20～22 艘船只连续不断地从事向越南的运输活动，这不仅为从苏联对外的运输，而且也为北越同其他各国的外贸联系提供保障。

截至 7 月 18 日，向越南运输的形势特点如下：在越南各港口停泊有 8 艘船只，载货总量约 4 万吨。正在开往越南各港口的船只有 8 艘，载运各种货物约有 5 万吨。在苏联各港口正在装货运往越南的有 3 艘船只，货运总量有 2 万～2.5 万吨。有 4 艘船只在从越南返回时，部分运载碎石，另一部分运载越南的货物开往日本。

根据苏联船长们的通报，最近 10～15 天以来形势仍在迅速地复杂化，在轰炸时，苏联船只越 来越处于危险的海域。例如：7

月7日，“苏维埃茨克”号[①]轮船停泊在码头附近，正处于直接轰炸的区域，有一枚炸弹在离船350米的地方爆炸，而敌机用机枪从离船舷只有100米远的地方对停泊在距“苏维埃”号不远的越南军用快艇进行点射。在“共青团”号油轮停泊区不知从何处投下了5个金属物。几乎所有进入东京湾的苏联船只都遭到飞机的侦察和驱逐舰的跟踪。比如：7月13日，当“印古尔”号冷藏船开出东京湾的时候，一群飞机在其60～80米高的上空直接进行长达20分钟的观察飞行和俯冲。在中国的海南岛和越南的海岸间，在东京湾的入口处有2～3艘航空母舰在值勤。一艘巡洋舰和6～8艘驱逐舰在围绕着这些航空母舰连续不断地航行着。苏联船只实际上是被迫在飞机连续不断地侦察和舰艇不断跟踪的情况下通过被航空母舰、驱逐舰和飞机从空中封锁的海域的。

通过对苏联船只最近在海防地区工作条件的分析，海运部认为必须报告如下情况：

1. 越南海军当局人为地拖延苏联船只卸货，认为在海防港地区苏联的船只越多，该港口的形势就越安全。因此，6月25日就已抵达海防的“Л. 古利阿”号轮船实际上是7月12～13日才开始卸货；运载1万吨汽油的“共青团”号油轮自6月20日起就停泊在海防海域，至6月28日仍未卸完货，自6月28日至7月5日卸了3500吨货，7月5日起再次未卸货并停在泊地，说是卸完货不会早于7月底。

其他船只的情况也是如此。

2. 苏联船只停在危险地区的旁边，比如防空岸炮连旁，显然

① 苏联有3个城市都以苏维埃茨克命名：一、位于基洛夫州皮日马河畔，1937年设市；二、在加里宁格勒州，为涅曼河港口，1946年前称季尔希特；三、位于图拉州乌帕河畔，1954年设市。此处是以苏维埃茨克城市命名的苏联轮船。

是说，由于其旁边有苏联船只而使美国人放弃对这些炮连的轰炸，也可能是根据某些人士的愿望来构成一种被迫的局势，使苏联的船只被炸毁。

3．在空袭时，军用快艇就靠向苏联船只的船舷并从苏联船只的船舷下开火，这样就可能使美国飞机的火力指向苏联船只；还有停在旁边的中国船只用自动步枪开火的情况。

4．在一次空袭时，一些不明物从美军飞机上被投到海防水域。可以认为这是深水水雷。我们请求越南朋友进行检查。越南朋友对我们的请求非常冷淡，实际上并未很好地检查。同时7月10日越南引水员引导中国船只绕过危险水域，而7月11日却有意让苏联的“车里雅宾斯克”号轮船直通过危险水域，显然是想用这种方法检查是否真有或没有这种深水水雷。这明显地使苏联的船只置于危险之中。越南引水员并未通知苏联的船长有否危险。

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实际上已经封锁了进入东京湾水域的国际航道。这显然是美国的侵略行动，它粗暴地破坏了世界各国公认的公海自由（通航）的准则。美国的这种侵略行动和军事挑衅行动对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贸易安全构成威胁。

考虑到美国并未正式向苏联宣战，上述水域还不是军事行动的水域。

海运部认为采取以下措施是适宜的：

1．通知越南朋友：苏联方面将不会停止向越南各港口派遣满载货物的船只，同时提请越方注意必须不让海运当局和港口当局延误苏方船只并对它们构成威胁，同时采取必要措施最大限度地加快苏联船只的卸货和装货。

2．委托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向越方讲明，在当前战争条件下那些不可能使用的货物是否可以暂时停止运送，以便减少海防港不必要的负担。现在，从苏联运来的

大量货物堆放在海防市内的公园里、街道上，并没有被利用。

3. 鉴于美国正不断加强通住北越的海上通道上的侵略行动，或者通过专门的照会，或通过联合国可要求美国停止在海上贸易航道上的军事挑衅行动，以便把美国这个无端挑起并不经宣布就进行战争，在法律上处于被告地位的国家，置于世界舆论面前。

海运部长　维·巴卡耶夫

№06764

外交部关于向越南派遣志愿人员向苏共中央提供的背景资料

（不早于1966年7月9日）

7月4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在同苏联驻河内大使谈话时说，根据越方的意见，希望能将下述条文写入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声明：

华沙条约成员国声明自己准备派遣志愿人员去越南以共同反对美国的侵略，如果越南人民表示同意的话。

范文同认为，这一条文可以这样写：

应越南的请求，华沙条约成员国准备派遣志愿人员以共同反对美国的侵略。

范文同在说明这一建议时指出，关于志愿人员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曾发表过声明。由于前不久美国空军对河内郊区和海防郊区的空袭，志愿人员的想法现在具有特殊的意义。

如同以前一样，他继续说，主要是指政治目的：以最有力的形式显示社会主义国家的战斗团结——声明准备派遣志愿人员。至于这一点的实际实行情况，那么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准备同其他兄弟国家讨论这一点。

关于可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派遣志愿人员的问题，列·伊·勃列日涅夫1965年3月23日在红场庆贺宇航员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时最先说过。列·伊·勃列日涅夫声明："我们的中央机构收到不少苏联

公民的呼吁，表示准备参加越南人民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斗争。我们很理解苏联人在这些呼吁中亲自表达的兄弟团结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感情。”

后来，这一思想在1965年4月17日苏越联合公报中也得到了反映：

“如果美国强化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苏联政府在必要的情况下，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请求时同意苏联公民前往越南，因为他们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情感，表达了为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为保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成果而战斗的愿望。”

苏联最高苏维埃1965年4月29日在答复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向世界各国议会的呼吁时也有类似的话。

在此后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在苏共和苏联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以及苏方的官方声明中，关于派遣志愿人员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话题再也没有提及。

在最近几个月里，这一问题又提了两次：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主任阿·阿·叶皮谢夫在苏共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提起过。

比如阿·阿·叶皮谢夫在苏共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言时说：“为了回答美国黩武主义的强盗行径，有数千人及一些部队的人员都要求：随时准备作为志愿者去越南，为灾难深重的越南人民的自由而战斗。”

苏联列宁主义共青团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致苏共中央的呼吁书中指出，“代表大会以苏联青年的名义声明：如果需要，苏维埃国家、十月革命国家的千百万志愿者决心挺起胸膛同越南兄弟肩并肩地保卫人民的神圣权力，保卫社会主义的成果。”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如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和保加利亚政府也发表声明，准备派志愿人员去越南。例如，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的联合公报（1965 年 9 月）指出："……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要求，保加利亚人民准备派遣志愿人员同越南兄弟并肩战斗，反对侵略。"

无论是越南领导人的讲话或是越南政府及外交部的声明一般都未提及外国志愿人员的话题。与此同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无疑经同河内协商后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例如，1965 年 3 月 22 日提出有名的 5 点建议的阵线声明指出："如果美帝国主义者继续派遣美国及其仆从的作战部队到越南南方并继续将战火扩展到越南北方和老挝，那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将呼吁各国人民派遣青年和军人来越南南方，同南越人民一道消灭共同的敌人。"

1965 年 6 月，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名义发表的声明强调指出："由于美国政府的擅自授权命令美国军队参加在南越的军事行动，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就有权在必要的时候呼吁北越和各友好国家派志愿军来南方抵抗美国的侵略。"

关于派遣苏联志愿人员去越南的问题，主要是在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谈判过程中按照越方的倡议曾不止一次地秘密进行过讨论。越南同志的观点基本上是：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军事技术装备和军事技术物资方面的帮助，至于人力资源，越南并不缺。有人曾向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提示过：在紧急需要的时候，越南方面可以请求派志愿人员。

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

№06765

谢尔巴科夫与范文同关于苏越关系的谈话纪要

（1970年8月28日）

谢尔巴科夫1970年9月4日日记节选

秘密　第2份

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的建议我们会见了他。

1. 范文同通报说，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已决定派他率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和中国。代表团受托将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人讨论一系列有关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局势问题。我们了解这个情况。总理强调指出，要向苏联同志谈谈这一问题。代表团还将提出苏联于1971年援助越南的问题。

据范文同说，率领商讨经济问题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与过去的不同，不是黎清毅，而是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阮昆同志。根据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党政代表团的访问应是秘密的，而由阮昆率领的政府经济代表团的访问为正式的。

至于代表团出访期限问题，范文同说，他们最方便的时间是9月份的下半个月。这样，他让我们理解他们已将自己的打算和愿望通告中国同志后最近就会得到中国同志的答复。

最后范文同托我们捎来了一封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同志的信，信中请求1971年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经济和军事

帮助。

我们答应尽快向莫斯科报告，我们说，正如越南同志所知，苏联经常地给越南人民以全面帮助。至于代表团访苏的期限问题，那么应注意到研究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也需要时间。

之后根据我方建议还提出了关于利用苏联经济援助的效率问题。我们说，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河内代表的计算，到目前为止，由苏联为90多家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提供的设备积压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境内，而且上述企业和项目的一半应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设。这些设备的大部分放在那里不用已不是第一年了。因此，采取相应的措施建设上述项目和适当利用上述设备是必要的。

范文同同意我们的观点，他说，他们正在听取有关的意见，但是在这方面需要苏联专家的帮助。这个问题已在由苏联大使转交给柯西金同志的信中稍微提了一下。

范文同说，苏联专家能够给予需要的帮助。

2. 我们受中央的委托已向范文同通报了柬埔寨的局势。范文同表示感谢后说，这一通报对越南同志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能够检验越南民主共和国得到的情报和所做的结论是否可信。苏联同志在通报时所说的情报大部分同越南的情报是一致的。此外他认为，这些情报的内容有一些是他们没有掌握的新情报，例如美国给朗诺政权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数额的情报。在这种情况下，范文同强调指出，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门罗主义”，但是他们是不会得逞的。

3. 在之后的谈话过程中还提到苏联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条约的问题。总理称，越南民主共和国“从积极方面”对待这一条约，并且已在越南报刊上就这一问题叙述了自己的观点。接着他强调指出，无论西德人民在过去25年里怎样翻来覆去，但是他们还是不

得不去莫斯科同苏联签订这一条约。这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表现。但是，范文同认为，今后必须警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不放过任何可对他们“施压”的机会。

我们回答说，苏联对帝国主义分子的习性及他们致力于破坏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威力的企图是了如指掌的。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签订的条约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不让帝国主义分子实现其侵略意图。

4. 我还谈了回莫斯科的印象，向范文同谈了苏共第二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苏联的收成及收割活动的情况。

范文同听了我们的通报后说，他很关心苏联农业的成就，他饶有兴趣地研究了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前不久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

参加谈话的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黄文进，外交部副处长谢友斤，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M.Г. 波多利斯基。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И. 谢尔巴科夫

№06766

苏联驻越使馆关于越美接触情况给苏联政府的报告

（1971 年 9 月 1 日）

秘密　第 1 份

在整个越南冲突期间，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一直以各种形式保持着接触，而且通常这些接触的倡议都是来自美国方面，尽管每一方都力图为了自己的政治和外交目的而利用这些接触。美国前国务卿迪·腊斯克有一次说（1967 年 7 月 19 日新闻发布会），问题并不在于缺少外交渠道，而在于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对解决冲突的可能的方式存在着深刻的原则性的对立观点。

在从越南冲突开始至约翰逊政府宣布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北纬 20 度线以北的领土（1968 年 3 月 31 日）期间，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各种接触实际上都是通过第三国的代表实现的。在这过程中，关于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开始就越南问题在巴黎进行谈判的直接态度等美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一系列重要呼吁书，是约翰逊政府通过苏联政府做出的。

从美越在巴黎举行预备性会晤（1968 年 5 月 13 日）以及后来的越南问题四方巴黎会议（1969 年 1 月 18 日）的正式会议开始以来，美越双方都能保持彼此间正式或非正式的经常直接的秘密接触。而且在尼克松政府掌权之前，巴黎会谈在解决越南冲突方面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为了尽力以自己能够接受的条件找到摆脱越南战争的出路，尼克松政府在掌权后便很快尝试直接通过白宫安排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秘密讨论解决越南冲突的重大问题。

比如，1969年1月上半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基辛格试图同北越人就个人在巴黎或其他地方举行秘密会晤达成协议，以讨论当时的局势和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但是他遭到越南人强烈的拒绝。这么一来，美国人作出了接近苏联的姿态，但是他们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不代替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进行任何谈判。

1969年3～6月份，美国一方面企图安排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在巴黎举行不公开的秘密会晤以研究军事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安排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西贡当局的代表举行类似的会晤以研究政治解决南越的问题。但是在会晤几次之后，北越方面在会晤中发现美国只企图解决他们感兴趣的军事问题，却避开认真研究政治问题之后便拒绝了举行这样的会晤。

1969年4月14日，基辛格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通过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向苏联政府转交了一份对越南问题的意见的备忘录，美方请求将这些意见通告河内。尼克松在这份备忘录里声明愿意达成双方都能接受地解决越南问题，同时表示准备在莫斯科或华盛顿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举行秘密会谈，以便拟定政治和军事解决的基本内容：在确保民族解放阵线参与南越政治生活包括参加规定日期的大选的情况下，双方从南越撤出所有军队并停火。但是对在大选前成立南越联合政府，尼克松不同意。美国的意见规定南越在一定时间内（例如5年）“单方面独立”，之后美国不反对越南统一。

上述备忘录的内容我们已通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1969年5月5日由范文同转给我们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答复指出，当前进行的巴黎谈判完全能担当起达成协议的任务，并表示了越南民主共和

国毫不动摇的立场。我们在答复4月14日尼克松呼吁时向美国人强调指出，美国拒绝成立能够反映南越各种政治势力的实际格局的临时联合政府使苏联方面更难以给予协助，而且这个问题与外国军队撤出越南一样，都是很关键的问题。

1969年8月4日，基辛格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春水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秘密会晤。从现有资料判断，基辛格在这次会晤时展开谈了美国1969年4月14日备忘录以及尼克松1969年5月14日讲话中谈到的论点。大约也在这个时候，即7月中旬，尼克松通过非正式渠道向胡志明发出一封亲笔信，笼统地呼吁共同努力解决冲突。越南民主共和国于9月30日（即胡志明逝世前3天）作出答复。北越方面实质上重申自己众所周知的官方立场。

1970年内，在基辛格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领导在巴黎谈判期间进行了5次秘密会晤（2月21日、3月16日、4月4日、9月初和9月底）。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代表团特别顾问黎德寿同越南代表团团长一起作为越方成员参加了这些会晤的前3次。

通过对这些会晤的分析（根据现有资料）表明：

1. 北越方面一直坚持美军按照具体规定的日期无条件地全部撤出南越，美国放弃支持西贡（阮文绍）傀儡政权，在南越成立临时联合政府，最好委托该政府在南越筹备并实施大选。

2. 美方每当提出美国从越南南方分阶段撤军（16个月，后来又提出12个月）的各种方案时都是以要求双方停火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从南越、老挝和柬埔寨撤军为自己这些建议的前提，同时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准备同意所谓的北越军队事实上秘密撤出。

3. 美国坚决拒绝强行排除西贡政府；美国只同意在相互撤军后成立某种三方混合委员会在越南南方实施大选，西贡政权的代表、临时政府和越南南方其他社会政治集团的代表都能参加这个委员会。

这样，在美越秘密会晤过程中双方实质上都坚持自己在官方声明和建议中分别阐述的立场。

美国人（基辛格）从1971年1月起又重新开始试探，其中包括通过苏联政府，试探恢复秘密会晤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基辛格则竭力想搞清的问题是：如果美国方面承担在规定的日期前撤出自己军队的义务，那么越南方面会不会履行在美军从越南南方撤军期间实行停火的义务。为了就恢复会晤达成协议，基辛格于1971年5月飞抵巴黎，显然是他在巴黎会见了春水。据春水说，他已明确告诉基辛格：他准备会见美国的任何代表以认真研究各种问题。

这次试探之后，亨·基辛格连续3次同黎德寿和春水举行会晤（6月26日、7月12日和7月26日）并于1971年8月16日会见了春水。

根据现有资料，基辛格在7月26日的会晤时向北越人阐述的解决越南问题的步骤分为3个阶段。

1．秘密制定并通过解决问题的原则的共同宣言。

2．根据解决问题的原则宣言，在越南问题巴黎会议上制定并签署最终协议。

3．召开新的印度支那问题国际会议，除直接冲突的国家参加外，还要有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国家，以便制定加强所达成的协议的国际保证措施。

原则宣言，按照美国人的想法，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美国军队从越南南方撤出的最后日期；

——美国承担不支持任何西贡政府的义务；

——承担按照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商定的范围限制对越南南方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彼此在整个印度支那停火；

——释放并遣返战俘。

美国人原则上同意这个宣言包括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7条中的某些条款（关于同时开始并结束撤军和释放战俘；关于和平恢复越南统一；关于越南南方中立的政策）。

至于美国从越南南方撤军的最后日期，基辛格以就上述美方建议中的所有问题双方达成协议作为准备确定最后日期的条件。

这样，今年夏季举行的最近几次美越秘密接触双方实质上并未就解决越南问题的主要方面的立场取得某种进展。无论是美国的还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非正式地向我们说的评价可以说明这一点。美国仍然拒绝确定越南民主共和国所坚持的美国无条件地全部从越南南方撤军的具体日期。美国人也不接受由临时联合政府取代西贡（阮文绍）政府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从美国的立场中经常可以看出他们竭力把彼此都撤军（或者停火）和遣返战俘同政治解决越南南方的种种问题分开。

№06767

葛罗米柯与基辛格就解决越南问题举行的会谈纪要

（1972年5月27～28日）

秘密　第2份

基辛格阐述了美国对越南的立场，他还对我们需要明确的问题作了答复，故而可以将其概括如下：

1. 如果从纯粹实践的观点对待事情，那么一下子就解决越南的一揽子所有问题（军事性质的和政治性质的）达成协议恐怕是十分复杂的。所以应该两方面充分进行研究并解决这些问题：一些问题是可以而且需要在最短期限内达成协议的；另一些问题是在实现第一方面的问题之后较为容易达成协议，当出现（尤其是美国军队全部撤出以后）新的政治形势或新的政治现实的时候，才可能去解决最困难的最终调解越南的问题。

2. 美国不认为自己与南越某个具体的政府紧密相连。由于这个国家事态的发展和某种演化，在那里新的政治力量可能会得到政权，可能还会成立共产党政府。对此，美国不会进行阻挠。但美国现在不能亲手去干这件事。

3. 不但如此，在就军事秩序采取某些措施（下面会谈到）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美国准备想发表一个关于基本原则的声明或宣言，在宣言中美国愿意担负一方的义务，单方面地对协定作出补充：

（1）同意南越中立；

（2）美国将不干预这个国家将来可能发展的政治进程；

（3）美国将准备限制自己对南越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援助规模已具体通告了另一方。当然，这里指的只是一段时期，即在由于南越的变革一些政治力量取得政权之前，而这些政治力量一般地说不愿意获得这种援助。

美国打算还准备按协定同另一方共同发表声明：

——关于南越应执行中立政策；

——关于应在越南人自己之间（即北方与南方）无外来的外国干涉进行协商的条件下实行越南的统一（这实际上是越南人众所周知的“7点”之一——这时基辛格补充说）。

4. 但是在事件总的发展之前，——如所见到的，美国已提出同意政治解决越南问题——应解决某些军事秩序的问题，以为今后总的进展创造有利基础。

5. 考虑到双方共同的兴趣，首要的军事问题如下：

（1）停火；

（2）释放美国战俘；

（3）美国军队从南越撤出。

停火协定不必以某种签署文件的形式而具有形式主义性质，它应是事实上的，若美国得到苏联必要的保证性表示的话。

还规定，释放美国战俘与美国军队全部撤出在某种程度应同时进行，以便这两个过程同时结束。

6. 所有这一切应对政治解决创造一个较为有利的形势。根据上述问题签订相应协定之后（开始实施协定），在6个月期间内在南越应举行选举。

在选举前一个月，现在西贡的总统和副总统都将辞职。

在准备选举和自由进行选举以前，应专门成立一个选举委员

会，其成员按以下比例组成：人民解放力量的代表占1/3，中立人士占1/3，现西贡政权占1/3。签订军事问题协定之后该委员会将立即着手工作，其任务是负责准备选举和监督自由选举。

7. 为协助委员会顺利工作和保障在南越的自由选举，在准备和进行这些选举的过程中，应成立国际专门观察组织或国际列席组织。组成这种观察或列席组织的成员应包括双方之间都同意的国家（基辛格说到这里具体只提到美国和苏联作为可能的参加者）。

8. 美国的出发点是：这些因素的共同配合（美军全部撤出、阮文绍辞职、相应的协定、美国关于若干原则的宣言，等等）将造成利于在南越自由选举的气氛。

9. 在选举委员会当中就已奠定了联合的原则。实际上委员会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将是一个过渡形式，与联合政府相似。

还可以考虑一下，怎样以灵活的、尽管有点迷彩伪装的形式还在协商所有这些问题之初就奠定联合政府的思想，虽然这个问题基本上应是双方之间谈判的题目。

美国准备在这方面对上述自己所提出的关于若干原则的单方面宣言还补充一个原则：美国将接受选举的结果，而不依其结果为转移。

10. 基辛格在回答有关问题时说，尽管他已单独地向北越人阐述了这一计划的主要部分，在其向我们讲述中包含有以下新的部分：

（1）没向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们解释美国种种建议的基础；

（2）没有向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如此统一而又集中地讲述这一切；

（3）未向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阐述关于停火和政治解决问题间的联系；

（4）没有向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讲美国准备在结束完全撤出自

己的军队的同时结束遣返美国战俘的问题（最近美国坚持要越南民主共和国首先遣返战俘，而只是后来才开始彻底撤军）。如果河内同意美国的这一建议，那么据基辛格说，在9月份或10月份之前，即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美国才会有从越南完全撤军的实际可能性。

11. 基辛格指出，白宫坚信，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蓄意不想同美国达成某种协议，是为了在美国的社会舆论中制造一种巴黎谈判完全是一条死胡同的印象，并且企图通过美国的社会舆论对尼克松总统施加压力，迫使他对河内的要求让步，特别是在总统大选期间。

基辛格说过，无论是在全体会议上还是在秘密会晤时，北越人现在新采取的纯粹是宣传的姿态就是为了这一点。据基辛格说，北越人坚决拒绝讨论美国人的任何建议，甚至于妥协办法，而且坚持讨论的只有他们的7条建议。

根据白宫的意见，这是由于4月份基辛格在莫斯科发表谈话后河内同意恢复在巴黎同美国人进行公开和秘密的会晤，同时在越南南方发动新的军事进攻，从而在配合北越人继续采取的纯粹是宣传的路线，使得这些会晤又一次遭到失败。

12. 基辛格最终还是放弃了美国人一再提出的条件：在恢复巴黎正式会议之前能同黎德寿举行秘密会晤，以及从北越人那里预先得到关于他们对继续会谈采取认真和建设性态度的保证。

现在白宫已经明白美方已经能够自由地阐述自己的全部计划，同样也明白越南方面将如何做这些后便同意恢复举行正式会议。

至于举行一次秘密会晤（或多次会晤）问题，基辛格说，我们当然期望越南人证实是否已经同意他们的意见，也就是说在巴黎正式会议开始后在6月的下半月在某个地方将举行秘密会晤。

此外，美国人的出发点是不要出现这样的局面，即：北越人得知美国同意恢复正式会议后便开始大喊他们取得了胜利，他们迫使美国投降了。基辛格说，这会使局势严重地复杂化。

№06768

谢尔巴科夫关于黄文进通报美越谈判情况给苏联政府的报告

（1972年12月27日）

秘密　第2份

应黄文进的邀请曾前往政府接见大楼。

副部长根据委托向我们通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同美国之间谈判的情况。当时他说，范文同总理已向苏驻越大使概括地通报了这一问题。接着黄文进通告了以下情况：

今年12月18日美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发来一封信，建议举行由黎德寿和春水同基辛格举行再次会晤，与此同时开始对河内、海防和整个北越进行密集轰炸。美国空前地动用了大量的防空兵兵力，其中B－52就有几百架，野蛮地屠杀和平居民。这是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战争升级的极为严重的步骤，它显而易见地证明，美国12月18日的信件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

黄文进回答我的问题时说明，美国在其信件中要求签署经美方加以修改的协定。否则，华盛顿宣称，难以估量以后事态发展的后果，也就是以继续战争相威胁。

副部长继续说，这样白宫就违反了美国早先作出的保证：在进行谈判期间直至谈判结束，对纬度20度以北的地区停止轰炸、射击和布雷，对纬度20度以南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减少轰炸和射击。

但是美帝国主义开始进行的又一轮战争升级无论从军事观点，还是从政治观点来看都遭受惨重的失败。侵略者遭到应有的回击。在短时间内，许多美国飞机被击落，其中包括 B－52 轰炸机，大量的驾驶员被俘。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大多数国家，其中也包括美国的许多盟国的社会舆论都坚决谴责华盛顿的极不明智的行动，要求美国停止战争升级并立即签署已达成的协定。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各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的积极支持正在鼓舞着越南人民和军队，使其增加了新的力量。

在巴黎专家会议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要求美国停止战争升级行动，回到今年 12 月 18 日以前所存在的状态。已向美方宣布，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将继续专家的会晤以讨论协定议定书。

1972 年 12 月 22 日，美国在继续加强对北越轰炸的同时，又给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出一封信，其中通知说，如果越南方面同意 1973 年 1 月 3 日黎德寿与基辛格会晤，在此条件下从 12 月 31 日午夜开始，美国航空兵将停止对北纬 20 度以北地区的轰炸。

12 月 26 日下午，越南民主共和国对美国两封信发去了复信。越南方面在复信中谴责了美帝国主义战争升级的惨无人道的行径，否定了美国两次信件中所包含的一切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揭露了尼克松政权在巴黎谈判中的背信弃义。越南民主共和国还要求美国立即停止战争升级的罪恶行动并放弃以实力威胁和进行谈判。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是美国同意回到 12 月 18 日以前所存在的状态，在谈判期间直至谈判结束，停止在北纬 20 度以北地区的轰炸、射击和布雷，并减少在北纬 20 度以南地区的轰炸和射击，那么将继续两方专家和代表在巴黎的会议，并举行黎德寿和春水同基辛格的会晤，如美方所建议的那样。

但是鉴于黎德寿同志健康状态不佳，越南民主共和国通知华盛顿说，会晤只可能于 1973 年 1 月 8 日举行。越南方面在信件中重

申了自己的严正立场并明确表明，越南将竭尽全力同美国代表一道解决所有遗留下来的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要求美国也采取同样严肃的态度，并指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取得成果，并在最短期间内签署在越南停战与恢复和平的协定。如果美国一意孤行，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升级企图以实力进行谈判，那么往后继续进行战争的全部责任将完全由美国来负，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则决心继续斗争到底。

越南同志请求苏联利用自己全部威信和影响，向美国施加压力，使其停止战争升级的新行动，迫使美国立即回到今年12月18日以前所存在的状态，并进行严肃的谈判以解决所遗留的问题、尽快地签署协定。

我感谢交谈者通报情况以后，答应将其告知莫斯科。我还问了，苏联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这一情报以向华盛顿进一步施加压力。

黄文进回答说，苏联同志可以完全使用这一情报。应该使美国人相信，在整个谈判期间直至谈判结束，只有停止对纬度20度以北地区的一切军事行动，并减少在纬度20度以南地区的军事行动，才可能使在巴黎的会晤得到恢复。副部长顺便提及，这正是尼克松向越南保证过的。

黄文进在谈话结束时说，越南同志请苏联加强对美帝国主义罪恶行径的揭露，尤其是揭露其对河内和海防的轰炸，以便动员社会舆论谴责美国的侵略。越南朋友还请委托苏联驻世界各国的大使开展相应的工作，使这些国家也响起支援越南的呼声。苏联领导人发表意见也会促使美帝国主义放下罪恶的手。

对此他说，苏联有力地支援了并正在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莫斯科会议上发言面对众多听众严厉地谴

责了美国的行动。阿·尼·柯西金同志和帕·费·巴季茨基元帅[①] 最近发表讲话支持越南。顺便谈到，这些发言在河内报刊上都被援引了。

苏联大使馆随员 И.А. 诺维科夫参加了谈话，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工作人员邓德科担任谈话翻译。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И. 谢尔巴科夫

① 帕·费·巴季茨基，时任苏联国土防空军司令。

№06769

基辛格关于北越违反协定转交多勃雷宁的通报

（不早于1973年5月9日）

译自英文

基辛格转交多勃雷宁

关于北越1973年3月6日至4月26日违反协定的通报[①]

一、北越军队违反协定继续渗透

1. 我们现已掌握令人信服的若干证据：自1月28日停火以来，北越15000名军人和约4000名其他特种小分队人员开始向南越方向渗透。除此而外，人数大约为20000人的军队1月28日已在突入走廊，继续向南方推进，现已到达指定地点。特种小分队现仍在继续渗入。

2. 还发现北越部队非法变更部署如下：

1）4月，观察到北越军队有2个高射炮团从广治省向老挝移动。

2）也在4月份，北越一个装甲团团部的一个分队原先驻扎在靠近河内的地方，现已出现在3号政府军事地带禄宁以北的柬埔

① 此件是基辛格在1973年5月4～9日莫斯科苏美会谈期间转交给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

寨－南越边界的点上。

3）北越一个装备萨姆－2导弹的导弹团于2月深入到南越的领土，现在广治省溪山市郊区建立了10个发射阵地。现在其中一些发射阵地已完全占领，人员业已配齐。

4）3月6日，北越至少又有2个高射炮团深入到南越。3月中旬，发现这新出现的2个高射炮团的司令部和2个步兵营在昆嵩省政府军事2号地带。同时，根据最近情报得知，其他一些团在1月28日以后从老挝领土开来在昆嵩省展开。推测，现在在南越至少已有16个类似的团。

5）最近我们发现，北越至少有2个高射炮团（第210和第46高射炮团）在2月中旬期间转移到柬埔寨去了。何况这些部队调动到柬埔寨是南越中央局控制地区的北越高射炮团已知道的首次行动事件。

6）我们还得到可靠的情报：北越军队第5师至少第275团和第6团及第5师师部又从南越深入到柬埔寨的柴桢地区。

二、北越仍在继续非法运送储备品和弹药：

3.3月6日至4月26日期间，北越人继续从北越向老挝、柬埔寨和南越运送大量的军事装备和储备品。继续运送这些储备品至少是以这样的速度，即在停火之前那段时间里的速度。例如，从停火之时起到1973年4月26日止，经非武装地带运到南越的军事物资约3万吨。也就是在这期间，从北越调拨到老挝的军事物资约3万吨。在这期间，我们发现，从北越到老挝有18000辆军用卡车在运行，而且到南越越过非军事区早已超过7000次。我们对以下情况深感不安：约400辆装甲车非法进入南越，至少有300门重炮，包括3组130毫米野战炮、以及广治省的溪山驻扎有一个装备萨姆－2导弹的导弹团。这些供给使装备程度提高了，比1972年4月的水平高，还应考虑到武器装备分布的特征，北越军队的战斗力

在那些起先没有配置这样大量重武器的地区有了本质的提高。

4. 在附件1中详细列举了被证实的北越人积极地非法进行运输和供应活动的事件。我们确信，北越军队的移动与供给有关，而供给的目的是支援在南越的军事战役。

三、北越军队仍在继续进行军事行动

5. 除最严重地违反第7条——表现在上述运输储备品和人员以外，还经常而粗暴地违反协定第3条的C项——要求完全停止进攻的军事战役。临时革命政府和北越的军队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在通往穆和3号军事地带的拉吉班以及在吉顿地区中心和4号军事地带的红古的基地上，还有在河静省的火力支援基地上尤其严重地违反了协定。临时革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的恐怖行为和屠杀行动仍在有增无减。例如，与1973年3月前的3个月相比，杀人数目几乎增加一倍。

6. 北越武装力量违反国际观察和监督委员会议定书第10条的敌对行动还严重地阻绕着国际观察和监督委员会的活动，并经常威胁着该委员会代表们的生命。类似行动最令人愤怒的例子是4月5日发生的事情：当时广治省的北越军队击毁了国际观察和监督委员会的一架直升飞机，9名乘客被打死。此前不久，5月2日，国际观察和监督委员会2架直升飞机在广治省临时革命政府控制的地区上空遭到射击，当时他们是按临时革命政府自己同意的航线在飞行。还可以公布其他许多国际观察和监督委员会的直升飞机遭到扫射的事件。国际观察和监督委员会人员的安全还严重地受到吉顿和红古地区中心大量的炮兵和导弹射击的威胁，委员会成员的驻地设在那里。由于临时革命政府表示不愿意合作致使健康和储备品的补足问题因而加重，威胁到本赫特和得柯边境站的国际观察和监督委员会代表们的安全。

№06770

谢尔巴科夫关于黄文进通报“联合公报”签署情况给苏联政府的报告

（1973 年 6 月 14 日）

秘密　第 2 份

应黄文进的邀请，曾前往政府大楼进行会谈。

副部长通报了最近一轮黎德寿和亨·基辛格在巴黎举行的会谈。[①] 这些会谈于今年6月6至9日在萨利文从西贡，亨·基辛格从华盛顿返回之后继续进行的。这次会见，双方讨论并达成了关于联合公报的协议。但6月7日美国人突然宣布，西贡政权对公报某些部分不同意，于是6月9日对公报进行了一系列修改。越南方面坚决谴责了美国的不认真态度，并积极反对拖延签署联合公报。因此，美国人提出将下次会见推迟48小时的建议。6月12日，亨·基辛格回到巴黎，谈判又恢复了。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坚定的立场，美国人取消了对公报最初文本所作的修改和补充。联合公报，像巴黎协定一样，分别由两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四方（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美国和西贡政权）签署的。

① 1973 年 1 月 27 日，参加巴黎会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美国政府在巴黎正式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国尼克松政府承担在 60 天内从越南南方撤出其全部军队和军事人员的义务。为保证“巴黎协定”的切实履行，“两国四方”又在巴黎进行了一系列会谈，签署了会谈的联合公报。

接着黄文进谈了以下情况：

公报和达成协议的基本内容与最初的方案相比没有重大改变。不同之处属于文本的措词、签署和公布的日期，以及为履行协定开始实施一系列措施的期限。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水域恢复、清除水雷、经济混合委员会的工作、释放公民和军人等条文都证明了这一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最近阶段的斗争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从一开始就向美国人表明，新的会晤的目的是：同美国一起总结并寻求严格而彻底地履行协定的措施。越南民主共和国将这一工作视为迫使美国和西贡政权履行巴黎协定的一场外交斗争。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企图取得一定成果，转移美国社会舆论，忘掉尼克松政府由于水门事件和在印度支那的局势，尤其在柬埔寨的局势所经受的种种困难。整个会晤期间，美国企图将履行协定与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联系在一起。越南方面坚决否决了问题的这种提法，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其立场是：印度支那这两个邻国的问题是这些国家人民的事。越南民主共和国一如既往地支持老挝和柬埔寨人民的革命斗争，支持老挝爱国阵线和柬埔寨民族统一王国政府的正义立场。越南方面要求美国停止轰炸老挝和柬埔寨，严格履行越南协定，美国应该停止支持朗诺政权并开始与西哈努克和柬埔寨抵抗力量进行谈判。

签署联合公报是越南人民为履行巴黎协定的斗争中的一次新的重要胜利。该公报对协定没有作任何修改或补充，公报中规定确保其履行的种种措施。尤其重要的是，签署公报是在美国和西贡政权严重并经常违反协定，污蔑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并企图将不履行这一文件的罪责推在它们身上的这种形势下进行的。如果联合公报的所有条款将得到履行，那未这将对南越的和平事业作出贡献，再次承认在南方已存在的现实：两个政权、两支军队、两部分领土。这个文件为越南两方创造了有利条件以解

决南方的内部问题，而美国则要履行其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义务。我们将面临着为履行联合公报所确定的协定和协议的艰巨斗争。必须保持警惕，因为美国和西贡政权可能企图歪曲公报中的内容，使世界舆论产生误解以实现自己的宗旨。还要继续作斗争反对美国和西贡政府方面的一切旨在撕毁协定及随后的协议的行动。

由于签署了公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将发表声明，指出越南人民这一新胜利的意义，将重申双方良好的意愿和严肃的态度，还含有严格履行协定和公报所有条款的要求。

黄文进以政府的名义请求苏联政府欢迎联合公报，在苏联领导人的发言中通过报刊和社会团体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的声明。副部长说，请求要求美国和西贡政权严格履行协定，揭露他们对公报的歪曲，及时谴责其旨在违反协定和随后协议的意图和行动。

黄文进面交给我们由两国四方签署的联合公报文本。他说，联合公报的签署是“我们共同的胜利”。

我感谢黄文进的通报说，通报的内容将通告莫斯科。我使交谈者确信，苏联将以适当的方式支持联合公报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及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的声明……

出席座谈会的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工作人员武豪安、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翻译 B.B. 谢拉菲莫夫。武豪安主持谈话。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И. 谢尔巴科夫

【专题说明】

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一）

（1968 年 2 月至 1982 年 6 月）

编入本专题的共 15 份文件，具体内容有：军前将军 П.Г. 格里高连科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的意见；乌克兰文艺舞台演出状况；“私下出版物”出版和变化状况；国家安全部要求注意神秘主义教派活动的报告；要求为希科尔斯基恢复名誉的情况，以及出版俄文版昂纳克回忆录，等等。如果按照这些文件各自的具体内容分立专题，显得有些“零碎”，考虑到都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于是合并称“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关注”。这些材料，尤其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哈尔科夫州委向苏共中央报告的关于文艺舞台演出状况；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苏共中央报告“私下出版物”的出版、变化状况等文件，更是研究此期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档案。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赵静男、赵英杰、李传勋翻译）

№03684

格里高连柯就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问题致卡达尔、罗歇、隆哥的信

（1968 年 2 月 13 日）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卡达尔同志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罗歇同志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隆哥同志

副本：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勃列日涅夫同志

同志们！

我想，你们是出于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注而聚集在布达佩斯的。

我和你们、和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一样，对我们的运动中存在的深刻危机十分担忧。但是更使我感到忧虑的则是：苏联的报刊却在千方百计地掩饰这一事实。在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中确认，似乎共产主义正在全球势不可挡地向前发展，只有敌对势力的宣传机器才叫喊危机，它们一厢情愿，把意愿当成了事实。

……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并未揭示出所发生的这一切的实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别说是全部真话，就连半点真话，甚至百分之一的真话都没说，通过十分委婉和颠倒黑白的形式仅仅就一个问题向大会说出了一丁点儿真话，即关于斯大林统治时期的暴行。但是，即便说了这一丁点儿实话，也害怕得要命——会后，立即开始支吾其词，一会儿说“斯大林是无能之辈”，一会儿又说“我们不能让斯

大林背黑锅”。

其实，单就这些暴行本身看，它们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们只是管理国家的具体方法造成的后果。更可怕的是，苏联的全部实践完全脱离了马列主义。以下事实可以为证。

1. 斯大林领导下建立的社会制度不能比资本主义更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马克思学说，这恰好是衡量一种新社会制度生存权的主要标准。

2. 苏维埃国家不仅没有达到无产阶级革命通过废除政治化的道路消灭国家的主要目标，甚至也未开辟出接近这一目标的实际可行的通道。事实上，十月革命后的实践仍是沿着过去历次革命的道路进行的。只不过它建立了比十月革命前更加完善的镇压机器。按照马列主义理论的教导，必须粉碎、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并以“行将消亡”、“刚要开始消亡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形式取代它。

3. 没有按马列主义学说预言的那样去极大地发扬民主，而是完全、彻底消灭了民主。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极权主义的国家。整个苏联社会生活的中央集权化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苏联国内没有一个独立自主活动的群众组织。不仅党和国家机关，即使工会、科学文化团体、编委会、出版社，等等，全都是统一的多层次的官僚机关的派生物。这个官僚机关被一个中心操纵并由专门为此目的而设立的机构控制着（现时这个机构被称之为克格勃）。

……

二十大之后。

我党的领导不仅没有着手纠正反共产主义实践的斯大林主义，反而加紧为进一步揭露这种行径制造障碍。苏共二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后，斯大林主义彻底复辟的路线已经特别明显地形成。

现在，新闻检查机构绝不允许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来揭露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实质。甚至“个人崇拜”这一字眼都被暗暗地禁止使

用。相反，那些或多或少掩盖、美化斯大林及其时代的东西却备受赏识。我们完全可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看到这条路线。

比如，在勃列日涅夫关于“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50 周年”的报告中，不仅把战前、战后镇压活动的整个时期，而且把揭露斯大林专制暴行的二十和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忘”得一干二净。但是，他却不失时机，尽可能不被人察觉地把斯大林同列宁相提并论。他说，在国内战争期间，“为了动员国内力量来粉碎敌人，建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工农国防委员会”，而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建立了由“斯大林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

安德罗波夫在他的国家安全机构 50 周年的报告中，不能不提一提斯大林时期的违法行为，因为被他赞颂的并确实著名的，但只是以罪恶而著名的机构，竟然杀死了大批肃反委员会的杰出组织者。但是，提到“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现象时，他说得十分含糊其词。说这不是在斯大林专制时期，至少不是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发生的，而是发生在“政治冒险家篡夺了安全机关领导权”的时代（你们能感觉到，“斯大林主义”是怎么简单地被其产物——“贝利亚作风”偷偷代换了吗?）。在这寥寥数语中他已指出，“贝利亚作风”并不会影响安全机构的社会主义性质。

全面复辟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如果可以用“思想”这个词的话）准备工作就这样在完成着。在这场具体复辟活动中，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我们清楚，二十大之后，苏联国内发生的变化只触动了斯大林主义一些极丑恶的表现，根本未涉及其基础。

比如，停止了大规模的镇压和残酷的逼供信，但是，恢复这些做法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诉讼程序如同斯大林时期一样是不公开的，国家安全机关的活动还如从前一样完全不受监督。

彻头彻尾的谎言仍然在国家基本法、国家的宪法中继续起着作

用。这个文献至今纯属一种宣言，其作用只是为了给国外编造苏联劳动群众享有一切民主和自由权的神话。

其实，在这方面，刑事法典根本就不把宪法放在眼里。在该刑事法典中有一个条款，根据它便可以阻止行使宪法中规定的任何一项自由（关于反苏宣传条款）。只有法西斯专政的国家法律中才有类似的东西。据此来评论我们法典中的这个条款，便对其性质明白无误了。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都没有类似的法令。甚至在高度垄断并需要高度调和一致的美国，也没能把有关反美活动的条款塞进自己的法律中。

目前，我国反人民的条款倒是不多见。现在正在制订新的残暴法律，用以对付可能出现的反对派。比如，在1966年9月通过了刑事法的两个补充条例，其中彻底取消了宪法授予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等自由以及工人阶级从长期奋斗中所争取到的一种最大权利。这两个补充条例是在人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打着同流氓习气作斗争的幌子通过的。

现在的政治犯劳改营，如同斯大林时代一样，与希特勒的集中营没有多大差别。

在苏联，对于政治“犯人”和过去一样既不开庭审理，也不审讯（这两个词均应按其真正意义去理解），便可定罪。如果在这方面谁有疑虑，便可以将他定为犯人。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利，特别是最近在莫斯科对加兰斯科夫和金兹堡两人的政治诉讼程序都证明了这一点。近两年来类似的诉讼程序还搞了几十起，但广大的苏联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对此均一无所知。

其实，不亚于种族灭绝罪的行径还在继续，只不过比斯大林在世时少一些而已。对待克里木的鞑靼人和伏尔加河流域地区德国人的方式、方法尤其不能容忍。对前者完全以行政手段——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剥夺了克里木的鞑靼人称呼自己民族名称的

权利，在1967年9月5日颁发的法令中和以后的一些文件中，把他们称为："以前居住在克里木的鞑靼族公民"。显而易见，照此类推，同样也可以把匈牙利人说成是"暂时住在匈牙利的鞑靼族公民"了。

自然，国内上述情况不能不引起社会上公众的反抗。这种反抗情绪日益公开地暴露出来。请看一些事实。

党的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夕，传出消息说，在这次大会上要部分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于是，几十位著名学者、作家和文艺界人士联名上书中央，反对为斯大林平反。人民一封接一封地来信，支持这一呼吁。尽管中央对代表大会隐瞒了这件事，但它对此已不能坐视不理了。

……

在我们国内培养上述歪风邪气的党的领导层，却不厌其烦地强调在"马列主义基础上"恢复团结的必要性。请问诸位领导，究竟什么是马列主义?！难道是目前我们国内搞的这一套吗？众所周知，这一套已不能作基础。须知，已有许多共产党为了保住已有的影响，不得不以某种公开的方式声明说，他们一旦执政后，绝不允许重演在苏联发生的一切。这就表明，在苏联经验基础上的联盟已不存在。

到底什么东西可以成为团结的基础呢？

……

关于团结的谈判应交给普通党员去进行！——这就是那条惟一的口号，一旦在会议上将它提出，会议便能实现寄托在它身上的希望。

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个惟一有效的口号至今还未被提出。要知道，各国党现今的领导人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自己完全无力消除他们之间产生的分歧。这些分歧公开暴露后已过去二十多年了，而且时至今日这些分歧不但未被消除，反而愈益加深。事情甚至闹到了一些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兵戎相见的地步。

真正采用这个口号将意味着同意该口号的各党之间的国际团结得到恢复。这次会议若能采用这个口号，它定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也将实际上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转折点。为了确保以上任务的完成，应着手做好以下工作。

1. 要公开谴责苏共现今反社会主义的、违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国内政策。“不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不得，而且是有害的、反动的。万不能把这条原则解释成各国的党在自己党内有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力。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党，因此，它们不能放弃自己无可争辩的权力——公开批评任何一个兄弟党不遵守国际主义义务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行为。任何一个共产党，如果它确实是共产党，就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尊重这种批评。苏联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应该是营造一个能成为对所有兄弟党具有鼓舞榜样的社会秩序。假若它不去履行自己这一国际主义义务，各兄弟党应当义不容辞地给它指出。

2. 要求苏共领导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真正回到列宁主义准则上来。起码应在党内恢复民主集中制原则。同时，应该为那些因为对党和国家生活中列宁主义原则的认识与领导有分歧而被开除出党的人以及不按党章原则而被开除出党的人恢复党籍。在国家内部生活中，要使国家基本法成为真正有效的大法，与此同时，要废除与基本法相违背的各种法、条例和规定，并对宪法作必要的修改、补充，以便我们的宪法与《人权宣言》完全相适应。

3. 要在各个共产党内开展大辩论，以便彻底弄清目前这场危机的原因。大辩论应具有国际性，即应做到：第一，辩论的过程和结论应见诸于国际共产主义刊物，必须让各种观点的拥护者自己全面充分地阐明各自的观点，而不是评论员的观点。第二，不仅有权批评自己党的工作，而且有权批评任何国家党的工作。第

三，每个参加辩论者有权向任何一个党要求并获得他所需要的任何有关辩论进程的资料。最后，就任何一个关于辩论中的不民主行为或关于某种思潮受到歧视的上访申诉书有权组织国际调查。

苏共的与会者应建议从公布自己中央委员会的行动纲领和所有其他纲领后开始辩论，而且这些纲领将在辩论开始前以书面形式提供出来，然后开始辩论。以后，对已公布的或在辩论过程中要公布的所有纲领的赞同者和反对者都应能得到为自己观点辩护的均等的机会——或是以每个纲领的赞同者在自己的印刷机关的印本中给予两种不同观点的论文同等数量的印张，并在该同一印刷机关编辑部为两种纲领的拥护者配置相同数量的工作人员的方式。辩论应随党代表大会的闭幕而结束，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应由各行动纲领的拥护者进行选举产生。我想，无需加以证实就很清楚，在苏共党内已有过的正是列宁早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谈论过的那种局面，这种局面能够要求按照行动纲领分别选出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苏联，已经完成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只是国内根深蒂固的官僚政治阻碍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最广泛地发扬民主，才能克服这种官僚制度。如果苏联共产党还配得上共产党称号的话，它就必须领导我国全面民主化的进程。然而，这绝非我国的内部事务——愿意，便和官僚主义者斗争；不愿意，就去助长官僚主义进一步发展。全世界的共产党关心的是，被斯大林的专制所中断了的社会主义的尝试继续下去，以便创建一个能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理想”中的社会。如果苏共领导不同意这一观点，全世界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应该同它断绝一切关系，并明确、毫不含糊地声明，他们不承认该党为共产党，也不承认由它领导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

П.Г. 格里高连柯

1968 年 2 月 13 日

№04388

奥夫恰连科就乌克兰巡回演出状况致苏共中央的信

（1969年5月12日）

苏共中央[①]：

最近，某些知识界创作人员的代表陆续来乌克兰共和国做巡回演出，他们在音乐厅演出的作品，存在着消极的倾向，思想模糊。

例如，今年4月，莫斯科诗人丽玛·卡扎科娃[②]和伊娜·卡舍热娃在哈尔科夫做巡回演出时，朗诵了她们自己创作的诗歌，其中有思想错误地方。今年3月29日到4月1日，苏联人民演员阿·伊·赖伊金[③]来哈尔科夫做巡回演出，在他的音乐会上，作家米哈伊尔·兹沃茨基[④]以及其他一些人演出了一系列幕间小喜剧，歪曲了我们的现实。

赖伊金、卡扎科娃、卡舍热娃等人音乐会小组的演出，不可能不在观众中引起消极反应。前来观看赖伊金演出的人都在谈论演出留给他们的压抑的印象，他们对部分节目以片面的吹毛求疵的手法侮辱苏联人民的尊严感到吃惊。

在卡扎科娃和卡舍热娃向青年观众朗诵的诗作中，充斥着悲观失望的情绪。诗作对我们复杂的历史时期阐述得极为片面。诗中的

① 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5月14日的批示：请绍罗同志给予注意。

② 丽玛·费多罗夫娜·卡扎科娃，苏联女诗人，擅长写豪情诗和爱情诗。

③ 赖伊金，苏联人民艺术家、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39年起为列宁格勒小型剧院演员和艺术指导。

④ 原文如此，应是米·日瓦涅茨基。

某些章节还含有世界主义思想。

我们认为，苏联文化部、苏联作家协会以及其他一些创作组织，必须加大对公演剧目监督的力度。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　X. 奥夫恰连科

1969 年 5 月 12 日

№04390

斯克里亚罗夫就乌克兰巡回演出的内容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9年5月27日）

莫斯科

苏共中央：

今年，在哈尔科夫举行了一系列由苏联文化部组织的艺术大师巡回演出以及持有苏联作家协会介绍信的一些诗人的演出。

我们认为，必须向苏共中央报告部分节目的内容和思想艺术倾向。我们认为它们不利于对劳动者进行正确的政治教育和美育教育。

例如：苏联人民演员赖伊金3月29日到4月1日演出的节目内容十分偏激。赖伊金的节目出自列宁格勒小型艺术剧院的话剧，由分散的片段、独白和幕间剧等组成，这些节目从总的方面歪曲了我们当今社会生活的某些现象。

在《信号灯》的独白中，赖伊金通过演员的表现手法，突出了这样的思想："为什么总得求人，为什么总得低三下四？放眼四周，大家都在求人，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求人，而是为了别人，为了生产，为了国家利益……，您随便给我找个人，我也得求他点什么。"赖伊金频繁地鼓动人们不要忘记苏联初级课本中的一句话："我们不是奴隶"。

在幕间剧《部里来电》中，赖伊金及其搭档向观众强调，似乎我们所有的生产系统都存在着诸多混乱、没有秩序、弄虚作假等现

象。

在对白中，赖伊金提到了一名在国外显然可以代表苏联科学与技术成就的人，竟然说他是愚蠢无知的人。这就有诬蔑之嫌了。

一个与赖伊金同台演出、名叫米哈伊尔·日瓦涅茨基的人，诚如斯言，他朗诵了“剧院将要上演的节目中反面人物的三段独白”。

在第一段独白中，日瓦涅茨基宣扬“沉默是金”的思想，只有在家庭的环境里才能谈缺点，因为“缺点很多，但命只有一条”。因此，作者鼓动人们按照“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权当自己是瞎子和聋子的”原则去生活。

在第二段独白中，日瓦涅茨基规劝人们“为什么要抓扒手的手，如果他突然变成大人物怎么办?”

节目不健康的倾向还有：极力表现庸俗的市侩风格，反面人物对一个民族的贬损、对另一个民族美德的歌颂——所有这一切都引起城市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困惑和正义的指责。

女诗人卡扎科娃和卡舍热娃的演出更是不负责任。4月16～17日，她们持苏联作家协会文艺作品宣传局的介绍信在哈尔科夫演出。

由她们朗诵的诗作《传闻》、《傻瓜》、《第五栏》、《领袖》（假定题目，因为作者只宣布了栏目的题目）明显有思想上的缺陷，许多思想是以毫不掩饰的厚颜无耻表现出来的，与公民朴素的正派作风相抵触。

过去我们不要上帝——现在
也不要领袖。
领袖啊，领袖，
你是一个不可靠的人。
大家猜一猜，跟在领袖屁股后面会怎么样?
——当缰绳再次绷紧……

跟在领袖后面，
就像小绵羊紧跟着山羊。
领袖已经成为史前
——穴居世纪和时代的错乱，
蜡烛正在滴尽最后的信念。

（丽·卡扎科娃）

还有：
时代在胸中激荡，
创造人是那样的奇怪。
勇士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
只有胆小鬼才乞求长命百岁。

（伊·卡舍热娃）

确实，这样的“诗歌”使全城哗然，根据公众的要求，地方机关被迫拒绝为这两位女诗人继续组织演出。

我们在汇报这一情况时认为有必要请求苏共中央注意，苏联文化部和苏联作家协会应提高某些艺术大师或作家们对剧目和文学作品中政治思想水平的责任感。

乌克兰共产党哈尔科夫州委书记　尤·斯克里亚罗夫

№04389

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乌克兰巡回演出状况的调查结果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9 年 5 月 27 日）

秘密

苏共中央

根据部长会议克格勃掌握的材料，苏联作家协会会员丽玛·卡扎科娃和伊娜·卡舍热娃曾于 1969 年 4 月 16～17 日在哈尔科夫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在她们朗诵的部分诗句中，思想界限模糊，并有模棱两可的倾向，受到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否定。

按通报程序报告。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H. 扎哈罗夫

№04391

苏共中央文化部就乌克兰巡回演出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9年7月14日）

苏共中央：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奥夫恰连科同志）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扎哈罗夫同志）报告了关于苏联作家协会会员丽玛·卡扎科娃和伊娜·卡舍热娃在哈尔科夫市公开演出时，她们所朗诵的一系列自己创作的诗歌有严重的创作思想错误。对流行歌曲演员阿·赖伊金和米·日瓦涅茨基在哈尔科夫市举办的音乐会也提出了相同的意见。

苏联作协理事会书记K.B.沃罗科夫同志报告，苏联作协理事会书记处讨论了女诗人丽·卡扎科娃和伊娜·卡舍热娃的演出，今后将禁止丽·卡扎科娃和伊·卡舍热娃举办类似的演出。苏联作家协会苏联文学宣传局（Л.Е.利亚什克维奇）建议严格挑选参加公开演出的节目的作者，严格审查上演的剧目。建议俄罗斯联邦文化部（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加大对流行歌曲演员上演剧目的监督。

苏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　З.图曼诺娃

苏共中央文化部指导员　А.弗罗洛夫

№06204

安德罗波夫关于“私下出版物”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0 年 12 月 21 日）

苏共中央

对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的所谓“私下出版”的书籍的分析表明，“私下出版物”近几年来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 5 年前传阅的主要是一些思想上有毛病的文艺作品，那么现在具有政治纲领性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从 1965 年至今这一时期已出现 400 多种研究经济、政治和哲学问题的各种学术著作和文章，这些出版物从各个方面批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对苏共的对外和对内政策进行修正，提出了各种对立活动的纲领。

许多文件还宣传从南斯拉夫领导人、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分子和一些西方共产党政治纲领中借用的思想和观点。

以反社会活动著称的罗·梅德韦杰夫所写的文章《论我国若干社会政治潮流》作出结论说，苏联社会已出现新思潮政党和具有思想影响的中心。文章断言，苏共内部一些人反对似乎存在着的“保守主义”的力量，“主张坚决揭露个人崇拜时期的所有罪行，清除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者、腐化堕落分子、教条主义者和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人；主张扩大言论、集会和讨论的自由，用党对新闻出版的形式更灵活的领导取代新闻书刊检查；主张扩大工人自治，改变选举制度”，等等。

在科学界、技术界和部分从事创作活动的知识分子中传播着一

些鼓吹各种“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文件。按照其中一个由萨哈罗夫院士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公式，苏联内部政治发展的演变道路应当不可避免地导致在国内建立“真正民主的制度”。因此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应预先研制这种制度的模型，以便使其成为现有社会政治制度中积极因素的综合。

在许多苏联“民主化”方案中都规定要“限制或消除苏共的垄断权力，在国内建立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反对党”。这些方案的作者和传播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目前的发展水平使得反对派观点有权存在，因而要求为表达与官方方针不同的意见提供合法的机会。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宣称，惩处反苏宣传的鼓动或散布诋毁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明显谬误的谣言的刑事法律是违反宪法的。

在写作和传播“私下出版”的书籍的基础上，志同道合者在某种程度上团结起来，明显地看出建立类似反对党的组织的图谋。

大约在1968年末至1969年初，由一些具有反对党思想的分子组成了一个名为“民主运动”的政治核心，按照他们的评价，这个核心具有反对党的三个特征：“有领导人、积极分子并依靠人数可观的同情者；不采用明确的组织形式，为自己提出明确的目标并选择明确的策略；争取合法地位”。

“运动”的基本任务，正如以亚基尔为首的莫斯科“民主运动”小组出版的《时事纪事》第13期中所表述的那样，包括“通过在人们中间培养民主与科学的信念使国家民主化，反对斯大林主义，保护自己不受镇压，与任何派别的极端主义作斗争”。

处于新闻出版检查之外的材料传播的中心仍旧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高尔基市、新西伯利亚、哈尔科夫。在这些城市及其他城市发现了300名自称“反斯大林主义者”、“民主权利斗士”、“民主运动参加者”的人。他们既从事单本文件的出版，又从事像《时事纪事》、《乌克兰通报》、《社会问题》等文集的出版。莫斯科、

列宁格勒、里加等地一些具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分子组成的小组，从1970年开始出版名为《离境》的杂志。

西方的宣传工具，国外敌视苏联的一些中心和组织把“私下出版物”看做苏联政治局势的重要因素。非法出版的杂志和文集被称作“民主的地下工作者”的机关刊物、“自由民主的出版物”等等。在比较几期《时事纪事》的基础上可以看出，“运动参加者人数不断增加”，其中有“经常的和集体的合作”。“苏联学家们”得出结论，在苏联存在和发展着一个“争取公民权的运动”，“它具有越来越清楚的轮廓和越来越明确的政治纲领”。

帝国主义的情报机关及与它们有联系的反苏移民组织不仅注意到反对派意向的存在，而且企图支持它们，呼吁炮制和宣传伪造文件。在许多这样的文件里，如《苏联民主运动纲领》、《策略原理》、《时不我待》中，阐述了关于组织反对苏共的地下斗争的纲领性目标和建议。

安全委员会正在采取必要措施制止某些人企图利用“私下出版物”去散布诽谤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谣言。根据现行法律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而对受他们影响的人则实行预防措施。

同时，在注意到“私下出版物”在思想上向表现对立情绪和观点的形式转换及帝国主义反动派把“私下出版”的书籍用于敌视苏联的目的的意图时，我们认为应委托意识形态部门在研究问题的基础上，制定必要的思想和政治措施去消除和揭露“私下出版物”中表现的反社会潮流，并拟定在政策中注意促使“私下出版的材料”出现和传播的因素的建议。

附件[①]

1．罗·梅德韦杰夫：《论我国的一些社会政治潮流》。

① 收集的档案中无此附件。

2．A．斯拉温：《苏联民主运动若干印象》。

3．《时事纪事》第10期

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

№06203

苏共中央关于“私下出版物”问题的决议

（1971 年 1 月 15 日）

绝密

CT－119／11C 号

关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70 年 12 月 21 日的报告（第 3461－A 号）

兹委托佩尔谢、杰米契夫、安德罗波夫、卡夫托诺夫和波诺马廖夫同志并吸收有关工作人员在一个月期限内研究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中阐述的问题并向苏共中央提出建议。

中央书记

№06245

同意格里高连柯因私赴美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
（1977年11月14日）

№2531－A
绝密

苏共中央

关于格里高连柯因私赴美国

近年来，在进行反社会活动的人中间，前苏军将军格里高连柯起了积极的作用。与他联系在一起的有数不胜数的记者招待会、各种各样的“声明”和“呼吁书”，鼓噪臭名昭著的“人权”问题，这是国外宣传机构经常用来达到反苏目的的。

格里高连柯曾经两次因进行反苏活动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两次皆以法律的程序被送去强制医疗，因为经专家鉴定，他患有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10月，格里高连柯申请批准他赴美国（他的儿子原先去了以色列，现在住在美国），事由是必须做前列腺手术。根据苏联医生的结论，格里高连柯的确须要做这种手术，但是由于健康原因，却不能进行手术。

如果在苏联进行手术，可能出现失败的后果，这将引起不良的

歪曲的言论和政治上对我们不利的反响。考虑到这些情况，决定不反对他因私赴美国。

格里高连柯是否能返回苏联的问题，取决于他在国外的表现。

作为信息汇报如上。

国家安全委员主席　安德罗波夫

№06242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邀请《新社团》杂志编辑部访苏的决定

（1981年1月27日）

绝密

13с，пр.№247决定

关于《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机关刊物《新社团》杂志建立合作关系

1. 批准《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机关刊物《新社团》杂志建立合作关系并且邀请该杂志的代表于苏共二十六大开会期间对莫斯科进行为期10天以内的访问。该代表抵达苏联以后所需费用从《真理报》出版社预算中支付。

2. 批准发给苏联驻德意志联邦大使的电文（见附录）。

附　录

波恩

苏联大使

25. 请通知《新社团》杂志编辑部，莫斯科对该杂志关于与《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建立合作关系的要求做出肯定的答复。根

据德国民主党理论机关的愿望，《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邀请《新社团》的代表在苏共二十六大开会期间访问莫斯科。

还请转告，莫斯科考虑到《新社团》杂志的代表往返苏联的费用由西德方面承担，而他抵达苏联以后的费用则由苏方承担。

电告执行情况。

№03351

安德罗波夫就神秘主义教派活动情况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1年前后）

致苏共中央

关于在苏联发现西方宗教神秘主义教派的信徒

简报。近来，从西方传来的宗教神秘主义教派在苏联得到一定的传播，它们引导自己的信徒不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劳动而倒向神秘主义。

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的信息表明，自70年代末起，存在于西方的把神秘主义教派信徒汇集在一起的国际组织“毗湿奴意识国际协会”和“白人兄弟会”，试图把自己的主张传播到苏联境内，并首先以知识分子和青年为吸收对象。

这些组织的代表先是设法同苏联公民建立通信关系。对于那些对“教义”表现有兴趣的人，会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密使从国外通过旅游途径奉派前来找他，给他带来影片、幻灯片、专门的书刊、做仪式时用的衣服，并给予在苏联进行传教活动的指示。

这类组织之中，最为反动的一个是“毗湿奴意识国际协会”。其创始人和主要的思想家是印度人毗湿奴斯瓦明·普洛布休帕达，他是从美国开始传布自己的“教义”的。其教义是一种集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于一身的大杂烩，宣称最终目的是达成“涅槃”境界

（灵魂摆脱物质桎梏的状态）。斯瓦明·普洛布休帕达宣传建立一种类似古印度的种姓制社会。“毗湿奴意识国际协会”试图通过否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并同它们作斗争，引导自己的追随者不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劳动，倒向神秘主义。

目前，这个组织的信徒已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以及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一些城市，以规模不大的教友小组形式出现。为了共同研读书刊，举行“教义”规定的仪式，这些小组的参加者在私人住宅进行聚会。在这类人中间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进行传教活动，同国外的中心和国内的同类组织建立联系。“毗湿奴意识国际协会”的信徒小组是按照狂热服从导师并将其神化的原则建立的。来自国外的密使拥有特别的威信。

这个教派中有狂热情绪的信徒，企图利用青年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古代东方宗教和哲学的兴趣，吸引他们信奉自己的教派。为了实现这种图谋，他们试图通过放映从国外带进来的影片、幻灯片，以及组织讲课来对广大的听众施加影响，于是用欺骗手段借用社会团体的场地安排此类活动。此种做法已在莫斯科、基辅、维尔纽斯、里加发现。参加此类活动的人数每次约有 100 人。

促使“毗湿奴意识国际协会”的信徒在苏联出现的因素之一，是近年来各城市中对心灵学、瑜珈功、内功的讲座盛行一时。

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开展工作，以求瓦解古代东方宗教——哲学流派和制止他们在国内的传教活动。

作为情况通报如上。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尤·安德罗波夫

№11738

安东诺夫等人关于为西科尔斯基恢复名誉致苏共中央的信

（1982年3月17日）

苏共中央：

俄罗斯仁人志士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和理解伟大的十月革命。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不理解革命的意义，离开了俄罗斯，在国外居住和工作，同时也怀着崇敬的心情对待祖国及其新的秩序。

属于给俄罗斯争光的这类人物有：作曲家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①]、歌唱家费德尔·夏里亚宾、作家伊万·布宁、艺术家尼古拉·廖里赫[②]、芭蕾舞演员安娜·巴甫洛娃[③]。尽管他们客死他乡，但在苏联他们都受到极高的评价。他们的光荣、他们的天才仍然是祖国的财产。纪念碑、博物馆、发行的各类刊物上，都记载着他们的人生之路。

在这些杰出的人士中，应该有著名的飞机设计师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西科尔斯基的名字。

---

① 拉赫玛尼诺夫，俄国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曾任俄国大剧院指挥。十月革命后，1917年12月移居美国。主要作品有钢琴协奏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钢琴前奏曲、幻想曲《岩石》、管弦乐诗《死之岛》等。

② 廖里赫，俄国画家、舞台美术家、作家。十月革命后，移居印度。主要作品有《急使》、《牢记》等。

③ 巴甫洛娃，俄国芭蕾舞蹈家，原姓玛特维耶夫娜。1899年毕业于彼得堡皇家芭蕾舞学校，当年在玛丽亚剧院登台，1906年获“芭蕾女舞蹈家”称号。1913年离开俄罗斯在欧洲和世界各地演出。以演出芭蕾小品《天鹅之死》饮誉世界。

伊戈尔·西科尔斯基是基辅一名著名儿科专家的儿子，他于1909年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架直升飞机，即不久就出名的“俄国勇士”飞机和独特的“伊利亚－穆罗梅兹”巨型多发动机系列飞机，使俄罗斯跃居世界首位。这位亲自驾机试验的俄罗斯著名的飞机设计师，作为俄罗斯航空思想的卓越代表，被载入世界飞机制造史册。

十月革命后不久，在国内战争和经济崩溃的年代里，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西科尔斯基请求列宁批准他到国外继续从事几年来一直不能进行的设计工作。列宁虽然遗憾，但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在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的帮助下，西科尔斯基在经历了一系列困难之后，终于成功地在美国继续了他的航空设计师的工作。最后几年，在“西科尔斯基”公司担任顾问。

据在不同时期与西科尔斯基见过面的苏联著名试飞员尤·卡尔纳耶夫、飞机总设计师安·图波列夫证实，西科尔斯基从未反对过苏维埃俄国。他与拉赫玛尼诺夫和廖里赫一样，总是以情不自禁的崇敬心情提到俄罗斯，梦想回归祖国。

他在钻研现代航空技术的同时，总把自己的活动当成是为站在自己祖国盟国的立场上，给西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又一打击。但是与其他一些俄罗斯优秀的活动家一样，他也没有实现返回俄罗斯的愿望，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客死美国。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现在提出关于为伊戈尔·西科尔斯基“恢复”名誉的问题是及时的。到目前为止，针对西科尔斯基仍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是否承认他是俄罗斯杰出的发明家。一方面，西科尔斯基的名字在我国报刊上，在祖国的历史上都曾提到过。另一方面，关于西科尔斯基既没有任何一篇详细的文章，也没有一次公开承认和深入研究。

现在，正当美国军国主义猖狂燃起冷战的烈火时，我们认为不能让俄罗斯伟大同胞的名字落在外国战争鼓吹者的手中，落在那些

伪造历史的外国人手中。更何况，现在承认在现代人类文明最现代阶段——建立与发展征服航空领域的工具方面——给俄罗斯祖国带来荣誉的俄罗斯著名活动家西科尔斯基是十分有益的。

我们恳请党中央审议我们提出的这一问题，以便在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上宣传这位优秀同胞的材料，以消除目前人们对待西科尔斯基的两种不同态度。

请求在国内与伊戈尔·西科尔斯基活动有关的地方给他树立纪念碑。

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科学院院士、总设计师
奥·安东诺夫①
苏联英雄、试飞员
米·卡拉伊②
苏联英雄、飞行员、空军上将、教授
米·格罗莫夫③
苏联英雄、飞行员、作家
格·戈夫曼
1982年3月17日④

① 安东诺夫，苏联飞机设计师，苏联科学院院士、乌克兰科学院院士。1945年参加苏共。他领导设计的飞机有运输机“安－10”“安－22”等，获苏联国家奖和列宁奖。

② 卡拉伊，苏联功勋试飞员、苏联英雄。1939年参加苏共。试飞最早的苏联喷气式歼击机、远程轰炸机、直升飞机等。

③ 格罗莫夫，苏联空军上将、苏联英雄。1941年参加苏共。1937年与尤马舍夫等人共同完成了莫斯科－北极－美国航线的不着陆飞行。

④ 文件上有如下批示：“交中央科教部谢尔巴科夫同志，中央宣传部杰热利尼科夫同志阅。信中要求审议西科尔斯基的问题，请与科学院、国防部、苏联支持

№04379

扎哈尔琴科关于为西科尔斯基恢复名誉致苏共中央的信

（1982 年 3 月 17 日）

秘密

苏共中央：

我国一批优秀的飞行员请求本刊支持他们提出的关于恢复著名飞机设计师伊戈尔·西科尔斯基[①] 名誉的要求。

飞行员们都想看到本刊关于俄罗斯著名飞机设计师、“伊利亚·穆罗梅兹”型多发动机飞机创始人西科尔斯基的详细介绍。西科尔斯基后半生在美国工作。

等待中央对该问题做出批示。

《青年技术》[②] 杂志总编　B.Д. 扎哈尔琴科

① 伊·伊·西科尔斯基（1889～1972），出生于俄国，1908 年就开始在俄国设计和生产飞机。1919 年移居美国，从事飞机设计和制造。

② 《青年技术》月刊是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主办的社会政治、科学技术和生产指导等综合性月刊，创建于 1933 年，在莫斯科出版。

№04380

谢尔巴科夫等关于为西科尔斯基恢复名誉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2年4月29日）

秘密

苏共中央：

鉴于飞机总设计师安东诺夫、试飞员卡拉伊、上将格罗莫夫、作家戈夫曼曾就西科尔斯基的问题致函《青年技术》编辑部，《青年技术》杂志主编B.Д.扎哈尔琴科同志要求考虑在其刊物上刊登飞机设计师伊·西科尔斯基材料的问题。作者在信中建议通过各种大众媒体广泛宣传西科尔斯基在发展航空技术方面的贡献，在与其活动有关的地方树立纪念碑。他们认为这些做法有助于促进在我国为其“恢复名誉”。

我们已会同苏联科学院、国防部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了作者的建议。

航空设计师西科尔斯基以设计制造出俄罗斯第一批多发动机飞机而闻名，1918年从苏维埃俄国移民，并于1923年在美国创建以其名字命名的飞机制造公司。

根据国防部的材料，在西科尔斯基领导下研制的飞机广泛应用在美国以及其他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力量中，它们在对朝鲜的军事行动（1950～1953年）和越南战争（1964～1973年）中频繁使用。

1944年纽约出版的《有翼飞机史》一书中，西科尔斯基在叙述其作为飞机设计师的活动时，对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

埃政权的确立有关的事件均做出极端消极的评价。

信函作者关于西科尔斯基移民海外是经过弗·伊·列宁同意的说法无法得到证实。根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学院提供的材料，在党的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列宁的文件中，未发现西科尔斯基的名字。另外，信函作者认为我国没有承认当时飞机设计师西科尔斯基在发展飞机研制工作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在 В.Б. 沙夫洛夫所著的《苏联飞机设计史》（机械工业部出版社 1969 年版）、《苏联大百科全书》（1976 年版）、空军博物馆莫尼诺城的陈列品中，对此都有充分的、客观的介绍。关于给西科尔斯基“恢复名誉”的问题早些时候就曾在苏联科学院讨论过，但未获支持。苏联国防部和克格勃亦保留上述观点。

考虑到这一点，苏共中央有关部认为不宜采纳作者的建议，并认为在讨论该问题时将以此为限。

我们已同扎哈尔琴科、卡拉伊、格罗莫夫和戈夫曼等同志谈过。在谈话中已向他们做了解释，责成乌克兰党中央（A.C. 卡普托[①]）同志向安东诺夫同志做出答复。

苏共中央科教部副部长　C. 谢尔巴科夫

苏共中央宣传部长　E. 杰热列尼科夫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副部长　B. 德鲁格夫

1982 年 4 月 29 日[②]

① 卡普托，1955 年参加苏共，1972 年任基辅州委书记。时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

② 在这份报告上有苏共中央书记齐米亚宁的批示：“请将扎哈尔琴科、安东诺夫、卡拉伊、格罗莫夫、戈夫曼等同志向苏共中央提出的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关于航空设计师西科尔斯基问题的报告交中央总务部勃格留鲍夫同志。契尔年科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我支持中央有关部的结论。米·齐米亚宁，1982 年 4 月 30 日”

№06244

苏共中央文化部关于莫斯科小型文艺节目剧院演出状况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2年6月7日）

№2531－A

绝密

致苏共中央

关于演员Г. 哈赞诺夫在《显而易见的和难以置信的》中的表演

1981年11月13日，莫斯科小型文艺节目剧院首演《显而易见的和难以置信的》（作者：Г. 哈伊特，表演者：莫斯科文艺节目演员Г. 哈赞诺夫）。演出的内容引起专家们、社会舆论以及苏共莫斯科市委文化部的严厉批评。莫斯科市委文化部责成莫斯科市执委会文化管理总局确保对演出的修改加工。

1982年2月，《显而易见的和难以置信的》再次上演。据苏共莫斯科市委文化部主任И.А. 格林斯基报告，修改加工过的节目适于演出。

今年3月，《真理报》、《苏联文化报》、《文学报》等报纸发表了对演出的评论。评论作者总体上肯定了作者和表演者提出的主题

的讽刺倾向和现实意义，指出了哈赞诺夫职业技巧的提高。

报刊上发表的批评以及审查过演出的苏共中央文化部工作人员的意见，使人有理由得出结论，认为哈赞诺夫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对他寄以的希望。

有鉴于此，建议苏共莫斯科市委文化部继续完善《显而易见的和难以置信的》的演出，更细心地监督首都文艺场所演出小型节目的准备工作。

作为信息汇报如上。

苏共中央文化部部长　瓦·绍罗

1982 年 6 月 7 日

№06183

叶戈罗夫就出版昂纳克回忆录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2年6月14日）

机密

苏共中央

根据苏共中央委托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参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埃·昂纳克的著作《生平记事》（德文版）译文的学术编辑的指示，我们认为采取以下措施是适宜的：

（1）略去面向资本主义国家读者的最后一章（答记者问）。

（2）鉴于该书主要面向西方读者，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记述与苏联学术著作和回忆录作品通常的写法不尽相同，我们认为有必要作一些删节。

首先应该删节的是那些通常从正面谈到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列·加米涅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等活动家或其著作的地方（见第49、51、55页）。

在正面评价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党的领导人相互交换意见时去掉爱·盖莱克的名字（见第489～490页），略去提到安德烈·纪德[①]的话（第88页）看来是必要的。

在对发生于我国和我党的一些事件的记述中有某些错误需要纠

① 安德烈·纪德，法国唯美国主义作家，主要作品有《梵蒂冈的地窖》、《伪币犯》等。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正。例如，在说明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第 52 页）的实质时应当作出更准确的评价。也就是说本着这样的精神："……代表大会规定要在现代化新技术的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这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巩固国家经济上的独立，提高其防御能力，保障农业的全盘集体化及为更快地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创造条件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列宁主义谈的很少（见第 13 和 256 页）。最好对这些见解加以扩展或深化，至少应借助翻译予以加强。

删去第 153 页如下一段话看来是适当的：1945 年 4 月在柏林地区"红军战士把 14～70 岁的所有男子都抓了起来作俘虏，不管他们穿着军装还是平民服装"，直到这段末尾。

在第 274 页，在描述 1961 年 8 月 11～13 日保障西柏林周围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界的行动时用了这样一个句子："我们的武装力量得到部署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武装力量的支持……"这句话有可能被读者按字面意义去理解。应当把它改为更准确的表述："部署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苏军部队进入完全战备状态。"以下按原文。

在第 277～278 页，在评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 1961 年 8 月采取的措施时作出一个结论，该结论特别着力地强调上述措施在争取缓和紧张局势中的作用，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未予重视。作者写道："我认为这一途径导致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签署"。建议说得更准确一些。

我们还认为应该消除一些历史事件（如慕尼黑协定）日期及某些组织、文件、人物名称（见第 60、84、103 页及其他页）中的小错误（根据手稿原文看出来的）。

鉴于埃·昂纳克这本书已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出版，可以把需要更准确说明的那些段落连同其他一些删去后不会给该书造成任何

损害的段落一并略去，但须预先声明该书经作者进行若干删节后刊印。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责成苏共中央政治书籍出版社与作者就这些删节达成协议。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　阿·叶戈罗夫[①]

① 阿·格·叶戈罗夫，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74年起任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

【专题说明】

泛俄罗斯主义问题

（1968 年 4 月至 1982 年 8 月）

60～70 年代，泛俄罗斯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在苏联，并且形成了一些带有政治性的组织，如“全俄罗斯社会基督教人民解放联盟”。实际上，这种思潮的重新出现不过是在部分知识分子当中存在的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反映，而人们的不满竟然发展到形成地下组织的程度，的确说明当时苏联社会内部的矛盾已经激化到相当程度。本专题选编的 4 份文件涉及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这类组织及人员活动的侦查和向苏共中央的报告，以及苏联司法部门对这类人员和组织的审理情况。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赵英杰、李明翻译）

№04564

安德罗波夫关于审理全俄罗斯社会基督教人民解放联盟成员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8年4月16日）

机密

苏共中央[①]

1967年12月，自称为“全俄罗斯社会基督教人民解放联盟”的反苏组织的首领：И.В. 奥古尔佐夫、Е.А. 瓦金、М.Ю. 萨多以及Б.А. 阿维里奇金被列宁格勒市法院判处期限不等的监禁。

今年3月14日至4月5日期间，在列宁格勒市对这个组织的其他17名参加者进行了法庭审理工作。

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有下列人员：В.М. 普拉托诺夫，1941年生人，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非洲学教研室助教；Н.В. 伊万诺夫，1937年生人，无党派人士，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艺术史教研室助教；С.С. 乌斯季诺维奇，1938年生人，无党派人士，列宁格勒市中央规划设计局工程师；Г.Н. 鲍切瓦罗夫，1935年生，无党派人士，苏联建筑、筑路和公用工程机器制造部中央设计局主任工程师；М.Б. 科诺索夫，1937

① 该文件附有决议报告：“请中央书记们审阅”。下列人员签署了该文件：安·帕·基里连科、米·安·苏斯洛夫、鲍·尼·波诺马廖夫、康·维·鲁萨科夫、亚·尼·谢列平、米、瓦·齐米亚宁。

年生人，无党派人士，列宁格勒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瓦斯管理局事故管理处值班钳工；Ю.С. 布津，1936 年生人，无党派人士，中央燃料设备科学研究所主任工程师；А.А. 米克拉舍维奇，1935 年生人，无党派人士，中央燃料设备科学研究所主任工程师；В.И. 纳戈尔内，1943 年生人，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列宁格勒精密机械学研究所工程师；О.П. 扎巴克，1941 年生人，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列宁格勒精密机械学和光学研究所技术员；Ю.Б. 巴拉诺夫，1938 年生，无党派人士，列宁格勒第一医学研究所电气工程师；О.Н. 舒瓦洛夫，1938 年生，无党派人士，列宁格勒精密机械学和光学研究所机械师；А.И. 苏达列夫，1939 年生，无党派人士，“苏联国际旅行社”列宁格勒分社监督员；А.Г. 伊夫列夫，1937 年生，无党派人士，全苏石油化学反应科学研究所主任工程师；列宁格勒高等院校的应届毕业生Л.И. 鲍罗金，1938 年生，无党派人士；В.Ф. 伊沃洛夫，1938 年生，无党派人士；В.Ф. 维列捷诺夫，1936 年生，无党派人士；以及С.В. 康斯坦丁诺夫，1943 年生，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上人员被捕之前均在我们国家的各个城市里工作。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以上人员的犯罪活动被大量的物证、对质，以及众多证人的证词和被告本人的供词所充分证实。所有的被告都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对自己的罪行表示懊悔，并在最后的发言中使法庭相信，将用诚实的劳动来赎回自己的罪过，请求法庭给予宽大处理。被告普拉托诺夫在最后的发言中说：“…在法庭进行调查审理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侦查人员愿意以人道主义来理解我。经过一年的狱中思索，以及能够充分向我们展示一切的这个过程，使有可能从另一方面来看待‘全俄罗斯社会基督教人民解放联盟’，使我明白了，它是一个虚伪的组织，注定要灭亡的，因为它没有任何根基。这个组织的全部活动不可能不是犯罪的…”。被告

科诺索夫说："在毫无理智的情况下，我被它的拯救祖国的谎言所迷惑，尽管祖国不需要任何拯救。我这是亵渎神明的行为。我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表示深深地、真诚地忏悔……"

每次庭审大会，出席的人数大约都有100人：有市级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代表、证人和犯人的亲属。大会的所有出席者，其中包括犯人家属的大部分人都对这个组织参加者的活动表示反对。例如，被告扎巴克的妻子说："没有脑子的人，才会认为，人民会支持这种妄想"。伊夫列夫的妻子分析和评论了丈夫的行为，她说："……我无法理解，要知道他是很聪明的人，一所高校已经毕业了，第二所也快毕业了，却参与了这种肮脏的勾当"。苏达列夫、科诺索夫、米克拉舍维奇、纳戈尔内的亲属以及其他一些人也谴责了"全俄罗斯社会基督教人民解放联盟"的成员们的犯罪活动。

但是，个别一些人，其中包括普拉托诺夫的父亲，鲍切瓦罗夫的母亲，对法庭的审理持有否定的态度。普拉托诺夫的父亲，职业是一名钳工，在同别人谈话时，他是这样描述案件的，仿佛是，年轻人被罗曼蒂克所迷惑，打算玩一种有组织的游戏，脱离有意义的工作来谴责他们是不必要的。鲍切瓦罗夫的母亲试图为儿子的反苏行为辩解，并说，仿佛是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不需要多久，共产党自己就会铲除自己。

犯人的某些亲属试图为罪犯辩护，并提出了一系列促使被告们走上从事反动活动道路的原因，如：揭露个人崇拜，以及其父母过去遭受过镇压的某些人的恐惧心理，对官方组织持怀疑态度，等等。

法庭判决如下：В.М. 普拉托诺夫，有期徒刑7年；Н.В. 伊万诺夫、В.Ф. 伊沃洛夫、Л.И. 鲍罗金每个人有期徒刑6年；М.Б. 科诺索夫，有期徒刑4年；С.С. 乌斯季诺维奇，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Ю.С. 布津、Ю.П. 巴拉诺夫、В.И. 纳戈尔内、

A.A. 米克拉舍维奇每个人有期徒刑 3 年；Г.Н. 鲍切瓦罗夫、В.Ф. 维列捷诺夫每个人有期徒刑 2 年零 6 个月；А.Г. 伊夫列夫、А.И. 苏达列夫每个人有期徒刑 2 年；О.П. 扎巴克、О.Н. 舒瓦洛夫每个人有期徒刑 1 年，以及 С.В. 康斯坦丁诺夫有期徒刑 10 个月；扎巴克、舒瓦洛夫以及康斯坦丁诺夫的刑期已被预审期限抵消，当庭释放。

出席大会的人员对判决一致赞同。

庭审过程中的关于“全俄罗斯社会基督教人民解放联盟”成员的反动活动的全部资料均未在大范围传播。有关这些案件在国外流行的某些传闻，都是外国资产阶级记者所杜撰的，这些记者采用了我们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西方新闻界提供的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并没有什么轰动效应的情报。

在法庭审理期间，无论是在庭审大会上，还是在列宁格勒市内，都没有出现任何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列宁格勒州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局和列宁格勒市的社会组织共同进行了必要的工作，以杜绝不愉快的现象出现的可能性。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① 此处附有下列批注：“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审阅。1968 年 4 月 17 日。Г.Э. 楚卡诺夫”楚卡诺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助手。

№04565

安德罗波夫就伊万诺夫和谢马诺夫的反苏活动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1年3月28日）

绝密

苏共中央

简报。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代表，打着“关心保护俄罗斯民族传统”的幌子，积极从事反苏活动。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这方面已经通过了决议：对A.M.伊万诺夫追究刑事责任，并杜绝与其有关的人员的反动活动。

最近一段时间，在莫斯科和我们国家的其他一些城市，在从事科研和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分子的某些人的情绪中出现了新的倾向，他们自称为“俄罗斯语文学家”。在打着保护俄罗斯民族传统的口号下，实际上是在进行积极的反对苏联的活动。外国意识形态中心、侨居国外的反苏组织，以及资产阶级的大量宣传工具的积极挑唆和鼓励使这种倾向得到了发展。敌人的间谍机关已经看出了在这种倾向中存在着在苏联社会从事破坏活动的可能性。

驻苏联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代表处对这个阶层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其中，美国、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加拿大的大使馆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积极性。这些国家使馆的工作人员竭力与这些所谓的“俄罗斯语文学家”们进行接触，以获取感兴趣的情报，并弄清楚，什么人可以为他们所利用来从事反动活动。

根据文件的情报资料来看，敌人认为可以把这些人员作为一种力量，在新的基础上在苏联从事反社会的活动。同时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这些活动还存在于较之遭到粉碎和名誉受到了损害的公众眼里所谓的“法律维护者”更为重要的阶层里。

对“俄罗斯语文学家”的状况进行研究表明，支持他们的范围正在扩大，尽管成分各种各样，但是，他们已经形成了组织。

危险首先还在于，苏联制度公开的敌人，利用关于必须为保卫俄罗斯文化、古代文献，为“拯救俄罗斯民族”而斗争，等等一些具有蛊惑性的俄语词句作掩护来从事破坏活动。

在1968年就判处了持有“俄罗斯主义”立场的奥古尔佐夫、瓦金以及其他一些非法的反苏组织的参加者，他们曾准备武装推翻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建立所谓的“社会基督体制”。

1975年奥西波夫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他非法出版的杂志里广泛地宣传了“俄罗斯主义”思想，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号召改变我们国家现存的国家制度。

目前，被国家安全机关发现的莫斯科市居民A.M.伊万诺夫，是全苏印刷品设备科学研究所的老科学工作者。他曾多次发表带有恐怖性质的言论，积极进行反苏宣传鼓动，试图建立散布传单的反动组织，为此，他曾两次被追究刑事责任。他两次承认自己没有自制能力，经法庭确认后，对其进行了强制性治疗。上述提到的奥西波夫是其志同道合者，伊万诺夫积极配合他进行反苏非法杂志的出版活动。在奥西波夫被判刑以后，他本人又积极地进行反苏宣传资料的出版和传播活动。他还是《噩梦的逻辑》和《模糊的骑士》等诽谤性著作的作者，这些书把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的历史描写成是希望维持自己统治的人们所设计和完成的一系列阴谋、政变、强权的历史，这是对党和国家著名活动家的造谣中伤……

伊万诺夫被公认为“为俄罗斯事业而斗争的战士”，这一点可

以保证他自由地走进创造性的知识分子家庭，其中包括艺术家格拉祖诺夫。

各种各样的追求名利地位的人和失意的人，都把自己列入“俄罗斯语文学家”之列，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经常是滚到反苏活动的道路上。利用妄想的论断，诸如：“保护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作掩护，他们宣称，“苏维埃政权已经蜕化变质，党已经脱离群众，对犹太复国主义倾向缺乏斗争，最后结论是，现有的国家机构已经不能控制社会生活中的社会政治过程。”一些持有类似观点的人甚至怀疑起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个事实来。

关于苏共党员、《人与法》杂志编辑部的工作人员雷日科夫的案子早些时候曾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作过汇报。他已被确认是一系列文件的作者，在这些文件中以保护俄罗斯传统为借口，实质上是提出了清洗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机构，仿佛机关里混进了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以及他们的同情者。

目前，《人与法》杂志的主编，是苏共党员 C.H. 谢马诺夫，他在自己的圈子里散布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造谣中伤的言论，恶毒地攻击和污蔑国家领导人。根据侦查资料表明，他们宣扬必须同国家政权进行斗争，并声称，“和平征服人们心灵的时代已结束。革命的时代已来临……应该转而采用斗争的革命方法……如果我们不自己起来进行反抗，那么我们就会灭亡。”谢马诺夫的周围集结了一批人，这些人或者是赞同他的观点，或者是由于各种原因对此没有受到应有打击的人。

根据上述阐述，必须杜绝所列出的反动现象，以预防由于反苏分子以“俄罗斯主义”思想作掩护，来进行活动而致使不愉快事件的发生。

考虑到这些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因此对 A.M. 伊万诺夫追究刑事责任。至于谢马诺夫，那么必须审核解除他目前担任的《人

与法》杂志主编职务的问题。关于对其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要根据对伊万诺夫案件的调查进展情况来作出。与此同时，对待其志同道合者、没有放下武器的人，以及被迷惑的人应采取预防性措施。

根据所得信息汇报如上。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尤·安德罗波夫

№04566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
关于免除谢马诺夫现任职务的报告

（1981年4月22日）

机密

苏共中央

经苏共中央宣传部和行政机关部同意，C.H. 谢马诺夫在工作中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根据苏联司法部部长1981年4月17日第120/к号命令，免除C.H. 谢马诺夫现担任的《人与法》杂志主编的职务。①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副部长　B. 格拉德舍夫

① 此处有如下批示："C. 谢马诺夫已被免除现任职务。此事已向E.Д. 卡尔佩先科同志做了通报。1981年4月13日。C. 阿维季相。"卡尔佩斯先科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书记处书记。阿维季相为苏共中央总务部副部长。

№04567

费多尔丘克关于谢马诺夫的反苏活动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2 年 8 月 4 日）

机密

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反苏鼓动和宣传）第 1 部第 70 页的条文，1981 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 A.M. 伊万诺夫的刑事案件进行了起诉。

在预审调查和庭审大会上，伊万诺夫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他曾系统地整理和散发了具有挑拨和中伤性质的、诋毁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文集，并供认，他所进行的这些反动活动都是由于苏共党员 C.H. 谢马诺夫授意的结果……

在调查伊万诺夫刑事案件的过程中，谢马诺夫作为证人也受到了询问，但是，他表现得很不诚恳，回答问题时支吾其词，试图回避提供真实的证词，但是，在确凿的罪证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他是用钱在伊万诺夫那里买到以上所说的反苏文件集。其他的一些有损名誉的事实……谢马诺夫都否认了。他没有出庭，但向法庭出示了病历证明。

根据以上所述，莫斯科市法院刑事案件法庭于 1982 年 6 月 24 日，对谢马诺夫的不体面行为作出了裁决，并将该裁决转呈俄罗斯联邦作家莫斯科分会以使其采取措施。

早在 1981 年 7 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于谢马诺夫的反社

会行为就提出过警告，命令他停止对一些具有创造能力的知识分子进行挑拨行动，并向他们灌输一种思想，仿佛为了与贪赃受贿和盗窃行为作斗争必须建立起各种各样“自主性的社会委员会”。

根据所得信息汇报如上。

委员会主席　B. 费多尔丘克

【专题说明】

苏联与巴黎“五月骚动”事件

（1968 年 5 月）

1958 年 10 月 5 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戴高乐就任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加强国家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强化总统权力，推动经济的发展。由于新兴工业部门的崛起，工业结构重组，也使原有的中间阶层出现激烈变动，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终于引发了 1968 年的“五月骚动”。“五月骚动”是从巴黎大学（索邦）的一所分校开始。5 月 3 日，该校大学生因不满拥挤的环境和严厉的考试制度而上街游行，要求改革。学生占领了学校，同前来平息事件的 1500 名军警发生激战。结果有数百人受伤，596 人被拘留，27 人被扣押。官方的镇压措施导致抗议运动加剧和扩大。5 月 10 日，中学生也出动了，拉丁区参加游行示威的人已达 25000 人。5 月 13 日，工人响应工会联合会号召举行了 24 小时总罢工。社会各界力量都支持大学生的行动或同情他们。同大学生们团结在一起的除工人外，还有法国的知识界，知识界出现的思想和情绪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五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向戴高乐发出呼吁，要求赦免被判决有罪的大学生，并要求开放大学。法国著名哲学家纳塔利·萨罗特、让－保罗·萨特尔等也联合发表声明。许多人都同情并担心积极参加这次风波的自己孩子们的生命安全。5 月 23 日在国民议会举行了所谓对

“谴责决议”的表决。该决议得到通过的票数由244票改为233票，于是制定了赦免大学生的法律。

在学生思潮开始后的最初一些日子里。法国共产党认为学生没有真正的目的，而《人道报》则发表了题为“假革命”的文章。由于共产党人在学生界的影响不大，这就决定了对事态发展第一阶段的这种评价，竭力低估其意义。法国共产党认为支持运动是不适当的，它不仅不去控制运动，而且实际上对其不施加任何影响。密特朗5月28日发表声明，号召团结一致，准备通过总统选举建立以激进党领导人之一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为首的左派政府。显然，这类计划并没有同法国共产党协商。但5月30日戴高乐发表讲话，断言法国笼罩着“霸主暴政”和共产党人“专政”的危险。戴高乐宣布解散议会和举行新的大选，政府企图干预大选。法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反对主张以暴力推翻现制度的学生领袖。法共考虑的是，法共是能够同当局进行对抗的一支最有组织的力量，它介入风波会引起与政府关系的根本恶化。尽管如此，由于当时流传着所谓“对社会进程的外来影响”起了主要作用这种说法，极右势力的某些代表仍然抱怨政府对暴动者的方针政策不够严厉，认为外部势力之一就是苏联的干预，他们甚至还公布了一些文件，证明苏联代表和法国共产党之间进行过积极协商并对各种行动进行了协调。

这里选编的3份文件是在“五月骚动”期间苏联驻法大使佐林与法共中央领导人举行会谈的记录，这些文件表明，法国右翼势力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的，苏联政府无意破坏与戴高乐政府已经形成的缓和、协商及合作的关系。因此，尽管法国总统戴高乐发表了煽动性的反共演说，但苏联的反应却是经过慎重考虑的，1968年5月的事件没有对两国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并不是偶然的。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吕允连翻译）

№08933

佐林与普利桑尼埃就法国政局的会谈纪要

（1968 年 5 月 20 日）

秘密

根据已经接到的指示，今天我在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会见了普利桑尼埃[①] 同志。我在向法共领导转交了有关苏联援助越南的情况之后，询问了法国朋友对法国国内政治局势以及对当前国内政治形势演变前景的评估情况。现将普利桑尼埃同志的谈话归纳如下。

当前发生的大学生出动闹事已经成了法国劳动群众大规模出动闹事的推动力。这是学生界对法国现行教育体制深怀不满的结果。在这次大学生出动闹事过程中提出的要求有些是具体、迫切的要求，有些则是超出教育范围的更加广泛全面的要求。但这次大学生出动闹事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前途。根据一个事实看，法国的大学生大都是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工人阶层出身的仅占总数的 10%，更何况学生界的大多数人受到形形色色的极左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影响，这些人在南特表现得特别积极。他们挑衅性地占领了索邦警察局，然后挑动大学生们同警察的公开冲突。他们利用警察方面的镇压，企图将更多的大学生吸引到自己周围。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共产党的战术是，一方面，支持面对警察

① 加斯东·普利桑尼埃，生于 1913 年，1950～1954 年为法共中央候补委员，1954 年起为法共中央委员，1964～1966 年为法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 年起为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 年起为法共中央书记。

镇压的学生群众；另一方面，限制领导学生并企图挑起同警察的新一轮冲突的极左集团的影响，并将其孤立起来。法国共产党的这种战术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法国共产党和各工会组织拒绝支持关于组织占领法国政府广播电视大楼的号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同警察更加严重的冲突。此后，由于法共和各工会组织的拒绝，上述行动没有进行，左倾分子企图同按劳工总联合会① 即共产党指示采取行动的雷诺汽车制造厂工人联合起来的打算也落空了。左倾集团彻底暴露了其立场的软弱性。

普利桑尼埃同志说明在学生中活动的左倾集团的特点时指出，那些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各类被开除出党的分子和少数反华分子表现得特别积极。普利桑尼埃不排除这伙托洛茨基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同法国的资产阶级集团、美国人甚至戴高乐分子有联系的可能性。正如普利桑尼埃指出的那样，打算在南特市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左倾分子图谋的破产，法国共产党昨天在南特的大学生中组织的辩论和在辩论过程中法共“成功地同左倾分子就某些问题进行的清算”表明，这帮左倾分子在学生界的影响正在消退。

普利桑尼埃同志在分析5月13日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的特点时说，共产党组织的这次游行示威是个巨大的胜利，因为这次游行示威不仅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而且在于：第一，为巴黎劳动群众提供了表示其对当前局势不满的机会；第二，左倾分子想领导这次游行示威的阴谋使他们离开法国劳动群众更远了。

当前已经展开的大规模的罢工运动正在发展，估计罢工者的人数约有400万～500万人，基本上是在劳工总联合会即共产党的领

① 劳工总联合会是法国最大的工会联合会，60年代末有会员200万人，法共在该联合会中处于领导地位。就人数来说，第二个工会组织是法国工人民主联合会，60年代末时有会员60万人。

导下进行的，尽管按照预先定下的战术设想，法共应当站在一旁避免直接参加这场运动。

普利桑尼埃同志叙述说，劳工总联合会成功地动员了像“雪铁龙”汽车厂这样一些工厂的工人参加罢工，“雪铁龙”汽车厂将近20年没有罢过工。同时，普利桑尼埃同志强调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当前法国的罢工运动再一次显示出了法国共产党和劳工总联合会的影响和力量，再一次证明了在各级工会组织中有影响对一个政党的极端重要性。

当前正在发展的罢工运动没有什么统一的政治口号，每个企业可自己决定在什么条件下罢工。劳动群众的要求基本上是经济性的，涉及的范围是提高工资待遇、减少工作日、改善社会保障、取消去年所发布的各种政府勒令，因为根据上述勒令，政府要从法国劳动群众所得社会救济中提取30亿法郎的救济金，还要停止提高养老金。与此同时，毫无疑问的是，上述要求本身自然含有政治性，也具有反政府的性质，所以法国共产党也逐渐赋予这次罢工运动以政治意义。

法国共产党同时注意到这次罢工运动中要防止各种左倾行为，诸如号召什么“武装总罢工”，这样会为政府进行武装镇压提供借口。在这方面，普利桑尼埃同志叙述说，虽然法国电力公司职工也在罢工，但他们按照劳工总联合会的建议始终保障供电，因为停止供电会为政府进行干预提供借口。

看来，由于广泛开展的罢工运动，政府的立场被软化了，戴高乐的个人威信大大降低了。

至于法国国内形势变化的前景，普利桑尼埃同志说：第一，政府企图采取镇压手段，但法国共产党认为，这条路在当前对政府来说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为罢工运动规模很大；第二，政府可能眼下不会采取什么措施反对罢工运动，它希望这次罢工运动能够“自

已筋疲力尽，失掉香味”，但这种办法奏效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样做的话，执政集团得满足罢工者的要求，增加开支，其物质上的损失就大了。此外，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的政治阵地就会遭到更大的削弱。

根据某些政治活动家（普利桑尼埃同志指的是雅克·沙邦－戴马斯[①]）以及接近政府的报刊（普利桑尼埃同志指的是《今日巴黎报》）的声明，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政府选择向罢工者作出某些让步的方法，千方百计保持现行政权不会出现大的变化。普利桑尼埃同志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这条道路对政府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任何让步只会导致要求的增加。

当前造成的一种印象是：戴高乐分子为通过中派集团的“民主中心”[②] 扩大其现今执政的多数派而进行着幕后辩论。“民主中心”总书记阿伯兰，法国前任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曾担任戴高乐的部长、后又转向反对派的苏德罗等人的声明，间接地证明了上述印象。

从普利桑尼埃同志的谈话中看得很清楚，法国共产党尽力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经出现的形势，以将国内左派力量的团结工作推向前进，促使左翼民主力量联盟[③] 制定左派力量联合执政纲领。正如普利桑尼埃同志所通报的那样，法国共产党于5月17日与左翼力

① 雅克·沙邦－戴马斯，1947年起为法国波尔多市市长，戴高乐党的领袖之一，1959～1972年担任法国总理。

② “民主中心”主要是由40～50年代末有影响的天主教改革派的“人民共和党”（人民共和运动）残余分子在1966年2月组成的中派集团。60年代后半期，“民主中心”在执政联盟和逐渐团结起来的左翼反对派之间保持不稳定的中间立场。

③ 社会民主左翼联盟成立于1965年9月，参加该联盟的有以密特朗为首的共和制议会派（1964年由当时的一些左翼激进派知识界的政治组织合并而成），以吉莫莱为首的社会党和急进党。

量联盟的代表举行了会见，就法共和左联之间的正式接触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当前还没有正式接触，不排除该联盟同“民主中心”进行某种接触的可能性。普利桑尼埃同志谈到法共与左翼力量联盟之间的关系时，并不掩饰他们之间存在的极为严重的意见分歧。分歧的实质是：法共代表着革命发展趋势，彻底保护法国劳苦大众的利益；与此同时，左翼力量联盟却代表的是改良主义倾向，并不愿意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普利桑尼埃同志还强调指出，法共并不是竭力要使自己进入政府，而是首先尽力就未来的左翼力量政府应该遵循的纲领达成协议。普利桑尼埃同志表示希望，加入左翼力量联盟的各个政党的基层组织对同共产党人保持一致的努力应该能够迫使左联领导最终制定联合政府纲领。问题是，包括左翼力量联盟、“民主中心”、独立共和党人[①] 集团和某些戴高乐分子在内的这种政治联合在目前情况下未必能够实现。

普利桑尼埃同志通报说，有消息传说蓬皮杜可能辞职。

普利桑尼埃同志认为，法国国会明天开始讨论谴责政府的议案，讨论未必会导致通过这项议案，因为要通过这项议案，必须使中右派集团“现代民主与进步”[②] 的所有代表都赞成这项议案，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当然，戴高乐分子会千方百计反对通过这项议案，因为在当前情况下，提前进行议会选举会使戴高乐分子丢掉大量的代表席位。一旦上述提案被通过，戴高乐就会解散议会，那时法共就要积极投入竞选运动，以尽量多争取代表席位。但普利桑尼埃同志强调说，法共的主要目的是同左翼力量联盟一起制定联合政府纲领，扩大和巩固左翼力量统一战线。普利桑尼埃同志据此通报

① “独立共和党人”是40年代成立的右派政治集团。后来的法国总统瓦列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便是该集团的领袖。

② “现代民主与进步”是反对左翼联盟思想的中派集团。

说，法共同戴高乐进行过“局部的”接触。普利桑尼埃同志强调说，当前广泛开展的罢工运动应该促进联合政府纲领的制订，完成这项纲领的制订工作就会使法国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会谈过程中，普利桑尼埃同志表示不能排除定于5月23日举行的法共中央全会将延迟到晚些时候召开的可能性，因为当前形势要求对有党的主要干部参加的地方群众运动进行领导。

会谈结束时顺便谈到了有关当前在巴黎举行的美国与越南谈判的问题。普利桑尼埃同志通报说，法国共产党支持同前来巴黎进行谈判的越南代表团的密切接触。越南代表团目前由法国朋友安排住在巴黎郊区。越南代表团在同法共的友好和非正式接触中请求法共在法国积极开展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对谈判所持立场的运动。正如越南人向许多朋友所通报的那样，说他们目前仍坚持自己的立场，往后，法国朋友打算开展支持上述立场的运动。

苏联驻法国大使　佐林①

① 文件上有如下批示：“情报材料。苏共中央国际部阅。1968年11月7日。国际部处长潘科夫、巴尔马什诺夫。

1968年6月21日收文，7401/情，送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卡图谢夫、波诺马廖夫、鲁萨科夫、葛罗米柯、库兹涅佐夫。”

№08671

佐林与罗歇及杜克洛就法国国内形势问题的谈话纪要

（1968 年 5 月 21 日）

摘自瓦·亚·佐林的日记

秘密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春水同志举行的招待会上，我和瓦·罗歇[①] 同志以及雅·杜克洛[②] 同志就法国国内形势问题进行了简短的谈话。

在估计国民议会表决对乔·蓬皮杜政府不信任案的可能结果时，瓦·罗歇同志对能够获得推翻现政府所需的多数票表示怀疑。不过，在国民议会进行表决之后，政府成员显然会有变动。

在业已形成的局面下戴高乐打算采取什么措施，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他面临着当前这种规模的事变，面临着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有组织的群众性的举义。戴高乐没有完全客观地估计国内局势，没有彻底认识到工人阶级的要求的严重性和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决心。现在参加罢工的有 800 万工人。工人占领了工厂，建立了自己的纠察队，坚守自己的阵地，表现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没有任何过火行为。

戴高乐深信个人专权体制牢不可破，因此去罗马尼亚进行访

① 瓦·罗歇，时任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② 雅·杜克洛，时任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问，认为自己不在国内时法国不会发生任何严重问题，学潮会停息，而工人阶级开始的游行示威不会给国内政治局势带来任何变化。

但是，国内形成的局势，劳动人民群众的压力，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压力，会迫使戴高乐作出重大让步，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进行改革。他有可能不得不对政府成员作变动，或者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新的大选。戴高乐也有可能在国内搞全民表决。

罗歇同志承认，在事变开始时法国共产党在开展学生运动方面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学生运动不在党的控制之下。他解释说，其原因在于学生是由小资产阶级组成的。现在情况有所好转。法国共产党能够左右日益扩大的工人罢工运动，它在工人阶级的基层工会组织中进行广泛的组织工作，以便对政府和戴高乐不断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戴高乐和现乔·蓬皮杜政府正为他们十年个人专权体制下奉行的政策自食其果。

至于说法共同盟者即左翼联盟和社会党人的政策，用瓦·罗歇同志的话说，在目前的条件下，他们采取了“动摇不定、模棱两可的立场”。

在回答有关法国已经形成的内政形势的问题时，雅·杜克洛同志对正在发生的事变作如下评价。

在法国开始的罢工运动，规模日益扩大。学潮本身不可能对个人专权体制造成严重威胁，因为学潮的参加者大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层。出身于工农家庭的大学生比例不大。

工人阶级起义，工人罢工和占领工厂，工人提出政治和经济要求，所有这一切给国内的形势带来了质的新变化。工人阶级的组织性，队伍团结，信念坚定和力争满足劳工大众要求的决心，是工人阶级罢工运动的显著特点。雅·杜克洛同志强调说，同其他国家一样，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法国政治生活中主要的而且起决定作

用的力量是工人阶级。

法国共产党目前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力争使各种左派力量统一行动。鉴于这一目的，拟举行法国共产党和左翼联盟代表会晤，制订当前条件下的共同行动纲领。

当谈到国民议会关于对乔·蓬皮杜政府提出不信任案问题进行辩论的情况时（5月21日开始辩论，应于5月22日晚间进行表决），雅·杜克洛同志对通过表决会推翻乔·蓬皮杜政府表示怀疑。他说，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很可能得不到必需的多数票。

但是，表决之后戴高乐有可能对乔·蓬皮杜政府进行改组，撤换个别部长。

雅·杜克洛同志认为，戴高乐对国内事件的发展没有思想准备。他不了解法国真实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对法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能力估计不足。戴高乐深信他的个人专权体制已经牢不可破，他能保障法国繁荣、稳定。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雅·杜克洛同志指出，5月13日曾经准备了一个广播电视节目，在戴高乐访问罗马尼亚时播放，但是节目被取消了。据雅·杜克洛同志讲，播放这个节目的目的是想说明个人专权体制牢不可破，拿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作比较，说明在第四共和国期间经常更换政府、发生罢工，等等，而在第五共和国的十年期间中根本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至于5月开始的学潮和工人游行示威，说什么它们无关紧要，不可能影响戴高乐的内外政策。从这一考虑出发，戴高乐开始出访罗马尼亚。但是法国时局的发展迫使总统缩短了访问时间，提前返回巴黎。

雅·杜克洛同志说，一旦提出对乔·蓬皮杜政府的不信任案，戴高乐目前会采取哪些步骤维护个人专权体制，现在还难以预测：总统可能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新的大选；也可能搞全民表决，以此争取对政府的拥护。

雅·杜克洛同志说，但是，法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算进行坚决斗争，争取满足劳动人民的要求，达到自己的目的。杜克洛同志最后说："戴高乐将为他十年当政付出不少的代价"。

苏联驻法国大使　瓦·佐林

№08672

佐林与居约关于法国国内局势的谈话纪要

（1968 年 5 月 30 日）

摘自瓦·亚·佐林的日记

机密

我遵照指示已向居约[①] 同志转达：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密切注视法国时局的发展。以数百万苏联共产党员的名义，对法国工人阶级在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下进行的斗争表示声援。考虑到法国发生的事变具有国际意义，若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向我们通报自己对形成的局势和事变进一步发展前景所作的分析和评价，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不胜感激。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想知道法国同志的意见和愿望，他们认为苏联报刊在报道法国时局时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方针，希望苏联社会团体在这一方面采取什么样的步骤。

居约同志允诺将我的话转告中央政治局。

雷·居约同志接着指出，戴高乐今天发表声明后国内形势急剧变化。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已经对戴高乐的这一声明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他们在声明中指出，戴高乐实际上已经向人民宣战，他开始激烈攻击法国共产党，因为正是法国共产党是法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党，并且捍卫他们的利益。法国共产党将继续捍卫法国劳动人民的

① 雷·居约，时为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前曾任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利益，而戴高乐本人却只字不提法国广大群众的要求。法国共产党早就要求进行新的普遍选举，并且为进行普遍选举作好了准备。它呼吁所有的左派力量联合。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声明将于明天发表，总的说来声明具有语气平和但立场坚定的特色。至于说法国总工会的反应，它打算支持法国劳动人民的要求，主张继续罢工运动，力争满足劳动人民的基本要求。

居约同志说，从今天的总统声明看，戴高乐选择了无论如何要保住权力的方案，一旦需要就动用武力，即法国共产党也估计到戴高乐派可能要采取的那种方案。看来，戴高乐深信主要的部队和总参谋部依然忠于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戴高乐打算大搞反共运动，指责共产党是戴高乐主义的头号敌人。他甚至认为无需提及实际上昨天还在觊觎总统和总理职位的那些政界人士的名字，以此来强调他对他们不屑一顾。他认为必须重点打击法国共产党，尽管众所周知，在最近的事变过程中法国共产党持非常克制的立场，而且是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居约同志强调说，现在特别清楚地看出，法国共产党的策略是多么正确，它没有被各种左倾口号所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若当局对法国共产党采取镇压措施，对法国广大社会舆论来说起码是不可理解的。居约同志还指出，戴高乐的讲话虽说并不意味着他选择了“希腊方案”，但是说明戴高乐政体正在明显地向建立军事专制滑去。居约同志不止一次地提到公开镇压法国共产党的可能性。

在谈到戴高乐讲话后局势的前景时，居约同志说，罢工将会继续下去。看来政府会动用军队占领机场、铁路、通讯设施等等，保障它们能正常运行。法国总工会已指示罢工者不要与军队和警察发生冲突，但是要继续罢工。看来，政府会成立所谓的国民行动队，把它们用作破坏罢工的工具，以保障国内最低限度的生产活动。根据宪法，国民议会的选举应当于解散国民议会后的40天内进行。

但是，能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选举，还搞不搞选举，尚不得而知。宣布的全民表决也不定期地推迟了。如果戴高尔决定搞全民表决的话，全民表决有可能和选举同时进行。总之，国内形势依然很不明朗，很不稳定。

原定今天法国共产党和左翼联盟就制订联合政府纲领举行的会晤不定期地推迟了，因为在目前条件下这种讨论还是纸上谈兵。最近很活跃的左翼人士目前大都保持沉默，没有对戴高乐的讲话作出反应。众所周知，密特朗作了一个调子很高的声明，不过声明中也有号召左派力量联合的内容。

居约同志认为，戴高乐今天带有攻击共产主义内容的讲话，应当在苏联报刊上得到语气激烈强硬的反击。当然，应当在可能的范围之内进行反击，而且要考虑到苏联同志可能有的特殊情况。他还说，对法国共产党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报刊也是这样的调子非常重要。他说，法国政府现在会密切收听其他国家对戴高乐今天讲话的反应，毫无疑问，它对这一反应会非常敏感。因此，苏联报刊的反应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况且，中国报刊也加入了法国政府现在掀起的这场反苏运动，它攻击法国共产党，指责法国共产党放弃了武装起义的道路。居约同志说，假若法国共产党让左倾分子推着走这条道路，那么在缺乏革命形势的这种条件下，法国共产党会注定灭亡。

苏联驻注国大使　瓦·佐林

【专题说明】

苏意两党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分歧

（1968 年 11 月）

1968 年春，捷克斯洛伐克涌起了以摆脱斯大林模式、建设捷克斯洛伐克型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运动，被称作“布拉格之春”。苏联经过精心策划，联合华沙条约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缔约国，于 1968 年 8 月 20 日，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对苏联这种无视联合国宪章的霸权主义行径，意大利共产党也予以严正谴责。意大利共产党是西欧社会政治生活中很有影响的大党，苏共非常希望意共能改变态度。经过反复磋商，苏共与意共于 1968 年 11 月 13 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双边会谈。本专题选编的这份会谈记录清楚地反映了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考虑，以及苏、意两党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和分歧。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张廷文、高增训翻译）

№06969

苏共与意共代表团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会谈记录

（1968 年 11 月 13～14 日）

双方代表团组成：

苏共代表团：安·帕·基里连科同志、阿·亚·佩尔谢同志、鲍·尼·波诺马廖夫同志、A.C. 别利亚科夫同志；

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恩·贝林格同志、保·布法利尼同志、卡·加鲁齐同志、阿·科隆比同志、阿·科苏塔同志。

安·帕·基里连科同志：我以苏共中央的名义欢迎意大利代表团并向全体意大利共产党党员致意，并转达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和列·伊·勃列日涅夫本人兄弟般的敬意。

基里连科同志说，我党中央委员会积极支持你们党对安排这次会晤所提的倡议。

在开始我们的会谈时，应该注意几十年来我们两党间的关系的特点。我们能完全坦率地就各种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关系过去和现在都是建立在我们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的基础上。

我们认为，我们这次会晤仍将遵循这些好传统。我们认为这次会晤的目的，是就我们两党所感兴趣的各种问题进行广泛地讨论，阐明各自的观点，为进一步开展我们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及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创造良好的条件。我们两党交给我们两个代表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如此。

基里连科同志接着说，我们很赞成隆哥同志所说的，而且这也

写入你们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纲草案中，即意大利共产党深入有效地同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在一起。你们可以坚信，我方将努力维护和加强我们两党间友好与团结的联系。请允许我们表达我们的愿望，即通过我们的会谈能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

恩·贝林格感谢基里连科同志对意大利共产党发表的热情而诚恳的讲话。他说，我们受托转达意大利共产党全党、党的领导人和隆哥同志对苏联同志、苏共中央领导人和勃列日涅夫同志个人的衷心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我们还请转达对苏斯洛夫同志的问候。

贝林格同志通报说，隆哥同志已经出院，他的身体正在康复，他已经在关注着各种政治事件，当然这只能是在医生允许的条件下。他对代表团的会晤很关注。出发前，贝林格同他就这个问题谈了很久。他对苏联同志们把萨拉兹金教授派往罗马去紧急抢救表示感谢。

安·帕·基里连科祝愿隆哥同志能很快完全康复。他说，我们对获悉隆哥同志的身体正在康复感到非常高兴。

恩·贝林格说，意大利党代表团同意基里连科同志的意见，即会谈的主题应立足于当前党与党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的条件下，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应该搞清楚，为了克服这些分歧应该怎么办。只有接近才能相互理解对方的观点。尽管有分歧，但还是要在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和争取实现共同的目标……的斗争中加强整个运动的团结。

贝林格接着说，有时候听人说我们好像要逃避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准备“分道扬镳”。对此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说，这是非常错误的……

贝林格指出，至于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两党间的分歧，我们首先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这是明显的。我们在这方

面的立场已在我党的有关文件中作了阐述，显然，这些立场大家都很清楚，因此没有必要多说。但是要引用某些章节，使之更加清楚。

贝林格同志接着说，应该强调指出，当我们说我们党的立场时，所指的绝不是各种文章里所写的，甚至也不是某些发言人在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而只是指党的各级机构的决议、隆哥同志的报告和发言、纳塔同志在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所表示的我党正式的立场，当然也包括第 12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提纲及党的领导成员的讲话和向记者的谈话中所表达的我党正式立场。

贝林格同志接着说，我们党的立场是我们的领导机构认真分析和思考的成果。我们过去曾努力极认真地考虑了我们所掌握的各种信息和意见，首先是既通过公开的途径又通过秘密的方式从苏联收到的各种情报。我们应当坦率地说，在所有这些信息中，我们并没有发现那些与我们党的观点有什么不同的材料。我们的立场始终没有改。

我们希望能够提醒，我们从不否认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中有困难，有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危险和活动的存在。但是我们已经强调过要纠正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以前的错误，也对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新领导的活动给予支持。我们相信，正是这样我们才能最好地促进扭转这个国家的局面。当务之急要克服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困难局面。而且在捷克斯洛伐克新方针的条件下完成这一任务也更容易了。否则将有利于反社会主义势力。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扭转已出现的局面的活动中有一定的软弱性，显得信心不足，但还未达到需要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出面干涉的地步，无论是在 8 月 21 日之前或之后的局面都是这样。我们并不认为，为了克服这些软弱性和错误及消除这些危险而需要出兵。

因此我们不同意这五个国家的行动。我们确信，即使在现在，

随着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对错误的纠正，这种干涉并不会产生积极的结果。我们党关于这一局面可以被扭转并能够出现好转的立场由此而确定下来。

贝林格同志说，我们希望知道苏共代表团有关对捷克斯洛伐克当前局势的评价及其发展前景方面的意见。

在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纲草案中所写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发展。

安·帕·基里连科说，这个文件中有这么一句话："扭转捷克斯洛伐克所出现的局面"，说实在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恩·贝林格回答说，这应该和提纲中的下文接起来，即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机构活动的完全自由。

安·帕·基里连科不同意这些机构的权力已完全得到恢复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府及国民议会在行使职权的说法。既然这样，那怎么还需要恢复呢？

恩·贝林格说，众所周知，普遍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并不正常，到处都在说局势正常化的必要性。

安·帕·基里连科答：据我们所知，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人和共产党员们以及人民都认为他们那里的局势是完全正常的。苏联军队暂时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协议得到所有的合法机构赞同。在经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同意后签订的条约有效期内，我国的军队都将留在那里。这个办法不是我们想出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的观点都是这样，同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至于对"正常化"的表达，那么显然我们所说的则是另外的意思。我们所说的正常化，就是履行苏共和捷共两党领导人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这个协议也得到捷克斯洛伐克所有领导机构赞同。协议所谈的就是使党内局势正常化，对党内的右派势力予以打击，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党和人民的团结、党自身的团结等问题；还谈到

加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与友谊，加强华沙条约组织以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免遭外来的侵害。这样理解正常化的既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志，也有他们的领导。他们都是直接而坦率地谈论这一问题的，他们也在努力争取改善党内的局势。

恩·贝林格说，他希望能够注意到：意大利共产党对捷克斯洛伐克无论是8月21日以前或是以后的局势的评价同苏共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党所作的评价完全不同。这已经再一次写进提纲草案之中。我们也想强调指出，我们不希望加剧分歧，不想利用分歧达到宣传目的，不希望党际关系破裂。你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见与我们不同，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请求能面对这一现实考虑到我们的观点同你们的观点有差别。

安·帕·基里连科说，这当然要考虑到。你们谈了现实和建设性的精神，我们觉得还应该保证有另一个因素，即信任的精神。

恩·贝林格说，他完全同意这一点。如果在两党的关系上没有信任精神，那么两党的所有联系将是不牢固的。我们两党在同一个阵营里共同进行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有40多年了，我们相信，还有许多战斗将由我们两党携手去进行。要彼此信任，要加强团结。没有信任就不能坦诚地阐述我们的观点。

贝林格接着说，遗憾的是，我们应该指出，某些党——我们不是说苏共——表现出另一种情绪。例如，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全会说，好像我们的立场受竞选纲领的左右，是对反动派的压力作出的让步，是在脱离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不能接受所有这些指责，这是明确无误的。

安·帕·基里连科指出，苏共没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德国的同志说过，那你们就去同他们谈谈。

恩·贝林格回答说，意大利共产党是想这样做，但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不愿意。

贝林格同志接着说，意大利共产党在自己支持自认为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中从未动摇过。我们不怕在必要的时候反潮流。在匈牙利事件期间就是这样。这一次情况则不一样，我们持另一种立场并非因为害怕反潮流，而是因为我们对形势的评价是以我们所拥有的信息为根据的，过去和现在都与别人不同。

在比较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形势时还有一个问题可以提出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也想以完全坦率和信任的精神加以阐述。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今天的立场实际上不只是根据这些国家事件事实上的不同发展，对反革命危险的不同评价来确定的。令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所作的总结和理论结论。

在匈牙利，苏联军队的干涉是因为情况紧急，迫不得已。当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的时候，同时苏共原先的基本政治立场也更加有力地强调起来。比如，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的声明就是这么做的。这个文件直接提出，在此之前的一个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之所以受到危害是因为这些相互关系的原则遭到破坏。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是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应根据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而加以发展。强调这些原则更便于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支持苏联军队的行动。必须击退敌人的进攻，这种干涉的紧急性质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这有助于我们反击来自政府、社会民主党人和国内反动派对我们的攻击。

现在发生了另外的情况。在苏联军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时和其后的一个时期出现了更加令人不安的情况。

问题并不在于意大利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力量的作用估计不足。相反，贝林格同志说，我们过去和今后都始终强调这一因素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作用和意义，因为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的斗争中为我们提供了支柱。但是我们现在为社会主义

国家的团结和力量担心。特别是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上的说法担心。德国同志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某些问题的不同观点简单地说成是不同的倾向。他们认为，由具体的情况引起的这些分歧是修正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向帝国主义让步的结果等。他们认为，这种意见分歧本身已在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共产党的团结。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这一苏联、各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共产党一向为之奋斗的原则，不应该运用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上，或者应该有限制地为社会主义国家所运用。

贝林格同志接着说，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即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特殊，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即要像匈牙利事件时期那样行动，因为当时只在对事实的评估方面有分歧。其实你们上述立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认为这些立场是不正确的，并不能提高社会主义理想的威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得到我们的支持，它同主张民族独立国家的人民的斗争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持这种立场可能会在斗争中妨碍我们自己。

我们的这种观点已在隆哥同志的报告和发言中反映出来，在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的提纲草案中可以找到。

安·帕·基里连科说，如果去引用第三党的文件和看法，那我们就不能相互理解了。当谈论我们两党的立场时，未必有必要去谈论我们的朋友。苏共站在已写入 1957 年和 1960 年莫斯科会议的文件的立场，站在写入布拉迪斯拉发会议文件的立场。那些文件都有各党的签名，并且也讲了通过各党的努力来保卫社会主义。布拉迪斯拉发声明的这一原则我们已在反对我们的阶级敌人的实践中加以运用了。我认为，关于这一点，民主德国的文件中也有。

正如我所记得的那样，我们对匈牙利事件有自己明确的阶级立场。您说，现在的事件并不像匈牙利事件那样。但是要知道，现在是另一个时代，不是 1956 年。可以说，你们现在对事件也没想出

新的处理办法。主要在于，我们从自己方面竭尽了全力，以使匈牙利事件不再重演。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有可能牺牲成千上万的人。您和其他兄弟党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向我们说什么呢？

此外还应该考虑到，反革命已经接受了1956年的经验教训，已不再作正面进攻，因为他们知道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这完全不是说要等着我们随意处理。我们也很清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情绪，那里现在是另一种法西斯主义，我们知道在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国家，帝国主义的情报机构也在打主意，它们也和过去不一样了。因此，把这两个时期加以比较并以此为依据作出结论是不行的，这两个时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当然，它们之间有共同点，而且两者都涉及到反革命的问题。但是在匈牙利，反革命动用了武器，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则采取了另外的办法。如果是我们导致捷克斯洛伐克政权被推翻，使那里的政权成了我们的敌人，那么谁也不能原谅我们。我们已经尽了所能。但是这都是我们大家对之作出强烈反映的事件。当然，我们希望你们能说出：请改变自己的观点。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还会是这样。所以我们诚望在这一进程中给你们以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是最高尚的感情促使我们这样做的。

使事情导致匈牙利事件能说明什么呢？卡达尔很了解反革命，也知道是如何准备阴谋的。无论是他还是社会主义各国的其他所有领导人，都一致主张要制止这种很容易采取其他形式的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危险发展。我们不惜一切，主要的是我们挽救了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

恩·贝林格说，两党立场的差别并不是必须同反革命作斗争的问题。我们的分歧有两点：第一，当时有没有反革命的威胁？如果有，那么用什么方法同它作斗争最好。如果反革命不用武力，那就用和平的手段同它作斗争，况且是在一个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

安·帕·基里连科回答说，既然是反革命，用和平的手段同它斗争是困难的。况且从和平的反革命到非和平的反革命——只有一步。而我们也不想迈出这一步，我们也不愿意对任何人这样做。这完全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出兵。我们自己还缺乏什么呢？我们的人民还需要什么呢？我国人民对国内的状况是满意的。

恩·贝林格回答说，意大利共产党员也乐意声明自己不同意这些行动，但是这种立场是由党的政治路线、党员的信念而确定的。

安·帕·基里连科说，我们确信，再过一些时候意大利共产党将改变它对形势的评价。意大利共产党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党，它善于以辩证的态度分析形势，这一点在以前曾多次得到证明。我们并不认为你们会永远坚持你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你们将会在以创造性的态度处理事情的过程中理解这一点。我们信任你们的党，信任你们党的领导层。因此我们也坦率地说，我们相信，再过一些时候你们会改变自己的评价。现在就要不要开进坦克或要不要开进拖拉机进行争论是无益的。重要的是，现在如何加强团结，如何使那里的局势正常化，如何摆脱右派分子和在十月革命51周年那天撕坏和焚烧我们的旗帜的长头发流氓分子。连日来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举行了有5000名诚实的共产党员参加的壮观的集会。与会者通过了一个很好的致苏联人民的呼吁书，立誓要加强同苏联友好。我们认为，这可以帮助杜布切克，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摆脱那些毒化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意识的人，摆脱那些鼓动发狂的年轻人的人。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将会像根据普遍同意作出的这一决定那样进行。因此，这一过程实现得越快，就越能更早地放弃评价形势的争论和评价那里有什么和没有什么的争论。

不要放弃自己的观点，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不应该向后看，而应该向前看。现在世界的形势是复杂的。我们并不了解尼克松将要做什么，而这是一个比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美帝国

主义，西德的新法西斯主义和其他反动势力将会怎样行动呢？这会使我们大家都感到不安。应当把我们两党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方面。现在许多党都在重新研究自己在最初所采取的立场。以前人们称我们是“占领者”。现在就不这样了。罗马尼亚人说我们是“占领者”，但现在就不这么说了。现在许多人都用另一种观点看形势，甚至连捷克斯洛伐克人自己也变了，他们现在关心的是另外的东西。

恩·贝林格说，他想提醒的是，所有这些问题，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对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评价，无论是在8月21日以前或之后，意大利共产党并未打算进行宣传或利用它进行分裂活动。恩·贝林格说，就是在我们这里，在谈判桌旁的表现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不想教训任何人，也不谋求去指手画脚地说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持什么立场，我们不想去干涉它们的事务。我们有历史感和对实际情况的理解。

在提醒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要考虑到一个情况，即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某些同志企图为我们的整个运动做出不同的结论和理论。意大利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是意大利国内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不能没有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也不能不去表达它。我们完全负责地这样做。我们两党都有不同的立场，但它是在我们完全承认同苏共和苏联团结的情况下持有的立场。换句话说，我们发表我们各自的意见，一刻也没忘记我们这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

重要的是，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立场也是以意大利的形势为出发点的。这一点我们不否认，也不后悔。但是当有人向我们说我们是按竞选纲领这样做的时候，比如德国社会党中央全会就这样说，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谬论。我们认为议会选举只是我们的政策的一个方面，在我们党的政策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千百万群众

参加的阶级大搏斗。当我们在竞选中得票率增加的时候，那么这也只是证明我们的斗争的成绩和尖锐的阶级冲突的成果。光靠退让是得不到选票的，这只有在斗争实践中才会更加清楚……

贝林格继续说，意大利共产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它可以对国家的内外政策施加影响。我现就对外政策方面举两个例子。首先是越南问题。由于我们动员了群众并在议会中开展斗争，我们把各种政治力量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它们中的许多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改变了自己起初的立场。意大利政府就是这样做的，它不得不拒绝直接捍卫美国的政策。

第二个例子是意大利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在最近 10 年间这种关系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当然，在这方面主要的功劳归于苏联对外政策本身，但是意大利共产党对这种变化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至于说意大利共产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立场，那么这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方面是不同意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另一方面随时都证明同苏联的团结，即抵制任何一种反苏主义，它有助于共产党更有效地从事反对极端大西洋主义、反对恢复冷战和反对同社会主义国家分裂的言论的斗争。当然，意大利政府方面也针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发表过声明并采取了一些行动，但是各种势力是反对这一点的。例如，意大利政府不得不在莫斯科举办预定的工业展览。

贝林格同志继续讲，意大利国内的局势现在是非常复杂而有趣的。不久前举行的意大利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第一次大会）使南尼及其追随者遭到政治上的失败……共产党在反对政府和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同时，可使社会党内的左右两派分裂，加强基督教民主党的左翼以及天主教组织的左翼。这将有助于意大利共产党在形成上流社会和民主党的各种左翼势力广泛团结方

面的整套政策。

在这方面的每一个步骤都朝着有利于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方向发展，但是也有利于其他各国共产党，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意大利的局势同法国的局势有很大的差异。在法国，帝国主义的政权是巩固的，尽管它同美帝国主义发生过冲突并在现在仍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自己的政策。而在意大利则是一个亲美的政府，但是在国内能够同这一方针相抗衡的各种力量正在发展……

意大利共产党虽然在个别问题上不同意苏共和其他一些党的意见，但是主张同它们在一个统一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线上并肩战斗。我们将永远同你们团结战斗。我们在推行自己独立的政策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给你们以帮助，促进缓和和争取裁军的斗争，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持苏联在这方面的对外政策。意大利共产党在这方面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由于它有动员群众的能力，在形势可能激化的情况下特别有用。

贝林格同志说，我们希望能听到苏联同志对世界形势，特别是对欧洲形势的评价以及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前景的评价。你们在这方面的观点将有助于意大利共产党人在今后更好地确定自己的方针。

贝林格同志接着说，哥穆尔卡同志不久前在一次讲话中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应该指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适应它们的需要。

安·帕·基里连科指出，每个党，由于它加入了共产党大家庭，就不能不在自己的活动中，考虑其他党的利益，我们大家都要考虑它，要始终想着如何去维护它，即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应当考虑这一点，所作所为有助于执政党，能够使它们最实际地完成它们所面临的任务。我们对各党都给予帮助。比如智利共产党，我们就答应与他们签订一些贸易合同。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党对我们的共同斗争有更大的贡献。

鲍·尼·波诺马廖夫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能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政策迎合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日常斗争的需要。

恩·贝林格指出，他同意这个看法，但是在这一事业中需要相互关心。

安·帕·基里连科说，至于说到国际主义政策，应该向前看，应该考虑如何才能使大家更好地一道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最好是，当你伸出援助之手时，你也能感受到别人给你的援助。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个共同的法则，无论那个党战斗在什么地方，是在欧洲、亚洲，还是在非洲。

鲍·尼·波诺马廖夫指出，苏共一向非常关注从物资上帮助各国共产党。比如对越南、古巴和非洲各国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但是我们不能去迎合其他党的政策，否则，这对各党来说不会有好结果。这就是说应该奉行卡斯特罗指出的那种政策。

恩·贝林格说，他同意这一点，因为每一个党都可能有不同的政治需要。很明显，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自己的政治需要。西欧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也就是那些已成为实际的政治力量的所有的党，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都持有大致相同的立场，但是这一事实不能说成是向修正主义的虚假的让步。可某些人正是这样说的。我要指出的是，我们不会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这些发言上，以及花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的大量宣传材料上。这些材料的分量是，甚至于我们的那些不同意我们党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立场的同志读了这些材料后也得出结论说我们是正确的。

安·帕·基里连科强调指出，每一个党可以对各种问题持有自己的意见。我们知道那个党已经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我们相信，大家都会重新看待的。但是在我们的大家庭里，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应该遵循这样一条规则：你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不可以去攻击别人。

恩·贝林格说，他完全同意这一点。

安·帕·基里连科指出，很遗憾的是常常不是这样。在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后，某些人就向我们说，我们是“占领者”，是“奴役者”。这种立场在劳动人民心目中能提高这个党的地位吗？我们认为是不能的，它将会阻碍这个党的斗争。我们并不请求赞同我们的行动，但是为什么要加以攻击呢？为什么，比如在南斯拉夫，为什么说我们是什么“占领者”，说苏联“在向温暖的海洋扩张”，“在继续推行俄国沙皇的政策”。

另一件事，例如布法利尼同志。他在罗马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发言，对苏联作了应有的评价，他谈了十月革命。各种观点都可能有，但是还是让我们携手共事。不错，他后来提到了斯大林问题，谈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安·帕·基里连科指出，50年来，苏联没有奴役过任何人，相反，却连续击退了敌人的侵犯，不仅保卫了本国的人民，而且还保卫了整个欧洲人民。可是突然有人却说：“占领者”。在反对希特勒占领军的斗争中，在争取解放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南斯拉夫人民的斗争中，我国牺牲了两千万人。

保·布法利尼说，承认这一事实是意大利共产党整个政策的基础，舍此，党就会立即被消灭。意大利的劳动人民从不会忘记苏联在这一斗争中的作用。

恩·贝林格表示同意每一个党都可能有自己特殊的观点，但是它不应该去攻击其他党。这也就是说，不应该指责任何说出自己对具体问题有不同意见的党为修正主义。况且这种攻击也不会产生他们所希望的那种效果。同志们都知道我们的真正立场，因此，这种攻击只能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是正确的。

贝林格继续说，我们对这种攻击的回答权受到限制。其他的事情——诚实而严肃地讨论我们两党所关心的问题。如果这种攻击再

继续下去，那么我们将全面作出回答，这就会导致公开的论战，那就很难指望会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什么好处……

安·帕·基里连科把话题转到了反对西德复仇主义和争取欧洲安全的斗争问题。欧洲的形势令人严重不安。帝国主义势力正在制定并加紧推行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计划，旨在警告由于北大西洋条约的20年有效期于1969年已满而在这个集团不断增长的离心倾向。

针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反共歇斯底里使欧洲的形势变得更加紧张。

当反革命在捷克斯洛伐克抬头的时候，联邦德国的复仇主义势力显得十分活跃，他们给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势力以很大的物资和财政支持，直接转播地下无线电台的广播，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下小组和组织进行经常的联络。今年夏天，西德的一些大康采恩和银行界代表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就西德的资金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广泛投资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反动的侨居在联邦德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侨民也表示准备“对新捷克斯洛伐克经济进行投资”。

众所周知，在最近的一年半至两年来，联邦德国企图实行所谓的“新东方政策”。众所周知，苏联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政策采取了非常克制的态度，即不妄加评论。其实，有人曾劝我们“相信”联邦德国，让我们相信这个国家的上层人士真正在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方针。但是我们的立场一直很坚定，我们现在认为我们是绝对正确的……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完全证明，当时我们对波恩的“新东方政策”持不信任的态度是正确的。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再一次明显地暴露出来。联邦德国的上层人士利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并以此为借口掀起一场有利于强化军备竞赛和巩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

运动。他们对美国政府，也对欧洲各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并且声称，似乎“欧洲的军事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欧洲的上空笼罩着“来自东方的侵略”威胁，似乎苏联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新学说”。所有这一系列宣传、声明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再次掀起“冷战”，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准备添加催化剂，加强自己在这一侵略集团中的阵地，利用战争狂热的气氛实现自己的复仇主义目的。

联邦德国政府利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再次拖延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顺便说一下，意大利政府也是这样做的……

鉴于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分歧，我们想十分坦率地指出以下事实。我们不隐瞒下述一个事实引起我们忧虑：某些共产党，首先是西欧的党，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同苏共，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及拉丁美洲、亚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共产党所持的立场不同。

至于说中国人或阿尔巴尼亚人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反应，那么在这方面不要有任何期望，他们总是利用任何借口来攻击苏共和其他兄弟党。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罗马尼亚共产党所持的立场的理由是明显的。在这几个党内，国际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正在削弱，民族主义的动机占上风，它在这种情况下也起了决定性作用。顺便说一下，最近我们认为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立场有某些进步，其领导现在表现得更加实际了。但是不能说南斯拉夫领导人也是这样，他们的立场现在已突出地表现出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其实，这种倾向在这个党内从未彻底根除。

前几天我会见了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维季奇，他向我递交了铁托就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信件的回信。这封回信同他们9月的信件的内容相比毫无任何新东西，再一次谈到出兵不合法以及

其他的各种指责。我不得不对他说，目前捷克斯洛伐克人并没有使用“占领者”这个词，可是在南斯拉夫，这个词却不仅在报刊上，而且在党的机关的领导人讲话中不断出现。同时铁托还声明，他对我们的关系的正常化充满信心，对两国关系的维持和改善充满信心，他呼吁找到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方法。我们也希望使这种关系尽可能多方面地正常化，以便使它能像上一段时间那样。

日本共产党领导一直表现出“革命的立场”，指责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为“修正主义”。现在他们表现出完全背离对五个社会主义国家旨在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行动作出阶级评价及国际主义的评价。众所周知，在整个最近几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所流露出来的民族主义观点占了上风。

至于说西欧的某些共产党，那么显然是另外一些因素在这方面起了作用。比如瑞典共产党的立场，首先是其主席赫尔曼逊的立场。这个党的领导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所作的一切就是真正的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很遗憾，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费希尔与这种立场近似。

从这些党的领导人和报刊的议论中能看出什么呢？公然迷恋所谓的捷克斯洛伐克“自由化”进程，无视那里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在行动，背离民主和主权问题的阶级评价。它给人的印象是，某些同志确实相信“一般的民主”、“一般的主权”，但是却看不到这些概念的阶级实质。

显然，在这些党的立场中起作用的是过高评价斗争的议会方式和和平方式。因此，他们很难赞同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的斗争中使用革命的暴力。

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出现的分歧无论有多么大，但我们还是认为，现实生活将向那些在这几个月表现出动摇的人表明五个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行动是正确而及时的。因此将为克服已出现的分

歧，为进一步统一行动创造有利的前提。我们认为，适当举行的双边和多边会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现在重要的是不要做使分歧加深的任何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原则上反对召开全欧洲的或西欧的共产党某种代表会议来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建议的原因。捷克斯洛伐克同志自己也反对召开这样的代表会议，其他大多数党也是如此。

希望在这次会晤时我们能记录下我们的这一共同立场，并在今后遇有这种倡议时能协商行动……

基里连科同志接着指出，有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所有基本情况，意大利同志们都已很清楚了……

如果谈到事情的本质，那么应该首先说，苏共中央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月全会是理解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说了不止一次。你们同样知道，纠正过去的错误的进程被反社会主义的势力所利用。贝林格在这个问题上也说过，匈牙利的情况已很清楚，问题就在于保卫社会主义，军队干涉是由于情况特殊，因此这一点大家都是理解的。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在出兵前事件的发展已变成十分危险的进程，它扩展到一个又一个的所有领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曾多次答应纠正事情的进程。在同帕耶塔谈话时有人说，应该做一切可以做的和一切不能做的事情。这一点我们做了。举行过有杜布切克和没有杜布切克参加的多人会晤，如在波兰、布拉迪斯拉发和其他一些地方，以便使事情不至于弄到出兵的地步。但是事情却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一致得出结论：必须向捷克斯洛伐克出兵。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们就是根据这一点而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遵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件的精神行事，比如布拉迪斯拉发声明，该声明直接谈到：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必须给予兄弟般的援助。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们拯救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

制度，在这个国家和欧洲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堵住了反革命前进的道路，巩固了欧洲的安全。

你们都知道军队介入后事件的发展状况。现在你们问我们如何评估捷克斯洛伐克现在的局势。你们知道，10 月初在莫斯科举行了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之后签署了关于苏联军队临时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协议。我们可以告诉你们，除了按条约规定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有限苏军以外，其他所有军队都已撤出捷克斯洛伐克……

所有这些谈判的结果均得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国民议会的赞同，相当一部分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员及劳动人民也相当满意。条约签署后改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团结的进程得到加强，右派、反对同右派势力妥协及搞折衷的斗争更加活跃。据我们获悉，广大的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阶层越来越理解出兵的理由，大家都说必须加强同苏联友好……

当然，一切并非顺利。正常化是在斗争中求得的，迄今仍有某种形式的敌对的袭击。这种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也有，他们阻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使形势正常化的进程。我们认为，整个这一进程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尽管谁也说不上到底需要多久……

【专题说明】

苏联对外国政府或组织的援助

（1969 年 8 月至 1988 年 3 月）

本专题选编的文件，反映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美行动和革命活动方面的立场，及实际采取的措施。其中包括苏联在财政上支持各国革命党和革命活动的报告和决定，向越南、老挝内务部提供无偿援助的决议，以及建立“支援左派工人组织基金会”的情况。至于苏联驻尼加拉瓜大使馆关于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与美国副国务卿托·恩德尔斯谈话情况给苏联政府的报告，也反映了苏共中央对拉美革命局势的关注。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赵英杰、刁绍华、赵静男翻译）

№07010

安德罗波夫就拨款支持印度穆斯林游行示威致苏共中央的信

（1969 年 8 月 29 日）

第 2169－A 号

苏共中央：

以色列人火烧耶路撒冷的阿利－阿克斯穆斯林清真寺引起印度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应。今年 8 月 26 日，印度议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外交部长季涅什·辛格发表声明指出，“印度政府和人民对这一事件深感震惊”。

国家安全委员会驻印度的谍报机构认为有可能会因此而在美国驻印度大使馆楼前组织抗议示威，参加者将达 2 万名穆斯林教徒。举行示威的费用达 5000 印度卢比，将由苏共中央拨出的用于 1969～1971 年度在印度进行特别活动的经费来支付。

呈请审议。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06243

安德罗波夫请求支持美国“黑豹”组织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0年4月28日）

№11128－A

绝密

苏共中央

近来，激进的黑人组织“黑豹”成了以美国联邦调查局为首的美国当局残酷迫害的对象，美国当局认为“黑豹”是对国家安全严重的威胁。警察对“黑豹”进行挑衅活动。法庭对它进行审判，当局对该组织的积极分子采取恐怖行动并对此广泛宣扬，这导致了“黑豹”在美国进步阶层中的威望显著提高。

考虑到“黑豹”是一个对美国统治阶级构成危险的很活跃的黑人组织，美国共产党力求在必要的方向上对它发生影响。共产党的这一政策已经取得了积极的结果。“黑豹”队伍里目前显露出扩大与反对美国现存制度的进步组织合作的趋向。

黑人反抗运动的高涨给美国统治集团造成一定的困难并且将吸引尼克松行政当局的注意力，使其顾不得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有鉴于此，我们认为采取一系列旨在加强和扩大这个运动的措施是适宜的。

为此目的，要求通过克格勃在非洲国家的机构策动政治和社会活动家、青年团体、工会和民族主义组织进行请愿，向联合国、美

国驻这些国家的代表处和美国政府提出要求和发表声明以保护美国黑人。在一系列非洲国家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和书信指控美国政府进行的种族灭绝。通过克格勃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机构来影响“黑豹”，使其向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请愿，要协助制止当局对美国黑人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

通过上述措施，有可能动员美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舆论保卫美国黑人的人权，从而促使“黑豹”更积极地进行斗争。

请予以同意。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① 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批示同意此报告，并于1970年10月5日通知了安德罗波夫（原文如此，疑是5月10日之误）。

№07011

乌里扬诺夫斯基就支持乌拉圭等国党的经费致苏共中央的信

（1975年1月20日）

第25－C－152号

苏共中央：

乌拉圭、阿根廷、希腊共产党和塞内加尔非洲独立党的领导请求支付他们派去参加印度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路费。

印度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975年1月27日开幕。

我们认为可以满足上述党的领导人的请求。支付这些党的代表路费可以从接待外国党的工作者预算中支付。

呈请同意。

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　罗·乌里扬诺夫斯基

1975年1月20日

№06065

卡济米罗夫转送尼加拉瓜领导人与恩德尔斯谈话简介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1 年 11 月 2 日）

机密　份数编号：1

苏联外交部

121200，莫斯科市 Г－200

斯摩棱斯克干草广场 32 /34 号

电话 244－16－06

1981 年 11 月 2 日№595 /па

根据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И.Н. 泽姆斯科夫同志的指示，兹将通过可靠途径得到的尼加拉瓜领导人与美国负责泛美事务的副国务卿托·恩德尔斯谈话记录基本内容简介寄给苏共中央国际部。

第一拉美司副司长　В. 卡济米罗夫（签字）

附件：发文594（5），共5页，机密，只按地址送交

机密　份数编号：5
1981年10月30日
№594 /ла

尼加拉瓜领导人与美国负责泛美事务的副国务卿托马斯·恩德尔斯谈话的基本内容简介

今年8月，美国副国务卿托·恩德尔斯访问了马那瓜市，会晤了尼加拉瓜一系列领导人。

尼加拉瓜方面参加谈话的有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民族领导委员会成员达尼埃尔·奥尔特加、巴雅尔多·阿尔塞、韦洛克·罗曼同志，领导委员会成员塞尔希奥·拉米列斯同志、外交部长米格尔·德斯科托同志。

据尼加拉瓜同志的评价，恩德尔斯访问的基本目的在于通过压力和威胁逼迫他们放弃支持萨尔瓦多爱国者们的斗争，不准加强国家的防务实力。恩德尔斯直截了当地把改善美尼关系问题与萨尔瓦多的局势联系在一起。

尼加拉瓜领导人从自己方面驳斥了干涉萨尔瓦多的指责，对华盛顿破坏国内局势的稳定和颠覆革命进程的企图深表关注。

涉及到中美洲的局势时，恩德尔斯强调指出，他就中美洲问题发表的观点代表美国政权执行机构以及立法机构的观点。

恩德尔斯指责尼加拉瓜当局通过自己的领土往萨尔瓦多运送武器、弹药和其他装备，并且向萨尔瓦多转送在其他国家培训的游击队员；他断言，美国侦察机关对此掌握了确凿的材料。他声称，美

国不允许左派势力在萨尔瓦多取得军事胜利，他强调这种冲突有升级和扩展到其他中美洲国家的危险性，因此断言，美国与尼加拉瓜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桑地诺派停止在军事上支持萨尔瓦多起义者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恩德尔斯企图证明，美国中断了对尼加拉瓜的经济援助是由尼加拉瓜人向萨尔瓦多输送武器引起的。他说，如果对萨尔瓦多的军事援助完全停止，华盛顿当局将会重新考虑食品和其他人道援助的问题。

国务院的代表力求给交谈者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美国并不威胁尼加拉瓜革命。他把美国与洪都拉斯一起在尼加拉瓜海岸举行的海军演习（“大洋神的冒险－81”）描绘成惯例的行动。副国务卿表示准备签订关于不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双边协定，如果尼加拉瓜人能够满足美国的要求，停止援助萨尔瓦多游击队。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回答而被搁置下来。

恩德尔斯指出，他们认为尼加拉瓜没有理由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会引起美国及其邻国的警惕。他强调尼加拉瓜军队装备有比其他中美洲国家军队更现代化的武器，并且补充说，国内有许多古巴军事顾问，更使事态复杂化了。

恩德尔斯认为，这一切都引起它的邻国的恐惧，加强中美洲的紧张，有可能变成地区性的冲突，到那时，美国也将卷进来。

谈到桑地诺派领导的国内政策路线时，美国代表指出了在政治上越来越脱离多元化的倾向，向一元集权制的政治体系偏移。

恩德尔斯用这些因素的总和来解释美国某些国会议员出现的冷淡态度，他们以前对尼加拉瓜革命本来抱有好感。

尼加拉瓜领导人从自己方面坚决驳斥了对他们的指责，证明自己并没有参与通过自己的领土给萨尔瓦多起义者运送武器的事。关于尼加拉瓜武装力量的问题，桑地诺派首领们直截了当地说，他们

担心美国的干涉。他们提醒恩德尔斯注意在美国的领土上存在着前索摩查派禁卫军的训练营，他们准备入侵尼加拉瓜，同时还让他注意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种势力的迅速扩张。

强调尼加拉瓜政府准备进行旨在达到本地区的和平的任何对话。但是尼加拉瓜不承认它向萨尔瓦多输送武器。就这个问题的著名的“白皮书”，在美国和西欧都受到怀疑。尼加拉瓜政府对萨尔瓦多或危地马拉发生的事绝对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说尼加拉瓜与其邻国的关系存在着紧张性，那么这是由这些国家有索摩查禁卫军和雇佣兵而引起的。

向恩德尔斯指出，美国奉行的加剧紧张局势的路线，不仅涉及到尼加拉瓜，而且也涉及到整个地区。不仅萨尔瓦多有美国军事顾问，而且洪都拉斯也有。美国在萨尔瓦多支持最保守的小圈子，支持阻碍政治调解的那些势力。这一切迫使尼加拉瓜的领导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

尼加拉瓜领导人非常注意调解萨尔瓦多冲突的途径问题。让恩德尔斯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尼加拉瓜曾经企图在美国与起义者中间充当谈判的中间人，后来又在政府与起义者中间充当中间人，指望取得政治解决。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合众国阻碍了这类谈判的进行。

经过调解萨尔瓦多冲突的国际社会的努力，希望美国利用自己对萨尔瓦多政府的影响，促进冲突双方进行谈判。与此同时，桑地诺派首领们承诺说服起义者相信谈判的必要性。尼加拉瓜方面强调，如果在政治上不承认起义者，如果没有他们参与这个过程，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解决萨尔瓦多国内的冲突。

尼加拉瓜方面再次重申自己关于召开加勒比地区各国外长会议的建议，研究把这一地区变成和平区的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却没有得到讨论，因为外长会议最终也没能召

开。

对恩德尔斯说，尼加拉瓜人认为他们和平调解的种种企图没能成功，是因为有来自美国方面的反对。副国务卿没有说明里根当局对待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建立和平区的思想的态度。

向交谈者申明，尼加拉瓜力求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尼加拉瓜方面提出了关于政府层次会晤的可能性问题，首先期望讨论本地区的问题并且向美国当局阐明尼加拉瓜对中美洲局势的基本观点。然而，恩德尔斯对待这个建议持消极态度，说这个问题的提出为时过早。

美国方面提出建立两国武装力量之间哪怕是有限的合作的可能性问题。尼加拉瓜人坚决否定了这个想法。

简介编者　H. 巴比奇

C. 马尔丘克

№06067

苏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建立支援左派工人组织基金会的决定

（1981年12月9日）

绝密

特别卷宗

№П39/13

送交波诺马廖夫同志——全部；

阿尔希莫夫同志——п.2.

摘自苏共中央政治局1981年12月9日会议记录№37

苏共中央国际部的问题

1. 通过苏共中央国际部关于建立支援左派工人组织基金会的提议，1982年度的金额为1835万美元，确定苏共应缴纳的份额为1550万美元。

2. 责成苏联国家银行理事会（B.C. 阿尔希莫夫同志）向鲍·尼·波诺马廖夫同志支付1550万美元专用。

3. 责成鲍·尼·波诺马廖夫同志向参加基金会的各共产党领导人通报基金会1981年度费用开支情况并与他们协商1982年度基金数额为1835万美元以及各党应按如下数量缴纳各自的份额：

德国统一社会党——100万美元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75万美元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65 万美元

保加利亚共产党——45 万美元

中央书记

1981 年 12 月 9 日

№11739

苏共中央关于1981年度基金开支情况和建议批准1982年度基金的通报

（1981年12月9日）

绝密

特别卷宗

兹将支援左派工人组织基金会1981年度开支情况汇报如下，并建议批准1982年度基金。

1981年度基金确定为1835万美元，参加基金会的各党按如下数量缴纳份额：

苏联共产党——1550美元

德国统一社会党——100万美元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75万美元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65万美元

保加利亚共产党——45万美元

参加基金会的各党皆按规定的数额缴纳了自己的费用。一年的过程中，基金会向76个党和组织提供了资助，总金额为1769.5万美元。

建议1982年度仍保持基金会相同的数额，并请批准总金额为1835万美元，参加基金会的各党按如下数额缴纳各自的份额：

苏联共产党——1550万美元

德国统一社会党——100万美元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75 万美元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65 万美元

保加利亚共产党——45 万美元

附上苏共中央决议草案。[①]

（签名）[②]

① 所收集档案中无此附件。

②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文件上有米·苏斯洛夫等 8 人表示同意的签字。

№06078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向越南、老挝内务部提供无偿援助致苏共中央

（1988年3月9日）

绝密

特别卷宗

致苏共中央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内务部的领导人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请求在无偿的基础上帮助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内务部装备专用、军用和普通民用器材。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可能部分地满足越南和老挝朋友的要求。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从进一步扩大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安全机关之间的合作和深化相互间的关系的利益出发，认为于1988年从现有的库存中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基金无偿地向朋友们转交总金额为46万卢布（包括运费）的专用、军用和普通民用器材是适宜的。

委托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发运军用和普通民用器材。

已与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Ю.П. 格里申同志）和苏联财政部（С.М. 鲍里索夫同志）协商。

附上苏共中央决定草案和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①]
呈请审查。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维·切布里科夫（签字）

E.Φ. 伊万诺夫同志
为准备材料用，呈请苏共中央审查。

阿·卢基扬诺夫（签字）
1988 年 3 月 9 日

① 参见本专题№11741 文件。

№11740

拉林关于向越南、老挝内务部提供无偿援助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8年3月16日）

绝密

特别卷宗

苏共中央

关于向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内务部提供专用、军用和一般民用器材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切布里科夫同志）从进一步扩大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安全机关之间的合作和深化相互间的关系的利益出发，建议支持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内务部的请求，在无偿的基础上帮助他们装备专用、军用和普通民用器材。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可能部分地满足越南和老挝朋友的要求，于1988年从现有的库存中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基金无偿地提供总金额为46万卢布（包括运费）的专用、军用和普通民用器材。

委托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发运军用和普通民用器材是适宜的。

关于提供器材的问题，已会同苏联财政部和苏联对外经济联络

部研究解决。

我们支持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

附苏共中央的决定草案。①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副主任 И. 拉林（签字）

1988 年 3 月 16 日

① 参见No11741 文件。

№11741

苏共中央关于向越南、老挝内务部提供无偿援助的决定

（1988年3月28日）

关于向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内务部提供专用、军用和普通民用器材

赞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命令草案（见附件）供签署用

1988年3月28日

表决结果：
阿·卢基扬诺夫赞成
……①

抄送：切布里科夫
卢基扬诺夫
斯米尔秋科夫
连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抄件

① 此处共有9人签名，但字迹不清。

已分发：……[①]

1988 年 3 月 28 日

附　录

绝密

135rc 抄件，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向越南、老挝内务部提供无偿援助的命令草案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 根据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内务部的请求，准许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于 1988 年从现有的库存中用自己的基金根据附件№1 和№2[②]向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内务部提供专用、军用和普通民用器材。

2. 责成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附件№1 向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内务部提供专用器材。

3. 责成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按照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要求根据附件№2 向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内务部提供军用和普通民用器材。

4. 按照本命令向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提供无偿援助所需要的费用，21.6 万卢布从苏联无偿援助外国国

① 此处签名字迹不清。

② 收集的档案中无№1 和№2 附件

家预算中拨款，24.4万卢布（从现有库存中提供）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预算中支付。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尼·雷日科夫

【专题说明】

涅托赴韩国旅行问题

（1971 年 9 月）

苏联功勋运动员、足球明星伊·亚·涅托，1971 年 8 月受聘为伊朗涅合足球队教练。涅托在赴伊朗任教途中，取道韩国、新加坡、香港、泰国，旅行访问。苏联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韩国有着微妙的“三角关系”，苏联体育运动委员会不同意涅托的旅行。只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涅托未能执行苏联体育运动委员会的指示。本专题的 2 份文件反映了这一情况。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赵英杰、李明翻译）

№04561

体委关于涅托前往韩国旅行问题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1年9月13日）

机密

苏共中央

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以通报的方式呈上苏联运动专家，根据合同目前与伊朗混合足球队一起工作的伊·涅托[①] 今年9月份前往南朝鲜、泰国、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的情况调查报告。

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席　Г. 罗古尔斯基

1971年9月13日

附　录

关于伊·涅托同志前往南朝鲜的情况调查报告

根据业已形成的合同，今年8月31日，苏联运动专家伊·涅托作为教练员前往伊朗与伊朗混合足球队一起工作，为期6个月。

① 伊戈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涅托，苏联功勋运动员，在足球赛中多次为苏联赢得欧洲赛冠军、奥林匹克冠军立功。

9月6日下午14点，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收到了一封苏联对外贸易部驻德黑兰的代表发来的电报，询问可否允许涅托与足球队一起前往泰国、南朝鲜、香港和新加坡，并应于1971年9月6日16点以前给予答复。电报收讫并送到有关负责人手中已经是当日的16点30分了。委员会立即将电报的内容通报给苏共中央宣传部（Ф.И. 穆利科夫同志）。

9月7日，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通知驻德黑兰的苏联大使馆，涅托同志前往上述指明的国家是不合适的，而9月9日，苏联对外贸易代表处通报说，涅托已于今年的9月6日与伊朗混合足球队一起飞往了泰国、南朝鲜、香港和新加坡，并说，如果将涅托从旅途中召回，那么伊朗方面将废除合同。9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通知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委员会不同意涅托前往上述指明的国家，涅托必须从旅途中返回。同时，9月9日，委员会还给苏联驻曼谷大使馆发去一封电报，要求涅托从旅途中返回（因为，最后一份通报中说他们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泰国，因此，为了阻止涅托去南朝鲜，就发了这封给苏联驻曼谷大使馆的电报）。9月10日，从平壤发来的电报说，最近1～2天内，伊·涅托与伊朗混合足球队将一起抵达南朝鲜，目前，全体运动员都在香港。并请求采取措施，以阻止苏联公民来到南朝鲜。与此同时，9月10日，驻曼谷的苏联大使馆来电说，球队目前已不在泰国。9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分别给曼谷和新加坡发出了电报。给曼谷的电报中阐述了将涅托从旅途中召回的理由，而给新加坡的电报则请求采取紧急措施让涅托返回伊朗他的工作地点。9月11日，平壤来电称，涅托与伊朗足球队已于今年的9月8日抵达汉城。

委员会经过与苏共中央（奥·鲍·拉赫曼宁同志）和苏联外交部协商，并考虑到涅托与伊朗足球队前往南朝鲜的旅行业已成行，就

于今年9月11日发电报给驻泰国和德黑兰的苏联大使馆，同意伊·涅托与伊朗足球队继续完成新加坡、香港和泰国的旅行。

9月13日，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发来电报，通报了伊朗足球队旅行行程的计划：9月6～12日——南朝鲜，9月13～17日——香港，9月17～21日——新加坡，9月21～24日——泰国。

№04562

斯克利亚罗夫就涅托至韩国旅行问题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1 年 9 月 21 日）

苏共中央

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在情况报告中通报说，根据合同目前正在伊朗工作的苏联足球教练员伊·涅托于今年 9 月 8～12 日到达南朝鲜。上述旅行是经苏联驻伊朗大使馆的许可进行的。

关于苏联运动专家前往南朝鲜事宜已经向苏共中央书记康·费·卡图谢夫同志作了汇报。

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尤·斯克利亚罗夫

1971 年 9 月 21 日

【专题说明】

对索尔仁尼琴的严密监视

（1972 年 6 月至 1974 年 1 月）

本专题选编的 8 份文件，涉及索尔仁尼琴的离婚案、索尔仁尼琴文集的出版，以及作家丘科夫斯卡娅因为索尔仁尼琴辩护而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等情况。这些文件表明，作为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受到国家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其一举一动都被及时上报给苏共中央。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李传勋翻译）

№06189

安德罗波夫就索尔仁尼琴离婚问题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2 年 6 月 21 日）

机密

第 1654－A 号

苏共中央

今年 6 月 20 日，梁赞市十月区人民法院作出关于解除索尔仁尼琴与前妻列舍托夫斯卡娅婚姻的判决。在开庭过程中，索尔仁尼琴在解释离婚原因时声称，他“错误地”与列舍托夫斯卡娅结了婚，最近他实际上与另一个女人（斯韦特洛娃）一起生活。这个女人将要生他的第二个孩子。同时他还说，鉴于离婚这一情况，他把“莫斯科人”汽车、车库、钢琴及四分之一的诺贝尔奖金送给列舍托夫斯卡娅，“尽管她无权分享奖金”——索尔仁尼琴强调了这一点。

列舍托夫斯卡娅指责索尔仁尼琴“忘恩负义”，对她的亲戚态度不好，并谈到在得知索尔仁尼琴对她不忠后曾企图自杀。她肯定地说，索尔仁尼琴“出了名”以后身边出现了献媚者和阿谀奉承者，她认为这些人对索尔仁尼琴离开她也负有责任。

据现在掌握的情况，索尔仁尼琴回到莫斯科后将办理与斯韦特

洛娃的新婚手续以及到她在莫斯科市高尔基大街上的住所居住的登记手续。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①]

① 在本文件上有苏斯洛夫的批语："转告И.Н. 尼切夫同志、Н.И. 萨文金同志。请商议一下。М. 苏斯洛夫。6月22日"

№06191

安德罗波夫关于索尔仁尼琴离婚案的报告

（1972 年 8 月 8 日）

机密

第 2145－A 号

1972 年 7 月 27 日，梁赞州法院民事案件审判委员会根据 H.A. 列舍托夫斯卡娅的上诉状，撤消了十月区法院就索尔仁尼琴关于解除与她的婚姻的诉讼作出的判决。撤消判决的理由是法院未完全查明案情、解除婚姻的真正原因和双方的相互关系。案件仍交给该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从可靠的消息来源获悉，列舍托夫斯卡娅及其律师目前正在准备材料，这些材料将对索尔仁尼琴提出离婚的主要理由——已组成第二个家庭、现有婚外生的儿子并且不久将要生第二个孩子——提出疑问。

据初步了解，人民法院开庭时间可能不早于 9 月下半月。

索尔仁尼琴、列舍托夫斯卡娅及律师的行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监视。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①

① 苏共中央书记 А.П. 基里连科、П.Н. 杰米切夫和 И.В. 卡皮托诺夫签阅了本文件。

№06190

马利沙科夫关于索尔仁尼琴离婚案上诉情况的报告

（1972年9月1日）

第100－1／3号

根据列舍托夫斯卡娅的上诉状，梁赞市十月区法院的判决被梁赞州法院撤销并将解除索尔仁尼琴与她的婚姻案交给法院重新审理。

索尔仁尼琴对州法院的裁决，上诉到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

根据他的请求，他受到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院长列·尼·斯米尔诺夫同志的接见。对梁赞州法院裁决的上诉将由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于9月末至10月审理。

苏联内务部部长H.A.晓洛科夫同志已熟悉和得知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报告的内容。

事件的进一步发展过程由本部进行监督。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副部长　H.马利沙科夫

№06194

安德罗波夫
关于《索尔仁尼琴文集》出版情况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2 年 11 月 27 日）

机密

第 2937－A 号

国家安全委员会现掌握下述材料：苏联作家协会会员 Л.К. 丘科夫斯卡娅及其女儿 Е.Ц. 丘科夫斯卡娅继续积极地支持索尔仁尼琴的反社会活动。

从可靠的消息来源获悉，现在丘科夫斯卡娅母女应索尔仁尼琴的请求正在准备一本登载对长篇小说《八月十四日》[①] 的读者评论的所谓“文集”。按照“文集”编者的想法，打算在其中登载我们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所写的积极评价这部长篇小说艺术优点的一系列文章。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初级科学研究员罗曼诺娃为“文集”撰写的前言揭示出版这本“文集”的另一个目的。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推倒“企图在作家与读者之间建起的那一堵无法穿透的高墙”。现将我们通过可靠途径得到的前言文本附上。[②]

反社会行动的积极参加者若列斯·梅德韦杰夫[③] 正在为“文

①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

② 所收集档案中无些附件。

③ 若列斯·梅德维杰夫，苏联 60～70 年代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集”写一篇文章，他打算在文章中证明，外国作者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批评文章是当局授意写的。评论该小说语言特点的文章委托苏联作家协会会员萨莫伊洛夫（考夫曼）来写，这个人的名字为资产阶级宣传所利用是由于其思想上有害的行为。以反社会观点著称的文学家伊万诺夫正在写“读者”反映的综述，为此目的而利用了索尔仁尼琴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人避开邮局途径收到的信件。

为使“文集”带有表面上的客观性，编者打算在其中登载一些已发表在苏联报刊上的批评材料。“文集”初步拟定用秘密方法传播，其中的文章将用笔名发表。

安全委员会正在采取措施制止“文集”传播并使编者的名声扫地。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06192

安德罗波夫关于索尔仁尼琴打算再婚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2 年 12 月 6 日）

机密

第 3003－A 号

苏共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通报，进一步拖延索尔仁尼琴与 H.A. 列舍托夫斯卡娅离婚诉讼已完全不可能。不久案件将在梁赞市十月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判决将对索尔仁尼琴有利。

根据现有材料，得到法院判决后，索尔仁尼琴打算立即与 H.Д. 斯韦特洛娃登记结婚，办理在莫斯科市的居住手续并同新家庭住在一起。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①

① 苏共中央书记 A.П. 基里连科、П.И. 杰米切夫和 И.B. 卡皮托诺夫签阅了本文件。文件上有如下文字："已向 M.A. 苏斯洛夫同志报告。1973 年 1 月 1 日。"

№06193

安德罗波夫关于索尔仁尼琴为儿子洗礼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2年12月30日）

机密

第3170－A号

苏共中央：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的材料，1972年12月29日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圣母升天复活”教堂（涅日丹诺瓦亚大街）为其第二个儿子伊格纳特举行了洗礼仪式。出席洗礼的除了孩子的母亲斯韦特洛娃以外还有罗斯特罗波维奇、维什涅夫斯卡娅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沙法列维奇。

洗礼仪式结束后在斯韦特洛娃的住宅（高尔基大街）举行了午宴，出席宴会的除了上述人士外，还有与索尔仁尼琴关系密切的几个人——斯托利亚罗娃、乌格里莫夫、乌兰诺夫斯基和司祭列昂尼德。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①

① 苏共中央书记A.П. 基里连科、П.Н. 杰米切夫和И.В. 卡皮托诺夫签阅了本文件。

№06195

安德罗波夫就索尔仁尼琴支持者反社会活动的报告

（1973 年 11 月 14 日）

机密

第 2790－A 号

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苏联作家协会会员 Л.К. 丘科夫斯卡娅继续积极支持索尔仁尼琴的敌对活动，参加在他和萨哈罗夫周围掀起的反苏叫嚣。在这方面她起草并向西方发出一封为他们辩护的信。这封信具有公开的反苏性质，其目的是诋毁那些谴责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某些行动的苏联公民在报刊上发表的意见。特别是她还作了以下声明：

“科学院院士，作家协会会员，首先是那些牵着他们身上绳索的人，对一切都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懂得为什么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都以自己的方式发表意见和发表什么样的意见。院士、作家、雕塑家、作曲家、画家排着整齐的队形在报纸上表态。这就是普通人，劳动者的反应。‘人民自发的愤怒’的爆发是有人安排的，但让它带有火山自行喷发的样子。当然，‘生气和愤慨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对萨哈罗夫院士，对他的行为、建议和想法有丝毫了解。在地铁和无轨电车里人们谈论着某个恶棍‘萨哈列维奇’，也许他根本不是萨哈罗夫，实际上是楚克尔曼……”

“这件事你们是否听到过，又一次人民愤怒的主角？您——善良的立式车床工，您——国营农场的康拜因手，您——奥伦堡托拉斯的电工，这些敢于代表25000万人民讲话的人。你们是不幸的、受骗的人！”

“丘科夫斯卡娅在信中肯定地说，在人民与她认为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代表——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之间矗立着一堵高墙，这堵墙……丝毫也不比柏林墙更矮，其破坏作用也不比柏森墙小。在把一部分城市和人民与另一部分城市和人民分开的柏林墙[①] 前，如果有人试图越墙而过，卫兵就会开枪。每一声枪响都会震动全世界并在每个德国人和非德国人心灵中得到回响。而为了普通人的心灵和争取绕过新闻书刊检查的高墙而与普通人交往的权利的斗争，在我们国家无声地进行着……”

她接着写道：“我要说，苏维埃政权是万恶的政权，它在人民与其精神上的领导者之间建起高墙，它把人民弄到这样一种地步：人民可以举起他们的小手：以前是在那时要求枪毙自己的时候，现在是在要求让他们说话的时候”。

上述信件的内容丘科夫斯卡娅事先已征得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以及文学家科佩列夫、伊万诺夫、巴别内舍娃及从流放地回来的利特维诺夫的同意。

丘科夫斯卡娅的反苏信念早在1926年至1927年即已形成。那时她作为《黑色警钟》杂志的出版者和传播者积极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组织“黑十字架”的活动。当时丘科夫斯卡娅因从事反苏活动被判处3年流放，但在她父亲进行干预后被提前解除处罚。然而丘科

① 柏林墙是指民主德国在苏联的指使下，于1961年9月修筑的，用来分隔东、西柏林的高墙。柏林墙直到1990年初才被拆除。丘科夫斯卡娅是借柏林墙来隐喻苏联党和政府用暴力封锁的手段将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与苏联人民分开，实行思想禁锢。

夫斯卡娅并未改变其观点，只是暂时停止了公开的敌对活动。

30年代丘科夫斯卡娅着手搜集诋毁苏联现实的材料，这些材料后来成为她的两本小册子《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空空荡荡的房子》）和《落到水下》的基础。丘科夫斯卡娅把这两本小册子送到国外，在那里被西方宣传机构发表并用于反对苏联的目的。

近年来丘科夫斯卡娅炮制并交给西方一系列诽谤性材料，其中有所谓的《给肖洛霍夫的信》、《不要死刑，不要思想，但要言论》、《致〈消息报〉编辑部》，在这些材料中表达了对那些因反苏活动而被审判的人的支持。

1961年丘科夫斯卡娅认识了索尔仁尼琴，从那时起一直协助他的反苏活动，极力把站在反社会立场上的人团结起来。

从可靠的消息来源获悉，丘科夫斯卡娅正利用当年拨给K.丘科夫斯基住的位于佩列杰尔金诺镇的苏联作家协会文学基金会的别墅与外国人会面。为保留自己将来使用别墅的权利，丘科夫斯卡娅正在争取把别墅变为他父亲的文学博物馆并期望成为馆长。最近得到材料说，丘科夫斯卡娅建议索尔仁尼琴冬季住在别墅，后者对此已表示同意。

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建议苏联作家协会秘书处拒绝丘科夫斯卡娅在佩列杰尔金诺镇建立博物馆的要求是适宜的。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① 此处有苏斯洛夫的批示："转П.Н.杰米切夫同志和В.Ф.绍罗同志。我支持这一建议。苏斯洛夫。11月15日。"

№06196

别利亚耶夫关于对丘科夫斯卡娅的处理情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4年1月15日）

第330－A/4号

苏联作家协会认为在佩列杰尔金诺镇K.丘科夫斯基的别墅建立博物馆是不可行的。有关此事苏共中央文化部1969年12月11日已报告过苏共中央。

莫斯科作家组织理事会秘书处1974年1月9日决定，鉴于Л.丘科夫斯卡娅粗暴违犯苏联作协章程，将其从苏联作家协会会员中除名。

苏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　A.别利亚耶夫

【专题说明】

关于剥夺罗斯特洛波维奇国籍的问题

（1974 年 3 月至 1978 年 12 月）

这里是关于苏联音乐家维什涅夫斯卡娅和罗斯特洛波维奇赴西欧各国巡回演出，乃至被取消苏联国籍、剥夺苏联公民权、取消苏联国家奖金和列宁奖金获得者称号的一组文件。

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尔多维奇·罗斯特洛波维奇，1927 年生于巴库，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得意弟子，并深受其创作思想的影响。作为苏联著名的大提琴家、钢琴家和指挥家，罗斯特洛波维奇先后获苏联人民演员称号、苏联国家奖金和列宁奖金。加林娜·帕夫洛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是罗斯特洛波维奇的妻子，1926 年生于列宁格勒，苏联女高音歌唱家，苏联人民演员称号和列宁勋章获得者。罗斯特洛波维奇因是索尔仁尼琴的朋友而在国内受到歧视，于 1974 年 5 月，要求出国演出。由苏联文化部经办、苏联外交部同意、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勃列日涅夫批准，罗斯特洛波维奇夫妇赴西欧作巡回演出。此后一再申请延长护照期限。由于他们在国外发表的言论被认为是反苏行为，1978 年 3 月 15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取消罗斯特洛波维奇夫妇苏联国籍的命令。1990 年 1 月 16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撤销了 1978 年 3 月 15 日的命令。

本专题的 20 份文件，全面反映了罗斯特洛波维奇缘何被取消苏

联国籍的全过程，并能从中感悟到苏联当年的文艺方针、苏联文艺界的政治情绪等。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耿葆贞翻译）

№07622

罗斯特洛波维奇
关于出国申请给勃列日涅夫的信

（1974 年 3 月 29 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近几年来，围绕着我们家庭发生了使人难以忍受的情况：陷害我们，卑鄙地限制我们的创作活动，无视我们的艺术。

我们曾多次书面向您请求帮助，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由于看不到能摆脱这一绝望困境的办法，我们请求您指示允许我们携带两个孩子出国两年。

致以诚挚的敬意

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

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洛波维奇

№07623

大剧院演员要求驱逐罗斯特洛波维奇
致勃列日涅夫的信

（1974年4月5日）

尊敬的列昂尼德·伊里奇[①]！

近来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围绕录制罗斯特洛波维奇导演普契尼[②]的歌剧《苦闷》展开的不正常的争执，迫使我们向您提出申诉，坚决抗议罗斯特洛波维奇同大剧院全体人员签订任何合同。姆·罗斯特洛波维奇到剧院后随之而来的勾心斗角，闹宗派、吵架之风，近乎病态的精神过敏的气氛以及对剧院的独唱演员和首席指挥的迫害等事不能重演并无法容忍！

罗斯特洛波维奇的行为使我们得出结论：他的社会道德准则与我们关于苏联人品格的观念是相抵触的。他是与索尔仁尼琴长期交往，并且善于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人们的人。他追求的目标是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在道义上他无权与大剧院的全体人员进行甚至是短暂的交往。

我们知道并了解姆·罗斯特洛波维奇是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但是我们不能仅把他看做一位专业指挥家，他创作上的优点丝毫也不能弥补他对全体人员的有害影响所带来的损失。

---

① 文件上有如下批示："分送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列·勃列日涅夫。1974年4月8日。"

② G. 普契尼，意大利作曲家，主要作品有《蝴蝶夫人》（1903年）、《来自西部的女郎》（1910年）、《杜兰朵公主》（1926年由阿尔凡诺续完）。

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家都感觉到了罗斯特洛波维奇在剧院全体人员中的破坏活动的后果，因此我们认为必须请求您，列昂尼德·伊里奇，使剧院摆脱自私自利、随心所欲耍性子的女人——加·维什涅夫斯卡娅所引起的试验新浪潮。加·维什涅夫斯卡娅不仅常常把自己凌驾于集体之上，而且还敢于发出一个投机性的反苏口头声明，威胁说，在不满足她要求的情况下，将步索尔仁尼琴后尘，带全家一起离开苏联！

她通过类似声明，成功地被批准录制演出《苦闷》的事实使我们感觉到莫明其妙和极度的苦恼。如果加·维什涅夫斯卡娅如此需要录制《苦闷》的话，她可以过一段时间，同剧院的任何一位指挥做这件事。

现在，一个歌剧团的两组人员，一个乐队的不同人员和不同指挥，同时录制同一作品的事实本身已经在全体人员中产生了没有必要的争执，将罗斯特洛波维奇这个不受欢迎的家伙推上舞台使这一切成为主要不是在创作，而是轰动一时的丢人事件。

鉴于以上所述，我们再次声明，尊敬的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坚决抗议罗斯特洛波维奇再一次出现在大剧院的全体人员中。

（签名）阿特兰托夫、阿尔希波娃、米拉什金娜、
皮亚夫科、奥布拉兹佐娃、涅斯捷连科、马祖罗克[①]

① 阿特兰托夫，歌唱家、苏联人民演员；阿尔希波娃，女歌唱家、苏联人民演员；米拉什金娜，女歌唱家、苏联人民演员；皮亚夫科，歌唱家、俄罗斯联邦功勋演员；奥布拉兹佐娃，女歌唱家、苏联人民演员；涅斯捷连科，歌唱家、苏联人民演员；马祖罗克，歌唱家、苏联人民演员。以上签名者均为当时的苏联国家大剧院演员。

№07624

苏联文化部关于同罗斯特洛波维奇谈话情况致苏共中央的信

（1974年5月12日）

№2356C

机密

送上今年5月在苏联文化部与大提琴家姆·列·罗斯特洛波维奇谈话情况。

苏联文化部部长　叶·阿·福尔采娃

附　件

同姆·列·罗斯特洛波维奇的谈话情况

1974年5月5日苏联文化部部长叶·阿·福尔采娃为姆·列·罗斯特洛波维奇请求出国两年事接见了他。

谈话中姆·列·罗斯特罗波维奇说明他想在今年5月末赴英国，以便准备自己的创作。同时他在国外逗留时，他的家人可以在今年7月中旬与他会合。他说明了希望尽快动身的理由（起初他打算在6月中旬动身）以及尽快避免对他出国可能发生的挑衅性的议论。

罗斯特洛波维奇强调，他和加·帕·维什涅夫斯卡娅将声明他们是由苏联文化部派遣出国两年。在这期间他们打算在各国举办音乐会，参加世界各大歌剧院的歌剧演出。其中，罗斯特洛波维奇还打算在邀请他去的美国、澳大利亚和法国上演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黑桃皇后》。

同时，罗斯特洛波维奇声明，他们打算自己独立商定演出的财务合同，处理音乐会的收入，但是罗斯特洛波维奇向部长保证，部分收入汇入苏联国家音乐家联合会的账户上，用来补偿他的出国费用。他说，这样做为的是将他的出国看起来像是长期外出巡回演出，并且证明他是自己国家的诚实公民。举办的全部音乐会和演出歌剧的全部情况将报告给文化部。

罗斯特洛波维奇在国外最初的演出将按照苏联国家音乐家联合会与英国经纪人霍哈乌泽尔之间签订的合同进行。他打算在刚到英国的初期住在他的朋友，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①] 家里。

罗斯特洛波维奇没有考虑在哪一个国家常住。他打算保留莫斯科的住宅和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只带一点必需品和一部小轿车。

同时他强调说："出国应该轻装，为的是给人一个完全像出差的巡回演出人的印象。"他补充说："我带燕尾服、西装、乐器和乐谱"。

今年7月罗斯特洛波维奇的长女将毕业于中央音乐学校，并参加莫斯科国立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为此，她将回到苏联上课。小女儿即将学完音乐学校的9年级，将定期回苏联进行课目质询并参加考试。

谈及自己的计划时，罗斯特洛波维奇强调说，他会远离那些企图把他卷入政治性质的阴谋，"我愿意献身于音乐"，——他说。

① 本杰明·布里顿英国作曲家、歌唱家、社会活动家，曾多次访苏，与罗斯特洛波维奇交厚。

他不打算会晤索尔仁尼琴，但是不能排除后者可能试图表示会晤的主动性。

罗斯特洛波维奇请求苏联文化部在他和他的家人获得出国护照和去英国的签证方面给予协助。

已经告诉他，文化部将给予适当的协助，同时向英国大使馆说明他出国是按法定程序，系出国巡回演出。他同意这一点。

必须指出，罗斯特洛波维奇在谈话时举止彬彬有礼，但是可以觉察出他表现出非常焦急和明显的不安。他不止一次谈到他出国期限约为两年，不会再长的问题，再三说，他不让那些对他很好的人们为难。他重复说，他当然有抱怨，但是他抱怨某些人，而不是人民和国家。他怀着极大的伤感说："我应该摆脱一切焦急和不安，平静下来，但是，人们从侧面看我，会了解我是一个诚实的公民和当之无愧的音乐家。"

突出的是，他同时不止一次地强调，他希望苏联的艺术在国外要比过去更加受到称赞。谈到他自己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工作的情况时，他说，过去、将来，他永远是该学院的教授，在国外无论是在什么地方作为一名爱国者，"他不会从事教学活动。"

参加谈话的有苏联文化部副部长波波夫和对外联络司司长A.M.久热夫。

A.久热夫[①]

① 随信附有一张公文纸，上面批示："请向苏共中央书记们介绍情况。"并附有手写批注："同时向绍罗同志介绍。"在这张纸上还写有批注："为什么两年？对所有的人是什么规定？为什么这样宽容？1974年2月20日。费·库拉科夫。"并有伊·瓦·卡皮托诺夫、康·费·卡图谢夫、彼·尼·杰米契夫、米·安·苏斯洛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和瓦·菲·绍罗等人的签名。文件上有一行注释："关于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的决定库拉科夫同志已知悉。阿韦季相，1974年2月24日。"

№07625

阿勃拉西莫夫关于准许罗斯特洛波维奇及其家人出国演出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4 年 5 月 20 日）

№180A /250

机密

苏联文化部（福尔采娃同志）提出准许苏联人民演员姆·列·罗斯特洛波维奇和加·帕·维什涅夫斯卡娅携同两个女儿（18 岁和 16 岁）赴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巡回演出的申请（附信件副本）。

我们认为在目前形势下，作为例外，可以准许姆·列·罗斯特洛波维奇同其家人出国，期限为 6 个月，而不是福尔采娃同志建议的两年，并建议罗斯特洛波维奇应向苏联文化部报告关于自己在国外巡回演出的情况。

请予以同意。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国外干部工作和出境部部长　彼·阿勃拉西莫夫①

① 文件上有批示：同意。并有彼·杰米契夫、米·安·苏斯洛夫、费·伊·多尔吉赫、德·费·乌斯季诺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安·帕·基里连科等人签名。

附　件

机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干部工作和出境部

苏联文化部请求批准下列人员到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为期两年：

罗斯特洛波维奇，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尔多维奇——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苏联人民演员、大提琴家。

维什涅夫斯卡娅，加林娜·帕夫洛夫娜——苏联莫斯科大剧院歌剧独唱演员、苏联人民演员

携女儿——奥莉加（1956年生）和叶林娜（1958年生）。应音乐会经纪人霍哈乌泽尔的安排在英国演出并参加随后的一些音乐会演出以及国外一些剧院的歌剧演出。

姆·罗斯特洛波维奇拟今年5月末启程。

加·维什涅夫斯卡娅携女儿拟于1974年7月下半月启程。

附件：材料——相片[①]

苏联文化部部长　叶·阿·福尔采娃

① 所收集档案中无此附件。

№07626

安德罗波夫关于罗斯特洛波维奇启程时的情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4 年 5 月 31 日）

№1419－A

机密

今年 5 月 26 日，姆·列·罗斯特洛波维奇由莫斯科飞往伦敦，大约有 35～40 人为他送行，其中有：他的妻子维什涅夫斯卡娅，女儿，姐姐，德·德·肖斯塔科维奇的妻子——И.А. 苏宾斯卡娅，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一些学生和教师以及苏联国家大剧院的个别音乐家和演员。

卢森堡特命全权大使安德里耶·马伊什先生和大不列颠大使馆全权首席参赞约瑟夫·多布斯先生也到机场为罗斯特洛波维奇送行。

海关检查时，在罗斯特洛波维奇的皮箱内发现有用打字机打的所谓为索尔仁尼琴辩护的《公开信》副本，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署名的关于将他开除出音乐（爱好者）协会原因的声明，大量国际音乐比赛的奖章。就奖章之事他说，他要把“自己的名声”带到英国去。

罗斯特洛波维奇平静地接受了对他的物品检查，但是，他对海关人员表示：“你们寻找手稿是徒劳的，我这儿没有，转寄倒是有可能的。”这时在场的维什涅夫斯卡娅知道了只能按批准的标准将贵重物品带出国时，直言不讳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要英国大使

馆帮忙”。告别时罗斯特洛波维奇也请她这样做。

起飞前，罗斯特洛波维奇同多布斯和马伊什吻别，并感谢他们“莅临”。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①]

① 文件第一页上有米·安·苏斯洛夫、安·帕·基里连科、彼·尼·杰米契夫、鲍·尼·波诺马廖夫和德·费·乌斯季诺夫的签名。

№07627

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关于罗斯特洛波维奇在国外行为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4 年 11 月 16 日）

№3253－A

绝密

关于姆·罗斯特洛波维奇在国外的不良行为

近来在西方由于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在 1974 年 10 月向外国报界代表发表的声明掀起了一股反苏浪潮。

根据 BBC 和其他某些电台的报道，罗斯特洛波维奇在接受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晚邮报》采访时称索尔仁尼琴是“襟怀坦白的爱国者”，说“他在写他知道的和感觉到的”；“他做的就像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处在自己位置上所做的一样。”在回答关于他同索尔仁尼琴的会晤问题时他说：“我和我妻子都尊敬他，他也尊重我们，要知道，老朋友迟早要见面的。”

罗斯特洛波维奇向法国反动报纸《震旦报》的记者和西德《明星》画刊的记者声明：“如果我们艺术家获得充分自由的话，我们应该有可能演出我们愿意演的东西，我们愿意在何时何地演出就能演出，愿意同谁合作就同谁合作，这时我们就回苏联”。这些话证明他不打算执行他在去西方时的协议，而且他有诋毁苏联的行为。

据所获得的行动资料，罗斯特洛波维奇与美国和欧洲的经纪人签订了金额很大的大量演出合同，一直到1978年。目前他正和家人一起在一些国家做耗费昂贵的旅行，他把自己的两个女儿送进瑞士一所贵族寄宿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她们在接触“上流社会”和娱乐的同时，在研究天主教会的公理和特征。

罗斯特洛波维奇同他的妻子维什涅夫斯卡娅目前在伦敦。据现有的行动资料，他们住在属于英国经纪人霍哈乌泽尔办事处的一所住宅内。这位英国经纪人参与唆使苏联文化界个别代表人物侨居国外的挑拨性活动，因此他的苏联入境签证被拒签。

考虑到罗斯特洛波维奇在国外的不体面的行为，我们认为请他到苏联驻伦敦大使馆来，同他进行一次适当的谈话，向他提出停止发表在政治道德上有损苏联国家利益的声明。同时建议他正式抗议利用他的名声进行反苏的目的。

请予以同意。

安·葛罗米柯

尤·安德罗波夫[①]

① 在报告的第一页上有批示：“传阅。同意。米·苏斯洛夫。18/11－74”和阿·尼·柯西金、尼·维·波德戈尔内、阿·雅·佩尔谢，安·帕·基里连科、维·瓦·格里申、安·安·格列奇科、亚·尼·谢列平、德·斯·波利扬斯基、基·特·马祖罗夫等的签名。在最后一页——注明同意的批示已通知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外交部。

№07628

波波夫关于延长罗斯特洛波维奇护照有效期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4 年 12 月 16 日）

№2705C

机密

据苏联外交部通知，姆·列·罗斯特洛波维奇和加·帕·维什涅夫斯卡娅向苏联驻法大使馆提出申请，要求延长他们的苏联护照有效期两年。

苏联驻伯尔尼大使馆也通知说，罗斯特洛波维奇请求延长他女儿们的护照有效期至 1975 年 5 月 24 日。在这之前，她们将住在洛桑，在那里的一所寄宿学校学习。

苏联文化部注意到拒绝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的请求在当前可能会引起不良反应，因此认为延长他们的护照有效期两年，他们女儿们的护照有效期至 1975 年 5 月 24 日是可行的。

委托驻巴黎的苏联大使馆在通知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他们的申请已得到同意的同时，着重指出，由于他们长期在国外，必须记住自己是苏联公民，是苏联演员，不应该纵容自己做败坏这些崇高称号的事是合适的。特别要使罗斯特洛波维奇注意对报界发表各种声明必须持谨慎态度。要告诉他，最近他在某些西方机关刊物上发表的一些声明使苏联舆论界极端困惑，使祖国受到一定损失的这种声明可能首先会对他本人产生不良后果。

附上对苏联驻巴黎大使馆指示草稿。

苏联文化部副部长　B.И. 波波夫[①]

附　件

巴黎，苏联大使馆

伯尔尼，苏联大使馆（作为通报）

请你们邀请姆·列·罗斯特洛波维奇和加·帕·维什涅夫斯卡娅到大使馆并通知他们，苏联有关机构已同意延长他们的护照有效期两年，延长他们女儿们的护照有效期至1975年5月24日。同时，你们要强调，由于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长期在国外，必须记住他们是苏联公民，是我们国家赋予最高称号和奖赏的苏联演员。为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的行动要符合这种地位，决不允许有损害苏联公民和苏联演员这一崇高称号的行为。特别要使罗斯特洛波维奇注意的是，对报界发表各种声明必须持谨慎态度。要告诉他，最近他在某些西方机关刊物上发表的一些声明使苏联舆论界极端困惑，并告诉他，使祖国受到一定损失的这种声明可能首先会对他本人产生不良后果。

请按法定程序给罗斯特洛波维奇、维什涅夫斯卡娅及其女儿们办理苏联护照有效期的指定延长期限。他们女儿们的护照有效期可以在伯尔尼申请办理延长。

请通报与罗斯特洛波维奇谈话的情况。

① 报告第一页上批示："不传阅。康·契尔年科"。

№07629

绍罗和阿勃拉西莫夫关于延长罗斯特洛波维奇护照有效期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4 年 12 月 31 日）

机密

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1974 年 5 月 24 日第 19349 号）已准许演员罗斯特洛波维奇携同家人出国期限为 6 个月。现在罗斯特洛波维奇和他的妻子维什涅夫斯卡娅请再延长护照两年。考虑到拒绝满足这一请求可能引起对我们不利的反应，苏联文化部（波波夫同志）认为延长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的护照有效期两年是可行的。苏联文化部同时建议委托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同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进行一次与他们在国外的行为有关的谈话。

由于考虑到最近罗斯特洛波维奇在西方报刊和电视上发表的一系列严重歪曲苏联实际情况的声明，根据一切情况看来，不能排除今后他会发表敌视苏联的攻击性言论。我们认为委托苏联驻巴黎大使馆根据现有的指示（1974 年 11 月 20 日苏共中央同意）与罗斯特洛波维奇进行一次谈话是合适的。如果使馆根据这次谈话结果得出认可的结论，那末，延长罗斯特洛波维奇及其家人的出国护照有效期不是如苏联文化部建议的两年，而是 6 个月。期满后视他们的行为而定，可以决定今后保留他们的苏联护照可能性的问题。

上述意见已征得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意。

请予以同意。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化部部长　瓦·绍罗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干部工作和出境部部长

彼·阿勃拉西莫夫①

① 报告附有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写给苏联驻法大使斯·瓦·契尔沃年科的申请书副本："我们请求您准许延长我们的护照两年。1974年10月18日"。报告于1975年1月6日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同意。1975年1月15日苏共中央通知彼·安·阿勃拉西莫夫和瓦·菲·绍罗，同意延长。

№07630

安德罗波夫关于罗斯特洛波维奇在国外行为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5 年 5 月 8 日）

№1134－A

机密

关于大提琴家姆·列·罗斯特洛波维奇在国外的不良行为

作为 1974 年 11 月 16 日№3253－A 的补充，我们报告，罗斯特洛波维奇在国外不断发表关于国内知识分子状况的带有偏见的诽谤性声明，这些声明被敌对分子用来积极进行反苏宣传。

例如，国外报界广泛吹嘘罗斯特洛波维奇与叛国分子巴里什尼科夫[①] 的谈话，刊登在巴黎《世界报》上的所谓《罗斯特洛波维奇声明》被西方许多国家转载。

在声明中，罗斯特洛波维奇声称似乎是下列原因迫使他离开苏联：

——“在苏联的环境中不可能自由工作，因为当局干涉你的创作活动，因为真正有天才的人如果不听话，就被消灭掉，代替他的是一个盲目服从领导，执行常常是官方制定的狭隘而又愚蠢路线的庸才；”

① M.H. 巴里什尼科夫，1948 年生，苏联芭蕾演员、编导。1974 年移居美国，1982 年开始担任美国芭蕾舞团艺术指导。

——“不愿意扮演拿演员做交易的国家机构‘音乐家协会’手中的傀儡角色。”

1975年2月罗斯特洛波维奇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寄给住在莫斯科的一位女相识一部大钢琴作为礼物，并打算如果接收这件礼物碰上麻烦的话，他就找西方的法学界人士公布这一事实。

苏联外交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报告了罗斯特洛波维奇在国外的错误行为，并得到同意和他进行一次警告性的谈话。

今年3月6日在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内谈话时，罗斯特洛波维奇态度虚伪，蛊惑人心，否认自己错误行为的事实。同他一道来使馆的妻子维什涅夫斯卡娅当时完全支持她丈夫的立场并发表了挑衅性的意见。罗斯特洛波维奇说：“我从来也没有同意在原先的条件下在苏联工作。在未得到苏联文化部的建议之前，我将继续在西方工作，而且我不仅作为大提琴家，也作为指挥家和导演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罗斯特洛波维奇的计谋在于他不停地发表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状况的带有偏见的诽谤性声明，在拜访苏联驻瑞士，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时，他蛊惑人心地断言，他不搞政治，而仅仅是批评文化部工作中的缺点而已。与此同时，他声明，如果在苏联能提供符合他业务水平和音乐演奏技巧的工作，他准备减少同一些西方国家演出团体的合同；他吹嘘自己的天才和演奏才能。

罗斯特洛波维奇与不同的经纪人签订新的合同，而在1975年4月他同意从1977年10月起担任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和艺术指导。

1975年3月外国电台《美国之音》、《自由》和侨民报《新俄罗斯之声》援用记者与罗斯特洛波维奇的谈话时，他们再次肯定他

不愿意回祖国。

在专门为向苏联转播而接见记者的谈话中，罗斯特洛波维奇声明：

“……我要告诉我的朋友、我的同胞，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这里，在国外，我获得了最大的机会表现我作为一个音乐家，一个指挥家的才能，我运用上帝赋予我的一切，我的人民赋予我的一切，以便最大限度地做贡献，而我的人民也为自己的音乐家而自豪”。在接受记者访问时，罗斯特洛波维奇表示了他和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在苏联巡回演出的想法。

1975 年 4 月 18 日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获得所谓“国际人权同盟”奖，因为他们是“拿自己演出自由做抵押的争取人权的优秀战士”。在指挥家伦·伯恩斯坦[①] 的住宅里举行的授奖仪式上，出席的人中有几个在西方从事反苏活动的前苏联公民；反动的侨民报《新俄罗斯之声》的编辑；《自由》和《美国之音》广播电台的代表；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约斯特和“欧洲音乐会”演出公司副董事长佩佩尔。

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对获奖表示感谢并说要为争取“看见一切的权利”，为争取“我们的自由和公民权利”，为争取“可以按个人意愿，而不是按别人的指使生活”而斗争的必要性。

在同《美国之音》的代表谈话时（该谈话不供发表），罗斯特洛波维奇评价《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的作用说：“先生们，你们在干一件大事，它对俄国听众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的广播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请继续你们的工作，别忘了那边的人们。”在回答他在苏联是否听这些电台的广播的问题时，他热情地说：“当然，是的。”

① 伦·伯恩斯坦，美国作曲家和指挥家。

1975年4月20日，属于具有反苏情绪之列的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在美国签署了一封《信》，以支持反动的“列·尼·托尔斯泰基金委员会”（“托尔斯泰基金会”），该基金委员会是在美国特工机关的积极参与下成立并进行活动的机构。

罗斯特洛波维奇的行为是公然无视苏联舆论界在不同时间给他发出的警告，并对舆论进行明显挑衅。他的行为开创了一个从事在政治上损害自己国家利益的劣行而不受制裁的先例。

鉴于上面所述并考虑到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在国外逗留的日期到1975年5月期满，依我们的意见，必须再次邀请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到苏联驻外大使馆（按他们的所在地）向他们宣布他们必须回国，否则将考虑取消他们的苏联国籍问题。

请予以同意。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①]

① 文件上有批示：“同意。苏斯洛夫。”并有安·帕·基里连科、尼·维·波德戈尔内、安·安·葛罗米柯的签名。在最后一页上注明同意的批示通知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07631

安德罗波夫等关于对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的措施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6 年 11 月）

№2507－A

最近陆续收到关于姆·列·罗斯特洛波维奇和加·帕·维什涅夫斯卡娅在国外反苏活动的材料：他们不断地发表诋毁苏联实际情况的谰言，他们的举动有损于苏联公民的称号。

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示威性地（大肆）宣扬自己同被社会抛弃的各种各样的人、背叛祖国的人、侨民、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反动分子的接触。在这方面特别突出的是：西方大登广告广泛宣传罗斯特洛波维奇于 1975 年 9 月在旧金山举办的慈善音乐会，该音乐会的收入捐献给所谓“俄国境外的俄罗斯残疾人”，即以前的保皇党和白匪军。出席这一反苏分子聚会的有前沙皇“贵族”的代表和反动的宗教界代表，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同他们来往密切。

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在 1975 年至 1976 年间经常不断地公开支持诸如“托尔斯泰基金会”等国外反苏机构。他们对记者发表过几次谈话，在谈话中评述了他们与索尔仁尼琴和“其他俄国演员，持不同政见作家”的关系，强调由于共同的观点，他们与这些人的友谊“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

罗斯特洛波维奇声明拥护国外的支持萨哈罗夫的一些敌对意图和危害社会分子的反苏活动，并公开坚持这样的意见："西方舆论界"的类似活动值得称赞。

在另一场合，罗斯特洛波维奇肯定地说，他完全赞同犹太复国主义集团的要求，这些集团正在煽动犹太人离开苏联。此外，罗斯特洛波维奇1975年在以色列作示威性旅行时公开称赞以色列领导人的扩张主义活动。

其他许多事实证明：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对苏联现状和国内外政策的敌对攻击，就其实质来讲越发肆无忌惮和尖刻化。其中1976年10月13日他们在英国电视上的讲话，再次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

近来，罗斯特洛波维奇正在努力说服个别著名的、有潜力的苏联音乐文化界活动家离开苏联侨居国外。他向歌唱家奥格尼夫采夫、钢琴伴奏家杰久欣和青年钢琴家维阿尔多建议创造一些条件在国外长期从事"独立"音乐会演出活动。

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在国外的行为证明他们同祖国完全断绝了思想上和其他方面的联系，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多次公开表示关于可能不回苏联的声明，最近由于他们充分具体的行动而加强了：签订打算在国外居留多年的合同；渴望在国外买到不动产（房子）；他们的贵重物品在外国人的帮助下运出苏联；委托亲戚抛售个人物品。

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的反社会活动受到创作知识界的谴责。

与此同时，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一方面仍然是苏联公民，另一方面则逍遥法外地诋毁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制度，这就把苏联社会人士引入歧途，而创作知识界中个别政治上不成熟的

人——巴尔沙伊[①]、斯韦特拉诺夫[②]、孔德拉申[③] 和其他的人——企图在他们俩人的行为中寻找可供效仿的先例。

综上所述，现在适当的做法是邀请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到苏联驻外某一使馆（视他们的所在地而定），对他们不成体统的行为提出批评并宣布，他们必须在2～3个月内结束自己在国外的事情返回苏联，否则，将取消他们的苏联国籍。

安德罗波夫

葛罗米柯

杰米契夫

齐米亚宁[④]

① 巴尔沙伊，苏联演奏家、指挥家，1977年移居国外。

② 斯韦特拉诺夫，苏联指挥家、作曲家、歌唱家，1968年获苏联人民演员称号。

③ 孔德拉申，苏联指挥家，1972年获苏联人民演员称号。

④ 文件上有批示："政治局。同意。苏斯洛夫"并有安·帕·基里连科、尼·维·波德戈尔内、费·达·库拉科夫、阿·尼·柯西金、基·特·马祖罗夫、阿·雅·佩尔谢、维·瓦·格里申、德·费·乌斯季诺夫的签名。在最后一页上注明，将同意批示并通知彼·尼·杰米契夫、米·瓦·齐米亚宁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外交部。

№07632

苏驻美大使馆关于罗斯特洛波维奇信件致苏共中央的电报

（1977年3月22日）

专电№797发自华盛顿

第2份

机密

姆·列·罗斯特洛波维奇来到使馆领事处请求转交列·伊·勃列日涅夫一封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由于在国外演出业务繁忙（给我们签订的合同至1981年）请求您指示将我们全家的国外护照延长3年。我们的护照有效期到1977年5月25日止。

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

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洛波维奇”

我们认为像上次一样，再延长护照一年是合适的，这指的是延期，将对遏制罗斯特洛波维奇在国外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阿·多勃雷宁

№07633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华盛顿来电的决议

（1977 年 3 月 24 日）

№50 /67

同意阿·费·多勃雷宁同志在该电报中阐述的建议。

批准对苏联驻华盛顿大使有关这个问题的批示。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　件

华盛顿苏联大使

你们可以将维什涅夫斯卡娅和罗斯特洛波维奇的出国护照延长一年。

№07634

苏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禁止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
在苏联巡回演出的决议

（1977年10月19日）

绝密

特别卷宗

№78－57

1. 同意1977年10月1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报告（№2237－A）中阐述的意见（附件）。

2. 委托苏联文化部采取措施排除姆·罗斯特洛波维奇指挥的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在苏联巡回演出和苏联演员与上述乐团在国外演出的可能性。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　件

№2237－A
绝密
特别卷宗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禁止姆·罗斯特洛波维奇指挥的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在苏联巡回演出和禁止苏联演员与上述乐团在国外的演出

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断收到关于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在国外继续进行使国家受到损害的错误活动的资料。

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公开谈话的特点始终是不停地赞扬西方生活方式，断言“在苏联无法表现自己的艺术”。这一点在有敌对倾向的《大陆》月刊第11期（1977年）刊登的维什涅夫斯卡娅同记者详细的谈话中找到最明确的证据。维什涅夫斯卡娅在同记者谈话时说：“祝愿”苏联作曲家、艺术家和作家“找到充分发表意见的创作自由”。罗斯特洛波维奇在今年4月访问了他本人同主编有着密切关系的反苏报纸《新俄罗斯之声》报编辑部时的谈话也证实了这一点。罗斯特洛波维奇在对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的讲话中百般称赞该报“为人类自由和尊严奋斗”的意义。

从1977年起，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多次会晤某些叛国分子，而罗斯特洛波维奇举办慈善音乐会支持各类反动集团和分子进行反苏的破坏活动。

分析证明，罗斯特洛波维奇利用这些活动把自己打扮成由于原则性意见而离开苏联的一位“伟大的”音乐家。罗斯特洛波维奇的任何一次类似举动都受到了敌对大众传播媒体的称赞，并围绕着这些举动激发起反苏狂热。

为保持自己的“威望”，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将自己在巴黎的住所提供给个别到国外巡回演出的苏联演员使用，企图对他们施加反面影响并给予各种小恩小惠。

现在有情报说，尽管罗斯特洛波维奇行为不端，他打算作为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的领导人和首席指挥到苏联巡回演出。

还在1976年，罗斯特洛波维奇秘密告诉他在莫斯科的亲戚：“我和乐队订了合同在1978～1979年演出季节结束时在欧洲作5个星期的巡回演出。为什么不能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呢？我在争取，但是这非常秘密。”以前，在谈到类似的愿望时，罗斯特洛波维奇口是心非地声明“对俄罗斯的思念”吸引着他，最近他的意图明显地证明了当前的做法是他早就策划好的挑衅行为。

其中，1977年7月对西德《时代》周刊的记者谈话时说，在即将到来的演出季节里他将担任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并声明：“我愿意和我的乐团在俄国演出，准确地说，就像我在伦敦、巴黎、罗马、慕尼黑和斯德哥尔摩演出一样。在这种场合，苏联政府可以表明它现在如何对待艺术自由。如果我的政府说‘不行’，那末，不仅仅是我和我的乐团会询问拒绝的原因，而且全世界都会想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不行’。”

罗斯特洛波维奇上述企图的挑衅性质可以从下面事实看出：他在同记者谈话时宣布自己希望今后继续在西方工作后说，“我的国家将实现艺术充分自由时，我才回去。”

罗斯特洛波维奇的类似行为和主张再一次说明了他多次许诺在国外不在报刊上发表不体面声明以及回避可能将他的名声用于反苏

目的的虚情假意。

综上所述，委托苏联文化部采取措施排除罗斯特洛波维奇指挥的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在我国举办巡回演出和苏联演员在国外与上述乐团共同演出的可能性是适宜的。

请予以研究。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尤·安德罗波夫

1977 年 10 月 13 日

№07635

维什涅夫斯卡娅和罗斯特洛波维奇要求延长护照期限致勃列日涅夫的信

（1978年2月1日）

加林娜·帕夫洛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和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尔多维奇·罗斯特洛波维奇写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信的副本：交给苏联文化部部长彼得·尼洛维奇·杰米契夫。

尊敬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由于在国外演出业务繁忙（给我们签订的合同至1982年），我们请求您指示将我们全家的出国护照延长3年。

我们护照的有效期至1978年3月25日。

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

姆·罗斯特洛波维奇①

① 信件上附有一便条，“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将申请书转送外交部。按照格·马·科尔尼延科的指示于1978年3月1日送苏共中央。”科尔尼延科，曾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07636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取消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苏联国籍的决议

（1978 年 3 月 14 日）

绝密

№79 / 54

同意 1978 年 3 月 10 日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齐米亚宁等同志报告中提供的关于该问题的意见。

赞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该问题的命令草案（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　件

№459 – A

机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取消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的苏联国籍

对收到的材料分析，证实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自 1974 年起在国外的整个时期从事反社会活动，诋毁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制度并进行有损于苏联公民称号的其他活动。

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用自己挑衅性的行为和诬蔑性的声明为西方反苏的诽谤活动提供材料，其中包括用一些夸张不实的关于我国“人权”和“创作自由”的问题恶毒地攻击苏联。在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浪潮中，罗斯特洛波维奇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对以色列及其执政者给予“深深地关切”。

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经常大肆宣扬自己对反苏联的颠覆中心的诚意，其意图鲜明。特别是他们写信支持以从事积极反苏活动而出名的“托尔斯泰基金会”。目前在华盛顿的侨民人士中都在议论关于不久前罗斯特洛波维奇转交给反社会主义的杂志《大陆》月刊基金会3.5万美元一事。在1976～1977年间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多次举办慈善音乐会资助白俄侨民。他们同“沙皇家族最后一位代表”罗曼诺夫的见面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

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与反苏分子索尔仁尼琴、马克西莫夫[①]、戈列泽尔[②]、谢缅金[③]，叛国分子巴雷什尼科夫、鲁季和其他敌对分子保持着密切关系。他们二人对其中许多人给予物质援助。

这样，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试图唆使创作知识界中的一些个别代表离开苏联到国外。因此，罗斯特洛波维奇积极支持西方创办的受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组织庇护的所谓“支援苏联音乐家出国国际中心”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注意。

这样，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形式上仍是我国公民并蛊惑性地夸夸其谈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同时却坚持走思想腐化、

① 马克西莫夫，苏联作家，曾任《大陆》杂志主编，1974年离开苏联。1975年被剥夺苏联国籍。

② 戈列泽尔，工程师，“友谊”俱乐部社会部主任，现代派美术展览组织者之一。

③ 谢缅金，艺术家，1971年离开苏联。

政治投机和旨在反对苏联的危害社会活动的道路。

鉴于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在国外的不良行为，苏联驻美国、澳大利亚和法国的大使馆同他们谈过话，可是他们自己没有作出应有的结论。

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曾多次请求延长他们在国外的期限，并且每一次申请都得到了满足。

他们在国外整整四年的活动说明了他们今后似乎只是指望我们在延长护照有效期方面的无止境的让步。同时，正如在他的声明中所见到的，他们不打算返回苏联。

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的这种行为给其他政治上不成熟的创作知识分子代表开创了先例。

已经有一些音乐家、指挥家、文学家、艺术家和运动员仿效他们的例子提出申请长期去国外。

根据上述情况，取消姆·列·罗斯特洛波维奇和加·帕·维什涅夫斯卡娅的国籍，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中公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并在《消息报》上刊登关于这个问题的简短消息是适宜的。[①]

安德罗波夫

葛罗米柯

齐米亚宁

1978 年 3 月 10 日

① 以《思想上的蜕化变质分子》为题的短文刊登于 1978 年 3 月 15 日的《消息报》上。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取消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苏联国籍的决定（草案）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考虑到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的行为一贯有损苏联威望并与苏联国籍不相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议：

根据1938年8月19日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籍》法第7条由于有损于苏联公民称号的行为，取消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尔多维奇·罗斯特洛波维奇（1927年生，巴库市人）和加林娜·帕夫洛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1926年生，列宁格勒市人）的国籍。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列·勃列日涅夫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　米·格奥尔加泽

№07637

维什涅夫斯卡娅和罗斯特洛波维奇关于被取消国籍致勃列日涅夫的信

（1978 年 3 月 17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公民[①]！

以您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取消了我们的苏联国籍。准确些，是您剥夺了我们在自己土地上生与死的可能。我们，诞生在这块土地上，把劳动和才能贡献给自己人民的我们，将几乎自己的大半生颇有成就地给了这块土地。我们对艺术的贡献得到了苏联政府的评价，苏联政府授予我们苏联最高奖赏：授予大剧院独唱演员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苏联人民演员称号和列宁勋章，授予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洛波维奇斯大林奖金、列宁奖金、苏联人民演员称号和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级别。

我们是音乐家。我们是以音乐进行思维和生活的。我们的处世方式，我们的观点，我们的待人接物完全出于我们的职业。最高苏维埃对我们提出的责难是纯粹捏造。无论是在自己祖国，还是在国外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反苏组织。您并不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少些！我们惟一的“过错”就是曾提供我们的家给作家亚·索尔仁尼

① 该信件是在 1978 年 3 月 28 日由苏联驻法大使斯·瓦·契尔沃年科送交苏共中央的。大使在附信中说：“我们给您送上取消了苏联国籍的罗斯特洛波维奇夫妇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的信。该信注明日期是 3 月 17 日，是由陌生人转交给大使馆收发室的。”

琴栖身。因为这件事，经您批准，使我们无法忍受的各种各样的迫害倾注到了我们身上：取消音乐会，禁止出国巡回演出，电台、电视台、报刊抵制我们，企图使我们的音乐活动处于瘫痪状态。还在俄国时，罗斯特洛波维奇曾找过您三次：一次是写信，两次是发电报请求您的帮助，但是，还是您，无论是您部下的任何人甚至都没有对这发自内心的呼吁作出过反应。

这样一来，您迫使我们请求长期去国外，并且作为苏联文化部的出差办理的出国手续。但是看来，您不满足我们在祖国流泪，您还要在这里打击我们。

现在有人以您的“争取和平和人权战士”的名义，根据捏造指责材料，在精神上朝我们背后开枪，剥夺我们回祖国的权利，苏联政府可以嘲弄现在住在俄国的许多作家：弗拉季莫夫[①]、沃伊诺维奇[②]、季诺维也夫[③]，而您大概在想已经把我们扔进垃圾场了，这垃圾场曾经扔进过拉赫马尼诺夫、夏里亚宾、斯特拉文斯基、康定斯基、舍米亚金、涅伊兹韦斯内、布宁、索尔仁尼琴、马克西莫夫、涅克拉索夫。[④] 您有权迫使我们改变居住地，但是您无法改变

① 弗拉季莫夫，原姓沃洛谢维奇，苏联作家，1983年离开苏联出国，同年被剥夺苏联公民权。

② 沃伊诺维奇，苏联作家。1974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80年离开苏联出国，1981年被剥夺苏联公民权。

③ 季诺维也夫，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编辑，1978年离开苏联出国，同年被剥夺苏联公民权。

④ 拉赫马尼诺夫，俄国作曲家、指挥家，1917年十月革命后离开苏俄。夏里亚宾，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1918年获共和国人民歌唱家称号，1922年离开苏联。斯特拉文斯基，俄罗斯作曲家、指挥家，1910年起侨居国外，1939年移居美国。康定斯基，俄罗斯画家，俄国抽象派艺术和奠基人之一。1921年离开苏俄，侨居法国。涅伊兹韦斯内，1925年出生，苏联雕塑家、线条画家，1976年离开苏联出国。布宁，苏俄作家，1920年离开苏俄出国，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涅克拉索夫，苏联作家，1974年离开苏联出国，1979年被剥夺苏联公民权。

我们的心，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将继续以俄国人民自豪并热情地为他们贡献我们的艺术。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从事政治活动，并且也不打算从事政治活动，因为本能地对这类活动没有好感。但是作为职业的和有天赋的演员，我们过去不可能，现在仍不能对自己艺术同行的命运漠不关心。正由于这一点我们做了所有人道的和公民的行为。

在对我们提出具体的指责和提供对这些指责的合法辩护之前，我们不承认您有权采取压制我们的行动。

我们要求：不论在苏联的任何地方和时间审判我们时，要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诉讼过程公开。

我们希望，您将对我们的第四请求做出反应，否则您的双颊可能会出现羞愧之色了。

加·维什涅夫斯卡娅

姆·罗斯特洛波维奇

1978 年 3 月 17 日于巴黎

№07638

苏驻法大使馆关于同罗斯特洛波维奇谈话给苏共中央的通报

（1978年3月28日）

机密，第1份

№286

由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今年3月15日取消姆·列·罗斯特洛波维奇和加·帕·维什涅夫斯卡娅苏联公民权的命令，为履行中央关于没收他们的苏联护照的指示，大使馆于今年3月17、18、19日采取必要措施以便同他们接触并邀请他们来领事处。

但是，同他们电话联系看来已不可能。当注意到他们最近要去英国时，按照领导指示，我们于今年3月20日到巴黎马尔泽尔布林荫大道135号住所拜访了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我们向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传达了邀请他们到大使馆领事处之事。

在他们断然拒绝去领事处之后，我们通知他们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取消他们苏联国籍的命令。因此请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交回已经失效和公认不起作用的苏联护照。

罗斯特洛波维奇答复时声明，他不承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取消他和他妻子苏联国籍的命令，如往日一样，他认为自己是苏联公民并因此不交回苏联护照。罗斯特洛波维奇强调命令中所谈及他对苏维埃国家所犯的过失事实以及措词本身“……由于有损苏联公

民称号的行为”是含糊的，不真实和虚构的。甚至，按他的话说，这是“强盗式的”，表明对人的专横和无礼态度，而这种态度似乎在苏联占统治地位。

在谈话过程中，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粗暴地攻击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

对话人告诉我们，似乎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之后，西方各国首脑：美国的吉米·卡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维利·勃兰特，法国的吉斯卡尔·德斯坦和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都写信和或打电话对他们表示支持和同情，许多国外著名的文化社会活动家也向他们表示自己的“声援”。按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的话说，所有这些人对发生的事态感到愤怒，并抗议苏维埃国家的决定。

接着罗斯特洛波维奇指出，取消他和他妻子的苏联国籍不只是有损于苏联的声望，而且这似乎还对法国左派力量的威望产生了消极影响，首先是对议会第二轮选举之前的法国共产党的威信产生了消极影响。为证实起见，罗斯特洛波维奇引用了他与法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的电话谈话，似乎后者告诉了他这一点，但他未透露该人的姓氏。

据罗斯特洛波维奇说，目前，为了吸引全世界社会舆论和西方

联护照。他们强调，他们已准备好，即使现在就返回苏联上法庭也好，条件是：审讯公开。

从整个情况判断，领事处的工作人员的到来，使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感到突然。可以感觉到，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维什涅夫斯卡娅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表现得神经过敏。

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二等秘书　B. 缅尔尼科夫

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专员　B. 卡尔别科

№07640

柯西金关于取消罗斯特洛波维奇国家奖金和列宁奖金获得者称号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8 年 12 月 7 日）

机密

№0C－798

因经常做出有损苏联威望和玷污苏联公民称号的行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 1978 年 3 月命令取消姆·列·罗斯特洛波维奇和加·帕·维什涅夫斯卡娅的苏联国籍。

1951 年罗斯特洛波维奇曾被授予国家二等奖金，而在 1964 年由于音乐演出活动被授予列宁奖金。

苏联文化部提出了关于取消罗斯特洛波维奇的国家奖金和列宁奖金获得者称号的问题。文化部现在报告：各艺术委员会、大剧院和音乐学院的社会团体已通过请求取消罗斯特洛波维奇的上述奖金获得者称号的决议。

随报告附上关于这个问题决议草案。①

请予以研究

阿·柯西金②

① 参见本专题文件№07641。

② 该报告于 1978 年 12 月 13 日分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表决№133－41。

№07639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关于取消维什涅夫斯卡娅和罗斯特洛波维奇的苏联国家奖励的命令

（1978年12月11日）

№8540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

根据苏联文化部的报告，按照《苏联勋章总则》第18条，由于行为恶劣，取消加林娜·帕夫洛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的列宁勋章、苏联人民演员荣誉称号和罗斯特洛波维奇的苏联人民演员称号。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列·勃列日涅夫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　米·格奥尔加泽

1978年12月11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07641

苏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取消罗斯特洛波维奇国家奖金和列宁奖金获得者称号的决议

（1978 年 12 月 15 日）

绝密

№134 / 11

赞同苏联部长会议就该问题的决议草案（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　件

绝密

1978 年 12 月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取消姆·列·罗斯特洛波维奇苏联国家奖金和列宁奖金获得者称号的决议

考虑到姆·列·罗斯特洛波维奇不断做出有损苏联威望的行为，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取消姆·列·罗斯特洛波维奇苏联国家奖金和列宁奖金获得者的称号。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阿·柯西金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米·斯米尔秋科夫[①]

① 米·谢·斯米尔秋科夫，1940年加入苏共，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1976年当选苏共中央候补委员。

【专题说明】

“护卫”号反潜舰兵变事件

（1975 年 11 月至 1976 年 7 月）

1975 年 11 月，苏联海军波罗的海舰队大型反潜舰“护卫”号，在政治副舰长 B.M. 萨布林的带领下，拒绝服从命令，演成一次兵变。兵变很快被镇压下去，萨布林也被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这一事件由于苏联当局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而在当时不为人知，本专题选编的 3 份文件，大体上描述了这一惊人事件的过程、起因和结局。类似事件的发生，是否如调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仅仅是“近乎病态的虚荣心”在起作用，值得怀疑。或许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当时一部分党员和军官对苏联社会的政治状况不满。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钟平和、张延文、高增训翻译）

№07003

格列奇科关于“护卫”号反潜舰部分人员的违纪行为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5年11月10日）

特件

绝密

现报告如下：

“护卫”号反潜舰政治副舰长、海军少校萨布林，1939年出生，俄罗斯人，1973年毕业于列宁军事政治学院。今年11月8日夜，他用欺骗手段将该舰舰长海军中校A.B.波图利内隔离起来，使两名军官和10～12名人员站到自己方面，于11月9日3时20分从里加起锚，驶向波罗的海，并向舰员宣布：应该开往喀琅施塔得。

萨布林对返回基地的命令拒不执行。

在空军航空兵沿航线进行警告性射击和轰炸后，该舰停止了航行。

舰长海军中校A.B.波图利内靠舰上人员的力量得到释放并进入指挥。萨布林被逮捕。

11月9日15时，该舰在里加湾停泊。

现在正进行侦讯。

安·格列奇科[①]

① 安·格列奇科，时任苏联国防部长。

№07004

戈尔什科夫等就“护卫”号事件的调查情况致格列奇科报告

（1975 年 11 月 17 日）

绝密

我们现报告如下：

您在 1975 年 11 月 9 日第 00105 号命令中所任命的委员会，对今年 11 月 8～9 日在波罗的海舰队第 128 导弹舰支队“护卫”号大型反潜舰上发生的不服从命令事件进行了调查。

“护卫”号大型反潜舰于 1973 年建造完工，1974 年 3 月进入海军服役。该舰在人员、武器装备和规定的储备方面都是齐装满员。在 1974～1975 年期间，此反潜舰在地中海执行战斗勤务，完成了经大西洋驶往古巴的远航，积极参加了“海洋－75”的演习，多次去过一些外国港口。在此期间舰艇对交给的任务是胜任的。舰员在国外的表现无愧于我们的祖国。1975 年度该舰战斗训练和政治教育计划完成的总评定是良好。

舰长、海军中校 A.B. 波图利内，1936 年出生，俄罗斯人，从 1954 年起在海军服役，1958 年入党，1958 年毕业于伏龙芝高等海军学校。

对他服役情况的鉴定是肯定的。从 1973 年 2 月起任现职。

原该舰政治副舰长、海军少校 B.M. 萨布林，1939 年生，俄罗斯人，1959 年入党，从 1956 年起加入海军服役，1960 年毕业于

伏龙芝高等海军学校，1969年以前曾任队列职务，他由北方舰队护卫舰协长职务进入列宁军政学院，于1973年毕业。1973年8月任职。服役情况的鉴定基本良好。已婚。1962年生有一子。其父——海军预备役上校。

从今年11月6日起“护卫”号大型反潜舰于十月革命58周年庆祝节日之际在锚地里加停泊。按照计划，该舰应于11月9日9时起航驶往利耶帕亚。

舰上有194人，其中军官15人、海军准尉14人、海军军士和水兵165人；苏共党员7人，预备党员9人，共青团员164人。舰员由18个民族的人组成，其中俄罗斯人111名，乌克兰人22名，白俄罗斯人12名，拉脱维亚人5名，摩尔达维亚人5名，立陶宛人3名，波兰人2名，及其他民族。社会地位情况：工人114人，集体农庄庄员19人，职员29人，学生32人。

11月8日约19时，B.M.萨布林用欺骗手段将舰长、海军中校波图利内吸引到水声部位去，砰的一声将舱门关上，上了锁，以此将舰长与舰上人员隔离起来。之后，通往隔离舰长处的通道处于萨布林最亲近的同谋者、水兵A.H.沙因的警卫之下。舰长采取的竭力获释的努力也未能奏效。

萨布林将舰长隔离以后，把13名军官和13名海军准尉集合到准尉休息室，表达了他自1963年以来就开始酝酿的思想。他认为，苏联社会有违法和破坏公正现象。同时他还蛊惑人心地利用了苏联报刊上公布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社会弊病（贸易中的个别营私舞弊事实、某些商品短缺、大学招生违反规定、种种欺瞒、虚报、以及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事件，等等）。萨布林将所有这一切都歪曲为是党和政府背离了列宁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原则。他从弗·伊·列宁、卡·马克思和一些民主革命者的著作中有倾向地举出所挑选的一些引文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萨布林建议擅自将舰艇改航去喀琅施塔得，并宣布该地为独立领地。他代表舰员要求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给他提供机会通过中央电视台发表讲话，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于向他提出的问题——这些观点与其党籍有直接关联时，他回答说，他已经退了党，他不认为自己与党有什么关系了。当问他，舰长在何处时，他说，舰长在舱里，正在考虑他的建议。

萨布林建议对他提出的想法进行表决，为此，他事先发了黑白棋子。部分海军准尉和军官赞成他的建议，对那些不支持萨布林的10名军官和5名海军准尉，按其指示被隔离在两个单独的地方。

10日23时，萨布林借口晚点名，安排了水兵和海军军士的大集合，讲述了自己的观点和打算。他还宣布说，大多数军官和海军准尉都支持他。不赞同他的只是那些企图去深造学习的人或希望职务高升的人，所以不愿意损害自己的名誉；这些人被隔离起来，萨布林已撤掉他们的职务。按照萨布林的命令，甚至支持他的军官和海军准尉都没有出席点名。当人员问及，舰长在何处，他对发生的事情持何态度，萨布林回答说，舰长不支持他，所以暂时把他隔离起来了。

萨布林在发言过程中声明，他提出的行动不是违反军人誓词，不是背叛行为，也不会降低舰只的战斗准备程度。为了证实这个声明，他列举了这么一个事实：没有向人员发放武器，武器库处于警戒状态。之后，萨布林主持表决。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水兵和军士对他的建议投了赞成票，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明白发言有什么反苏的、背叛的本质，而另一部分则没有投票。预先拍摄的萨布林的发言后来对全舰作了播放。现已查明，并非舰上的全体人员都接受萨布林的鼓动，这一点可由在事件刚开始时某些水兵、军士和军官企图释放舰长并把萨布林抓起来证明。但是这种企图被萨布林的支持者们制止了。

23时30分，海军上尉B.B.菲尔索夫从舰上用系缆下到水鼓、转到停地旁边的“Б－49”潜艇并由快艇送到岸上，正是他最先将情况报告给二级潜艇艇长Г.И.伊格纳坚科海军中校，尔后又报告给第78水警戒区舰艇支队参谋长B.C.弗拉索夫海军中校和该支队特别处处长B.Г.尤金海军中校的。

萨布林了解到菲尔索夫已经离去后，决定提前将舰只开进海上。11月9日2时50分，舰只在萨布林的指挥下解开水鼓驶向里加湾。后来用快艇运到岸上的Ю.М.舍韦廖夫海军中士从舰上跳到水鼓上。

4时，萨布林向海军总司令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假借舰只革命委员会（并未发现该委员会的存在）的名义要求苏共中央宣布军舰为自由而独立的领土，提供发表电视讲话的权力，为军舰提供各种给养和邮政，允许在任何基地锚泊和系留，保证不侵犯乘员和不对乘员的父母及亲朋采取强暴措施。

在“护卫”号大型反潜舰进入里加湾后由舰队兵力和边防快艇对其进行连续监视。

乘员通过报务和译电员了解到已收到国防部长、海军总司令和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的电报，电报命令该舰返回泊地，并警告如不服从就动用武力；由此，以及出动飞机、军舰和快艇监护该舰等情况，才使大部分人员醒悟过来并开始明白萨布林的主意是犯罪，开始着手让武器和技术器材都不能使用，开始坚决行动起来解救舰长和军官。

大约在10时20分，即在飞机投弹之前，由25～30人组成的水兵小组解救了军官和舰长。在这方面表现最积极的有B.C.科佩洛夫海军中士、B.A.斯坦基亚维丘斯海军下士、C.И.雷科夫上等水兵、K.A.纳比耶夫上等水兵。

舰长被解救时以及随后的行动迅速而果断。按照他的命令军械

库被打开了，部分水兵、军士和军官被武装起来。舰长亲自将萨布林击伤并逮捕，很快控制了舰上的局面。萨布林的支持者 11 人，其中有两名年轻军官：B.K. 杜德尼克——1975 年毕业生、今年 8 月份来到舰上，鱼雷战斗部发射中队中队长；B.И. 瓦维尔金——航长供给助手。他们均已被捕。

10 时 32 分，舰长把舰停了下来并用无线电报告说他已行使指挥权并等候命令。之后军舰返回里加湾。

擅自将军舰开进海上并不服从指挥是前政治副舰长萨布林犯罪行动的恶果，此人是凶恶的蜕化变质的反苏分子，披着军官外衣，通过蛊惑人心的声明和欺骗唆使舰上的部分人员站在他一边。

这一重大事故也是一部分人不作思索的行动恶果，这些人听信敌人蛊惑人心的谎言鼓动，而敌人则是长时期以来一直在党内和我们国家内部策划反对现行制度的罪行阴谋。萨布林利用他们担任的职务的崇高威信，了解自己的许多部属的心理，狡猾地玩弄他们的情感，故意歪曲事实，善于从心理上让那部分不坚定的人员相信他只是想公开批评我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缺点。他得以使部分乘员相信他这些行动不违背法律，也没违背军人誓词，不是背叛，而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将首先可靠地保卫自己的祖国。事件开始时部分人员则相信萨布林不仅是因为他以自己的雄辩口才使他们坚信不移，而且也是由于大家都习惯于相信他，因为他是政治副舰长、共产党员、军官。

通过对萨布林个人笔记、他窃取的某些材料的研究，以及在侦查过程中对情况的了解，可以对他作出评价：萨布林是一个具有近乎病态的虚荣心、思想固执的人，他总是想出人头地并成为一个特殊的人。他认为发表公开的电视讲话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之一。

在委员会工作过程中并未发现在大型反潜舰“护卫”号有敌人的反苏小组和萨布林在给海军总司令的电报中提到的所谓的革命委

员会的存在。萨布林在某些只在公开活动前被他拉拢的人的支持下单独活动。在调查过程中并未发现认为萨布林想把军舰开往瑞典的论点的根据。

之所以发生这一特殊事故，是由于：

1. 在培养军官对祖国具有高度责任感、荣誉与尊严、坚定与勇敢、原则性方面的政治教育工作者有重大失误，从而导致那些不善于及时认清叛徒萨布林发表蛊惑讲话和意图的反苏思想并坚决制止他的犯罪活动的军官们被动和惊慌失措。

2. 萨布林利用其具有崇高威信的职务——政治副舰长来掩护自己的犯罪活动。萨布林拒绝许多应有的群众政治工作的形式，不对人员讲话，不对军官上政治课和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是伺机发表自己反苏的观点。他利用公认的对水兵和军士单独作工作的方法多半是为了研究人们的心理素质和情绪，以便利用这些在今后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各种形式的政治教育工作，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和政府、忠于军人誓词和军人职责、政治警惕性，这些具体的问题和概念被看成是抽象的。在舰上很少去作加强军人友谊与同志之情的工作。

3. 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的政治成熟性不够，他们在评价萨布林蛊惑人心的声明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警惕性和党的原则性，没有勇气给他以及时的反击。在军舰停在里加期间党组织书记和副书记不在舰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4. 第128导弹舰支队和12导弹舰总队的指挥部、政治处和政治机关对舰上组织政治教育工作的真实情况不了解。直接与萨布林工作的舰长波图利内海军中校和副舰长Я.Я. 罗曼诺夫斯基海军中校没有看到他的思想中有反苏方面的迹象，只把舰上党政工作的缺点和失误归咎于作为政治工作人员的萨布林经验不足。

5. 在组织作战和值班勤务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失误，海军

驻军指挥部行动迟缓，因为他们在收到最初的不正常信号后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整顿该舰的秩序并防止它开出基地，虽然有能力和时间做到这一点。

第78水域警戒舰艇支队参谋长弗拉索夫海军中校、支队特别处处长尤金海军中校、在泊地值班的“C－263”潜艇二级艇长Л.В.斯维特洛夫斯基海军中校在收到菲尔索夫大尉的报告后不是采取应有的措施，而是长时间开会，很晚才按级上报，表现出指挥不力、不果断、胆怯。

委员会指出，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A.M.科索夫海军中将，军委会成员——舰队政治部主任Н.И.沙布利科夫海军中将未能深刻地分析各舰艇和各部队的情况，未能具体而有目的地组织舰队的政治教育工作，首先是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政治教育工作，未能对负责人员和值勤人员必须执行命令提出必要的要求。

※　　※　　※

因此，正如调查所表明的那样，可以得出结论：萨布林是单独行动的，并得到某些人的支持。并未发现有组织的反苏集团和所谓的舰上革命委员会。

萨布林是一个道地的伪装起来的反苏分子，他长期以来一直在琢磨自己敌对的观点。他以蛊惑人心的手段，利用职务的崇高威信，一部分人员政治上的不够成熟、消极和不坚决才得以在短时间内控制了舰上的局面。然而听信萨布林鼓动的只有一部分人员，而多数人很快就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和犯罪意图，从而最终挫败了萨布林的意图并恢复舰上的秩序。

舰长A.B.波图利内海军中校不善于教育乘员组这个统一的战斗集体能在任何情况下履行自己的军人职责。调查还表明军官们有某些消极和惊慌失措，他们不善于及时认清叛徒讲话和计划的反苏用意并坚决制止他的活动。

在舰艇擅自出海时，里加海军驻军的值勤人员和领导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有过失的，他们没能采取果断措施整顿舰上的秩序并阻止萨布林出海。

我们认为采取下列措施是恰当的：

1. 鉴于这次发生的事故，由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制定并实施一些补充措施来改善对各类军人的政治教育工作，用无限忠于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思想，用高度的政治警惕性、思想性和原则性的思想教育各类军人。要特别注意使每个军人都深刻意识到军人誓词的要求，必须积极而有进取性地捍卫共产主义道德及苏联现实的原则。

研究修改高等院校军官培训大纲和指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计划的必要性，以加强军官的意识形态和心理训练，教育他们具有军官荣誉、职业道德和军人职责的崇高情感。

2. 由海军总司令部制定并实施改善对作战和值班勤务的组织工作的措施。对规范负责人员作战，值勤人员行动的条例、训令、命令和其他文件的执行情况加强监督，严格要求。

3. 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司令部和政治部应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活动，培养人员具有高度政治警惕性、具体而又目的明确的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各类负责人员和值班人员执行命令的自觉性。要深入研究、分析和准确评价各编队、舰艇和部队的情况。教会军官能在任何情况和条件下独立行动和采取果断措施。要同那种导致自己无主动性和丧失责任感的不必要的照顾作坚决的斗争。

4. 对那些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以及由于其不尽职和对值勤的轻率态度而诱发事故的责任者要严加追究党内的纪律和责任。

同时我们报告：

在委员会和海军的负责领导及乘员组的许多成员以及“护卫”号大型反潜舰全体人员的谈话中，人们都对萨布林的背叛行动表示

愤怒，并向国防部长、苏共中央和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本人保证：水兵、军士、海军准尉和军官们均已深深意识到了自己一时糊涂，现在已准备好履行自己的军人职责。

正在对这一重大事故进行追究犯罪人员刑事责任的调查。已召开了党的会议，会上明显的犯罪人员，包括萨布林，均被开除出苏共。舰艇的乘员组已被解散，舰艇更换了新乘员组。“护卫”号大型反潜舰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武器和技术器材完好无损，舰队已采取了杜绝走漏信息的措施。

（调查）委员会主席　谢·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

（调查）委员会成员　阿·叶皮谢夫大将

П. 纳沃伊采夫海军中将

С. 罗曼诺夫中将

В. 萨巴涅耶夫海军少将

Ю. 柳班斯基少将

М. 古利亚耶夫海军少将

1975 年 11 月 17 日

№07005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萨布林案件”的诉讼程序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6年7月14日）

第1574－A号

莫斯科市

关于萨布林和沙因案件的诉讼程序（1976年2月8日第408－A号的补充）

苏共中央：

今年7月6～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司法少将Г.И.布舒耶夫的主持下审理了背叛祖国分子、1975年11月9日擅自驾驶“护卫”号大型反潜舰离开里加港开往瑞典方向的萨布林及其积极的帮凶沙因的刑事案件。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完全承认原告起诉的罪行并对所犯罪行的详情供认不讳。在法庭上还审问了证人，他们均已证实被告的罪行，同时还对其他证词作了调查。

鉴于萨布林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军事法庭判处他极刑——死刑（枪决）。

舍因判处有期徒刑2年（监禁），剥夺自由8年。

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关于勃列日涅夫寿辰及其著作

（1976 年 11 月至 1986 年 8 月）

1976 年 12 月 19 日，是勃列日涅夫 70 岁生日，苏共中央为此开了一系列的筹备会，进行盛大的祝寿活动。自勃列日涅夫当政后，苏联大量出版勃列日涅夫及其他几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这些著作，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后的 1986 年，仍旧大量地堆放着，以致苏联国家图书出版系统的领导人也为此而大伤脑筋。本专题选编的两份文件，很实际地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出苏联党政干部对领袖人物生前死后的态度。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李传勋、高增训翻译）

№07001

苏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勃列日涅夫70寿辰庆祝活动决议

（不早于1976年11月30日）

米·安·苏斯洛夫关于庆祝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70寿辰举行活动的程序的通报。

赞同庆祝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70寿辰所举行的活动（见附件）。

1976年11月3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表决赞成通过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有：米·安·苏斯洛夫、安·帕·基里连科、费·达·库拉科夫、鲍·尼·波诺马廖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弗·拉·多尔吉赫、库·费·卡图谢夫、米·瓦·齐米亚宁、康·乌·契尔年科、雅·彼·里亚鲍夫。

附　件

大致安排：

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70寿辰。

1. 授奖

12月19日上午10时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授奖仪式。出席授奖仪式的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联部长

会议各副主席。

出席授奖仪式的还有抵达莫斯科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

2. 招待会

12 月 19 日 17 时在克里姆林宫的格奥尔吉耶夫大厅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名义举行招待会，大约 600～620 人。

邀请出席招待会的有：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及其夫人们；

苏联部长会议各副主席及其夫人们；

各部长、国家委员会各主席；

党的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中央机关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人员；

苏共中央的各部长、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其他工作人员；

军人和宇航员；

学者和设计师、文学艺术活动家；

社会团体领导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及其他社会组织）；

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每个加盟共和国出席 3 人）。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各兄弟党的代表团。

还规定了必要的机动人数，以便被祝寿的人酌定对一些同志个人发出邀请。

打算用以下方式举行招待会：

招待会开始是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名义致祝词。

招待会过程中以下人员可以发表讲话：

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

武装力量的代表、工会代表、共青团代表、苏联科学院的代表；

各兄弟党代表团领导人；

招待会上发言的次序将另行确定。

因为官方的祝词将在报刊发表，打算将发言祝酒词的时间限制在1.5至3分钟内。

招待会要组织一场艺术大师的时间不长的音乐会。

与招待会有关的费用从党的预算开支。

3. 在报刊发表材料

12月18日晚，通过电视和无线电广播播放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致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的祝词及对他的嘉奖令。

12月19日，这些文件要在中央与地方报刊发表。

同日，要发表各兄弟党的和其他外国活动家可能发来的贺词以及各加盟共和国、莫斯科、列宁格勒、武装力量、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贺词。贺词篇幅1.5页至2.5页。

要发表党的边疆区委和州委的首批贺词（这些贺词的篇幅约1页）和其他一些组织的首批贺词。

12月19日晚，通过电视和无线电广播播放对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举行的授奖仪式和关于克里姆林宫招待会的消息。

12月20日，在报刊报道这些消息并继续发表贺词。

№06206

雅科夫列夫关于停止销售国家领导人书籍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6 年 8 月 6 日）

苏共中央

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出版、印刷和书籍发行委员会（M.Φ. 涅纳舍娃同志）统计，在该委员会及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军事出版社，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系统的图书贸易机构中现有大量1969～1983 年出版的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言论集和单本著作。其中有勃列涅夫的 166 部书计 277.9 万册。党和政府其他活动家的 55 部著作未完全售出，剩余 44 万册。

由于苏共二十七大通过了新版苏共纲领并批准了苏共章程，1971～1983 年出版的党章和党纲目前有 127.6 万册尚未售出。

在图书贸易网中还有勃列日涅夫的肖像 70 万张以上、安德罗波夫的肖像 13 万张、契尔年科的肖像 17 万张。带有他们的肖像和引文的宣传画和画册也有大量剩余。

在各加盟共和国，用各民族语言出版的类似出版物有 1049 种（计 75.68 万册）。

各图书贸易机构现存上述作者的出版物总计价值 450 万卢布。售出这些出版物看来已不可能。

考虑到这一情况，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出版、印刷和书籍发行委员会作出停止销售上述书籍的决定。

这一决定已得到同意。

A．雅科夫列夫

附　录

图书贸易网中现有各中央出版社
1969～1983年出版的党务活动家的出版物

	出版年代	种数	册数	金额(卢布)
勃列日涅夫	1969～1983	166	2679391	1088373
安德罗波夫	1976～1983	8	188691	40697
格里申	1971～1982	7	22049	15135
库拉科夫	1972～1978	3	18139	10297
佩尔谢	1975～1984	3	16600	24331
波诺马廖夫	1974～1983	12	19600	24300
罗曼诺夫	1979～1983	4	34570	36172
苏斯洛夫	1970～1982	12	103601	76794
吉洪诺夫	1980～1982	3	26300	23100
乌斯季诺夫	1981～1983	4	14421	1187
契尔年科	1977～1983	8	47655	46064
勃列日涅夫访问记	1973～1982	11	90952	12828
合　计		241	3261969	1399278

图书贸易网中现有各共和国出版社出版的勃列日涅夫及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著作①

图书贸易机构	种数统计	册数统计(万册)	金额(万卢布)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16	17.02	9.24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29	0.77	0.77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225	2.25	4.27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74	1.78	1.08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未报	1.76	0.62
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80	7.21	5.26
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50	0.56	0.3
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44	1.15	0.97
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43	16.04	4.31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63	1.76	1.6
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55	0.65	0.52
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65	14.94	6.27
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46	4.37	2.01
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59	5.42	1.62
合　计	1049	75.68	38.84

① 原文中无俄罗斯联邦图书发行公司剩余此种出版物的统计数字。

国书贸易网中现有各中央出版社
1971～1983年出版的苏共纲领和章程

名称	出版年	种数	册数	金额(卢布)
苏联共产党纲领	1971	1	13686	2190
苏联共产党纲领	1976	1	134564	25567
苏联共产党纲领	1977	1	13732	2609
苏联共产党纲领	1978	1	5603	1121
苏联共产党章程	1971	2	34714	1400
苏联共产党章程	1972	2	23517	1386
苏联共产党章程	1973	1	86684	2601
苏联共产党章程	1974	1	67215	2016
苏联共产党章程	1975	2	24460	734
苏联共产党章程	1976	2	82757	2483
苏联共产党章程	1977	3	216032	8424
苏联共产党章程	1978	2	121808	4166
苏联共产党章程	1979	1	123562	3707
苏联共产党章程	1981	2	46153	2707
苏联共产党章程	1982	1	124369	3731
苏联共产党章程	1983	1	157277	4718
合　计		24	1276133	69560

【专题说明】

斯涅吉廖夫放弃苏联国籍问题

（1977 年 7～12 月）

斯涅吉廖夫是苏联作家、电影编导。1977 年 7 月，出于政治上对苏联社会现状的不满，斯涅吉廖夫宣布放弃苏联国籍，于是受到国家安全部门的侦查，并被逮捕。本专题收入的关于斯涅吉廖夫放弃苏联国籍的 3 份文件，表明了当时苏联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以及政府对处于反政府地位的那些人所必然采取的措施。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李传勋翻译）

№06175

斯涅吉廖夫就放弃国籍致苏联政府的公开信

（1977年7月29日）

我在此声明放弃苏联国籍。

这一决定是我在你们进行所谓新宪法草案讨论的那些日子作出的。报纸、广播、集会都大肆宣扬一致热烈的拥护。不久这一草案即将在一片“乌拉”声中成为法律。不管是谁胆敢不喊“乌拉”，克格勃及其忠实奴仆——党的工作者就会死死地监视每一次集会和集会的每一个参加者。

你们的宪法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说你们的国家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说全部政权属于人民是谎言；说你们国家的最高目的是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是谎言；说你们实行和平政策并为巩固各族人民的安全而斗争是谎言；关于各民族自由发展和各共和国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的声明是谎言；你们的选举制度是谎言和耻辱，全国人民拿它开开心而已；你们的国徽是谎言和耻辱，徽上的麦穗是你们从美国进口的；你们的国歌是谎言和耻辱，你们把国歌里的斯大林换上了列宁。

你们声称建立了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你们断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拥有完全的社会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第39条），共和国的公民言论、出版、聚会、集会的自由得到保障（第50条）。这里还有一句话：

“公民对权利和自由的利用不应给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带来损失。”

这样你们就恬不知耻地把自己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一笔勾销。

第 156 条规定：

“所有法院对案件的审理都是公开的。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方可在法院的非公开法庭上审讯案件。”

这样你们就恬不知耻地保留了对每一个公民进行非公开审讯的可能。

你们以前剥夺了我的权利和自由，在你们害怕真理的声音时——你们总是害怕它的——就对我进行了非公开的审讯。然而以前即使你们宣布实行专政，但还下不了决心公开地做这些厚颜无耻的事，那时候我还有可能挥舞宪法这个武器，要求你们不侵犯得到保证的权利和自由，进行公开审理。今天你们扔掉了专政的招牌，宣称自己是全民国家，但你们又粗暴地制止我说：别再援引什么宪法，什么你的权利和自由了，在我们，即国家，还没有明确这些东西对我们即国家有没有什么损害之前，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即国家规定的法律对你们进行非公开审讯！你要抗议？试试看吧，宪法就是这样规定的，而宪法是由人民批准的，包括你在内。

我不想把自己包括在内。你们的宪法是受政治暗探局控制的，在苏联一切都处于它的支配之下，没有它你们的集中营制度连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我不想做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它在自己存在的 60 年里治理无方，以至于不得不把公民副业饲养的牲畜和家禽写入根本法从而使其载入光荣的史册。你们把百分之一的农业用地划给副业，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农业用地划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这百分之一的土地却生产出全国三分之一的食品！而你们是怎样掠夺这百分之一的土地上的公民——把牛牵出他们的院子，连一只老母鸡、一个小苹果、一墩草莓也要毫无道理地收税！现在明白了，你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养活不了这个国家，你们向公民讨好、巴结、下保证

说——再也不要怕，尽管养你们的猪和鸡，我们保证不碰一指头。现在在宪法中写上要用这百分之一来养活我们，现在要交给我们的不是三分之一，而是三分之二，因为指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要落空的，这些颂扬腐朽意识形态的纪念碑是用牲口粪捏成的。

最后，我不愿意再做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公民，它消灭了我们乌克兰人民的社会精英、农民和知识界的优秀部分，歪曲和诬蔑我们过去的历史，贬低我们的现在。你们使我的乌克兰同胞丧失了民族尊严，你们迫使我们害怕甚至不想称自己是乌克兰人。你们还敢在你们的宪法里胡吹什么各民族的发展？你们竟恬不知耻到愚弄我们的人民并在宪法中写上关于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的条款！

亿万受尽你们摧残和被你们吓怕了的公民将顺从地和漠然地举手赞成你们的宪法。像我这样公开宣布不想通过你们的根本法的人将是极少数。我完全清楚我的行为将被你们认定为滔天罪行：我利用言论自由的权利损害了你们的国家，你们将按你们国家规定的法律对我进行不公开的审讯。

话又说回来，你们的宪法暂时还只是草案！你们要惩治我还得等到它被全民通过时，只有那时宪法条款才适用于我，真是麻烦事！关到精神病院里不是更简单？或者指控我犯了刑事罪？或者由受了侮辱的穿便服的爱国者动私刑？或者搞一次车祸？你们的武库里还有什么快速惩治我的方法？尽管使好了。

今天是1977年7月29日，我把自己的公民证连同本声明一起寄给你们，从今天起我不再认为自己是苏联公民。

1977年7月29日

基辅－33

塔拉索夫大街8号43号住宅

斯涅吉廖夫，格利·伊万诺维奇

№06174

安德罗波夫关于制止斯涅吉廖夫犯罪活动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7 年 9 月 19 日）

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发现并用文件证明格·伊·斯涅吉廖夫从事反苏活动。此人生于 1927 年，乌克兰人，1974 年被开除苏共党籍并被作家协会和电影工作者协会开除，曾任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已退休，现住基辅市。

斯涅吉廖夫从 1957 年起系统地炮制和散发敌对性作品（《州委书记》、《告密小说》、《妈妈，我的妈妈》、《自画像——1966》、《给苏联政府的公开信》①、《骂还是不骂》、《打死了一只鹅》、《致领袖的呼吁书》等），在这些作品中诋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他与国外反社会主义杂志《大陆》的副主编涅克拉索夫、莫斯科的反社会分子及一些美国记者建立了非法联系。斯涅吉廖夫通过他们向西方转交敌对性材料，这些材料被国外的一些宣传中心和民族主义组织用来进行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自由》电台今年 7 月 18 日广播了斯涅吉廖夫的一篇谤文——《给美国总统吉·卡特的公开信》，信中再次恶毒诽谤苏联的国家和社会制度、苏联政府的国际和国内政策。今年夏天斯涅吉廖夫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向外国记者宣布他出于政治上的理由放弃苏联国籍并向他们递交了所谓的《给苏联政府的公开信》。他把这个攻击苏联宪法草

① 见本专题№06175 文件。

案并号召消灭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文件的副本（随报告附上）寄给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由斯涅吉廖夫炮制出来并于今年8月交给西方的他的另一篇谤文——《致领袖的呼吁书》充满了独特的反苏主义。斯涅吉廖夫在其中号召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恢复私有制，解散集体农庄，消灭苏联军队。

已通过社会舆论和亲属对斯涅吉廖夫采取了预防措施，但这些措施对他没有起作用。

鉴于上述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逮捕斯涅吉廖夫并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第一章第62条（反苏鼓动和宣传）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决定。这一问题已征得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

现以情报的形式报告。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06176

国家安全委员会
关于斯涅吉廖夫案件侦查过程的报告

（1977 年 12 月 2 日）

第 2584－A 号

作为对 1977 年 9 月 19 日第 2042－A 号报告的补充，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如下：

格·伊·斯涅吉廖夫已被逮捕并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第 62 条（反苏鼓动和宣传）被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其 1975～1977 年在苏联撰写和散发并送出国外发表《告领袖书》、《致吉·卡特的信》及许多其他有反苏内容的文件这些事实他已供认不讳。

此外，在审讯时涅斯吉廖夫声称，他不打算改变其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和信念，坚决不愿说出他以何种方式将反苏材料转寄西方以及他在苏联哪些人中间散发过这些材料。

按照被捕前制定的行动方针，斯涅吉廖夫今年 10 月 30 日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写了一个声明，他在声明中诬蔑苏维埃制度和苏联新宪法，宣布进行绝食并开始拒绝进食，因此按规定制度对他进行了强制进食。

在研究从斯涅吉廖夫那里搜查到的材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他炮制的反苏文件草稿，其中有他给以敌视苏联著称的美国作家贝洛的信的副本。斯涅吉廖夫在这封信中请求贝洛帮助他与美国驻基辅领

事建立联系，并在国外发表他的诽谤文章中的一篇。

侦查现继续进行。

现以情报的形式报告。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专题说明】

苏联与瓦文萨的意大利之行

（1981 年 1 月）

1980 年 7 月，波兰政府宣布提高肉类消费品的价格，引发了全国性的罢工浪潮。在罢工过程中，工人自发组成“独立自治团结工会”简称“团结工会”。1943 年出生的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工人瓦文萨当选为团结工会主席。原来由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工会迅速瓦解，并于 1980 年 12 月 31 日宣布“停止活动”。本专题文件反映了苏共中央对瓦文萨访问意大利的态度和对策取向。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刁绍华、赵静男翻译）

№06055

波诺马廖夫关于瓦文萨意大利之行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1年1月13日）

由Л. 瓦文萨率领的“团结”工会代表团（一行18人）应意大利地方工会邀请将于1981年1月14至18日访问意大利，代表团中也有以反社会主义为宗旨的政治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华沙1981年1月7日专电，ш/т－ма，№15）。

据现有的消息，各资产阶级政党，各种群众性的信息媒体皆打算广泛利用该代表团在意大利逗留的机会进行有损于波兰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的活动，支持旨在动摇和最终消灭波兰的社会主义成就的路线。为此目的，计划在工会和政界相当高的水平上组织对代表团成员的接见。除了教皇在梵蒂冈接见之外，工会联合会（全意大利劳工联盟－意大利劳工大会－意大利劳动者联盟）的领导还准备接见Л. 瓦文萨及其代表团，组织与工人集体的会见。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虽然起初决定拒绝会见Л. 瓦文萨，可是至今还持有摇摆不定的立场，不排除与他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接触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向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说明情况是适宜的，该党在意大利工会运动中拥有牢固的阵地，对国内政界能发挥重大影响。

有鉴于此，可以指示苏联驻意大利大使会见恩·贝林格或者能够代替他的人员。会见中应该提请意共领导注意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务使Л. 瓦文萨意大利之行不能导致对其以反社会主义为

宗旨的政治反对派路线的支持。

致意共领导的信抄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是适宜的。

附上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①]。

波诺马廖夫（签字）

1981 年 1 月 13 日

① 参见本专题№11742 文件。

№11742

苏共中央关于瓦文萨意大利之行的决议

（1981年1月14日）

246 /1rc

绝密

1. 批准给苏联驻意大利大使的指示（见附件）。
2. 致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信抄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中央书记　苏斯洛夫、基里连科、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波诺马廖夫、卡皮托诺夫、扎米亚京、鲁萨科夫同志赞成（签字）

已送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鲁萨科夫同志。

1981年1月14日

附　录

机密
罗马

致苏联大使

请您拜会贝林格同志或者别的能够代替他的人员，做如下说明：

（为华沙——向C. 卡尼亚或者他所指定的人员通报发往罗马的如下电文）

“鉴于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Л. 瓦文萨开始意大利之行，苏共中央想要交换一下自己的想法。

当前，‘团结’工会的首领们及其拥护者们竭力在使波兰社会政治形势尖锐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搜罗所有企图削弱党的阵地及其在国内的领导作用的人。‘团结’工会提出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就是如此，其目的在于企图公开对抗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立场。这点证明了苏共中央在致意共领导的信中所阐述的我们的评价，即认为在‘团结’工会的活动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集中力量攻击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基础本身，您从该信中对此已经有所了解。

‘团结’工会的意图和行动随时随地都表现出来，就是要使波兰的经济状况恶化，动摇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众所周知，波兰的经济状况已经极度困难。在这种条件下，继续增加种种要求而不考虑经济实际情况，尤其是中断工作，只能导致国家经济生活更大的崩溃。政府的代表已经理由充分地向‘团结’工会的领导人说明……[①] 完全过渡到每周五天工作制，可能引起生活水平降低8～

① 此处增加一行手写体，分辨不清。

9%，造成工业生产大幅度减产，其中包括人民必需品的减产。‘团结’工会领导人忽视这种警告，与此相背离，企图组织事实上的总罢工，要求立即实行五天工作制，这意味着，这个组织的首领们所要达到的并不是改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状况，不是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是进一步削弱党的阵地，造成一种孕育着新的危险的尖锐冲突的局面。

该联合组织当前是一种现实的力量。然而，它并不是一个在思想和政治方面统一的组织。它的队伍里，在个别领导人和区域性的派别中间表现出严重的分歧，一系列派别公开表示不同意在‘团结’工会中央领导机构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活动。

瓦文萨的代表团里有一些所谓‘保卫工人委员会’的代表：格维亚兹达、瓦伦狄诺维奇和莫杰列夫斯基，该组织明显是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这些人以其露骨的反共和反苏情绪而臭名昭著。很可能是这些人企图利用瓦文萨访问意大利之机不仅为‘团结’工会和自己的观点大作广告，而且也企图依靠所谓‘国际支持’在波兰向社会主义发起新的进攻。

想要提醒您注意这种情况，波兰思想政治形势的复杂性特别是由这种情况所制约的，即各种不同的力量往‘革新’口号中加入直接相对立的内容。一些人——波兰统一工人党及其同盟者——把这理解为巩固社会主义原则和恢复党的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而另一些人则理解为侵蚀和动摇社会主义制度。赋予‘革新’口号具体内容的这种两重性，被波兰党和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利用来伪装自己的真实立场和意图。

根据以上所述，显而易见，瓦文萨及其同伙企图利用访问意大利来达到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的目的，贵方对这些企图采取中立立场，不符合波兰人民的利益，波兰统一工人党

的利益及其执行的社会主义革新的路线。

‘团结’工会的领导目前奉行的政治路线是：在波兰利用其合法的活动，与此同时又力求颠覆其宪法制度，现在支持这条路线，就意味着实际上支持它反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斗争。考虑到所阐述的这些情况，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提请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注意这一点。”

电告执行情况。

【专题说明】

裁军和禁止核试验

（1981 年 2 月）

1979 年底，苏军入侵阿富汗。美国为此宣布对苏实行谷物禁运，作为“制裁”手段，但并无实际效果。当任的美国总统卡特被美国公众舆论指责为“对共产主义软弱无力”，在 1980 年的总统选举中，败于共和党人里根。1981 年 1 月，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加拿大驻苏联大使皮尔逊与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科尔尼延科的谈话，主要涉及苏军入侵阿富汗和里根上台后的苏联外交动向问题。本专题仅 1 份文件。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刁绍华翻译）

№06056

科尔尼延科关于裁军和禁止核试验与皮尔逊的谈话记录

（1981 年 2 月 6 日）

摘自科尔尼延科 1981 年 3 月 18 日日记

№213 / ГС－нс

根据皮尔逊的要求接见了他。

大使说，自从 1980 年 9 月他到莫斯科上任以来，已经在苏联一系列部委和机关进行了会见和谈话，有机会在苏联外交部就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受到安·安·葛罗米柯接见。

接着谈到了自己对裁军问题的兴趣，因为他以前曾在加拿大外交部当过这些问题的协调员，他认为这些问题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占有中心地位。加拿大参加日内瓦裁军委员会的工作，参加了日内瓦谈判，并且希望在所讨论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大使宣称，加拿大政府也认为继续限制战略军备和尽快在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三方会谈中达成一致是异常重要的。这时，他在这方面表示，加拿大跟这些会谈没有直接关系，对其顺利进行不能起到重要作用。

我对大使说，他明显缩小了加拿大对上述谈判进程施加积极影响的可能性，特别是通过在北大西洋联盟内部利用协商的途径。

皮尔逊涉及到在裁军委员会范围内建立工作组的问题，以便对正在进行的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三方会谈施加影响。他宣称，加拿大认为所有感兴趣的国家经过多方努力，就会产生积极影响，可是苏

联和美国似乎是反对建立这样的工作组。

我对大使说，我们原则上并不反对在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建立一个工作组，这个问题看来在今年2月3日开幕并且正在进行的委员会会议上得到讨论。可是我们认为，这次会议应该形成这样的文件，以便不使三方会谈的进程复杂化。

皮尔逊关心苏联方面如何评价最近几个月内将要恢复的限制战略军备谈判的前景。

我告诉皮尔逊，苏联方面，正如就此不只一次声明的那样，非常明确地主张继续进行限制战略军备的谈判；不仅仅主张继续谈判，而且更具体地主张限制战略军备第二协议生效，以便能够转入谈判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目前很难说近期内能否恢复我们与美国方面在限制战略军备问题上的合作，因为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而且也取决于另一方。

我提请大使注意到这种情况，即里根政府断言“第二限制战略军备协议对单方面有利”，这个协议并不会缩减战略军备，诸如此类的言论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譬如，根据这个协议，苏联方面应该到1981年年底把战略系统武器的运载工具从2500削减到2250，也就是削减百分之十。

皮尔逊问道，报道说不管限制战略军备第二协议是否得到批准，双方商定在实践中履行协议的条款，这种报道是否符合实际？

我回答道，这种武断不符合实际。在1972年签署的限制战略军备第一协议上，与美国达成了这种一致，但这个协议的有效期是五年，现在已经过期了。1977年，苏联和美国的确商定在限制战略军备第二协议生效以前应该依据限制战略军备第一协议的条款。美国方面提出一个问题，把这种实践也扩展到限制战略军备第二协议上来，也就是让限制战略军备第二协议在事实上生效，可是就这个问题并没有达成一致。我让皮尔逊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美国

在这种情况下对遵守协议条款表现出来的兴趣，明显证明限制战略军备第二协议对美国“不利”的断言没有根据。我也指出了跟美国办事的困难，这个国家每更换一次白宫的主人，其政策都发生变化。

接下去在谈话的进程中，皮尔逊指出国际局势气候的恶化，询问我们认为这是暂时现象还是认为目前形势的复杂化是长期的。

我告诉皮尔逊，目前政治气候的确变得复杂了，可是苏联方面对此绝对不承担责任。美国大选和里根当上总统之后，我们马上表示希望和准备同新的行政机构进行积极的对话。很遗憾，美国领导人并没有提出讨论双边关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问题，而是代之以发表了一系列片面的声明，这绝不能认为是偶然的。这些声明证明美国方面企图执行明确的政治路线，因此可以认为我们遇到的国际气候的恶化要持续一个时期，究竟持续多久，这取决于美国。

我让皮尔逊注意一下今年2月3日塔斯社声明中阐述的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接着，皮尔逊表示，阿富汗事件对当前国际局势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些事件也影响到苏联和加拿大的双边关系。大使宣称，众所周知，由于这些事件的结果，加拿大前任保守政府就已决定冻结与苏联的官方合作，这项决定如今继续起作用。

然而，近来提出一系列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建议，特别是法国总统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皮尔逊问道，苏联是否认为目前有迹象表明有和平解决的希望？

我向皮尔逊指出，企图用阿富汗事件来解释当前国际局势的复杂化，是站不住脚的。我举了这样的事实作为例证，即使抛开阿富汗问题的实质，也不能用这些事件来解释限制战略军备谈判过程中出现的复杂化。众所周知，1972年达成了限制战略军备第一协议，当时有50万美国兵驻扎在越南，美国飞机轰炸河内和海防，当时

海防还停泊着苏联军舰。尽管如此，苏联方面还是在莫斯科接待了尼克松总统。虽然做出这项决定是很复杂的，但苏联也还是签署了协议，这是从巩固和平与裁军的长远利益出发的。

然后涉及到阿富汗问题的实质，指出了最近出现的某些新的特点，特别是巴基斯坦领导人准备开始与阿富汗领导人会谈。很遗憾，西方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包括加拿大），更不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想方设法要破坏已经拟定的合作。正是这样评价那项建议的，认为它是不现实的，因为它没有规定阿富汗政府参加会议。因此，我们理解阿富汗领导人对法国建议的拒绝。

大使问道，苏联如何对待联合国代表可能参加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会谈？

回答说，阿富汗领导人并不反对联合国代表参加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会谈，我们同意他们的这个意见，但是我们跟阿富汗人一样，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让会谈以某种反阿富汗的决议为基础在联合国的包办下进行。

接着，皮尔逊谈到使国际局势复杂化的其他因素时，援引了加拿大总理彼·特鲁多就波兰事件问题在1980年12月6日写给列·伊·勃列日涅夫的信，并且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加拿大政府担心这个国家的事态可能进一步发展，这种担心还在继续。他也表示有兴趣：能否期待对这封信的回复。

我回答大使，我不了解特鲁多的信，因此不能说是否会回复它以及是否需要回复。

至于波兰事件，我们认为那是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内部事务，认为某个第三方，其中包括加拿大，参加讨论这个问题是不合适的。

我接着向皮尔逊指出，许多西方国家和组织声明要求“不准干涉波兰事件”，但实际上却积极干预。我举出美国劳联和产联众所周知的行为作为例子。

我也提请大使注意华沙条约国领导人1980年12月在莫斯科会晤时发表的声明。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格·科尔尼延科

分发：科尔尼延科
科瓦廖夫
福金
科姆普列克托夫
彼得罗夫斯基
苏斯洛夫
限制战略军备谈判代表团
ООИ
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
归档3份

【专题说明】

阿富汗战争及其后果

（1981 年 3 月至 1990 年 1 月）

1979 年底，苏军集结 10 个师的兵力，大举入侵阿富汗，使阿富汗原来各派力量的流血军事政变，衍变成阿富汗游击队与入侵的苏军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民族战争。在阿富汗战争中，苏联耗资 200 多亿美元。1988 年 5 月 25 日，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利济切夫宣布：在阿富汗战争中，苏军死亡 12210 人，伤 35478 人，失踪 311 人。阿富汗战争成了苏联日夜不停的“流血的伤口”。由于入侵阿富汗，苏联不断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处境孤立。由于入侵阿富汗，苏联与巴基斯坦交恶日甚。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即开始寻求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1988 年 4 月 14 日，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与巴基斯坦签订了由苏美两国予以保证的解决阿富汗问题日内瓦协议。5 月 15 日，苏联和阿富汗发表联合声明：根据日内瓦协议，苏军从今天开始撤离阿富汗，撤军将在 9 个月内完成。1989 年 2 月 15 日，苏联政府就从阿富汗撤军结束发表声明：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已经结束，这一行动完全符合日内瓦协议。本专题选编的文件，反映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高层领导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的决策过程，以及处理战争滞留问题的一些情

况。关于这一问题，本档案集第32卷收入了1980年12月以前的更多的档案文献。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刁绍华、赵静男翻译）

№06058

葛罗米柯与弗罗曼－缪里斯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谈话记录

（1981年3月20日）

№255／ГС－нс

根据A.弗罗曼－缪里斯[①]的请求而接见了他。

A.弗罗曼－缪里斯：我想要把这次谈话看成是法国与苏联之间在各种不同层次的经常对话的一部分。不久前列·伊·勃列日涅夫与吉斯卡尔·德斯坦之间交换信函，这就雄辩地证明了这种对话的不间断性。在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的条件下，这种对话是很重要的。在法国，人们以极大的注意力了解了列·伊·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做的总结报告，发现报告充满了在国际舞台上推动积极进步的努力。

法国领导人跟以前一样，认为阿富汗问题即使不是加剧世界紧张局势惟一的，也是基本的原因。法国方面不只一次地发表了这样的想法，认为苏联武装力量在阿富汗的行动将会引起全民族的反抗，苏联军队在这个国家滞留的时间越长，反抗的运动就越加广泛。不久前，法国总统提议召开国际会议来寻求能够结束对阿富汗事务的外部干涉的方法。法国注意到，列·伊·勃列日涅夫在总结报告中也承认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讨论阿富汗问题的必要性。

① A.弗罗曼－缪里斯，时任法国驻苏联大使。

大使感兴趣的是苏联认为法国的建议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苏联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上新的建议。

安·安·葛罗米柯：苏联很重视法国官方人士，首先是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立场，他们强调，为了防止战争，保持和平和国际合作，法国主张继续与东方，与苏联对话。我们关注这些言论，认为它们符合我们的立场。国际问题，首先是那些存在着分歧的国际问题，只能寻求协商解决和相互谅解，除了这种和平的解决方法之外，各个大国没有别的选择。苏联领导人将要做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促进世界局势的缓和，特别是在目前日益紧张的那些方面，以期与西方各国，首先是与法国找到共同语言和相互谅解，因为正是我们两国的合作才有益于欧洲以及欧洲之外地区的和平与缓和。

至于阿富汗问题，苏联的立场已经明确地向法国外交部长阐述过了，后来列·伊·勃列日涅夫在华沙会见时又亲自向吉斯卡尔·德斯坦阐述了。苏联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苏联主张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我们认为如果各个邻国能够相互间进行双边对话：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阿富汗与伊朗，——这是明智的。可是看来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领导人迄今为止还没有成熟到理解这样做的必要性的程度。况且可以说，外国对这些国家发生强大的影响，使它们失去了清醒的立场，陷入迷途，这样说并不冒犯错误的风险。

此外，列·伊·勃列日涅夫在党代表大会的讲坛上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准备在国际场合讨论阿富汗问题。这指的当然是讨论国际上对阿富汗问题的各种观点。至于阿富汗内部的事务，任何人都无权讨论；惟有阿富汗人自己才能决定他们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事务。

我们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这种立场使人有责任做出惟一正确的结论：没有阿富汗代表参加，就不可能谈到在国际场合下讨论阿富汗问题。我们不愿意采取摇摆不定的立场。

A. 弗罗曼－缪里斯：法国关于就阿富汗问题召开国际会议，

考虑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为了终止外国对阿富汗事务的干涉，必须与决定着这种局势改变的国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他感兴趣的是苏联是否赞成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直接对话，与此同时举行国际会议，或者是主张从这两个方案中选择一个。

安·安·葛罗米柯：这里主要的是——这也完全符合阿富汗的立场，——停止外国干涉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这并不排除其他一些大国在达成不干涉协议的情况下可以在国际范围内对其进行保证。法国尽管离这个地区很遥远，但也可以参与这种保证。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继续武装和培训匪徒，然后把他们派到阿富汗为反对合法的政府而斗争，这并不是秘密。不完全明白，为什么有些国家经常谈论阿富汗有我们的军队，可是对停止外国干涉却不施加影响，不停止外国干涉，也就不能解决苏联军队在那里驻守问题。阿富汗问题只能政治解决，为了整个这一地区的和平而围绕着阿富汗对局势进行调解，此外，苏联并没有别的打算。

接着，A. 弗罗曼－缪里斯转到召开欧洲裁军会议问题上来。法国政府表示希望这种会议能有一个明确的基础，不要任何模棱两可。法国满意地注意到列·伊·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所做的声明，亦即苏联同意扩大采取信任措施的范围。这样一来，苏联就回答了法国关于会议地理范围的建议：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法国认为信任措施应该必须遵守，接受检查，在军事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所有这些因素对于成功地举行马德里会晤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安·安·葛罗米柯：的确，苏联同意把采取信任措施的范围扩大到乌拉尔，期待着西方采取相应的步骤。我们没有说出任何建议或意见，期望西方各国能够自己提出关于扩大自己那方面的区域的建议。众所周知，欧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也是个政治和战略的概念。我们期待着西方各国对我们的建议能够提出相应的回答。它们自己这样做比回答我们的提示更容易一些。

据我们所知，法国提议按阶段召开欧洲裁军会议：第一个阶段可以讨论加强信任的措施；第二个阶段讨论纯粹裁军问题。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法国是否主张在马德里通过有关这两个阶段的决议，或者马德里会晤的决议只是应该指出召开第一个阶段的会议，而关于召开第二个阶段会议的决议留待以后再通过。

A. 弗罗曼－缪里斯：吉斯卡尔·德斯坦于 1978 年在联合国大会专门会议上阐述了会议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会议的宗旨就是欧洲裁军。这一宗旨在法国提出的会议名称里得到了反映——欧洲裁军会议。但是，法国认为，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已做好准备马上讨论裁军问题，因此法国同意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信任措施；第二个阶段——裁军。

的确，在马德里会晤时当前特别注意的是第一个阶段。马德里会晤只要通过关于召开采取信任措施的第一阶段会议的决议，法国便会认为是积极的。这里要考虑到，随它之后还有第二个阶段，但是关于召开第二阶段会议的决议应该留待以后通过。

A. 弗罗曼－缪里斯谈到调解近东局势时说，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与苏联的立场一向是相符合的。列·伊·勃列日涅夫关于召开近东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建议在法国引起了兴趣。当前法国并不太热衷于找到一个调解这一地区局势的国际程序。主要努力是为了使所有利害相关的方面在实质上达成共识。在威尼斯和卢森堡“十国”领导人会晤的决议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苏联到目前为止对待召开解决近东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可能性一直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可以推测，苏联领导人现在则认为召开这样的会议的条件最大限度地成熟了。不久以前伊斯兰国家会议的决议中没有提到联合国安理会 242 和 348 号决议，而这两个决议则是调解近东局势的基础。A. 弗罗曼－缪里斯也援引了伊斯兰国家会议的决议，表示法国忠实于联合国的两个决议，对苏联的态度很感兴趣。

大使通告说，法国外交部准备在1981年6月就调解近东局势问题进行法苏磋商。

安·安·葛罗米柯：苏联对待西方提出的解决近东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各种方案过去和现在的确都持怀疑态度。据我们所知，美国同意召开会议，但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人民却排斥在参加者之外。本来应该解决消灭以色列侵略的问题，可是美国对此却置之不理，而想要把对美国以及以色列有利的解决方式强加给会议。苏联认为参加会议的必须有巴解组织、叙利亚、约旦，以及所有与之利益相关的国家。换言之，我们主张召开的不是一般性的会议，而是能够保障这一地区所有国家和人民公正利益的会议。因此，我们表示希望别的国家能以理解的态度对待苏联的建议，其中也包括法国，我们与法国在近东问题上经常都有较大程度的共识。

至于伊斯兰国家会议，我们对它持肯定的态度，因为它主张公正地解决近东问题，主张巴勒斯坦人参加国际会议，主张解放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众所周知，苏联是联合国安理会242和348号决议的参加者，因此继续认为这两个决议是解决近东问题的基础。

安·安·葛罗米柯肯定了苏联方面赞同就近东问题进行苏法磋商。

A. 弗罗曼－缪里斯：在1980年威尼斯会议上，欧洲委员会主张吸收巴解组织参加会谈，也就是说，西欧各国也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参与对近东问题的解决。

涉及到乍得的局势，大使声明，法国认为乍得问题的解决只能是纯非洲的，以拉各斯协议和洛美会议决议为基础。

安·安·葛罗米柯：苏联方面很少了解乍得的局势，因为甚至现在在那里还没有设立大使馆。但是，苏联原则上认为乍得应该是个独立的国家，任何人皆不得干涉它的内部事务，不得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它。

№06059

加夫里洛夫与佩斯考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谈话

（1981 年 4 月 10 日）

根据领导的委派，我按照佩斯考[①] 的要求在司里接见了他。

佩斯考在谈话过程中把阿富汗的局势说成是“复杂的”，认为是来自阿富汗居民方面“对巴·卡尔迈勒制度日益加强的反抗”所引起的，他企图弄清这是否会导致苏联向阿富汗增派军队。他同时断言，美国主张对问题进行政治调解，认为在这方面缺乏进展的原因在于苏联关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建议没有超过一年前巴·卡尔迈勒政府表达的思想。

我向佩斯考解释了我们调解围绕着阿富汗局势的立场的本质。强调苏联积极地建议讨论与阿富汗相关的问题，应该与波斯湾安全问题联系起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提出了这个建议，明显地证明了谁在行动上主张政治调解，谁只是空谈调解，而实际行动上则有意地拖延这个问题。我阐述了塔斯社 1981 年 3 月 19 日声明的基本论点，揭露了美国行政当局企图公开向阿富汗叛乱者运送武器。

我强调，被佩斯考当成所谓“阿富汗人民的反抗”的军事干涉是在反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苏联将在被认为是必需的领域里给阿富汗提供援助。停止这种干涉，首先是从巴基斯坦的领土上，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与巴基斯坦就此达成协议，将会开拓通向真正政治调

① Б.Л. 佩斯考，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

解的途径，这种政治调解只是涉及阿富汗问题的国际方面，而不应该涉及阿富汗的内部事务。

佩斯考问道，从取得政治调解的观点来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对话是“如此重要”吗？我对这个问题给了肯定的回答，说道，如果美国不阻碍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进行对话，不通过扩大对阿富汗反革命分子的援助规模而在调解的道路上设置新的困难，和平调解与阿富汗相关的事务，就会取得大大进展。

阿富汗司副司长　C. 加夫里洛夫（签字）[①]

分　送：

1. 科尔尼延科，格·马·

2. 总秘书处

3. 美国司

4. 归档

1981 年 4 月 14 日

① C.П. 加夫里洛夫，时任苏联外交部阿富汗司副司长。

№06060

葛罗米柯与恭萨尔威斯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谈话

（1981 年 5 月 14 日）

互相致意之后，安·安·葛罗米柯说，苏联密切地关注印度对外政策的步骤并且对印度方面为我们提供的信息表示感谢。

埃·恭萨尔威斯[①]：首先请允许我转达总理英·甘地和外交部长 H. 拉奥向您的致意和良好祝愿。印度外交部长怀着极大的兴趣期待着访问莫斯科，可能在今年 7 月成行。

安·安·葛罗米柯：我们不久前提议 7 月 2 日和 3 日作为这次访问的日期。

埃·恭萨尔威斯：我返回新德里后将立即着手这个问题，我们对所提出的日期是否可以接受将通报给苏方。

安·安·葛罗米柯：如果出现什么复杂情况，我们将很高兴在秋天接待他。

埃·恭萨尔威斯：我在莫斯科会见了费留宾先生并且与他进行了交谈，对这次交换意见非常满意。我们确认了在国际问题上相互一致的观点。印度自然基本上对亚洲地区以及印度洋地区的问题感兴趣。

我不久以前访问了美国，会晤了国务卿黑格。美国对我们地区政策的军国主义化引起我们深深的不安。我不能说我得以影响国务卿的思路，但是我们将来也要进一步努力使美国的政策中出现理性

① 埃·恭萨尔威斯，印度外交部秘书。

和健康思想的因素。印度认为美国在波斯湾和印度洋地区加强军事阵地，只能导致加剧局势的不稳定。遗憾的是不得不做出一个结论：美国人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没有从自己以前的错误中得出结论。特别是它对待巴基斯坦的政策足以证明这一点。美国人当前企图把巴基斯坦拖到在阿富汗和波斯湾问题上与苏联对抗的战略中来。

我们密切地关注着巴基斯坦事态的发展。不受欢迎的现行政府没有意识到它得到用来反对印度的武器将会导致什么后果。

安·安·葛罗米柯：我们两国对美国和巴基斯坦的政策，首先是它们在你们地区的政策的评价，实际上是一致的或者相近的。我们形成一种印象，华盛顿很清楚，它在这个地区针对苏联、印度、阿富汗的粗暴侵略政策不会发生影响。它丝毫也不能迫使我们和阿富汗牺牲自己的合法利益。如果不能达到政治解决，我们的军队就将无限期地留在阿富汗。

美国对待印度的目的在于迫使印度离开它理由充足的合法的具有原则性的路线。然而，不久以前的事件表明，印度能够明辨是非，希望并且善于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这些事件也表明印度并不是孤立的。将来许多事情取决于相关国家的政策是否始终如一。我们完全能够为自己和阿富汗担保。我们相信印度将继续自己的具有原则性的和一贯的政策，不会为了华盛顿的好感和慑于巴基斯坦的独裁制度而放弃自己的利益，统治巴基斯坦的是“刺刀、枪弹的伟大民主主义者”。

埃·恭萨尔威斯：我们的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跟美国和巴基斯坦对话，试图在好的方面影响它们。6月7～8日，我们的外交部长将访问巴基斯坦。印度的社会舆论拥护我们与所有的邻国发展合作关系，不受这些国家的国内政策所制约。因此印度政府努力发展

与尼泊尔、孟加拉以及巴基斯坦的睦邻关系。我们期望以这种方式对巩固国际和平与稳定做出自己的贡献。

安·安·葛罗米柯：是否计划与阿富汗方面会晤？

埃·恭萨尔威斯：我们支持在各个层次上与阿富汗的代表进行相当正常的合作。可是，坦率地说，我们多多少少为阿富汗的局势担忧。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那里的政治局势在恶化，政府没有足够广泛的基础。

安·安·葛罗米柯：我们得到的却是另外一种信息。阿富汗领导的社会基础在扩大和巩固。苏联方面在列·伊·勃列日涅夫访问印度期间对此做了说明。在这方面经常不断地进行工作。战局不断好转。

我们完全满意苏印关系发展的进程。我们对我们两国领导人的会晤赋予重大意义，在这个具体背景下，我愿意指出列·伊·勃列日涅夫不久以前访问印度的重要性。我们期望着印度总理在不久的将来根据邀请也能访问苏联。我们随时都高兴地欢迎她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到我们这里来。

埃·恭萨尔威斯：感谢您提供的关于阿富汗的信息。印度过去和现在都主张从政治上长期解决阿富汗问题，我们为了促进这一点而采取了步骤。

印度关心巩固亚洲和波斯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它在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就是按照这个方向活动的。我们特别主张东南亚国家联盟与印度支那各国进行对话。遗憾的是目前东南亚国家联盟指望召开国际会议。我们主张在东南亚建立和平与不结盟地带。

安·安·葛罗米柯：我们不相信巴基斯坦的领导能理解阿富汗领导希望与巴基斯坦建立良好的关系，不相信巴基斯坦具有良好的历史机会调整与阿富汗的睦邻关系。

请您向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和外交部长 H. 拉奥转达最良好的祝愿和问候。

№06061

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阿富汗问题的会议记录

（1981年6月4日）

绝密

仅此一份

主持人：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出席者：尤·弗·安德罗波夫、米·谢·戈尔巴乔夫、维·瓦·格里申、安·安·葛罗米柯、安·帕·基里连科、阿·雅·佩尔谢、尼·雅·苏斯洛夫、尼·亚·吉洪诺夫、康·乌·契尔年科、彼·尼·杰米契夫、瓦·瓦·库兹涅佐夫、米·谢·索洛缅采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弗·伊·多尔吉赫同志

1. 关于1981～1985年扩大生产生活第一必需品和更全面地满足居民对这些商品的需求的措施

勃列日涅夫：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是一种好的现象。这是个最困难的、最重要的问题，如我们过去和现在一贯所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个主要的问题，部长会议进行了研究，提交给我们审议。可以理解，这个决定中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引起所有的党组织、苏维埃、社会组织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却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正确的。

从决定草案中可以看出，部长会议主席团研究了扩大生产生活第一必需品和更全面地满足居民对这些商品的需求的措施的问题。特别是决定草案中规定了确保1985年出售给居民的用于制作服装

的棉纺织品达到13亿米的措施，或者说比1980年增加31%，增加生产针织内衣37%，各类长短袜子的生产达到20亿双，而合成洗涤剂和香皂的生产增加一半。

我在开始时就说过，当然，一个决定里不可能解决涉及到……商品的所有复杂和重要的问题。

……

葛罗米柯：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发言以及他宣读的致各国议会和世界人民书，本身已经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

契尔年科：这是对和平纲领的贡献，是我们的和平攻势的一个环节。

通过决定：认为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上就这个问题提出方案是适宜的。

8. 关于与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同志的谈话

安德罗波夫：受政治局的委托，我和葛罗米柯同志与巴·卡尔迈勒同志谈了话。乌斯季诺夫同志也与他进行了谈话。我们向巴·卡尔迈勒提出了在政治局会议上商定的所有问题。我们在谈话中强调，阿富汗民族民主党中央和阿富汗的领导首先应该在巩固党的方面进行认真的工作，提高军队和警察部队的战斗力，加强各国家机关的干部工作。就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了卡尔迈勒同志相应的答复和建议。我们同时也强调了改进各政府机关与我们的代表进行协商工作的必要性。

葛罗米柯：我们在谈话中强调，阿富汗问题目前牵涉到我们政策的其他许多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从阿富汗领导方面来看，应该提高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积极性。我们强调了，巴·卡尔迈勒同志研究干部问题时让瓦坦贾尔同志进入政治局，做得正确。可是在配备国家机关的干部时却仍然存在着片面性，也就是说大部分工作人员属于小集团（“帕尔奇”）。存在着派性。

吉洪诺夫：阿富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局势。我应该说，当然，波兰人民共和国局势的恶化也严重地打击了我们的经济。目前波兰人给我们发运的煤炭只占应该发运的57%。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另寻弥补的来源。

契尔年科：里根当局特别起劲地进行反苏宣传。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他们在犹太人方面对我们施加的压力。不久以前，里根接见了因从事特务活动而服刑的夏兰斯基的妻子，尽管她并不是他的妻子，可是报刊关于这件事却大肆宣传，还有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缅杰列维奇。美国报刊和电视台围绕着这个人广泛进行反苏宣传。譬如说，仅仅一天的时间就发出大约600份电报要求释放关押的犹太人。第二天发出大约300份电报。

葛罗米柯：目前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考虑释放夏兰斯基的问题，因为形势非常不适当。

安德罗波夫：说到夏兰斯基，我们应该设法向美国人民表明，他被判刑并非因为他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

通过决定：赞许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同志与巴·卡尔迈勒的谈话。

№06066

里特尔在美国国会上就阿富汗问题的发言简介

（1981 年 6 月 25～26 日）

国会记录，1981 年 6 月 25～26 日

1981 年 6 月，美国众议院就阿富汗问题进行了辩论，D. 里特尔议员（宾夕法尼亚州）提出进一步加强美国对阿富汗反革命分子的军事援助的问题。

D. 里特尔对阿富汗的整个局势做了评价，断言巴·卡尔迈勒制度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之所以把持着政权是由于“有苏联军队”。这位美国议员认为，西方对反革命势力的军事援助可能更有效地削弱苏联军队。D. 里特尔在 6 月 25～26 日直截了当地声称，“自由的非共产主义世界”各国应该帮助阿富汗穆加赫德分子“解放自己的祖国”。他的发言附录了一些美国作者和一位英国作者的文章，其中表达了一种意见：向穆加赫德分子提供个人使用的轻型防空武器，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局势向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变化。

D. 里特尔认为，必须增加对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的援助的理由还在于苏联把阿富汗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对阿拉伯和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最近的海路构成直接的威胁。

他的发言附录的英国上院议员 N. 贝特尔爵士的文章中断言，继续向阿富汗“自由战士”提供军事援助，他们可以战斗“几百年”。N. 贝特尔指出，滞留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共有 180 万

人。

N. 贝特尔认为美国及其盟国应该让苏联相信，必须讨论阿富汗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的地位问题以及从其领土上撤出“所有的外国军队”的问题。

D. 里特尔通报说，他与贝特尔爵士要尽力创建“美欧阿富汗问题工作组”（没有披露宗旨与任务）。

№06062

科尔尼延科与弗罗曼－缪里斯就阿富汗问题的谈话纪要

（1981 年 9 月 14 日）

摘自科尔尼延科 1981 年 10 月 27 日日记

份数编号：14

发文号：835 /ГС－нс

按照 A. 弗罗曼－缪里斯的要求接见了他。

在安·安·葛罗米柯与 K. 舍松即将在纽约会晤前夕，大使感兴趣的是苏联大使斯·瓦·契尔沃年科在巴黎会见 F. 密特朗之后苏方的印象如何。

我指出，初步的接触无疑是有益的，主要是从改善对法国新的领导对外路线的理解的角度来看，因为具体问题在接触的过程中并没有详细讨论。当然，我们不准备欢迎法国方面阐述的所有立场。有这样一些声明，特别是有利于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各国补充装备的声明，以并非苏法关系的因素的问题为先决条件与苏联对话，不能有感召力。与此同时，我们很自然欢迎法国方面总体上肯定保持和发展与苏联的良好关系的路线。这也符合我们自己的立场。

根据大使的要求，我解释了所说过的话，援引 K. 舍松实际上指出苏联和法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关系的著名声明。这样的联系——当然是无益的。

大使却说，他不完全理解，像阿富汗这样在国际政治中如此重

要的核心问题，怎能不在苏法关系中起作用。他说，怎能不谈这个问题？

我强调，当然可以谈论这个问题，如果旨在寻求消除围绕着阿富汗的紧张局势的实际途径。至于苏联，它准备不仅谈论，而且也与其他国家一起行动，特别是与法国在促进阿富汗人民共和国与其周边国家尽快进行对话方面。我提醒道，我们曾经积极地促进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对话，可是法国人却积极反对这么做。回到联系的问题上来，我援引了K. 舍松说过的话：在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之前，他访问苏联是不可能的。

大使不否认做过这样的声明，指出，据他所知，这种言论没有出现在与斯·瓦·契尔沃年科的谈话中。用他的话来说，K. 舍松以最关心的方式评价安·安·葛罗米柯在纽约有可能通报解决阿富汗问题有所进展的某些迹象。而弗罗曼－缪里斯感兴趣的在我们看来，是阿富汗人民共和国最近的建议中有什么新东西，以及为什么苏联方面认为关于阿富汗问题著名的“十国”建议是不能接受的。

我说，我们支持阿富汗政府寻求政治调解的路线。如果客观地对待事物，就不能不指出阿富汗人民共和国在这方面的立场有进一步积极的转变，这在今年8月25日的声明中有所反映。然而，我们却看不到西方各国准备实际促进政治调解。相反，西方有些人感兴趣的是维持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

我解释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1980年5月14日的建议中主张分别与伊朗和巴基斯坦举行双边会谈。然而众所周知，巴基斯坦却坚持有伊朗参加的三方面会谈。如今阿富汗政府对召开三方面会谈也表示准备接受，可是西方现在对此好像是没有注意到似的。阿富汗政府正在准备与邻国举行双边或者三方面会谈的同时，还准备举行多边会谈，以求制定国际保障，当然得有阿富汗参加。举行会谈没有阿富汗参加，是荒唐的。

既然“十国”建议主张就阿富汗问题召开国际会议似乎是研究不干涉这个国家事务以及保障不再出现这种干涉的问题，可是又不让阿富汗的合法政府参加，而模糊地说什么在国际会议的某个阶段可以允许根本不能代表阿富汗人民的某些“代表”参加会议的工作，怎能严肃地评价这项建议。我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认为上述“十国”建议一开始提出就不是一项严肃的建议，A. 弗罗曼－缪里斯对此是很清楚的。不可能指望阿富汗、苏联能接受这项建议，尽管阿富汗和苏联真诚地希望得到政治调解而且根本并不乐意看到本地区业已形成的局面。

大使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看来，阿富汗政府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的建议中是否存在着相吻合的共同点。我对这个问题回答说，除了个别的共同词句，“阿富汗”、“不干涉”之类，这些建议就其态度来看是根本相对立的。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足够了：“十国”建议的基本出发点是不接受阿富汗现在实际存在的制度，不承认现在的阿富汗政府，顺便说一下，这个政府已经得到不少国家的承认，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渴望真正的政治解决问题，其出发点是合理的：如果忽视阿富汗实际存在着的政权，便不可能有任何调解。

谈到两个系列的会谈（阿富汗与其邻国的双边或三方面会谈和就国际保障问题的多方会谈）时，大使要求就苏联从阿富汗撤军问题做出解释，何时开始和完成：是在这些会谈期间还是在会谈临结束时，或者只是在签署了所有必要的协议之后才能进行。

我强调说，阿富汗政府在最近的声明中已经明确地说过，与苏联撤军的程序和日期有关的问题，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总体调解的一部分。只有在事实上停止对阿富汗事务的干涉，对于不再恢复外国的武装干涉有了足够牢固的保障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撤军。由此可以看出，只是由于谈判的开始这一个事实，苏联军队不可能撤出。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件事并不十分重要。

我接着指出，对于我们来说，撤军是一个从这个地区现实的局势派生而来的问题。苏军驻扎在阿富汗领土上的数量是根据客观需要而定的，因为还存在着外国对阿富汗事务进行干涉的事实，首先是来自巴基斯坦方面的。只有从目前的现实出发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著名的“十国”建议中却没有任何相像之处。早在会谈期间，立刻就向卡林顿爵士指出了，这个建议是不现实的和不能接受的。英国外交大臣做出一种姿态，仿佛是苏联方面给的不是最后答复，所以我们又用书面形式把我们的反应通知大不列颠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他成员国。

大使触及了欧洲中程导弹问题。提到法国方面做出相应的声明，表示不允许把法国的核力量列入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总体均势中去，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力量完全保持不变。他对我们在安·安·葛罗米柯与亚·黑格会晤前夕如何评价中程导弹谈判开始的前景很感兴趣。

我首先提醒交谈者注意，我们对上述法国声明的答复还完全有效。至于谈判开始的前景，可以相当坚定地期望由于安·安·葛罗米柯与亚·黑格会晤的结果，有可能在举行谈判的时间和地点上达成共识。我同时强调，谈判的开始独立地来看，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各方怀着什么打算走上谈判：是希望寻求现实的、各方皆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还仅仅是希望用谈判开始这一事实来安抚社会舆论。在这方面对美国人的积极性没有任何信心。

大使表达了一种推测，根据某些迹象来判断，中程武器的谈判将会是严肃认真的。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的前景，法国人根据IO. 罗斯托与苏联驻美国临时代办 A. 彼斯麦尔特内赫的谈话，也认为有一定的进展。

我肯定了上述谈话的事实，指出这只是一般性的谈话，要想从

中看出美国人严肃认真地对待这次谈判的态度，很遗憾，仍然是不可能的。IO. 罗斯托本人承认，问题仍然处在研究阶段，美国人暂时还没有一个明确概念：何时以及从何处着手恢复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美国报刊急急忙忙地把这次谈话几乎是说成谈判的恢复。美国人出现了一种作风，把一次平常的无关紧要的三言两语交谈说成是重要的接触，或者甚至就是谈判，其目的是造成相应的印象。这种作风仅仅证明美国现行当局对待严肃问题的不严肃态度。

说到马德里会晤，大使询问，在我们看来是否有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尽管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我们看待马德里的恢复工作是带着某种乐观主义，还是相反，带着极端的悲观主义。我回答说，我们去参加中断以后又恢复的马德里会晤，坚定地打算使事情进行到底，能通过一项在政治上有分量的总结性文献。目前谈论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有困难，因为还不充分了解几个基本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代表团将带着什么样的打算回到马德里。假如他们的态度能够与我们相类似，也就是希望找到悬而未决的问题积极的调解，那么将会有理由乐观。相反，假如他们带着带走的东西回来，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乐观了。

大使企图弄清我们是否认为建立采取措施的信任地带的问题是主要的困难，与这一困难相比，所有其余的困难虽然也比较重要，但毕竟带有相对次要的性质；或者除了信任地带之外，我们是否在其他的“篮子”里也看到重大的困难。

我说，我们不认为剩下除了采取措施建立信任地带之外，其他未解决的都是次要的，非本质的。因此我吸引交谈者注意在外交实践中早就使用的所谓“一揽子交易”的形式，在这种形式的范围内，一方在一组问题上妥协，指望在另一组问题上得到相应的让步。至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向我们提出的“一揽子”，这完全是由纯粹只反映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各国立场的表述组成。这个

“一揽子”里面没有一个问题反映了我们的立场，——这不是别的，而只是对“一揽子”解决的讥笑。

大使请求确认一下，苏联是否会对列入“一揽子”的问题本身提出异议，或者只是对西方就此的表述提出异议。

我解释说，我们不满意的不是这些问题本身，我们对其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立场，而西方的表述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利益，没能留有余地。

接着，大使声称法国方面不理解苏联的立场：虽然通报了计划中“西方81”演习，但却没有指出参加军队的数量。

我让他注意：塔斯社关于演习开始的正式报道中包含着有关军队的数量的信息。至于关于军事演习的最早的通报中没有指出军队的数量，法国人如果不赋予这一点以政治意义，那就做对了。

转到近东的事态上来，大使着重讲到黎巴嫩的局势，用他的话来说，这对法国人来说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他对我们如何评价黎巴嫩开始的停火发生兴趣，我们认为停火够不够，停火是否能持久，我们认为黎巴嫩政府用建立主权隔离区的手段进行分权，在自己的领土上巩固政权的前景如何。

我回答说，遗憾的是对黎巴嫩的安定没有信心，因为这个国家没有消除紧张局势的根源，这与整个近东一样。这是以色列巩固被占领土、对黎巴嫩内部事务进行干涉、支持阻碍局势的安定的各种势力肆无忌惮的路线，不让黎巴嫩政府有可能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大使与此相联系，提出关于黎巴嫩四方委员会的问题。我指出，这个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消除决定着黎巴嫩危机的原因并不取决于这个委员会。这里的紧张局势受到以色列系统的支持，而以色列又得到美国的保护。我用一些具体事实说明了这一点：以色列袭击伊拉克核反应堆，随后美国对这一举动形式上的谴责，以及不久前美国当局决定恢复向以色列提供军火，也

就是事实上鼓励它进行新的侵略举动。

谈话的最后，大使提出法国政府任命外贸部长 M. 若贝尔为“大”委员会法方的共同主席这一事实。他这时指出，若贝尔作为国家部长，在法国现政府的上层官位等级中占第三位。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格·科尔尼延科（签字）

№06069

国家计委关于在塔吉克建造医院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3年9月1日）

机密

№693

致苏共中央

关于在塔吉克加盟共和国建造医院复苏共中央国际部1983年6月17日的公函

№18－15－1470

苏联国家计委同塔吉克共产党中央、塔吉克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一起研究了为了向阿富汗边境地区公民提供医疗救助而在塔吉克加盟共和国建造医院的问题，特此汇报。

为了上述目的，认为1984年完成设计是适宜的，1985～1986年在塔吉克加盟共和国库利亚布州莫斯科区莫斯科镇建造一所设有150张病床的多科的医院，并设有容纳250名就诊者的门诊部，可以利用该医院向阿富汗公民和莫斯科区居民提供专门的医疗救助。

有鉴于此，苏联国家计委在1984年度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家计划草案中规定了为该医院的设计拨款。

为了在塔吉克加盟共和国与阿富汗相毗邻的领土上实施传染病和疟疾防治措施中提供组织方法的和实际的救助，叶·伊·马尔齐诺夫斯基[①] 寄生虫医学和热带医学研究所的专家组从今年 7 月开始工作。

建造上述医院和在毗邻领土上开展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问题，已与苏联卫生部（谢·彼·布连科夫同志）协商。

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　Л.А. 沃罗宁（签字）

① 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马尔齐诺夫斯基，苏联寄生物学家和传染病学家，热带研究所的创办人。1934 年以后，该研究所以马尔齐诺夫斯基命名。

№11743

布连科夫关于为阿富汗提供医疗服务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3年9月8日）

机密

份数编号：1

№2771c

苏共中央

复1983年6月17日№18－15－1470

苏联卫生部研究了为了向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北部各省公民，首先向在与反革命战斗中负伤的人员提供医疗救助而在塔吉克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相毗邻的地区建造医院，以及在毗邻领土上扩大防治传染病的工作问题，并汇报如下。

1983年8月19日，塔吉克加盟共和国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委员会在塔吉克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塔吉克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K.M.马赫卡莫夫同志处开会，讨论了向居住在阿富汗北部各省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公民在医疗服务方面提供实际救助的问题。

认为在库利亚布州莫斯科区建造一所设有150张病床和能轮流容纳250名就诊者的门诊部是适宜的。

此项提议已与苏联国家计委进行过协商。

苏联国家计委在1984年度将拨给塔吉克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专款，用于准备该项建设的技术资料。

苏联卫生部为了在塔吉克加盟共和国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相毗邻的地区加强防治疟疾的措施，批准为共和国的卫生防疫站增加20个编制，以便组织流动防治传染病小分队，与疟疾进行斗争。

1983年，为了在与疟疾的斗争中提供实际的和组织方法上的救助，苏联卫生部在传染病流行期间派出了三个传染病防治小分队，苏联卫生部规定1984年也将派出三个传染病防治小分队。为了与传播疟疾的蚊子做斗争，小分队的专家们在塔吉克加盟共和国与阿富汗人民共和国相毗邻的领土进行了航空消毒，为此目的而拨出农业航空飞机。

在1982～1983年传染病间歇期间，苏联卫生部帮助塔吉克加盟共和国卫生部购置了10部用于消灭传媒体的野外自动灭火器、远距离航空除虫器、马拉松农药喷洒器、防治疟疾的药剂（伯氨喹啉、氯喹啉、乙胺嘧啶）。此外，还培训了与疟疾进行斗争的干部。

由于苏联卫生部向塔吉克共产党中央和共和国部长会议提出建议，塔吉克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了1983年8月22日№261－30决定《关于在塔吉克加盟共和国加强疟疾的防治工作》，其中肯定了1983～1985年预防和消灭疟疾措施综合计划。上述决定规定在库尔干－秋别州和库利亚布州组织流动防治疟疾小分队（每队20人），选拔了100名化学专家。塔吉克加盟共和国卫生部在1983年增加拨出专用汽车2715辆ИЖ－2，452辆УАЗ－Д2，53ГАЗ－Б1辆以及一定数量的燃料和润滑油。为了这一目的，责成共和国计委每年拨给塔吉克加盟共和国卫生部汽车运输工具、装备和材料用于装备疟疾防治小分队。

责成共和国各部委、州市执委有效地协助卫生机关组织和实现各项防治疟疾的措施。

苏联卫生部部长　谢·彼·布连科夫（签字）

№05621

戈尔巴乔夫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声明（摘要）

（1988年2月8日）

苏联政府和阿富汗政府为了努力促成迅速和顺利实现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日内瓦谈判，就10个月内撤军和开始撤军的具体日期达成协议。确定此日期的出发点是：必须不晚于1988年3月15日签署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以及所有有关协议在2个月以后同时生效。如果协议能在3月15日以前签署，则撤军可以相应前开始。

№05622

关于阿富汗问题政治解决的协议（摘要）

（1988 年 4 月 14 日）

阿富汗、巴基斯坦、苏联和美国的代表于 4 月 14 日在日内瓦就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局势签署协议书（联合国秘书长在场）。签署的文件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关于相互关系原则，特别是互不干涉和干预原则的双边协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关于难民自愿返回家园的双边协定；关于与阿富汗有关的局势的解决办法的相互联系协议书（由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作为保证国的苏联和美国代表签署）；关于国际保证宣言（由苏联和美国代表签署），谅解备忘录。

№05624

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特赦前驻阿富汗苏军全部犯罪军人的决定

（1989年11月28日）

根据人道主义原则，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

1．免除前驻阿富汗军人在他们服役期间（1979年12月～1989年2月）所犯罪行的刑事责任。

2．免除在阿富汗服役期间被苏联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法院定罪人员的刑罚。

3．根据本特赦决定，取消对刑满释放人员以及因在阿富汗服役期间犯罪服刑期满人员的判罪。

4．授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10日之内确定执行特赦的办法。

5．此决定自1989年12月15日起生效。

№05623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对苏军进驻阿富汗政治评价的决议

（1989 年 12 月 24 日）

1.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支持由苏联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作出的关于苏联军队 1979 年进驻阿富汗决定的政治评价，认为该决定理应得到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谴责。

2. 代表大会委托苏联新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制定新宪法草案时考虑到关于同苏联国防委员会章程有联系的苏联现行宪法第 113 条第 13 点和第 14 点；第 119 条第 13 点规定，建议将使用苏联武装力量决定的基本原则具体化。

3. 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考虑成立苏联驻阿富汗原军人事务委员会问题。

4. 委托苏联部长会议制订解决驻阿富汗苏联军队原军人和其他列入驻阿富汗苏联军队编制的人员，以及阵亡军人家属的生活安排有关问题的国家计划。

№06072

苏联政府就向阿富汗提供军事援助给苏联驻阿大使的指示

（不晚于1990年1月）

喀布尔

苏联大使

请与M.A.加列耶夫、B.A.列文和Г.A.阿列克谢耶夫同志一起拜会阿富汗共和国总统纳吉布拉，说明受委托通知他，阿富汗领导人关于1990年为阿富汗武装力量补充提供特种器材的请求已经仔细研究。

苏联政府找到了可能性：1990年向阿富汗提供150枚Р-17Э型导弹综合装置用导弹、两架“月亮-М”型导弹综合装置的发射器、380辆坦克、865辆步兵用战斗汽车和装甲车、195门大炮和火箭炮、680门高射炮和装置、1000门火焰喷射器、大约96000支步兵武器、54架飞机、6架直升飞机、弹药、工程技术装备、交通通讯工具、1500多个多次性的空降运载系统、后方器材和其他器材，并且对以前苏联提供的特种器材进行维修，总价值约为18亿卢布。

发运和维修特种器材按以前的结算条件进行，也就是为发运的器材支付价值的25%，为维修支付价值的50%，欠款10年偿还，年息为2%。

值得注意的是各部门分配上述器材应从实际的目的以及它们面临的任务出发，由阿富汗方面进行。

要求提供 C－125M1A 型和 C－75 型地对空导弹，增加 P－17Э 型导弹综合装置用的导弹 150 枚，以及更多地满足阿富汗方面关于提供交通工具的要求，是不可能的。谈判和签订合同可在莫斯科或喀布尔进行，日期由双方协商。

苏联方面委派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苏联国防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外交部进行谈判。签署合同委派苏联外经部进行。

电告执行情况。

【专题说明】

苏联最后十年的对外关系

（1981 年 3 月至 1991 年 6 月）

本专题选编的档案文献是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有关苏联党和国家对外关系的会议记录和有关决议、决定，时间从 1981 年 3 月至 1991 年 6 月，也即苏联存在的最后 10 年。这些文献反映了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主政期间，苏联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微妙变化。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刁绍华、赵静男、高增训翻译）

№06057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关于勃列日涅夫会见各党领导人的总结

（1981 年 3 月 12 日）

绝密
仅此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出席者：米·谢·戈尔巴乔夫、维·瓦·格里申、安·安·葛罗米柯、安·帕·基里连科、阿·雅·佩尔谢、尼·亚·吉洪诺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康·乌·契尔年科、彼·尼·杰米契夫、瓦·瓦·库兹涅佐夫、米·亚·波诺马廖夫、米·谢·索洛缅采夫、弗·伊·多尔吉赫、米·瓦·齐米亚宁、康·维·鲁萨科夫同志

勃列日涅夫：我们今天举行党的二十六大以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因此请允许我再一次祝贺各位被选进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并且希望和相信，我们跟从前一样，将会友好地和卓有成效地工作。

我们每个人都将对中央政治局总的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进一步巩固统一和团结。对于我们党的普遍的集体工作来说，特别是对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作为我们党的最高机关的工作来说，统一和团结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开始审议会议议程问题。

1. 关于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谈话的总结

勃列日涅夫：我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谈话也像与其他兄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一样，是在二十六大开会期间进行的。谈话记录已经按时分发了，因此看来没有必要复述谈话的全部内容。我只说几点。

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谈话是一系列这类谈话中的第一次。从我与菲德尔进行的谈话中可以明确地看到……①

葛罗米柯：卡达尔同志的讲话内容非常充实。

基里连科：亚诺什·卡达尔对谈话非常满意，并且如他本人所说的，代表大会和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报告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契尔年科：勃列日涅夫同志与卡达尔同志的谈话进一步提高了卡达尔同志和整个匈牙利代表团参加党的二十六大工作的意义。

吉洪诺夫、乌斯季诺夫、库兹涅佐夫、鲁萨科夫同志也都就这个问题发了言。

通过决议：赞同列·伊·勃列日涅夫与亚·卡达尔同志的谈话并且认为是有益的。

4. 关于列·伊·勃列日涅夫与托·日夫科夫同志的谈话

勃列日涅夫：日夫科夫同志在谈话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希望我能率领代表团出席保加利亚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我显然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暗自想道：我为什么不可以出席兄弟党的一次代表大会，譬如说，捷克斯洛伐克。当然，率领苏共代表团出席各党的代表大会是有困难的，可是到一个国家去，如我所说的，到捷克斯洛伐克去，看来是可以的。

葛罗米柯：说得对，列昂尼德·伊里奇。

---

①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3页。

基里连科、契尔年科、乌斯季诺夫、格里申支持建议，同意勃列日涅夫，列·伊·率领苏共代表团参加捷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通过决议：赞同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与托·日夫科夫同志的谈话。

5. 关于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与埃·昂纳克同志的谈话

勃列日涅夫：与昂纳克同志谈话的记录已经分发了，各位有可能读了。谈话很简短，可是对于昂纳克同志来说却有很重要的意义。我对昂纳克同志表示欢迎，感谢他参加代表大会。与此同时，我表现出兴趣，询问昂纳克同志代表大会进行得如何，代表们的发言如何？他回答说，大会的代表们发言都很令人振奋，不仅谈了成就，而且也谈了困难，谈了缺点。

然而，昂纳克同志的谈话中也有着对波兰局势的不安。我告诉他，波兰的这种局势也让我们不安。这时我指出，昂纳克同志跟卡尼亚同志进行了会晤，这无疑是有益的。看来我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认为波兰同志应该为了维护国内的秩序、保持严格的稳定而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当前，雅鲁泽尔斯基同志主持政府工作，他是个聪明的好同志，他有很高的威信。

我告诉昂纳克同志，希望他在与卡尼亚同志会晤时也能坚持让波兰同志在维护国内的秩序方面采取更加坚决的措施。昂纳克同志表示感谢这次谈话，邀请我率领苏共代表团出席其党代表大会。我感谢他的邀请，并且说由谁率领代表团，将由政治局做出相应的决定。

葛罗米柯：波兰当然使他们不安，首先是使昂纳克不安，这完全可以理解。我觉得，昂纳克向卡尼亚相当坚决地提出了一切问题，跟胡萨克同志一样，非常果断地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

鲁萨科夫：说到列昂尼德·伊里奇的谈话，显而易见，所有的同志都提出了波兰问题。当然，波兰的局势让所有的人都不安。我

想，波兰同志也感觉到了这种不安。他们应该采取更坚定的措施来回答这种不安。可是在各兄弟国家的领导人进行磋商之后，波兰朋友们仍然还没有认识到为了建立国内的秩序而采取一系列基本措施的必要性。

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格里申同志也就这个问题发了言。

通过决议：赞同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与昂纳克同志进行的谈话。

№06063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关于勃列日涅夫会见各党领导人的总结

（1981 年 9 月 17 日）

绝密

仅此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出席者：米·谢·戈尔巴乔夫、维·瓦·格里申、尼·雅·苏斯洛夫、尼·亚·吉洪诺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彼·尼·杰米契夫、米·亚·波诺马廖夫、米·谢·索洛缅采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弗·伊·多尔吉赫、米·瓦·齐米亚宁、康·维·鲁萨科夫同志

1. 关于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理凯山·丰威汉会见的总结

勃列日涅夫：与凯山同志的谈话进行得很好。我可以说，他作为一个领导者成熟了。他对国家的内部事务、我们的关系、东南亚的局势的议论具有成熟的性质。

老挝跟越南一样，也遇到了中国的强大压力。特点只在于中国人收敛了对老挝直接的武装挑衅，而在那里加强了破坏工作。很像是他们把一定的赌注押在反越南的情绪上，指望破坏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紧密的联盟。

凯山除了以前提出过的那些要求之外，还增加了一个希望——向老挝派一位总理的经济问题顾问。我认为应该满足这个要求，挑选一位在业务和政治上水平很高的同志去做这个工作。我觉得，现在时机已到，我们的经济机关应该跟老挝、越南、柬埔寨……建立经济关系了。

……①

格里申：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靠着我们过日子。

勃列日涅夫：我认为巴伊巴科夫同志与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谈判协调计划时应该依据从前就这个问题做出的决议以及政治局会议上交换过的意见。

全体：正确。

决定通过。

8. 苏联大使1981年9月15日发自柏林的电报（专电№598）

勃列日涅夫：我在1981年9月11日通过电话与卡尼亚同志通了话，根据我们在上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商定的，我把这次谈话的内容通报给了我们的大使，让他们分别介绍给昂纳克、卡达尔、日夫科夫和胡萨克等同志。

大使们执行了这项委托并且汇报了结果。各兄弟党的领导人完全同意在电话通话中对卡尼亚同志所说的内容，认为卡尼亚同志表现出不能容许的自由主义，应该对他施加强大的压力。

昂纳克同志与阿勃拉西莫夫② 同志谈话时提出一项建议：各兄弟党的领导人在莫斯科集会，邀请卡尼亚同志参加，让他申请退职，推荐奥尔绍夫斯基取代他当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

---

① 收集的档案此处缺7页。

②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阿勃拉西莫夫，1940年参加苏共。1975年起任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

我想要就这个问题商议一下我们该怎么办。当然，现在就这个问题很难通过一致的决定。我们还不了解其他同志，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意见。这一切都应该仔细想一想。

或许我们责成苏联外交部、国防部和中央国际部研究一下电报中阐述的问题，考虑到政治局交换的意见，向中央提出相应的建议。

如果没有不同意见，那么我们现在就算通过这项决定了。

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们说，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提议完全正确，应该通过。只是研究这些问题的机关还应该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

提议通过。

9.1981 年 9 月 14 日发自蒙特利尔的电报（专电№81）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我们大家怀着很大的注意力和紧张的心情注视着我们的体育代表团在加拿大参加冰球锦标赛的情况。

应该说，这一胜利不仅具有体育上的意义，而且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他们从蒙特利尔给我拍来电报，汇报了所取得的胜利，表示今后要更加刻苦，努力提高技巧，取得新的胜利。我认为应该鼓励冰球队员。他们中间一些人很久没有得到奖励了，或者根本就没有得到过奖励。这样的人恐怕应该给申请政府的奖励，而那些不久前得过奖的，譬如说，得过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的，也应该用重奖加以鼓励。

齐米亚宁：列昂尼德·伊里奇，我想要向政治局汇报以下的想法。苏联冰球队的全体同志，除了拉里奥诺夫之外，都得到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因此，看来没有必要提出奖励冰球队员的问题。因为他们赢了加拿大锦标赛，加拿大政府根据举办锦标赛的条件奖给他们每人一千美元。此外，根据苏联部长会议 1980 年 4 月 8 日的决定，每个参赛得胜的运动员应该得到 500 卢布的奖金。因为他

们一共赢了六场，所以每人有权得到3000卢布。

苏斯洛夫：此外，可以向他们全体表示感谢。

吉洪诺夫：以部长会议的名义。

苏斯洛夫：对，以部长会议的名义。

№06064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关于同各党领导人会谈的总结

（1981 年 10 月 29 日）

绝密

仅此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出席者：尤·弗·安德罗波夫、米·谢·戈尔巴乔夫、安·安·葛罗米柯、安·帕·基里连科、阿·雅·佩尔谢、尼·雅·苏斯洛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康·乌·契尔年科、彼·尼·杰米契夫、瓦·瓦·库兹涅佐夫、米·亚·波诺马廖夫、伊·瓦·卡皮托诺夫、米·瓦·齐米亚宁、康·维·鲁萨科夫同志

1. 关于与也门阿拉伯共和国总统 A.A. 萨列赫会谈的总结

勃列日涅夫：谈谈与萨列赫的会谈。

当然，北也门在近东远非最有影响的国家。可是它却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为争取它而进行着严重的政治斗争。

美国人利用军事的经济的杠杆想要把北也门控制在自己的方面，而且在这里也可保持对沙特阿拉伯的影响。我们感兴趣的是巩固也门的独立，加强萨列赫的政策中的进步因素。这也符合我们南也门朋友的利益。

从这个观点来看，这次访问整体上是有益的。我想我们应该得

以推动萨列赫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立场，加强他在反对反动影响的斗争中的坚定性。萨列赫本人虽然回避了对美国的批评，但却明确表示支持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政策。

我们应该继续奉行发展与也门的关系的路线。萨列赫要求提供武器，与此相关的是应该考虑在那里可以做些什么，以便北也门今后……①

通过决定：

（1）赞同与A.A.萨列赫的会谈。

（2）责成国防部和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研究萨列赫就军事合作问题上提出的要求。

（3）责成苏联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国际部准备加强苏联与也门阿拉伯共和国政治合作的措施，其中包括研究也门方面提出的友好合作条约的草案。

（4）责成外交部和中央国际部准备关于与萨列赫会谈总结的通报，以便转交给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

2. 关于康·维·鲁萨科夫同志的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之行的总结

勃利日涅夫：在座的各位同志都知道，鲁萨科夫同志受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出访了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其目的是就某些问题，特别是就我们与波兰事件相关而采取和将要采取的措施向我们的朋友们进行通报。

鲁萨科夫同志到了这些国家之后曾经以书面的形式向政治局做了关于此行的报告，各位手中都有这份报告。

---

① 收集的档案此处缺1页。

也许康斯坦丁·维克托罗维奇对报告中所阐述的还有什么要进行补充。那就请吧。

鲁萨科夫：我同四个兄弟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谈话，就像政治局所委托的那样。会谈涉及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关于波兰。在报告中已经详细阐述了与各兄弟国家领导人就波兰问题谈话的进程。可以说，各兄弟党的领导人就我们在波兰方面以及波兰目前形成的局势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上跟我们完全一致。总之，可以说，我们意见完全一致。

在会谈的进程中，各兄弟国家的领导人也涉及了经济问题。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关于减少载能体，首先是石油的供应。卡达尔、胡萨克和日夫科夫等同志虽然说他们很困难，可是毕竟对我们的建议能够理解，对于我们的要求表示将尽力寻求出路，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为了更明确起见，我向这些同志提出如下的问题：我可否向政治局汇报说你们都同意我所表达的观点。这些同志回答说，是的，可以报告。

可是与昂纳克同志谈话则是另一种情况。他立即说，对于民主德国来说，减少石油供应是不能接受的，这将给民主德国的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给民主德国的经济带来严重打击。他甚至这样宣称：他们不能接受这一点，要求勃列日涅夫对他们发出的两封信做出书面回答。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了，它实际上没有解决。况且昂纳克同志再一次证明说，他们向我们提供铋、铀，他们承担供应集团军的任务，由于波兰人民共和国不提供煤炭，他们的情况变得特别复杂，这些煤炭就应该从我们这方面给提供。与此相联系，昂纳克表示，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这一点。他们不得不重新审查所有的计划设想。

勃列日涅夫：我认为应该赞许鲁萨科夫与昂纳克、卡达尔、胡萨克和日夫科夫等同志的谈话，并在未来的实践中考虑到同志们就

波兰问题发表的设想。

大家都清楚，我们决定削减给我们的朋友们提供的石油。他们都很勉强地接受了这一点，直到目前为止，昂纳克，你们瞧吧，还在等待着我们对他来信的回复。别人不等待回复，可是在心里当然希望我们能够改变决定。

这样一来，我们与朋友们进行例行的会晤时也许应该谈谈这个问题，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完成和超额完成石油供应计划，并且期望着我们能够办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修改拟定供应载能体的计划，当然我们现在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们了解我们将在自己的决定上退却。吉洪诺夫同志看来应该再一次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一旦出现微小的可能性可以缓解紧张程度，就向中央提出相应的建议。

葛罗米柯：我想就波兰问题谈谈。我刚刚与大使阿里斯托夫同志谈过话。他汇报说，一小时的罢工是强制性的。许多企业实际上由“团结”工会当家作主。甚至想要劳动的人也不能劳动，因为“团结”工会的过激分子们阻碍想要劳动的人，千方百计地威胁他们，等等。

至于中央全会，如阿里斯托夫同志所汇报的，进行得很正常，补选了两名书记。议会从10月30日开始工作，他们提出了限制罢工的问题。这项法令会产生什么结果，现在还很难说，但最低限度在试图通过法律的途径来限制罢工。雅鲁泽尔斯基同志在全会上的讲话，我认为不错。

勃列日涅夫：我不相信雅鲁泽尔斯基能够做出什么建设性的事来。我觉得他为人不够勇敢。

安德罗波夫：雅鲁泽尔斯基实际上没有做出任何新的事，尽管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在政治局里最大的障碍是巴尔奇科夫斯基和库比亚克。据说甚至有人提议把巴尔奇科夫斯基和库比亚克清除出

政治局。然而，雅鲁泽尔斯基实际上拒绝了这一措施。而且他解释说，他没有能够代替这两个人的干部。

非常让人不安的是将由谁来担任波兰的总理。雅鲁泽尔斯基明显赏识奥尔绍夫斯基和拉科夫斯基。这两个人当然无一人适合于当总理。

勃列日涅夫：施米特甚至在一次谈话中泄露出来，波兰的局势非常危险，这种情况有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并且影响到我对民主德国的访问，因此我有可能去不成。

安德罗波夫：波兰的领导人谈到兄弟国家的军事援助问题。然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奉行这样的路线——我们绝不出兵波兰。

乌斯季诺夫：总体来说，我们不能出兵波兰。他们波兰人并没有准备接待我们的军队。眼下波兰正在进行超期服役人员的退伍工作。而且把复员者放回家去，让他们换上便装，然后重返部队再服役两个月。可是这个时期，他们却受到“团结”工会的改造。据我们所知，雅鲁泽尔斯基组建了行动小组，每组大约由三个人组成。不过这些小组暂时还没有任何行动。看来必须与波兰领导人，尤其是与雅鲁泽尔斯基会晤。但谁将去会晤，这也是个问题。

鲁萨科夫：明天议会开幕，会上将提出授予政府解决这类问题的权力。雅鲁泽尔斯基的确想要到莫斯科来。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有所准备。

勃列日涅夫：将由谁准备与雅鲁泽尔斯基会谈的材料？

鲁萨科夫：我认为应该责成波兰问题委员会准备与雅鲁泽尔斯基会谈用的材料，如果他表示这种希望，会谈就可能实现。

勃列日涅夫：我们通过决定向波兰发运肉类，运出了没有，是否就此通知了雅鲁泽尔斯基？

鲁萨科夫：通知了雅鲁泽尔斯基，他说了数量——3 万吨。

阿尔希波夫：我们将从我们的国家储备中给波兰发运肉类。

勃列日涅夫：在我的电报以后，从各共和国往联盟储备调拨肉类的问题有所进展。

阿尔希波夫：列昂尼德·伊里奇，调拨肉类的问题暂时还没有什么进展。诚然，时间还不足。可是我已经跟各个共和国谈过，可以汇报说，各地都在采取措施，确保完成向国家提供肉类的计划。特别是爱沙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克兰暂时还没有向各州下达指示。

契尔年科：不过我们亲自向乌克兰各州发了电报。

阿尔希波夫：材料将于星期一准备就绪，那时我可以汇报我们工作进展的情况。

戈尔巴乔夫：列昂尼德·伊里奇，您的电报起了重大作用。首先，各共和国和各州认真地研究了措施，以便确保实现计划。最低限度，根据我们同各州委、边疆区委和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电话通话结果掌握的资料，各地都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将于1月1日提交关于调拨肉类的总结。

勃列日涅夫：我一直在想，虽然我们为波兰提供了3万吨肉，可是我们的肉未必能够帮助波兰人。最低限度我们不明确波兰的前景将会如何。雅鲁泽尔斯基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性。也许我们应该准备跟他进行一次谈话。

至于供应石油问题的谈话，让我特别不安的是民主德国。从总体上来看，我想要说，各社会主义国家接受我们的建议是很勉强的。即使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们在心里是不满意这个决定的。从鲁萨科夫同志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来，某些国家直接表现出不满。昂纳克同志尤其不满意。他公然说这个决定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他甚至要求书面回复。我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决定。

安德罗波夫、苏斯洛夫、基里连科说，应该同意您刚刚发表的意见。

阿尔希波夫：我们还会出现燃料困难。煤炭部门将减少3000万吨煤炭。如何弥补？石油工业不能超额完成计划，因为不得不弥补这3000万吨。此外，我们缺少150万吨食糖，也得购买；缺少80万吨植物油，这也无法生活。

至于回复昂纳克，我认为鲁萨科夫同志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应该肯定，我们绝对不能改变向昂纳克通报的决定。

至于昂纳克所说的供应铀的问题，民主德国供应的铀并不能解决问题，总共只占我们消耗的铀的总数的20%。昂纳克也没有考虑到我们在给民主德国建造原子站，这是一件大事。

鲁萨科夫：我还想要说，波兰人要求供应石油和天然气保持今年的水平。

阿尔希波夫：我们与波兰人进行会谈，认为应该按照计划平衡的原则来建立我们与他们的经济关系。当然，这就要大大降低石油的供应，因为他们并不向我们提供煤炭和其他产品。然而，如果一切都将很好，那么结算时我们可以用现在供应的石油数量相抵。

巴伊巴科夫：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都在试探我们，指望着民主德国，看着我们如何对待民主德国。如果昂纳克能够打开缺口，那么他们也都会达到目的。最低限度还没有给任何国家书面回复。我在最近几天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委员会主席谈了话。他们都想要保持石油按年度分批供应的总量。有些人提议用其他载能体代替石油。

通过决定：

（1）赞同康·维·鲁萨科夫同志与昂纳克、卡达尔、胡萨克和日夫科夫等同志的谈话。

（2）要求波兰问题委员会准备必要的材料，供与雅鲁泽尔斯基可能进行的谈话使用。

（3）委托吉洪诺夫、鲁萨科夫、巴伊巴科夫进一步研究为这些

国家供应石油的问题，考虑到政治局会议上交换的意见。

3. 关于苏共代表团赴保加利亚参加保加利亚建国1300周年的纪念活动的总结

勃列日涅夫：根据保加利亚方面的要求，我们派出了以库兹涅佐夫同志为首的代表团赴保加利亚参加保加利亚建国1300周年的庆祝活动。库兹涅佐夫同志向政治局做了关于此行的书面汇报。

我觉得，应该赞同库兹涅佐夫同志的此行，责成相应的机构，其中包括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研究保加利亚同志提出的某些问题。

№06068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接待各国领导人情况的讨论记录

（1982 年 5 月 20 日）

绝密

仅此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出席者：尤·弗·安德罗波夫、米·谢·戈尔巴乔夫、维·瓦·格里申、安·安·葛罗米柯、安·帕·基里连科、阿·雅·佩尔谢、德·费·乌斯季诺夫、康·乌·契尔年科、彼·尼·杰米契夫、瓦·瓦·库兹涅佐夫、米·亚·波诺马廖夫、米·谢·索洛缅采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弗·伊·多尔吉赫、米·瓦·齐米亚宁、康·维·鲁萨科夫同志

1. 关于与由捷共中央总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的正式友好访问相关的各项措施

勃列日涅夫：由胡萨克同志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即将在 6 月 1～4 日对苏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关于接待这个代表团的问题我们很久以前在政治局已经原则上决定了。

现在需要批准访问日程方案。

各位已经看到，会谈拟于 6 月 2 日举行。6 月 3 日将在苏联科学院授予胡萨克同志卡尔·马克思勋章。

胡萨克同志表示希望访问乌里扬诺夫斯克。从乌里扬诺夫斯克返回布拉格。

就接待捷克代表团的计划有什么意见吗？没有。那么就批准接待捷克代表团的计划。

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们说，这个问题准备得很充分，没有引起异议，应该通过决定。

通过决定。

2. 关于与奥地利共和国联邦总统鲁·基希施莱格对苏联的正式访问相关的措施

勃列日涅夫：关于接待奥地利共和国联邦总统基希施莱格的问题，我们政治局也已原则上决定了。

访问将于5月25～30日进行。会谈拟于5月26日举行。

27～29日，拟定访问塔什干和基什尼奥夫。总统将于5月30日从基什尼奥夫飞回维也纳。没有什么意见吧？通过。

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接待基希施莱格的工作非常重要，况且我们与奥地利建立了良好关系。

契尔年科：这个问题准备得很细致。会谈的材料也已准备好了。

通过决定。

3. 康·维·鲁萨科夫同志汇报访问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情况

勃列日涅夫：根据我们的委派，康斯坦丁·维克托罗维奇·鲁萨科夫赴华沙专门与雅鲁泽尔斯基进行了谈话。中央政治局给他下达了相应的指示。

鲁萨科夫同志分发了他与雅鲁泽尔斯基同志谈话的文本。

或许鲁萨科夫同志对于已经分发的材料还想做些补充吗？

鲁萨科夫：谈话的记录已经在政治局里分发了，从谈话的内容来看，我个人也坚信，说明政治局决定我赴波兰与雅鲁泽尔斯基同

志会晤是异常正确和及时的，我此行的目的是传达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口信。

我不想复述谈话的记录，因为各位手里都有谈话的文本。我只想指出，谈话一开始气氛是相当紧张的，有一次竟然引起雅鲁泽尔斯基同志的抗拒，他企图反驳我说的某些结论。可是随着谈话的进展，雅鲁泽尔斯基同志进入心平气和的状态。我代表列·伊·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各种理由是有说服力的，他都正确地理解了。他相信我们政治局，列昂尼德·伊里奇非常清楚地了解波兰的局势并且为了使国内的局势正常化而提出了正确的建议。

应该说，雅鲁泽尔斯基同志现在的处境非同一般。一方面，诸如巴尔奇科夫斯基、拉科夫斯基以及其他一些活动家企图把他推上不正确的道路。他们向他吹风，关于健康力量向他灌输各种不正确的议论，雅鲁泽尔斯基相信了，不仅相信而且企图针对这些同志做出自己的结论和发表言论。诚然，他说，他这样做动机是好的，似乎应该细致地了解策略，这是他采取的策略手段，不能走上公开对抗的道路。我谈到“团结”工会的具体行动、地下活动以及波兰领导采取的措施，并且做出结论说，应该强化这些措施。这时，雅鲁泽尔斯基同志不得不表示赞同。我以列·伊·勃列日涅夫的口信为依据，用具体的实例向雅鲁泽尔斯基说出了完全明确的建议。谈话临结束时，雅鲁泽尔斯基同志完全是另外一种情绪了。他承认，波兰领导起初认为列昂尼德·伊里奇口信中谈到的某些方面是不能接受的，没有对此做出应有的反响。他声称，为了使局势正常化，他们将采取相应的措施。总之，他同意了这些理由。

诚然，应该指出，雅鲁泽尔斯基同志对于许多事情还根本不了解，看来是隐瞒了他，譬如说，报刊上个别反对健康力量、反对社会主义成就、或者包含着公开反苏性质的言论。他甚至还向我提问：何时与在何处刊登的。我回答了。

总体来说，我还想再一次强调，谈话基本上进行得很心平气和，我认为是非常有益的。因此政治局决定与雅鲁泽尔斯基同志举行会谈是及时的和正确的。雅鲁泽尔斯基同志请求转达对列昂尼德·伊里奇、政治局委员们、中央书记处们深深的感谢，感谢这些同志式的建议。

勃列日涅夫：是否有人希望发言？

安德罗波夫：我看过了与雅鲁泽尔斯基谈话的记录，认为这次谈话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契尔年科：谈话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鲁萨科夫同志详细地说明了列·伊·勃列日涅夫口信中包含的有关波兰事态的各种理由。

与此同时，这里也包含着相当重要的建议，这些建议我们得在政治局进行研究和决定。看来向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通报谈话的结论是适宜的。

葛罗米柯：支持雅鲁泽尔斯基，用严肃的理由坚定他为了使国内局势正常化而执行正确政策的决心，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会使他不至于偏离正确的道路。我认为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口信恰恰包含着雅鲁泽尔斯基所必需的一切，鲁萨科夫同志详尽地阐述了这个口信中所包含的理由。

格里申、戈尔巴乔夫、基里连科支持认为谈话是有益的意见。

勃列日涅夫：或许我们可以赞同鲁萨科夫同志访问华沙所进行的工作。当然，波兰问题——这是这样一个问题，靠着一次谈话或者一朝一夕无法解决，需要时间。显而易见，必须帮助波兰人利用目前的时间来巩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阵地。

波兰问题委员会应该继续自己的工作，我要说，应该每天对波兰的事态都了如指掌。

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诵读《关于康·维·鲁萨科夫同志访问波兰人民共和国的通报》的决议草案。

一致通过决议。

4. 关于华沙条约参加国国防部长委员会例行会议

勃列日涅夫：国防部（乌斯季诺夫同志）报告说，根据华沙条约参加国国防部长委员会第14次会议的决定，委员会例行的（第15次）会议将于1982年12月在布拉格举行。现在国防部提出如下建议：

（1）华沙条约参加国国防部长委员会第15次会议将于1982年12月23日至26日举行；

（2）派遣由德·费·乌斯季诺夫同志率领的苏联国防部代表团赴布拉格；

（3）赞许供各国国防部长商议用的关于召开委员会第15次会议以及会议工作总结的公报草稿，待通过后在报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发表。

有什么补充或意见吗？没有。那么我们认为决定通过了。

乌斯季诺夫：列昂尼德·伊里奇，我认为决定应该通过。我们当然还要跟兄弟国家协商。可是我觉得，关于召开各国国防部长委员会第15次会议以及会议工作总结的公报文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葛罗米柯、格里申、戈尔巴乔夫、鲁萨科夫等同志都支持这项建议。

决定通过。

5. 关于与芬兰共产党代表团会谈

勃列日涅夫：政治局分发的报告通知说，根据政治局的委派，跟芬兰共产党代表团进行了会谈，该代表团是由于芬兰共产党非常大会以及党内局势的复杂化，特别是领导层中的分歧而应苏共中央的邀请前来的。

现在代表大会已经开过了，是在5月14～15日举行的。从材料中可以看到，芬兰共产党领导队伍中由于缺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为基础的统一，在贯彻执行1981年召开的芬兰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各项政治和组织的决议方面又没有表现出积极性和始终如一的精神，结果导致党内危机现象继续存在和增长，并为非常代表大会的召开准备了土壤。苏共代表团把我们对芬共的局势的评价通报了芬兰共产党的领导。芬兰人声称，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将向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们传达，也可能向非常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传达。

№06070

苏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韩国飞机事件等问题的讨论记录

（1983 年 9 月 8 日）

绝密

仅此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康·乌·契尔年科同志

出席者：米·谢·戈尔巴乔夫、维·瓦·格里申、尼·亚·吉洪诺夫、格·瓦·罗曼诺夫、维·伊·沃罗特尼科夫、弗·伊·多尔吉赫、瓦·瓦·库兹涅佐夫、米·谢·索洛缅采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康·维·鲁萨科夫同志

1. 关于改进总结社会主义竞赛和奖励其优胜者的实施办法

契尔年科：改进竞赛组织工作的问题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这是今年 4 月份我们研究改进奖励办法时政治局委托办的。当时委托一个委员会研究现行的总结竞赛和奖励优胜者的实施办法。这个委员会由卡皮托诺夫同志主持。现在我们请他发言。

卡皮托诺夫：研究这个问题时广泛吸收了地方党委和各部委参加。下到地方去调查，同时要求下面上报情况，共收到 7 个加盟共和国、14 个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州以及一些部委的建议。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大量工人、集体农庄庄员、专家，党、工会和共青团机关的工作人员。

……①

12. 关于盖·阿·阿利耶夫同志与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美国农业部长约·勃洛克的谈话

契尔年科：阿利耶夫同志提交了他与美国农业部长约·勃洛克谈话的详细记录。大家都知道，谈话时涉及了苏美关系的现状，特别是新的粮食协议的意义问题。勃洛克返回合众国以后发表谈话的精神也是这样的。我认为可以赞同阿利耶夫同志所进行的谈话。

政治局委员们：可以赞同。

通过决定。

13. 关于就南韩飞机入侵一事举行新闻发布会

契尔年科：我们已经事先解决了就南韩飞机事件为苏联和外国记者举行新闻发布会的问题。或许参与这个问题工作的同志会向我们通报一下情况。

格·马·科尔尼延科（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我能向政治局汇报的是：工作组由外交部、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组成，每天都开会，拟定并且向政治局提交相应的建议。现在对于我们来说重点是筹备新闻发布会，决定明天下午3点举行。

乌斯季诺夫：我在塞瓦斯托波尔授奖仪式上讲话时要说说我们对南韩飞机事件的评价。

契尔年科：这很好。

切布里科夫：我要向政治局汇报的是：现在在南韩飞机坠落的地区有13艘美国和日本的舰艇和24艘我们的舰艇。这些舰艇集中在三个地方。此外，那里还有4架美国飞机和5架我们的飞机。现在美国的一条船正在驶近这个地点，以便进行深水作业。

应该说，美国以挑衅为目的，在其俄语广播中声明，如果苏联

① 收集的档案此处缺12页。

飞机出现在美国舰艇上空，它们将被击落。这当然是蓄意挑衅。

由于风向朝着我们的岸边，因此海浪把大约900件与飞机坠毁有关的物品冲到岸上。暂时还没有尸体。

美国围绕着这起事件的宣传中出现一些新的倾向。第一，经常不断地夸张渲染这样一个问题：飞机似乎不是在苏联领空，而是在中立水域上空被击落的。这是明目张胆的谎言。第二，围绕着要求向飞机乘客家属赔偿损失的问题掀起一阵叫嚣。第三，美国和日本的报刊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越来越多地提出问题：为什么美国当局对南韩飞机被跟踪的事实一直保持沉默。许多记者直截了当地对夜间、天气状况以及飞机与苏联歼击机的距离，不能提供准确辨认该机的国籍一度表示惊奇。无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没有披露自己的航行调度台的活动情况。

吉洪诺夫：我们是否要在飞机坠毁的地区进行深水作业呢？

乌斯季诺夫：渔业部有一条船能够进行深水作业。我们试图使用它。

切布里科夫：那里水深不是像估计的80～100米，而是400～600米。在这样的深度作业相当困难。况且那是中立水域。

戈尔巴乔夫：是否研究了我们在国际民航组织会议上该怎么行动的问题？

切布里科夫：国际民航组织无权讨论飞机事件问题。

吉洪诺夫：可是飞行员联合会却发表声明说两个月之内将不跟我们合作。

切布里科夫：它陷入了困难的处境。目前在苏联有很多外国旅游者。假如他们不接待苏航的飞机，那么谁把这些人运出去？迄今为止，只有美国和加拿大对苏航采取了制裁措施。至于我们国内，我们的人及其对待这起事件的态度是最平静的和正确的。应该指出，美国和其他外国记者在莫斯科拿着录音机询问他们对待南韩飞

机事件的态度。回答都是坚定的和尖锐的，记者们很快就走开了。

契尔年科：当前主要的是成功地举行新闻发布会。我们有了就这个问题的决定。没有反对意见就赞同吗？

政治局委员们：没有，可以赞同。

通过决定。

14．关于A.A.巴边科同志

契尔年科：苏联部长会议建议任命A.A.巴边科同志为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建设部部长。他在此之前曾任重工业企业建设部第一副部长。苏共中央书记处审查了这项建议，认为可以支持它。

乌斯季诺夫：这个地区在经济和国防方面都非常重要。工作量将会非常大。

契尔年科：巴边科同志对这项任命持何态度？

巴边科：如果政治局把这一地区委托给我，我将尽一切努力完成党的委托。

契尔年科：祝您成功。

巴边科：谢谢信任。

通过决定。

K.博戈莫洛夫（签字）

№06071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关于处理美国入境飞机等问题的讨论记录

（1983 年 11 月 24 日）

绝密

仅此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康·乌·契尔年科同志

出席者：盖·阿·阿利耶夫、米·谢·戈尔巴乔夫、维·瓦·格里申、安·安·葛罗米柯、格·瓦·罗曼诺夫、尼·亚·吉洪诺夫、德·费·乌斯季诺夫、维·伊·沃罗特尼科夫、彼·尼·杰米契夫、弗·伊·多尔吉赫、米·亚·波诺马廖夫、米·谢·索洛缅采夫、米·瓦·齐米亚宁、伊·瓦·卡皮托诺夫、康·维·鲁萨科夫、尼·伊·雷日科夫同志

契尔年科：讨论政治局会议议程之前，我想要向各位通报一下我与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会见的情况。首先他请求向你们大家转达深切的致意和祝愿，希望友好、和谐与目的性明确地工作。

政治局委员们：谢谢。请向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转达我们的祝愿，希望他迅速康复。

契尔年科：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指出，他不安的是我们迟迟没有批准明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家计划。各位都知道，计划草案已由苏联部长会议准备好并且提交上来了。计划的基

本方向已向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详细汇报过了。他认为现在大家手里拿着的这个计划草案从明天起就应该开始执行。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因此要求帮助部长会议、各部委领导、我们全体经济干部、苏共中央各部明确方向。安德罗波夫同志说，只有我们真正地开展好这项工作，他才能安心。

……①

葛罗米柯：昂纳克同志性格急躁，有时过于病态地对待我们与民主德国的关系。与兰勃斯多尔弗的会谈是在严格的和得体的气氛中进行的，没有任何过分之处。因此如果向民主德国领导提供某一信息，那也得采用最心平气和的形式。

契尔年科：虽然超出了会议议程，可是我还是想要涉及一个问题，这是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委托转告各位的。让他不安的是我们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中间有些同志破坏了自己工作的条件和规程，不能很好地关心自己的健康状况。卫生部第四总局局长恰佐夫院士在给政治局的报告中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应该相互鼓励要严格遵守工作制度，可是自己却违犯了这个制度。恰佐夫提出的问题是正确的。他手里有资料表明，已故的沙拉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在其死亡的那一天在棉花田里行走了12公里，而库纳耶夫说，他每天在田地里行走20公里。我们应该保护各位政治局委员，保护党的领导。

吉洪诺夫：我觉得应该把这一点通知给领导，让他们严格执行。

乌斯季诺夫：有时执行起来很困难。有时文件不能带回家去，就得在办公地点处理。

契尔年科：可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严格遵守我们做出的

① 收集的档案此处缺20页。

决定。

葛罗米柯：我也想要通告各位一个超出会议议程的情况：根据苏联驻美国大使馆掌握的材料，有一个精神变态者，我想是姓弗林特，租了一架波音，想要沿着那架南韩飞机的飞行路线在我国领空飞行，以此来表明这是一架间谍飞机。我们通过华盛顿大使馆把这件事通知给美国政府，警告他们不能允许这种挑衅。可是一旦这种挑衅将要发生，我建议不要击落这架飞机，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间谍飞机。

乌斯季诺夫：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突然。我们怎能知道飞机里面的乘客是间谍或者不是间谍。为了保证我国边境的安全，我们有总的规章。首先向这种飞机发出警告，然后把它击落。

吉洪诺夫：可是显而易见是民用飞机。

乌斯季诺夫：这是向我们挑战。我们今天放过一架飞机，明天又来了另外一架，因此不能同日而语。

葛罗米柯：可是毕竟应该给军队下达指示，不要造成事端。

乌斯季诺夫：我理解政治局决定不击落这架飞机。可是如何处理下一架出现在我们领空的飞机呢？应该分秒必争地做出决定。

波诺马廖夫：美国当局对飞机的这种航线承担责任。

吉洪诺夫：看来应该商定对这架飞机做出例外。

戈尔巴乔夫：也就是说不击落这架飞机，而对其他的破坏者保留我们现行的规章。

契尔年科：我们就这样商定吧，当然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挑衅的话。

K. 博戈莫洛夫（签字）

№06967

苏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反对美国新霸权主义的决议

（1986年9月4日）

绝密

1. 同意爱·阿·谢瓦尔德纳泽、维·米·切布里科夫、谢·列·索科洛夫、阿·费·多勃雷宁、瓦·安·梅德韦杰夫和亚·尼·雅科夫列夫同志在报告中关于该问题阐述的意见（附后）。

2. 委托苏联外交部、苏联国防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苏共中央国际部与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和苏共中央宣传部，并吸收苏联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在三个月之内深入研究并提出关于加强我们反对美国“新霸权主义”政策的综合性措施建议。

3. 第2点中所列的各主管部门和苏共中央各部应根据报告阐述的意见实施实际步骤。

中央委员会书记　米·戈尔巴乔夫

附　录

关于加强我们反对美国“新霸权主义”政策的措施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分析里根“新霸权主义”政策的实际表现和总统本人对于这一问题的言论，可以断定该政策的实质如下：

里根政策中的“新霸权主义”反映了美国当政的右派集团企图重新恢复战后初期美国实行的旨在世界上最终确立美国霸权地位的强权对外政策方针。

虽然“新霸权主义”政策的直接目标目前主要是针对第三世界国家，首先是针对具有进步政治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事实上，它的锋芒指向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

里根当局明白在当今世界力量对比中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便给自己提出任务，即改变对比关系之后，不仅能够制止世界社会主义阵地的继续扩大和巩固，而且能够“消耗”苏联及其盟国，用一般的军备竞赛或者挑起世界各地的冲突，都能破坏加速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种政策与美国力求达到在军事上超过苏联的方针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想利用这一优势牵制我们阻止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专横的可能性。

现阶段“新霸权主义”政策主要具体表现如下：

——事实上宣告非社会主义世界的所有地区都是美国“切身利益”的范围，企图吸收其军事－政治集团的盟国保护这些利益，无论他们同意或不同意参加这些行动；

——对反对本国（阿富汗、尼加拉瓜、安哥拉、柬埔寨）政府而进行武装斗争的反革命力量提供扩大的和公开的军事援助（包括提供新型高效武器）；

——在估计美国不受到惩罚的情况下，以这种或那种借口（保证美国公民安全，“惩罚”恐怖行动等等）直接使用美国的武装力量（格林纳达、黎巴嫩、利比亚）；

——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压力，首先是对持有进步政治倾

向的国家（美国及其盟友在联合国大会专门会议上对非洲紧急形势的立场，美国政府对利比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其他国家对外经济联系的限制和消除稳定作用的措施）；

——公开藐视国际组织的决定，首先是联合国的决定，经常藐视自己盟国的立场。这种藐视与美国国内沙文主义情绪的压力和新保守主义反动势力的猖獗遥相呼应。

除了竭力采用“新霸权主义”学说的精神——使用实力方式以外，美国政府通过更换披着民主外衣、已经垮台的独裁政府的途径，实行政治迂回，将笼罩着社会骚乱的国家继续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在挑起地区冲突的同时，强调按照美国的条件作为优先任务解决区域冲突的重要性，说什么，不预先完成这个任务，则不可能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在限制武器及裁军方面有重大进展，不可能有美苏间富有成果的对话，也不可能在这方面把“国际恐怖”问题突出到美国对该问题的解释上。

必须保证挫败“新霸权主义”政策，当然主要之点——是顺利实现我们国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计划，将其军事威力保持在应有水平，始终一贯地继续执行积极而稳妥的对外方针，其中包括继续加强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当然也要考虑到我们的资金和能力。

此外，针对加强我们反对在各地区具体表现的“新霸权主义”政策制定特殊的长期措施是必要的。在制定科学依据的综合措施时，应当以我们在建立各方都能接受的国际安全体系构想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为出发点。

不能等待完成这项工作，为此需要一定的时间，重要的是现在业已拟定同反对“新霸权主义”政策任务有联系的我们行动的基本方针，并根据可能性实施某些具体步骤。

1. 注意到“新霸权主义”政策的锋芒实际上是指向整个社会主义友好国家，在兄弟党中央书记有关国际问题的例会上适当地讨论加强反对这项政策的问题。

2. 发展中国家以及他们在这方面的联合行动，特别是考虑到在哈勒尔[①] 举行的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第八次会议总结的不结盟运动，在联合国、其他大型国际会议中心范围内加大反对美国“新霸权主义”的力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3. 既然中国领导人对里根“新霸权主义”的危险后果也表现出不安，那么可以就这个问题开始尝试同中国人对话。开始可由学者们进行。

4. 为反对美国“新霸权主义”政策，应该做我们在西方政界人士（其中包括美国国内）的工作，他们也担心由于里根政府在世界“热点”地区的冒险行动将引起国际局势尖锐化的危险，并担心由于华盛顿企图使自己的“新霸权主义”政策具有整个北大西洋组织性质而被拖入冲突的可能。

5. 在这项计划中同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同革命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进行相应的工作是有益的。

6. 揭露美国“新霸权主义”，苏联大众媒体必须高度重视对政策的起源、具体表现和危险后果进行系统的有根据的报道。同时，在我们对外政治宣传中必须有效地利用这种政治基本观点的科学研究成果。

① 哈勒尔是埃塞俄比亚东部城市，哈勒尔盖省的行政中心。

7. 除了利用官方渠道在上述方面进行工作外，在反对美国“新霸权主义”政策计划中还可以由苏联克格勃系统实施某些活动。

爱·谢瓦尔德纳泽、
维·切布里科夫、
阿·多勃雷宁、
瓦·梅德韦杰夫、
亚·雅可夫列夫、
谢·索科洛夫

№06074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关于美国驱逐苏联工作人员的讨论记录

（1986 年 10 月 22 日）

绝密

工作记录

仅此一份

主持人：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

出席者：盖·阿·阿利耶夫、安·安·葛罗米柯、列·尼·扎伊科夫、叶·库·利加乔夫、尼·伊·雷日科夫、米·谢·索洛缅采夫、维·米·切布里科夫、爱·阿·谢瓦尔德纳泽、弗·伊·多尔吉赫、鲍·尼·叶利钦、尼·弗·塔雷津、亚·帕·比留科娃、安·费·多勃雷宁、米·瓦·齐米亚宁、瓦·安·梅德韦杰夫、Г.П. 拉祖莫夫斯基、A.H. 雅科夫列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同志

1. 关于由于美国驱逐苏联工作人员而采取的措施

戈尔巴乔夫：美国当局采取了新的敌对行动，我们应该就相关的措施交换一下意见。雷克雅未克会晤[①] 之后事态的发展表明，我们的美国“朋友”没有任何建设性的纲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气氛更加白热化。他们像土匪一样，行动极其粗暴。

① 雷克雅未克是冰岛首都，1986 年 10 月 11～12 日，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里根在这里举行“工作性会晤”。两国在削减战略武器和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上达成意向性协议，但是在太空武器和停止核试验等问题上没有进展。

索洛缅采夫：是的，他们的行为就像是大路上的土匪。

戈尔巴乔夫：期待美国当局做出什么有建设性的行动和建议是不可能的。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必须戴上宣传家的眼镜，继续向美国和整个世界舆论界进行进攻性的解释工作。华盛顿的活动家们害怕这一点。海关三天三夜的过程中一直扣留我在雷克雅未克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和苏联电视材料。

雅科夫列夫：布加耶夫同志打电话给我，说这些材料至今还被美国海关扣留着。

戈尔巴乔夫：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向美国当局施加压力，向社会舆论界解释我们的立场，证明美国撕毁削减和销毁核武器问题协议的责任。

里根及其周围的人近来为了再一次采取敌对行动没有找到任何好的办法，——只好驱逐55名苏联外交官。我们的5名工作人员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华盛顿回答为什么驱逐我们5名外交官时这样解释说，而50名被驱逐的借口是使美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数量上对等。对这一反苏的敌对行动不能置之不理。我们不能面对着最坚决的措施裹足不前。美国人威胁地宣布说，假如我们采取报复行动，他们便对我们驻美国的外交人员采取进一步的步骤。我认为由于苏美关系的局限性，这回我们驻美国大使馆也一定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必须想出严肃的建议。具体地可以做些什么？从美国大使馆召回我们那些在那里当服务人员的人。接着，必须限制美国代表到驻莫斯科大使馆来出差。每年通过这条渠道到我们这里来的美国公民近500名。最后，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允许到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来做客的问题，一年为200人。我们的人出差，作为客人访问大使的情况很少。将来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处理这种事。

总体上证实了我在雷克雅未克对美国总统说的话：看来苏美关

系正常化——是未来几代人的事了。

谢瓦尔德纳泽：我们驻美大使馆的人员有243名，旧金山总领事馆有25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共有229人，列宁格勒总领事馆25人。此外，我们有250名公民在美国人那里当服务人员。得把他们召回来。这将明显地影响到美国代表的活动。至于出差，到美国大使馆来的每年达500人。我们几乎不利用这种形式到美国去。在这件事上应该奉行对等的原则。美国人在这方面受到的损失将多于我们。我们也不使用像大使个人邀请这种形式。一年到驻美国大使那里去的不到180人。

多勃雷宁：况且这些“客人”中间有许多人大使甚至不认识。

谢瓦尔德纳泽：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里当服务人员的有14人来自芬兰。应该要求这些人离境，还有8名美国人被怀疑从事非法活动，也应该离境。与美国人的行动对等，我们应该同样对待武官处。结果我们留下来的工作人员与美国人数量相同——大使馆里各为251人，领事馆里各为25名工作人员。

以前美国方面为我们的代表机构限定的定额是320人，这也证明了美国当局行动的挑衅性质。我们从来都没有让这个定额满员。

戈尔巴乔夫：这一切都应该阐述得论据充分，准备一份有力的政治文件。

谢瓦尔德纳泽：美国当局采取新的敌对行动，是适应即将举行的选举的要求。在我们的文件里也应该说明，假如美国人针对我们的行动采取报复措施，我们也将这么做。

戈尔巴乔夫：同志们就这个建议有没有异议？

政治局委员们：没有。

多勃雷宁：对待基辅和纽约领事馆也这样处理，是适宜的。

葛罗米柯：在目前形势下也许不要急于公开化。现在这样没有意思。

戈尔巴乔夫：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放慢。至于我们行动的总路线，行动起来应该平静，但要坚决。这不仅从苏美关系的角度来看，而且在一般的国际事务中也很重要。既然美国人这样与苏联谈话，那就可以设想他们怎样对待其他国家。

我曾经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谈过话。当前应该停止向美国人购买玉米。

葛罗米柯：在我们的声明中也许不值得说这件事，只用行动来实现。

索洛缅采夫：我们的声明中应该引用谢瓦尔德纳泽同志说的那些数字资料。

多勃雷宁：美国人对待我们武官处采取的行动是没有先例的。

戈尔巴乔夫：我们也把美国的武官驱逐出境。

切布里科夫：在我们的掌握中还有备用的一步棋，必要时可以使用。我已经向政治局汇报过了，我们在我国驻美国大使馆里发现了许多窃听系统。可以把这个事实公之于众，目的是揭露美国的特务活动，举行新闻发布会，展示美国特务的窃听器具。

葛罗米柯：他们在自己的代表机构中发现了多少窃听装置？

切布里科夫：一套。这里的数字对我们有利——1∶150。

戈尔巴乔夫：这可以考虑。

谢瓦尔德纳泽：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就这个问题发表声明？

戈尔巴乔夫：文件一经准备好。我们看看，然后可以用无线电和电视播发，也可以在报刊上发表。

政治局委员们：正确。

戈尔巴乔夫：我本来打算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说明美国人在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让事情往什么方向发展。揭露他们的谎言和诈骗行为。可是如今在美国当局采取这一敌对行动之后，看来不合时宜。也许不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而是通过电视向我们的人民说

明这一情况更适宜。

雷日科夫：正确。

戈尔巴乔夫：讲话中不会提出什么新的建议。因此未必有必要专门散发讲话文稿。在我们所确定的立场范围之内表明，美国当局对破坏雷克雅未克协议应该承担责任，他们进行诈骗活动是为了歪曲事实，误导社会舆论。也可以说明，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事态的发展表明，里根驾驭不了自己嘈杂的同伙。

葛罗米柯：可以讲这一点，但要采取这样的形式，而不至于袒护里根。

戈尔巴乔夫：是的，里根是个说谎者。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

同志们有别的建议吗？

政治局委员们：没有。

通过决定。

2. 关于与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总统 C. 马舍尔之死有关的措施

戈尔巴乔夫：由于马舍尔之死，我们应该决定采取相关的措施。阿利耶夫同志明天飞往莫桑比克。我们飞行员最后的报告是："我们被击中了"。

阿利耶夫：他现在在南非共和国。

葛罗米柯：应该通过红十字会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前去看望他并且要求释放他。

……①

① 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

№06073

扎伊科夫等人关于恢复核试验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6年12月8日）

机密

份数编号：5

苏联单方面宣布暂缓进行任何核爆炸的举动将于1987年1月1日到期。

虽然美国拒绝回应我们单方面的举动，宣布缓期在政治方面仍具有重大意义。

合众国继续频繁地进行核试验（在我们宣布的缓期期间进行了23次），在这种条件下，苏联继续不进行核试验，会给我们的安全带来危害。政治上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恢复核试验。然而，出于政治上的考虑，1987年进行试验的计划是这样安排的：次数大约相当于我们宣布暂缓以前进行过的试验次数。这使我们有可能保持苏联由于其单方面的举动而获得的对外政策上的主动性。

我们将在苏联政府的专门声明中宣布我们恢复核试验的决定，这项声明应该在1986年12月中旬发表。

为了进一步向美国施加压力，我们认为在这项声明中要对我们单方面暂缓举动的重要性给以政治上的评价，批评美国的消极立场，同时还应该宣布以下几点：

第一，苏联恢复核试验只在1987年美国第一次核爆炸之后进行；

第二，假如美国宣布决定停止自己的核试验，苏联准备随时回到宣布暂缓的举动上来。

在声明中还必须强调苏联准备立即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这项任务可以分阶段解决。

考虑到西方群众性信息媒介通常在周末报道最完全的信息和对世界性的事件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声明通过无线电和电视转播在12月11日或18日进行，翌日见报是适宜的。

我们认为提前向朋友们、“德里六国”、不结盟运动（通过它的主席罗·穆加贝）、联合国秘书长、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通报做出的决定，并且通知其他核大国是有益的。

附上决定草案。

呈请审查。

亲笔签名　列·扎伊科夫

亲笔签名　维·切布里科夫

亲笔签名　爱·谢瓦尔德纳泽

亲笔签名　谢·索科洛夫

亲笔签名　阿·多勃雷宁

亲笔签名　Ю. 马斯柳科夫

亲笔签名　Л. 里亚鲍夫

1986年12月8日

№1597/ОС

附　录

苏共中央决定草案

关于苏联政府就苏联单方面宣布暂缓进行任何核爆炸的举动将于1987年1月1日到期的声明及相关措施

1. 同意列·尼·扎伊科夫、维·米·切布里科夫、爱·阿·谢瓦尔德纳泽、谢·列·索科洛夫、阿·费·多勃雷宁、Ю.Д. 马斯柳科夫和Л.Д. 里亚鲍夫等同志1986年12月8日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中阐述的意见（见附件①）。

2. 批准苏联政府声明的文本（附件1）。1986年12月18日在无线电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发，翌日见报。

3. 批准给苏联驻华沙条约各国、古巴、蒙古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柬埔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大使的指示文本（附件2）。

4. 批准给苏联驻“德里六国”、芬兰和津巴布韦大使以及驻联合国苏联代表和维也纳各国际组织的苏联代表的指示文本（附件3）。

5. 批准给苏联驻美国、大不列颠、法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指示文本（附件4）。

6. 责成B.Ф. 彼特罗夫斯基（苏联外交部）、A.M. 彼特罗西扬茨（中等机械制造工业部）和H.Ф. 切尔沃夫（国防部）为苏联和外国记者就苏联政府声明举行新闻发布会。

7. 苏联外交部确保在华盛顿和纽约就苏联政府声明举行新闻发布会。

---

① 即本专题文件№06073。

8. 苏共中央国际部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革命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以及各个国际社会组织和运动系统进行解释工作，以确保在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对苏联立场的支持。

9. 苏共中央宣传部确保群众性信息媒体，包括在国外，为支持苏联的举动而进行宣传。

10. 苏联国防部、苏联中等机械制造工业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从军事工业问题的角度就苏联将在1987年进行核爆炸在一周的期限之内准备好并且提出建议。

中央书记　（签字）[①]

① 此处签字难以辨认。

№06077

切布里科夫关于授予米尔克苏联英雄称号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7年11月27日）

绝密

份数编号：2，抄件

№2388－Ч

苏共中央

关于授予埃·米尔克苏联英雄称号

今年12月28日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将军80岁诞辰。

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昂纳克与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的谈话（1987年11月20日给苏联外交部专电 ш/т№1110）中对埃·米尔克在其一生各个阶段的贡献给了很高评价。昂纳克指出了他积极参加德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反法西斯斗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对确保共和国的国家安全事业、发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合作关系的巨大贡献。埃·昂纳克认为埃·米尔克值得获得苏联的奖励，主张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

因此，国家安全委员会特报告如下。

埃·米尔克1921年加入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德

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站在阶级斗争最激烈的领域。从30年代初开始积极参加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进行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比利时、法国和德国处于地下状态，参加了抵抗运动。

主持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工作达30余年。在埃·米尔克的领导下，德国朋友们定期地获得并且转交给我们特别珍贵的政治、军事战略、科学技术，其中包括防务和国民经济性质的情报材料。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之间的合作在许多方面有赖于埃·米尔克的努力，而在工作的各个方面不断发展。

埃·米尔克自1950年起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1976年起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者、苏联真诚的和可靠的朋友。他在自己的党务和国务活动中始终不渝地、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苏共与德国统一社会党之间的关系、巩固苏联与民主德国的友谊与合作的路线。

曾获得三枚列宁勋章、十月革命勋章、四枚红旗勋章、一级卫国战争勋章。两次被授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英雄称号，是民主德国各种高级勋章的获得者。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注意到埃·米尔克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及其表现出来的英勇精神和英雄主义，在确保苏联安全和巩固国防的事业中对苏联的贡献，对发展我们两国关系中个人的重大贡献，在他80岁诞辰之际，建议授予埃·米尔克苏联英雄称号。

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支持此项建议。

附上苏共中央的决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命令草案。

呈请审查。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维·切布里科夫（签字）

附　录

苏共中央关于授予埃·米尔克苏联英雄称号的决定（草案）

通过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授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将军苏联英雄称号的建议。

同意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该问题的命令草案（见附录）。

中央书记

1987年11月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草案）关于授予埃·米尔克苏联英雄称号

鉴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将军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并在斗争中表现出英勇精神和英雄主义，在确保苏联安全和巩固国防能力的事业中对苏维埃国家做出了贡献，对于发展苏联与民主德国的关系做出了重大的个人贡献，在他80岁诞辰之际，特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并授予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安·葛罗米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　T. 缅捷沙什维利

№06079

卡普托关于更新保密总局技术装备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8 年 12 月 6 日）

绝密

苏共中央

关于苏联部长会议报刊保守国家机密总局特工机关的技术保障

苏联部长会议报刊保守国家机密总局（B.A. 鲍尔狄列夫同志）报告说，苏共中央 1961 年 3 月 7 日№177/77rc 决定责成苏联保密总局对外国记者发往国外的信息进行非公开的监督，以便获得必要的情况和及时地组织反宣传。为此目的，苏联保密总局特工机关同时接通了一系列外国记者的通讯线路。

近来，越来越多的西方情报机关传递材料开始采用快速的计算机技术和其他现代化通讯手段（例如传真），可是苏联保密总局特工机关的工作却仍然以陈旧的机器（电报打字机）为基础，非常复杂，没有相应地更新技术基础，这样特工机关很快便不能完全胜任所赋予它的使命。

有鉴于此，建议责成苏联通讯部会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保密总局研究对苏联保密总局特工机关的技术保障问题。这些问

题应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Ф.Д. 博布科夫同志）和苏联通讯部（B.A. 沙姆申同志）协商。

认为支持苏联保密总局的建议是适宜的。

附上苏共中央决定草案[①]。

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　A. 卡普托

1988年12月6日

① 参见本专题№11744文件。

№11744

苏共中央关于保密总局特工机关技术保障的决定

（1988 年 12 月 15 日）

绝密

特别卷宗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关于苏联部长会议报刊保守国家机密总局特工机关的技术保障

赞同苏联部长会议报刊保守国家机密总局关于对苏联保密总局特工机关的技术保障的建议。转交苏联部长会议研究。

供签署用

（签名）①

1988 年 12 月 15 日

表决结果：

……②

抄送：鲍尔狄列夫、卡普托、斯米尔秋科夫

① 此处签名难以分辨。

② 文件上 8 人签字表示赞成，但签名难以分辨。

№06080

克留奇科夫就纳吉当年在苏活动的档案材料问题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9年6月16日）

特别卷宗

№1236/K/OB

莫斯科

关于纳吉·伊姆雷在苏联活动的档案材料

传来的消息表明，匈牙利反对派势力与1956年事件期间匈牙政府首脑纳吉·伊姆雷相关联而掀起的进攻，旨在损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所走过的道路的声誉，破坏党和现任领导的威望，在国内居民中间煽动对苏联的不友好情绪。

反对派组织要求从法律上和政治上彻底为纳吉恢复名誉，创造一个受难者和两袖清风者，一个完全正派的和有原则性的人的光环。围绕着纳吉的名字叫嚣的重点是：他曾是个“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始终不渝的战士”，“民主和社会主义根本革新的拥护者”。匈牙利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纳吉是由于苏联的压力而被指控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处死刑并且被处决的。反对派向纳吉的名字举起盾牌，竭力把他变成“为争取民主与进步、匈牙利的真正独立而斗争”的象征。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层中对待根本谈不上给纳吉恢复

名誉的问题没有统一的观点。И. 波日盖、М. 叙列什和И. 霍尔瓦特首先解决加强自己在党内的影响的任务，有时公开地随声附和反对派，为纳吉的功勋和优点唱赞歌。К. 格罗斯、Р. 涅尔什、М. 雅肖等人主张在法律上给他恢复名誉，同时又认为开展无限歌颂纳吉的运动的矛头首先是针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苏匈关系。匈牙利许多中年的，特别是老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对待这一运动抱着激烈批判态度。他们中间盛行一种根据党的某些老战士的讲述而形成的见解，认为纳吉20～30年代在匈牙利和在苏联的行为并非像反对派控制的报刊向匈牙利居民所灌输的那样无可指责。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整理了属于30年代后半期至50年代初苏联肃反的材料的过程中发现一些文件，它们让人们了解了纳吉在我国的活动以前所不为人知的方面。

从上述文件中得知，纳吉于1929年流亡到苏联，从一开始便主动地寻求与国家安全机关接触，1933年自愿地当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的间谍（秘密情报员）。化名“沃洛佳”。他积极地搜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落进内务人民委员部视野的匈牙利的和其他的政治流亡者以及苏联公民的情况。有一份文件证明：纳吉在1939年建议内务人民委员部“收拾”38名匈牙利政治流亡者，其中包括Ф. 明尼赫。他在另一份报告中开列了他所熟悉的150名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俄罗斯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说如果需要，他可以对他们进行“工作”。

根据纳吉——“沃洛佳”的告密，有数批参加了匈牙利、德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政治流亡者被判刑。他们皆被指控进行“反苏的”、“恐怖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土地专家”、“死不改悔者”、“注定灭亡者的垂死挣扎”等案件）。一份文件（1940年）中指出，纳吉为15名被逮捕的在国际土地研究所、共产国际、全苏广播委员会工作的“人民的敌人”“提供了材料”。“沃洛佳”的活动导致

著名学者E. 瓦尔加、匈牙利共产党一系列活动家（Б. 瓦尔加－瓦戈、Г. 法尔卡什、Э. 奈曼、Ф. 加保和其他一些人）被逮捕。其中一部分人被枪决。许多人于1954～1963年间被恢复名誉。

从现有档案材料中看不出纳吉是被迫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合作的。更有甚者，文件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沃洛佳”“在工作中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主动精神，是一个业务熟练的间谍”。

考虑到匈牙利开展的宣传进攻、它的性质和针对性，我们认为把我们现有的文件通知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K. 格罗斯并且商议可以利用这些文件的问题是适宜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B. 克留奇科夫（签字）

№06081

布鲁捷茨和斯洛博佳纽克关于美国向立陶宛提供人道援助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90 年 8 月 23 日）

机密

苏共中央

苏联驻美国大使馆（1990 年 8 月 17 日№4942 专电）报告说，美国打算通过一项决定：拨出 1000 万美元作为向立陶宛提供所谓人道援助。上述举动的目的显然是给这个共和国的分离主义运动以支持，也鼓动苏联其他地区类似的过程。

考虑到这一点，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与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的代表人物接触时应该强调莫伊尼亨议员的想法的可疑性，他倡议把这个问题列入参议院的议程。美国社会也存在着另一种意见，认为提供这种“援助”在苏联可能被当成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会促使莫斯科与维尔纽斯之间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应该支持这种意见。

也值得让美国方面注意到把“援助”与防务拨款法案联系起来，可能加剧苏联社会舆论界对华盛顿在其他问题上的行动的不良反应。由于以“援助”为名的物资运抵苏联领土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也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国会仍然通过相应的决议，那么就应该对这一举动做出原则性的评价，认为这是企图干涉苏联的内部事务。

我们认为把这份报告抄送苏联外交部是适宜的。

特呈请同意。

苏共中央国际部副主任　K. 布鲁捷茨（签字）

苏共中央民族关系部副主任　C. 斯洛博佳纽克（签字）

1990 年 8 月 23 日

№06/1－534c

№06082

马纳延科夫关于举行全军党代会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91 年 3 月 2 日）

苏共中央

今年 3 月 1 日，协调委员会会议研究了基层党组织进行工作总结和选举的问题，讨论了全军党代会的筹备进程。

协调委员会的成员们建议今年 3 月 29～30 日在苏军中央剧院举行全军党代会，有 1025 名代表参加。建议把“关于苏联武装力量党组织的现状以及加强其思想团结和从组织、政治上巩固党组织的措施”以及与选举全军党委和监察委员会相关的问题列入会议的议程。就第一个问题，将由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主任 Н.И. 什利亚格同志做报告。

协调委员会会议指出，在举行的党代会上，共产党员们提议邀请苏共和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承担国防任务的各部委领导参加全军党代会。还提出建议，希望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党代会上讲话。

呈请同意。

苏共中央书记　Ю. 马纳延科夫（签字）

1991 年 3 月 2 日

答复是否同意：（戈尔巴乔夫等签字同意）

1991 年 3 月 12 日

№11745

法林就埃塞俄比亚的局势及苏联的对策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91年5月16日）

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国际部归纳了能够说明埃塞俄比亚局势发展、该国危机加强的前景的资料。所进行的研究证明，埃塞俄比亚国内以及围绕着这个国家出现了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情况危险，其他一些国家卷进非洲之角地区，尖锐的冲突对该地区构成威胁。

这份资料也最有说服力地描绘了苏联方面对待局势应采取的态度：在可能发生转折的情况下，应该坚持我们两国传统的良好关系，力求缓和该地区的紧张，保持苏共与埃塞俄比亚工人党的关系，寄希望于主张民族和解的力量，疏远国家领导当局奉行的暴力路线。

谨作信息汇报。

报告的抄件分送苏联外交部、苏联国防部，可供其工作中利用。

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　B. 法林（签字）

1991年5月16日

附　录

关于埃塞俄比亚国内的政治危机与苏联对其调解的可行步骤（分析报告）

埃塞俄比亚的危机具有了无所不包的性质。不仅现存的统治制度的命运，而且作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的未来都出现了问题。

1. 现存制度与反对派的军事对抗加强了。各种反政府集团——厄立特里亚解放人民阵线、提格雷解放人民阵线、奥罗莫解放阵线、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运动以及其他一些集团控制了1/3以上的国土，包括人口最稠密和产粮省份厄立特里亚、贡德尔、戈贾姆、沃累加。

反对派首先是在种族主义的口号下行动的。

厄立特里亚解放人民阵线以厄立特里亚居民的代表自居，提格雷解放人民阵线声称代表提格雷人，奥罗莫解放阵线宣布代表分布全国各地的最大民族奥罗莫人。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运动以埃塞俄比亚“占统治地位的”阿姆哈拉民族的名义行动。这些组织多数有社会主义方向的派别（从强硬的行政体系的主张者到社会民主模式的拥护者），也有君主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帮派。

1990年6月，各反对派运动（除了厄立特里亚解放人民阵线）联合成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阵线的军队与厄立特里亚解放人民阵线采取一致行动，加强了对政府军的进攻。反对派计划近期攻占红海的港口阿塞巴（70%的外贸周转和国内惟一的炼油厂），在阿斯马拉地区包围第二革命军并且把北方各区与埃塞俄比亚其余的部分分割开。

2. 民族大会（申果）向反对派发表呼吁书（今年4月23日），

号召停火，举行谈判，组建过渡性的民族团结政府，但是像宣布大赦制度的反对者一样，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

有三个因素决定了这些为时太晚的和平倡议的无效：

第一，反对派不满意于呼吁书的宣言性质，认为没有指出调解冲突现实可行的能够让反政府势力满意的途径和条件；

第二，反对派成分极其复杂，纲领宗旨相互矛盾，因此其营垒内部对抗，其中包括军事上的火拼加剧；其个别集团不仅对待现存的统治制度，而且彼此之间也互不妥协；

第三，埃塞俄比亚现在的领导前后自相矛盾，没有把军事解决冲突从日程中撤掉（前不久宣布全民总动员就是证明）。

3. 尖锐的经济危机加重了形势的危机。军费开支、经济政策的失误，近6年来两次最严重的干旱（由于连续干旱，有550万人处在饥饿死亡的边缘上）使国内绝大部分居民倾家荡产。食品价格上涨，燃料和工厂原料短缺。在埃塞俄比亚不安定的条件下，西方不愿意提供新的贷款，而苏联和东欧各国收缩与它的经贸合作。

4. 国内社会紧张局势在加剧。失业、过重的捐税、武装力量的严重损失（从年初至今死伤15000人）不仅动摇了门格斯图个人的威望，而且也缩小了埃塞俄比亚工人党的社会基础（它在1990年的人数是70万）。曾经试图把党从先锋队变成一个全民族的政党（埃塞俄比亚民主团结党），让它失掉明确的意识形态方向，这一企图遭到了主张选择社会主义的人（特别是军队里的全体政治委员）反对，另一方面遇到了右翼亲资产阶级和亲西方集团的不信任。

5. 埃塞俄比亚的国际地位复杂化了。1989年11月，埃塞俄比亚恢复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支持美国在波斯湾的行动，这引起了一系列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否定的反响，而这些国家以前本来同情门格斯图的制度。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领导更改了对外政策的优先权，但是这丝毫没有对西方的立场发生本质的

影响，也没有削弱西方与反对派的联系。

6. 我们曾经建议埃塞俄比亚的首领与反对派积极对话，认真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可是他不愿意听取。苏联方面在研究亚的斯亚贝巴的军火订货时表现出克制态度，主张把经济关系转到正常的互利的合作轨道上来，这一切使得苏联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处在复杂的阶段：大量缩减了在埃塞俄比亚的军事专家的数量；撤出了苏联海军在红海达赫拉克群岛上的技术物资供应点；提出了偿还债务的要求（29 亿多卢布，其中 6 亿卢布已经过期）。

7. 现任国家元首门格斯图·哈伊雷·马里亚马及其身边最亲密的一伙掌握政权究竟能坚持多久，这非常难以断定。不能排除以军官为首的军队推翻现存制度新的尝试。埃塞俄比亚知识界的政治积极性近来猛烈增长，引起人们的注意。今年 4 月，知识界的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公开要求门格斯图辞职，停止内战，建立“人民信任的政府”，为了保持埃塞俄比亚的国家观念和国家的统一而达成民族和解。

8.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国在下述几个方面采取积极行动是适宜的：

第一，有计划地和目标明确地促进埃塞俄比亚政治局势的稳定，实现国内和平与民族和解，保持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

第二，在我们可能的范围内，尽力排除产生国际紧张局势新的危险的根源，它对整个东北非和近东的安全将会造成无法预测的后果。

第三，不调解厄立特里亚问题，埃塞俄比亚局势的稳定实际上是不现实的，这是基本出发点。考虑到已经取得的经验，特别是非洲南部的经验，调解也必须纳入国际合作（首先是苏联、美国、联合国），它的进程才能加快。也不排除召开国际会议，吸收利益相关的国家共同解决非洲之角的问题。

第四，事态可能发生各种转折，在这种情况下，也要保持并且尽可能巩固苏联和埃塞俄比亚两国人民的传统良好关系，而假如新的领导上台执政，则保持苏埃关系的友好性质。

第五，继续保持苏共与埃塞俄比亚工人党（或者与它将变成的党）的关系，寄希望于那些反对独裁主义和暴力，坚持寻求民族和解思想的力量。必须疏远门格斯图及其最亲密的一伙，让他们明白，我们不能同意他们的暴力路线。

9. 苏联在对待埃塞俄比亚冲突的政治路线以上述宗旨和态度为基础，符合苏联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以及和平发展的基本趋势。

在国际方面，这种路线能够证明新的政治思维路线的有效性，展示苏联对外政策的公开、正派和爱好和平的性质，证明苏联领导真正忠诚于承认各国人民有选择的自由的原则，忠诚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人道化的思想。

在国内政治方面，这条路线会使反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失去土壤，因为谈到“意识形态的盟友”时，他们把不始终如一强加给苏联的对外政策。

№11746

祖耶夫关于卡尔迈勒返国致苏共中央的信

（不早于1991年6月19日）

1991年6月19日，在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在苏联逗留4年之后以私人身份携夫人离开莫斯科回阿富汗长期居住。他曾作为我们的客人住在苏联。巴·卡尔迈勒返回祖国之事是经纳吉布拉同意之后才成为可能的。

巴·卡尔迈勒请求转达他对苏共领导人给予他本人和家属的帮助与关照表示深切的谢意。他还保证，过去和现在他都是苏联的真诚的朋友。

巴·卡尔迈勒请求在喀布尔市安顿下来之前为他本人及其暂时留在莫斯科市的家庭成员（儿子的一家、女儿的一家和单身的儿子）保留苏共中央以前通过的决定中所规定的住宅、医疗服务和支付补助。

特此报告。

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　Ю. 祖耶夫

【专题说明】

关于恢复顿斯科伊修道院问题

（1982 年 10 月至 1983 年 1 月）

顿斯科伊修道院始建于 1591 年，是为纪念莫斯科免遭克里木汗卡扎－格来的侵略而修建的男修道院。修道院占地 6.8 公顷，整个建筑群包括独顶小教堂、大斋堂、钟楼、五顶大教堂、齐赫文斯基教堂、塔楼，以及围墙，至 1711 年方全部建成，历时 120 年。1964 年赫鲁晓夫执政年代被辟为 A.B. 休谢夫建筑科学博物馆的分馆。本专题文件包括东正教莫斯科和全俄牧首、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委员皮缅关于恢复顿斯科伊修道院问题给勃列日涅夫的信，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调查，以及安德罗波夫主政以后，苏共中央同意教会请求的决议。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高增训翻译）

№06945

皮缅为恢复顿斯科伊修道院致勃列日涅夫的信

（1982 年 10 月 18 日）

极敬重的、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请允许我以俄罗斯正教教会的名义向您转达最恳切和迫切的请求——研究关于将 1592～1593 年建于莫斯科市的顿斯科伊修道院转交归莫斯科总主教管辖的教会使用。

1988 年是罗斯受洗[①] 1000 周年纪念。这一件事对世界基督教历史意义重大。对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纪念日。顿斯科伊修道院将成为罗斯受洗 1000 周年的纪念性建筑物，成为莫斯科总主教管辖的教会的行政中心，那里将集中从事广泛和各种爱国的及维护和平活动的部门，这些部门现今分布在城市各处为其安排的不合适的地方。

顿斯科伊修道院历史建筑群转交教会管理，将有利于我们国家向外国社会和宗教界的解释工作，将证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对教会的高度重视。这将是揭露针对我国教会状况进行反苏维埃诬蔑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正面解决这一问题时，由我们承担修缮、保存作为历史建筑古

① 公元 988 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接受东正教为罗斯国教，命令基辅市民在第聂伯河畔接受希腊牧师的洗礼。接着，罗斯各地城乡居民也先后接受洗礼，随着东正教成为俄罗斯国教，俄罗斯的封建化过程也加速进行。1988 年是东正教成为俄罗斯国教的 1000 周年。

迹的整个修道院建筑和空地的义务。

我们伟大的祖国目前正在准备隆重纪念苏联成立60周年。我们每一个公民怀着对祖国命运理所当然的满意和深刻的喜悦之情来迎接这个纪念日。由于我们国家的英明政策，您的伟大工作，使欧洲得以保持和平38年。我们星球的全体进步人们热烈称赞您那种保护人类免受核灾难袭击毁灭的和平首创。

我们这些教会的信徒们真诚地接受和赞同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旨在为我国各族人民幸福生活和世界各国人民和平生活的高尚政策。这些仁爱原则已在那部有赖于您的有效鼓舞力和有引导作用的思想和活动而制订的苏联新宪法中巩固下来。俄罗斯正教教会怀着对祖国的热爱感情，将利用与100多个国家教会联系的机会，竭尽全力为神圣的和平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其中一个最光辉的榜样就是今年5月在莫斯科顺利举行的由我们倡导的“宗教活动家为拯救神圣的生命恩赐免遭核灾难全世界代表大会”。我们教会每年向和平基金提供3000万卢布经费。

极敬重的列昂尼德·伊里奇，我敢向您保证，满足我们关于将顿斯科伊修道院移交莫斯科总主教管辖的请求，将为我们的正常而紧张的工作创造条件，将会更加扩大和加深造福于我们伟大祖国的我们教会爱国主义和拥护和平工作。

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衷心祝愿您事业成功，健康长寿！

致深深的敬意。

莫斯科和全俄牧首　皮缅[①]

① 皮缅，原名伊兹韦科夫，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1930年剃度为修士，1960年为大主教，1971年成为莫斯科和全俄牧首。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06946

为恢复顿斯科伊修道院勃列日涅夫致杰米契夫等人的信

（1982 年 10 月 18 日）

致彼·尼·杰米契夫同志

米·瓦·齐米亚宁同志

瓦·菲·绍罗同志

请你们研究这个问题。依我的意见，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列·勃列日涅夫

№06947

关于顿斯科伊修道院历史和现状的报告

（1982年12月14日）

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牧首皮缅请求将前莫斯科市的顿斯科伊修道院转交莫斯科总主教管辖的教区。据皮缅的意见，转交修道院的做法会得到外国社会和宗教界的肯定评价，并且是一个揭露关于我国教会状况的反苏维埃诬蔑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在修道院拟安置教会机关。在得到正面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总主教管辖的教区承担修缮和保存修道院综合建筑的义务。

顿斯科伊修道院始建于1591年，是著名的历史和建筑古迹。修道院占地面积6.8公顷，四周用围墙围住，修道院内有大小教堂、住持内室、僧侣单人房间和日常生活用的建筑物。这里是安葬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著名活动家的墓群，他们是：哲学家П.Я.恰达耶夫，诗人А.П.苏马罗科夫和М.М.赫拉斯科夫，艺术家В.Г.佩罗夫，历史学家В.О.克柳切夫斯基，“俄罗斯航空之父”尼·叶·茹科夫斯基。在修道院内陈列着许多从俄罗斯各地收集起来的和保留已失去的建筑古迹的著名俄罗斯纪念雕塑模型。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曾在修道院内设立反宗教博物馆。现在这里是А.В.休谢夫[①]建筑科学博物馆分馆的办公地点。在大教堂和其他建筑内分布着陈列品和19～20世纪初祖国建筑艺术历史科学研究处的办公室贵重资产、科学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其他

① 休谢夫，苏联建筑师，苏联科学院院士。主持设计喀山火车站、列宁墓、莫斯科饭店等，以及制定莫斯科市改建计划。生前三次获苏联国家奖。

部门。

考虑到顿斯科伊修道院建筑群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以及收集到国家稀世珍宝，是否可以委托苏联文化部、苏联部长会议宗教事务委员会和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协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建设委员会民用建筑工程委员会及全俄罗斯保护历史文化古迹协会共同提出转交使用前修道院的部分教区建筑物的条件，提出今后发挥修道院范围的一系列博物馆设施职能的程序及修复和保护全部建筑群的程序，以及研究关于将院内的 A.B. 休谢夫建筑科学博物馆分馆资产迁移到其他地方的问题。

同时还知悉教会在最近几年内将自费设计和修复全部建筑群（转交给教区的和留给国家机关管辖的）修道院围墙和塔楼。应当拨补偿开支，用于将 A.B. 休谢夫建筑科学博物馆分馆的陈列品和资产的搬迁和为这一机关建设新的场所。

（签名）[①]

① 原件此处有四人签名，但复印件字迹模糊，无法辨认。

№06948

杰米契夫等为移交顿斯科伊修道院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2年12月29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依照委托，关于转交莫斯科市前顿斯科伊修道院归莫斯科总主教管辖的教区使用的问题已同有关组织进行了研究。

我们认为，对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牧首皮缅在信中所提的请求持肯定的态度是有可能的，并将其移交到苏联部长会议审查。

考虑到顿斯科伊修道院建筑工程和古老的大墓地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古迹，我们认为必须委托苏联文化部、苏联部长会议宗教事务委员会和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协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建设委员会民用建筑工程委员会和全俄罗斯保护历史文化古迹委员会共同与正教教会的代表一起讨论前顿斯科伊修道院部分建筑物转交莫斯科总主教管辖的教区的条件问题。同时还应注意在顿斯科伊修道院范围内还要保存一系列国家博物馆设施并使之发挥作用。

修缮顿斯科伊修道院全部建筑群，修道院的围墙和塔楼，完善建筑群的保护地带，拟由莫斯科总主教管辖的教区负担经费，该教区还应该补偿用于迁移A.B.休谢夫建筑科学博物馆的陈列品和资产以及为展示博物馆募集品新建场所所需的费用。

彼·杰米契夫、米·齐米亚宁

鲍·斯图卡林、瓦·绍罗

№06949

契尔年科关于执行移交顿斯科伊修道院的命令给齐米亚宁的指示

（1982 年 12 月 29 日）

致米·瓦·齐米亚宁同志

已报告尤·弗·安德罗波夫同志。他已原则上同意。

可以发出命令执行。

康·契尔年科

№06950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皮缅请求的决议（摘录）

（1983年1月4日）

绝密

第 СТ90/67ГС 号

关于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牧首皮缅的信

以肯定的态度对待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牧首皮缅在他信中提出的请求，并将此请求转交苏联部长会议审查。

表决结果：

中央委员会书记：

伊·瓦·卡皮托诺夫——同意

鲍·尼·波诺马廖夫——同意

弗·伊·多吉尔赫——同意

尼·伊·雷日科夫——同意

康·维·鲁萨科夫——同意

康·乌·契尔年科——同意

【专题说明】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社会矛盾与冲突

（1985 年 3 月至 1991 年 12 月）

1985 年 3 月 10 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契尔年科病逝。3 月 11 日，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从此，苏联开始了戈尔巴乔夫主政的历史年代，直至 1991 年底苏联社会发生剧变，苏联共产党解散，联盟国家解体。编入本专题的共 29 份文件，这些文件反映了苏联社会长期郁积起来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从中可以探寻苏联社会剧变的原因和教训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赵宏、吴玉英、张建文、高增训翻译）

№05610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坚持二十六大方针的讲话（摘录）

（1985年3月11日）

在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经尤·弗·安德罗波夫和康·乌·契尔年科的积极参与下制定的战略方针，永远都不改变。这一方针的目的是加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改善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这里指的是改革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指的是改善社会关系的体系，首先是经济体系；指的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物质条件及精神面貌。

当前，我们面临着使国民经济向快速发展道路的决定性转变。我们应该，也必须在短时期内进入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领域，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社会劳动生产率。

为了更加顺利和更快地完成这一任务，必须继续始终不渝地完善经济机制和整个管理系统。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在选择最适宜的解决方法的同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意味着要始终不渝地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扩大权力，提高企业的自主性和责任感，增强它们对工作最终结果的关心。这就意味着使所有经济的发展，最终都要服从于苏联人民的利益。

党将始终贯彻其制定的社会政策。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福利——这个纲领性的原则应该赋予更深刻、更具体的内容。我们都明

白，改善人的生活条件，应该根据他对共同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什么地方偏离了这个原则，那里就必然出现破坏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最重要的团结和安定因素的社会公道。

№05611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关于继承二十六大方针的讲话（摘录）

（1985年4月23日）

今天，我们重新强调由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制定的战略方针的继承性。按列宁主义的观点，继承性意味着必然前进，发现和解决新问题，排除一切阻碍发展的因素。为了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旨在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政策和我们的总路线，我们应该无条件地遵循这一列宁主义传统。

主要问题在于怎么样和依靠什么国家才能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治局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实现这个高速发展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把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经济的集约化和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上，改革管理和计划，改革机构和投资政策，普遍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从根本上改善工作作风，那么加速增长，而且是实质性地增长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我想，全会的与会者都是赞同这个结论的。如果我们让组织经济和社会的潜力起作用，首先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极其认真地、高效地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

作为我们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作为全力准备召开党的第26次代表大会时的主旨总口号应该是——创造性的劳动，言行一致，高度的主动精神和责任心，对自己、对同志的严格要求。

№05615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关于加强同酗酒作斗争的命令（摘录）

（1985 年 5 月 16 日）

……

2. 上班时（在工作地点、房间、企业、机关、团体范围内）酗酒或上班时不清醒者处以 30～50 卢布的行政处罚。

工长、工段长、调度员、车间主任和其他领导，上班时与其所属工作人员一起酗酒，或者不采取措施将醉酒人员调离工作岗位，或者对其所属人员酗酒或所属人员醉酒后仍留在工作岗位上隐情不报的，处以 50～100 卢布的行政处罚。

对于违反本条规定的人员，在对他们实施行政处罚的同时，还要给予纪律处分。

……

7. 为了牟取暴利收购和贩卖为数不多的伏特加和其他酒类，以及日用品和农产品，倒卖收款单和提货单，发票单据，各种文娱和其他企业门票，倒卖书籍、乐谱、唱片、磁带、影片胶卷和别的有重要价值的物品，如果牟利不超过 30 卢布者，可给予 50～100 卢布的行政处罚并没收投机者的物品。

对违反本条规定的案件，由人民审判员单独按联盟共和国规定的程序进行审理。

附　录

关于莫斯科居民酗酒情况的统计资料

按年龄分段显示的莫斯科男女酗酒量指数

年龄	每千人中酗酒人数		所占比例	
	男	女	男	女
15～19	89.4	5.0	4.9	4.2
20～29	133.1	6.3	18.7	14.4
30～39	195.4	8.4	19.1	21.6
40～49	268.5	13.7	31.6	36.5
50～59	131.6	6.6	10.6	15.4
60及60以上	59.4	2.5	5.1	7.9
总计	159.2	7.3	100.0	100.0

在所考察的人口中，因酗酒进过防治所的（14.1%），进过醒酒所（66.6%），因酗酒叫过救护车的（19.8%）。在1964～1982年期间，苏联酗酒人数比例增加，每人每年消耗酒精量达10升。

№06075

检察院关于鲁斯特刑事案件调查结果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7 年 7 月 31 日）

抄件

机密

份数编号：3

Усл. №1630 – Б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结束了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公民鲁斯特·马休斯（1968 年生）的刑事案件的调查。

认定，鲁斯特驾驶从汉堡市航空俱乐部租用的“采谢纳 – 172P”型体育飞机，破坏了国际飞行准则，未持有经过确认的文件，未经苏联权威性机关的许可，于 1987 年 5 月 28 日 14 时 25 分飞越苏联在芬兰湾上空的领空边界，14 时 56 分飞越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科赫特拉亚尔维市地区该海湾的海岸线。后来，鲁斯特在苏联领空超越了确定的国际航线在禁止外国飞机飞行的区域飞行了 718 公里，并且于当日粗暴地破坏了社会秩序，表现出对社会的明显不尊重，在危险的低空不只一次绕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红场和附近人口密集的市区飞行，随后于 18 时 45 分降落在莫斯科河桥上，对人们的生命及其财产构成威胁。

鲁斯特承认起诉书中对他指控的犯罪事实，详细地供认了他的行为种种情形。他的罪行也经专家们的结论、见证人的证词、物证

和其他证据所肯定。

考虑到鲁斯特被指控为犯有两个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刑法有关条款规定的罪行，案件应该由苏联最高法院审理。

我们认为有必要委托最高法院会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外交部、苏联最高检察院和苏共中央有关部门审查关于可以允许国外群众性信息媒体的代表出席该案的法庭审判的问题。

呈请同意。

亚·列昆科夫[①]

Ф. 鲍勃科夫

1987年7月31日

①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列昆科夫，1940年参加苏共，1980年起任苏联总检察长。

№11747

克拉夫佐夫关于发表刑事统计材料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7 年 9 月 17 日）

机密

份数编号：1

№7 /385

致苏共中央

关于发表刑事统计的某些材料

苏共中央书记处于 1987 年 7 月 14 日通过关于在公开报刊上发表审判正式统计材料的决定：公布因盗窃国家或公共财产、偷窃个人财物、故意杀人、与麻醉剂有关的犯罪、以牟利为目的的酿造私酒、流氓行为、与违犯交通规则有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的人数。苏联司法部与苏联检察院（A.M. 列昆科夫同志）、苏联内务部（Б.В. 扎博京同志）、苏联法院（В.И. 捷列比洛夫同志）、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Ф.Д. 鲍勃科夫同志）以及苏联部长会议报刊保护国家机密总局（B.A. 鲍尔狄列夫同志）协商，按上述犯罪种类准备了 1987 年度上半年审判统计材料（带有与去年同期比较的材料）供在《消息报》上发表。

特呈请同意。

附上供在《消息报》上发表的材料1页。

司法部部长　Б.В. 克拉夫佐夫（签字）

附　录

供在《消息报》上发表的材料

苏联司法部近日审查了各级法院今年前6个月的工作问题。

根据各级法院的统计报告，被判刑者中间在醉酒状态犯罪的人数开始缩减。违犯交通安全条例的案件有所减少——这类犯罪造成严重后果而被判刑者为10562人，比去年减少18.6%。

国内伤害个人的暴力犯罪有所减少，流氓行为有所减少。因故意杀人罪而被判刑者为4682人，因各种流氓罪——53008人。

然而，侵占社会主义的和个人的财产罪却继续保持很高的水平。今年上半年因盗窃国家或公共财产而被判刑者为64231人，其中因以偷窃的途径窃取而被判刑的为40373人，有63574人承认偷窃公民的个人财产。因以牟利为目的的家酿私酒而被审判者上升了39.1%。与麻醉剂有关的犯罪暴露得多起来，法院因这类犯罪对17537名公民进行了审判。

法院的统计资料经过专家们的分析。他们分析的结果将用于制定完善司法机关的工作和预防违法行为的措施。

№06076

拉林等人关于在公开报刊上发表刑事统计的某些材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不早于 1987 年 9 月 17 日）

机密

根据苏共中央关于在公开报刊上发表刑事正式统计的某些材料的决定（1987 年 7 月 14 日发 Cr－56/5c），苏联司法部（克拉夫佐夫同志）提议在《消息报》上发表司法机关本年度前半年工作的个别结果。

指的是公布有关因侵占社会主义财产和公民的私人财产、伤害个人罪和其他各类预谋违法行为而被判刑的人数。该问题和供发表用的文本已与苏联最高检察院（列昆科夫同志）、苏联内务部（扎博京同志）、苏联法院（捷列比洛夫同志）、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鲍勃科夫同志）以及苏联部长会议报刊保守国家机密总局（鲍尔狄列夫同志）协商。

附上供发表用文本。

我们支持本建议。呈请同意。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副主任　И. 拉林（签字）

苏共中央宣传部副主任　П. 斯列兹科（签字）

1987 年 9 月①

① 此处日期字迹模糊。

通知同意

（签名）[①]

附　录

供《消息报》发表的材料

苏联司法部审查了各级法院今年前6个月的工作问题。

根据各级法院的统计报告，被判刑者中间在醉酒状态犯罪的人数开始缩减。违犯交通安全条例的案件有所减少——这类犯罪造成严重后果而被判刑者为10562人，比去年减少18.6%。

国内伤害个人的暴力犯罪有所减少，流氓行为有所减少，特别是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亚美尼亚。因故意杀人罪而被判刑者为4682人，因各种流氓罪——53008人。

然而，侵占社会主义的和个人的财产罪却保持很高的水平。今年上半年因盗窃国家的或公共的财产而被判刑者为64231人，有63574人承认偷窃公民的个人财产。这类犯罪在哈萨克、摩尔多瓦、爱沙尼亚最为盛行。

因以牟利为目的的家酿私酒而被审判者上升了39.1%。这首先属于俄罗斯联邦各州，还有乌克兰和哈萨克。与麻醉剂有关的犯罪暴露得多起来，因这类犯罪而被判刑者也相应地增加了。例如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被判刑1473人，比去年上半年增加62%。

摩尔多瓦和拉脱维亚被判刑者人数也有所上升。

---

① 此处签名字迹模糊。

法院的统计资料经过专家们的分析。

分析的结果将用于提高预防违法工作的效率。

（签名）[①]

① 此处签名字迹不清。

№05618

安德列耶娃谈坚持社会主义原则

（1988年3月25日）

大概不只是我一个人注意到，党的领导人号召把“揭露者”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各阶段实际成就上来，以乎像命令一样，爆出了一批又一批新的“揭露者”。

就拿约·维·斯大林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作为例子。据我的意见，正是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所有批判性攻击的狂症，与其说是关系到历史人物本人，倒不如说关系到所有最复杂的过渡时代。在这个与整个一代苏联人的史无前例功绩相联系的时代里，今天这些人逐步放弃积极的活动，强行把工业化、集体化、文化革命这些把我们国家引向世界伟大强国的概念塞入“个人崇拜”的公式。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怀疑。事情已经发展到坚决要求“斯大林分子”（随心所欲地把人列入其中）进行“忏悔”的程度。

我支持党的号召，捍卫社会主义先驱者的光荣和尊严。我想，我们应该从这些党的、阶级的立场出发来评价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历史作用。

“左派自由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们形成了一种伪造社会主义历史的倾向。他们闭口不谈国家过去和现在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却向我们暗示，在过去的年代里，国家做的都是错事和罪过。他们在追求历史真理完备的同时，用伦理学范畴那种不切实际的理论偷换社会发展的社会政治标准。

“左派自由主义者”观念的另一个特点——公开的或隐蔽的世

界主义倾向，某种没有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

培养青年人工作的复杂性加大，还在于“新左派自由主义者”和“新斯拉夫主义者”思想范畴中出现了非正式的团体和联盟。他们的领导层让善于挑拨离间的极端分子占了上风。最近，这些自发形成的组织在这不是社会主义多元化的基础上呈现政治色彩。这些组织的领袖们经常谈论在“议会制度”、“自由工会”、“自治出版”等等基础上的“权力分配”。以我之见，所有这一切可以得出结论：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的这些讨论的主要和最最基本的问题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党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领导作用。毫无疑问，由此可以对政治、经济和思想得出全部理论和实践结论。

正如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在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同时，首先应该在精神方面采取行动。同志们，我们不应该用任何借口放弃这些原则。”

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捍卫原则。原则不是来自别人的恩赐，而是在祖国历史急剧转变时刻，由我们流血牺牲换来的。

№05616

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关于公开性》的决议（摘录）

（1988年7月1日）

1. 苏联共产党全苏代表会议从社会主义和改革的利益出发，认为继续发展公开性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代表会议把公开性作为一个已在发展的过程来分析，并强调指出，始终一贯地扩大公开性是反映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实质的必要条件；也是动员人民，吸引每个人参加到所有社会、国家、集体事业的必要条件，使之成为在全民监督所有社会机关、权力和管理机构活动的基础上反对社会主义蜕变的有效保证。

代表大会将公开性视为实现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和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力、自由和职责的必要条件。

所有领域里的公开性是继续深化改革及其不可逆转过程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2. 与此同时，代表大会指出，公开性作为改革的尖锐武器，本身也需要深化和支持……

4. 必须取消使用关于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生态环境等统计信息的不合理限制，建立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搜集、处理和传布体系，保证各类图书馆开放，用立法方式整顿档案资料的利用。

5. 代表大会认为，制止报刊发表批评文章，以及刊登有损公民名誉和人格的非客观报道文章都是不允许的。公开性要求大众信

息媒体担负起社会、法律和道德责任。

6. 不容许利用公开性损害苏维埃国家、社会的利益，损害个人权利；不容许宣传战争和暴力，反动的种族主义、民族和宗教偏执性，以及宣传残暴行为，传布淫秽作品，不容许利用公开放性行骗。

№04430

莫奇利尼琴科就各级官员对精简党中央机关干部的态度致戈尔巴乔夫的信

（不晚于1988年9月29日）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①]：

现就苏共中央机关精简整编过程中机关党组织的工作和生活存在的几个问题向您请示。

首先，我们要汇报的是中央机关仍然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形势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机关工作人员热烈欢迎党的代表大会和六月全会的决议，完全赞同并支持上述决议。现在，各部的共产党员正投身于党提出的关于深化国内改革这一新的重要方针的组织和宣传保障工作之中。大多数人理解已经确定的精简整编措施。工作人员能够平静地对待取消医疗保健、食堂和生活服务工作中铺张浪费的措施。

与此同时，虽然没有发现明显的消极态度和不满情绪，但部分领导干部仍然对因机关整编而带来的个人命运的变化而担忧。他们担心，在各部门普遍裁员的条件下，如果得不到相应的帮助，我们被裁减下来的工作人员将很难找到工作。许多人还担心自己被中央机关“精简”到别的部门工作会有一定程度的不受信任。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最近一些大众传媒非客观报道的结果，已发现对党的机关

① 戈尔巴乔夫对此件的批示是：交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尼科诺夫、斯留尼科夫、切布里科夫、拉祖莫夫斯基同志阅；解决问题时请考虑莫奇利尼琴科同志的意见。

产生了一定的不友好态度。

机关党组的党委、支部与各部的领导人一起，正在就机关工作问题进行有关的解释工作。着重强调要对在这次中央机关改组过程中被裁减下来的工作人员给予最大的帮助，向他们提供社会保障。

考虑到苏共中央机关将裁减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尚不包括已到退休年龄的255人，需重新安置的领导干部将近700人，这一数字还将随着彻底更新机关措施的实施而增加。我们大多数的工作人员都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有在党、政、经济部门工作的丰富经验。

我们认为，在管理机构普遍精简的条件下，只有预先采取措施，才能完成对中央机关下岗人员合理使用的任务。特别是，现在就应该着手统计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委、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各部委、大众信息媒体等一些部门的空缺职务，我们的很多同志可以向这些地方流动，也可以在苏共中央内部组建一个权威性的委员会，安置“下岗”人员。

由于机关行将改组，工作人员也提出了一些社会－生活方面的问题。一些同志的住房问题尚未解决，还有一些同志担心他们可能失去到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第一门诊部就医的权利。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没有园圃用地，对退休人员在成立退休人员园艺协会时是否可以优先分配给他们土地，还出现了技术工作人员（约要裁减600人）的安置问题。可否就这些问题授权苏共中央办公厅解决。

由于中央机关面临改组，中央各部召开党组织总结及改选会议的时间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认为中央各部的此类会议在中央机关改组之后再召开较为适宜，党的总结及改选大会可在今年12月份举行。

恳请您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给予必需的帮助和支持。

苏共中央机关党组书记　K. 莫奇利尼琴科

№03686

萨哈罗夫就苏联面临的问题在苏联第一次人代会上的发言

（1989年6月9日）

安·德·萨哈罗夫：……我略去论据，提出我建议通过的政权法令正文。

政权法令。

根据人民政权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宣布：

1. 苏联宪法第6条作废。

2. 通过苏联各种法律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独有的权利。

苏联法律在加盟共和国境内须经其最高法律机关批准方具有法律效力。（掌声）

3. 苏联最高苏维埃是代表大会的工作机关……

为节约时间我略去第4条。

5. 选举和罢免苏联最高公职人员，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和委员、苏联最高法院院长、苏联总检察长、苏联最高仲裁长、中央银行行长，以及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消息报》总编——为代表大会的独有权利。上述官员有义务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并且不受苏联共产党及其机关决定的约束。

6. 副职候选人……

再略去一条。最后一条。

第7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仅限于担负保卫苏联国际安全的任务。

我请求成立一个决议起草委员会，在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上审定这一法令。

我请求苏联公民以个人或集体的形式支持本法令，就像在企图毁坏我的名誉、吸引开对阿富汗战争责任的注意力时所做的那样。

省略论据。

我继续说。苏联遭军事进攻的危险早已消失。（大厅里喧哗声、掌声）。我们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比美国和中国的军队加起来还要多。我建议成立一个起草缩短服役期决议的委员会。大体上士兵和军士缩短二分之一，同时相应缩减所有种类的军事装备。但是，要极少缩减军官人数，以便过渡为职业化军队。这样的决议对提高信任和裁军，包括全面禁止核武器会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同时也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

我的发言是原则性的。我继续讲。（大厅里喧哗声、掌声。）

民族问题。我们从斯大林主义继承了民族－宪法制度，这种制度具有“分割、控制”这样的帝国思维和帝国政策的印记。小的加盟共和国和遵循行政管辖原则进入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小国是这一遗产的牺牲品。它们在漫长的几十年中遭受了民族压迫。现在这些问题戏剧性地浮到了表面。

但是，一些大的民族也成了这一遗产的牺牲品，其中包括俄罗斯民族，主要由它背负着帝国的傲慢和内外政策中的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重负。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我建议讨论向民族宪法体制的联邦横向制度过渡的问题。这一制度规定赋予所有现存民族——领土国家平等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权利，不论其大小和现有制度如何，并保留现有边界。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将有必要确定边界。

大会主席：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您还是结束吧。已经用

了两个议程的限定的发言时间。

安·德·萨哈罗夫：马上结束。我省略论据。我省略了很多。

大会主席：您的所有时间，两个议程限定的发言时间已经过去了。请原谅，结束吧。

安·德·萨哈罗夫：我坚持……

大会主席：结束吧，萨哈罗夫同志。萨哈罗夫同志，您尊重大会吗？好，到此结束。

№04429

科诺托普就民主化与公开性问题致戈尔巴乔夫的信

（1989 年 6 月 15 日）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尊敬的中央政治局各委员[①]：

我同意，我们的社会进程正不可逆转地前进着。当然，现在说这些为时已晚，但我还是要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难道你们的“经验”还不够吗？例如，看看波兰，不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要向哪个方向发展了吗？令我们不幸的是，现代形式的民主化与公开性使犹太复国主义者、民族主义分子、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形形色色的贪赃枉法者、新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其他妖魔鬼怪死而复生并日益猖狂。世界主义者几乎是在利用所有信息媒体，尤其是报刊和电视、诸多文化设施，用各种颓废混乱的思想，欺骗劳动群众，散布对党的不信任，千方百计让人们忘却苏联人民自古以来的爱国主义情感教育，而扎哈罗夫和卡里亚金——我都羞于提起——他们还是苏联人民代表，却怀着不可告人的企图，居然向最最神圣的弗·伊·列宁挥起了大棒。他们及其“战友”的许多“活动”都已得手，如果你们这次还是对他们的挑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他们还能成功。现在他们还没有受到官方正式的驳斥，但人民已在担忧了。

正如你们所了解的那样，现在军队、行政机关，包括克格勃在

① 此信分发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

内，普遍遭到公开的、恶意的非难和攻击。青年人的处境尤为窘迫，他们不断地被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一部肮脏的历史，没有任何人性、任何英雄和卓越人物。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没有良知和荣誉感的人肆意歪曲事实，而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掠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行径而发展起来的发家史精心地隐瞒起来，即使现在它们仍在榨取那里人民的血汗，要他们支付难以承受的债务。而俄罗斯，同其他兄弟共和国一道，总是先人后己，先援助别人，而后才是弥补自己的破洞。为避免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奴役，俄罗斯也给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援助。世界尚不知道，竟有如此大言不惭和叛徒式的恶意煽动。每当我看到或听到苏共中央总书记与对苏共对社会主义没说过一句好话——相反，却恶意极深的萨哈罗夫站在一起时，总是让人难以忍受。而西方大老板将高兴地拍拍我们的肩膀，从各个方面夸奖我们的改革，高兴地搓着两手。我认为，他们已在提前享受吞食我们的快乐，就像吞下波兰一样。当然，他们也可能会噎住，但那些与他们有共同思想的人也在这样梦想着，其中也有我们国家的人，还有部分人民代表。因此，叶夫图申科在大会上谈到新的“不流血的卫国战争”一说并不是偶然的。但他明显犯了一个错误，我们的人民不会轻易自觉自愿地将自己的历史战果拱手相让。

相信我们吧，同志们，今天的苏联人遭到别人千方百计的侮辱，被人称为“奴隶”，不仅他们自愿劳动的热情被打消，而且他们也失去了在这个世界正常生活的兴趣，因为改革的最初几年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多于快乐。目前，族际斗争愈演愈烈，以后他们也有可能由于社会分化加剧，苏联人的物质状况与精神状况不平等的差距迅速增大而引发更加可怕的社会风暴。现在，费多罗夫以及那些同他一样在我们这个“拙劣制度”下得到不少好处的活动家们多次重复“聪明和能干的人”的论调，而我以为，那些被认为“水火不

相容”的人现在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生活和工作。而那种被在思想领域和哲学领域里的投机分子所吹捧的貌似科学、实际混乱的观念，目前正在我国大行其道。

我认为，我们不可饶恕地、过早地在计划体系尚未完善的时候就将其摈弃，转而依靠“超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经济”理论，我们过早地抛弃了党的领导作用，首先是党的干部政策，转而依靠缺乏应有纪律和严格秩序的、虚构的自愿人民政权制，将我们的“议会”变成资产阶级的议会更是灭顶之灾，因为在那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只有“美元”和富商们才能行使真正的权力。也可以这样形象地说，他们愿意饶恕谁就饶恕谁，愿意将谁处死就处死谁。人民代表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蛊惑人心者，而人代会有时就像是个大戏台，并非偶然。

我想，你们不难想象，我是以何等的忧虑和惶恐的心情给你们写这封信的，但潜意识告诉我，你们的反应很可能是西方心理式的——“我们不要激化事态”。我之所以说出这样的意见是因为你们现在特别相信蛮不讲理的《星火》和《观点》杂志和尤·阿法纳西耶夫、格·波波夫等人，而不愿相信那些一辈子也不热衷于名利地位的普通人——他们在最艰苦的年代经受住了考验，为了祖国和人民而奋不顾身，忘我牺牲。

如果仅我一个人或是与我同时代的一小部分人这样想的话，那我将会很幸福，但实际上却远非如此。

致以真诚的、同志式的敬礼！

В.И. 科诺托普①

1989 年 6 月 15 日

① 科诺托普，1944 年加入苏共，1959 年任莫斯科州执行委员会主席，1965 年任苏共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1985 年退休。

№03688

各地代表要求改善民族关系给苏共中央九月全会的信件

（不晚于1989年8月）

E.A.扎瓦利申，苏联共产党党员，雅罗斯拉夫尔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与会的同志们，必须承认，今天我们国家民族团结已经动摇了，在一些加盟共和国里发生了一些不健康的、导致民族关系紧张的事件。极端主义分子成了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受到坚决抵制。在许多情况下共产党领导人给了他们主动权，而且佯装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因此形成了对这些加盟共和国内其他民族代表们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民族主义现在比食品缺乏更为可怕。……

集体来信，60人签名，第比利斯：从去年秋天起该市居民，其中包括我们——军官、超期服役的准尉、工人和职员、外高加索军区军人家属都是煽起具有反社会主义和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亲眼目睹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苏维埃政权存在70年的这个加盟共和国的境内充满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分子能够任意活动，不受惩罚，公然号召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迫害共产党员，把外国军队引入加盟共和国的领土。加盟共和国政府不是采取果断的措施及时制止类似行动，而是去巴结一些青年大学生和一些知识界的小团体。我们认为，还是这种立场导致了悲惨的第比利斯四月事件[①]。

① 1989年4月9日，第比利斯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反政府游行示威。演成流血冲突的事件。参见本卷“第比利斯的动荡”专题。

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雷赫内村村委会通过的宣言书摘录，约32000人签名：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直接依赖于它的政治权力的扩大。只有把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变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它的国民经济才有可能完全按全苏劳动分工的原则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合理地综合利用独一无二的自然、气候条件，物质和劳动资源。

终于到了坚决改造错误的政治制度的时候了。那种把所有民族划分成等级，并使一些加盟共和国服从于另一些加盟共和国的中世纪等级制度要存在到何时？甚至在党内的机构也形成了这样一种状况，把阿布哈兹州的党组织变成令人费解的受双重管辖的体系。今天极其重要的任务是必须改善民族关系，巩固阿布哈兹、格鲁吉亚和生活在阿布哈兹地区的所有民族间的兄弟般的团结。这只有在列宁联邦思想的范围内通过恢复阿布哈兹政治、经济和文化主权来实现。

P.X.汉贾罗夫，莫斯科市：乌兹别克斯坦流氓坏蛋焚烧房屋、抢劫、杀人。我清楚地想象到，抢劫的受害者在这些日子里怎么看待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到底谁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刑事犯罪分子、他们公开的和隐蔽的保护者，还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显然，一些领导人将更担心人民代表中突然会有人质问，说："这是谁，敢下命令迅速整顿乌兹别克斯坦的秩序"？

农业公用建筑修理托拉斯工作人员集体来信，11人签名，费尔干纳[①]：我们经常听到："回你们的俄罗斯去"。疏散土耳其－麦斯赫基人我们感到是法西斯坏蛋的胜利。过不了很长时间，就会出现表面的平静，内卫部队被撤走，那时搞大抢劫、大屠杀的人就会

① 费尔干纳，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城市。1924年以前称斯科别列夫市。

重新从地下钻出来。地方政权保护不了我们。在最近的一些事件中，当人们往警察局打电话报告房屋被烧着时，警察所关心的不是被烧毁的房屋的地点，而是打电话的人的身份。

摘自拉脱维亚里加国立音乐学院党的公开会议上通过的信：各加盟共和国劳动者，特别是各当地民族，不能容忍全联盟各部、部门在自己民族的领土上为所欲为。不容许把狭隘的部门利益冒充全民和国家的利益。由于受共和国中央支配一方对这种政策的纵容，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工业臃肿、其他各行各业陷入危机之中。发生了非集团化，拉脱维亚民族被逐渐淹没在外来人的海洋里。由此产生了民族磨擦和共和国改革力量分裂的现实威胁。

M.Ю.维亚尔克，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纳尔瓦市：我们打心底里对国际运动和劳动具体联合会代表们的活动感到愤怒。在爱沙尼亚国营地方发电站预选会议上，克连戈利姆纺织工人说“我们要求把爱沙尼亚东北地区划分出来，并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决不反对来我们这里生活，尊重我们语言和风俗习惯的人。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却在支配着爱沙尼亚的土地呢。

无线电测量仪器研究所工作人员集体来信，36人签名，维尔纽斯市：全苏第十九次党的代表会议以后，居住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所有民族的人曾以为，他们将能够积极地参加改革。但实际上，我们这些非本地民族的人不能参加社会生活，我们得不到信任，被指控参与了斯大林时的镇压，歪曲社会主义，导致经济停滞和衰退。对俄罗斯人使用这样一些侮辱性的词：“占领者”、“斯大林分子”、“移居者”、“沙文主义者”、“异族人”。我们要求改善现状，如果我们是由于国家错误的、没有考虑立陶宛民族利益的政策来到立陶宛的，那么，就要直接向我们宣布这一点并提供条件使我们迁回俄罗斯。如果我们是我们国家和我们加盟共和国

有平等权利的公民，那么我们要求谴责肆无忌惮地迫害立陶宛俄罗斯居民的运动，并惩罚这一运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公民权利……

食品工业公司自动控制系统专门设计局的工作人员集体来信，基什尼奥夫市：最近一年半到两年在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发生的事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关注。民族主义思想、对俄语居民的仇恨正在深入到土著民族居民的意识里。地方大众新闻传媒粗暴地歪曲历史事实，硬说在共和国内似乎正在执行一种使摩尔达维亚人丧失民族性、消灭摩尔达维亚语言和文化的政策。容许侮辱非摩尔达维亚语言和文化的政策。容许侮辱非摩尔达维亚族人名誉和人格的言论。谈论“移民者入侵”。除了许多新闻工作者外，创作界的代表们也在煽起民族纠纷中发挥了作用。在首都中央广场群众集会上响起这样的号召：“摩尔达维亚是摩尔达维亚人的摩尔达维亚”，“摩尔达维亚人，团结起来！”。

我们感到，共和国内极端力量增强了。他们以改革的口号作掩饰，极力保持行政命令的管理方式，并且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排挤俄语。为此，他们要求把凡是占据生产活动各个领域领导职位的人必须掌握摩尔达维亚语这一具有歧视性的条款，写进共和国境内语文使用法草案中。

A.B. 卢萨科夫，莫斯科市：我们、俄罗斯人已经为民族间的实际平等工作了 70 年。因此，我们长期观察了至今仍没有正常生活条件的非黑土地带。俄罗斯人散居在各民族边疆区，而在那里他们经常被提醒，当地居民应当有特权。苏维埃政权教导我们所有公民不分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不可动摇的公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一原则不适用于俄罗斯人。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我接受的是明显歧视俄语居民的法律。

A.C. 塔拉修克，苏联共产党党员。切尔卡瑟市：土地——这

是公有的财产，因此，诸如“哈萨克土地”，“雅库特[①]土地”等等的概念是反常的。仅这一点就能将“哈萨克土地”上的乌兹别克人或者“雅库特土地”上的哈萨克人置于从属地位。只要还存在民族间的地理界线，只要某块领土优先权还存在着原则上的争论，类似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问题[②]就会产生。

① 雅库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22年4月27日成立，属俄罗斯联邦，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奥列尼奥克河、勒拿河、科雷马河流域，面积310.32万平方公里，人口近90万，1/3以上为雅库特人。

② 1988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发生了严重的骚乱。见本卷《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事件》专题。

№05629

苏联人民代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摘录）

（1989 年 12 月）

我们，下面署名参加地区代表团的苏联人民代表认为，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前，必须当着国家选民的面，简洁地评价在远大历史性前景中的目前局势并提出一个行动纲领，这个纲领能够在不远的将来作为保持各民主力量之间差别的情况下实际协调始终不渝的民主力量行动的基础。

由于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拒绝放弃执行新的极权方针，由于向 1917 年 10 月革命以来没有过的改革政治转变，出现了根本性的新的社会局势。这种局势有希望、有可能使我们摆脱习惯性个人无权、贫困、侵犯民族利益和传统。改革是米·谢·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亲密战友的卓越的历史功绩。

……改革的第一阶段（从 1985 年 4 月到 1987 年 1 月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发言）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解冻；第二阶段，即 1987 年，是公开性的开始并放弃过去的政治；第三阶段是 1988 年到 1989 年 3～6 月，结束了当时的政治关系，其标志是首先出现了自发的社会运动，同时产生了公民社会分子，这就保证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腾飞，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前沿地区，开始了不可控制的集中制官僚国家的解体。当然需要从总体上对民主派有肯定的评价，这个过程标志着在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出现不同寻常的病态，伴随着在许多场合发生各民族之间的纠纷，野蛮地使用暴力和种族灭绝，政府和社会没有对上述问题作出彻底的有效

的回答。

……两大危机，即民族国家危机和经济危机明显地呈几何级数增长，两大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影响、互相刺激。

……大多数居民正是在第1次代表大会以后丧失或已经丧失了对改革的信任，认为改革多半是口头的和表面的。许多人甚至不相信米·谢·戈尔巴乔夫。这种潜在的可怕的信仰危机，公开的不满和气愤与日俱增，并影响着从春夏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改革的第四阶段。这非常令人遗憾。

简而言之，现阶段的实质是改革停滞，毫无疑问是耗尽了改革前不久的手段和形式，是所有制和权力关系方面的真正的机构改革的中止。

改革的进程已到了原则的边缘，各机构反动头目的对抗在增长，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犹豫更一目了然。但是，错了。东欧发生的大好事就是例子，对于那些打算在不确定的时期内保持强行的“苏联共产党的先锋队和领导作用”，对于那些打算保留经济部门、指令性计划、国营集体农庄系统的垄断权的人是足够清晰的警告。必须在一定时候开始拆除这一切。

……这首先涉及到苏联共产党的状况和作用。作为积极的群众性政治组织的苏联共产党，一般说来已不存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宣传职能。像从前一样，它只是一个自我产生的机构。在这个机构中加入了许多努力工作的人和有理智的人，但是他们不占大多数，而主要的是作为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系统的机关，其中包括国家机关，按起源和职能而言属于极权机构，与真正的改革并不相容。

……从宪法中取消可耻的第6条，拒绝承认苏联共产党这支后卫先锋队成为永恒的官方指导者和社会监督者，但丝毫不意味着要求从国家政治生活中取消共产党。

在苏联已经出现了实际上的多党制，可能是在1990年这个具

有决定意义的时候产生的。要是事先明智地民主地将这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合法化就好了。时至今日，甚至仍在阻止记“流水账”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至于苏联共产党，那么它现今的机构、秩序、组成及名称本身不会维持太久。实际上，苏联共产党已经分裂，很多带有最明显政治色彩的人，极端仇视运动的人徒有形式地加入苏联共产党。我们认为在真真假假的“苏联共产党”的最终公开分裂和在此基础上出现2～3个现实的俄罗斯群众性党是不可避免的，更不用说几个共产党的分支了。

至于那些不依附于苏联共产党的激进民主力量，那么改革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力量，特别是在俄罗斯，能不能集合几个真正大型的和政治方向明确的运动或政党，哪怕在总人数和影响方面能够与比如说立陶宛的“萨尤季斯”① 相提并论。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伏尔加河流域以及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到处都有许多民主阵线、运动、选民俱乐部、劳动者联盟。但是他们在全俄罗斯范围内没有联合，没有明确的、有组织的、民主的左派机构，虽然他们基本上具备了必需的成员。

没有反对派就不能有正常的政治生活。用抽象观点看这是通用的，但是很多完全不胆怯、能干的人还是害怕把自己列入反对派，列入“派别”行列。通常有两个理由：一是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为联合并转到右派进攻的队伍而被抓住把柄；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中派分子代表称号或者刺痛戈尔巴乔夫本人。

① “萨尤季斯”是“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的立陶宛语的音译。该组织成立于1988年10月，纲领是争取立陶宛的国家、经济、文化的主权。1989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59岁的“萨尤季斯”领导人兰茨贝吉斯当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

№05617

沃尔霍夫斯基谈“自行出版物”

（1990年）

彼得一世曾被迫发布《关于谁来禁止写作的命令》。自行出版物是与文字和识字同时出现的。自行出版物过去和现在到处都有。偷改过的公文，胡说八道的论文，假命令，诗抄等等我们这里应有尽有，西方谁也不会为此提供出版经费。

在“改革与公开性”初期，普遍认为“公开性”意味着自行出版物的结束。一年以前，许多人都以为，随着苏联报刊上出现批评列宁，批评布尔什维克，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自行出版物将会冻结。这样的批评出现了，然而，就在批评出现之前，也只有很少的自行出版物坚持公开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列宁主义的立场。自行出版物——绝不是解放臭名远扬的《白斑》的手段。

统计资料显示，在1989年7月，全国出现了323种自行出版物。其中：属于各单位的有208种；独立的有115种。1988年7月共有100种自行出版的杂志。1987年约有30种。1986年约有10种。

与此同时，《公开性》这几年在苏联报刊中的发行量急剧增长和发展，而《白斑》发行量在减少。索尔仁尼琴们也已在出版刊物。在数量上并没有出现成反比例的从属关系。相反，自行出版的杂志在增加。最近以来，已出现了自行出版的报纸。看来，消失的不是自行出版物本身，而是其具体方针、题目、杂志、作者。

№03980

吉连科等人就采取紧急措施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90 年 3 月 5 日）

绝密

有根据地认为，在重新当选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将通过建立独立自主的立陶宛国家的决议。

分立主义势力打算在苏联人民代表第三次紧急代表大会召开前就召开会议，企图最大限度地促使这一决议通过。

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由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形势复杂化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决定，已在立陶宛开展有准备的反对分立主义倾向的工作。拟在近几周内实行这一决定所规定的以及由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出现的紧急形势补充采取的措施。

这些紧急措施的草案及苏共中央就这一问题的决定草案附后[①]。

瓦·梅德韦杰夫

尤·马斯柳科夫

Г. 拉祖莫夫斯基

А. 吉连科[②]

① 参见文件№03981。

② 吉连科，苏共中央书记；马斯柳科夫，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拉祖莫夫斯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

№03981

苏共中央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的决定

（1990年3月6日）

第П181/10号

绝密

批准就这一问题采取的措施（后附）。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　录

关于第181号记录的第10项：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的一揽子紧急措施

1. 在《消息报》上发表有关立陶宛分立主义势力的打算和决定脱离苏联可能产生的经济及别的后果的材料。

3月6日之前

А.С. 卡普托同志、И.Д. 拉普捷夫同志、А.А. 萨佐诺夫同志、А.И. 米柳科夫同志、В.Г. 科姆普列克托夫同志负责。

2. 通过苏联最高苏维埃就立陶宛打算脱离苏联问题发表的声明。

（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日程被确定之后）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紧急会议上审议“关于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1989年11月12日决定”、“关于1940年发生在爱沙尼亚的事件的历史法律评价”和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1990年2月7日“关于1939年苏德条约和消除条约对立陶宛的后果”等问题。评价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通过的法律和决定是否符合苏联宪法和国际人权条约。

А.И. 卢基扬诺夫同志、Е.М. 普里马科夫同志、Г.П. 拉祖莫夫斯基、А.Н. 吉连科同志、Р.Н. 尼沙诺夫同志负责。

3.（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届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日程被确定的当天）通过并公布在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苏联公民及联盟所属的组织）的利益的声明，即由于即将通过成立独立自主的立陶宛国家的决议，苏联政府打算在立陶宛内实施的措施。

Н.М. 斯柳尼科夫同志、尤·德·马斯柳科夫同志、Г.П. 拉祖莫夫斯基同志负责。

4. 审议关于保护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财产措施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3月10日以前

尤·德·马斯柳科夫同志、В.П. 莫任同志、А.С. 帕夫洛夫[①]同志负责。

5. 审议关于在苏联人民代表第三次紧急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在“各加盟共和国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程序的苏联法

① 莫任，苏共中央社会经济部第一副部长；帕夫洛夫，苏共中央国家法制部部长。

律”通过前，暂停执行苏联宪法第72条的建议问题。

3月12日以前

A.И. 卢基扬诺夫同志、E.M. 普里马科夫同志、P.H. 尼沙诺夫同志负责。

6. 组织一系列大众新闻媒体的活动（举办中央电视台的“圆桌会议”并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按专门的计划），总题目是：匆忙通过这个共和国退出苏联的分立主义的决议将给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居民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带来的消极后果。

3月12日以前

A.C. 卡普托同志、A.A. 萨佐诺夫同志、A.И. 米柳科夫同志、A.C. 帕夫洛夫同志、B.C. 巴比切夫同志[①] 负责。

7. 补充审议在通过立陶宛退出苏联的决议的条件下，围绕苏联共产党立陶宛临时中央委员会（拥护苏共纲领派）可能复杂化的政治局势问题。

3月12日以前

Г.П. 拉祖莫夫斯基同志、B.M. 法林同志、H.E. 克鲁奇娜同志负责。

① 巴比切夫，苏共中央党的建设和干部部第一副部长。

№03689

梅利尼科夫就新库兹涅茨克独立工人运动和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果致戈尔巴乔夫的信

（1990 年 5 月 8 日）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1990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2 日，新库兹涅茨克市举行了独立工人运动和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想就此事谈谈自己的想法。

情况：来自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 46 座城市、17 个州的 58 个不同组织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英国和波兰的工人组织代表和外国记者应邀参加了本次大会。

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人员，地方党的、苏维埃的机关工作人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的人民代表，中央报纸、广播、电视的记者出席了代表大会。

莫斯科组织委员会（召集、起草文件）和新库兹涅茨克组织委员会（组织总务问题）进行了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莫斯科的科学家（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苏联科学院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克麦罗沃和新库兹涅茨克市高等学校的学者们参加了本次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

1989 年 7 月罢工以后，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急剧政治化了。促成这一状况的是罢工委员会提出的要求贯彻不彻底，没有得到满足，政府和各部没有尽快解决主要问题——将法律上和经济上的自

主性全权交给企业，完善管理机构，划拨用以解决社会问题的物资。

他们没有考虑到，在苏维埃、党、工会机关的选举中，许多（工人）罢工委员会的积极分子都被选为人民代表，进入党委会的领导机关，主持劳动集体委员会和工会委员会，成了企业的领导。他们更多地感到没有完全满足劳动人民要求的个人应负的责任。因此，在与部门垄断主义的斗争中客观地趋向同其他区联合起来。

这一目的在本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工人运动的现状和前景》的报告中提得很明确。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建立这样的工人联合会的思想。这一联合会要能够一致拥护加快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拥护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条件下健全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拥护在加快改革进程中对官方机构施加压力。

代表大会提出了整个工人运动团结一致的号召，指出了苏联共产党作为促进并阻挠工人运动发展的政治力量在社会上的重要作用。我认为之所以会有这种评价是因为许多党的委员会把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不是看做积极现象，而是看成消极现象。总的说，苏联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党，没有很好地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没有保障工人广泛进入国家和社会管理机关。

在承认工人委员会现实力量的同时，应当指出，同时还有一些工人运动的其他分支在形成（在库兹巴斯有作为社会政治团体的劳动者联盟），其中加入了些半无产阶级分子 、采取极端立场的各种知识分子阶层和对社会不满的人。

遗憾的是，官方机构——企业劳动集体联合会、工会暂时还没有在工人运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工人的主流也是消极的。但是他们全部表达了对生活条件恶化、企业亏损、改革迟缓、纪律松懈的不满。

工人运动中的这些成分积极地企图运用各种破坏力量旨在掌握

社会基础，形成新的政治团体（无政府主义者、民主分子、社会党人等等）。他们都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并企图使大会迷失方向，作出根本上反共产主义的政治决议。

苏联人民代表 Н.И. 特拉夫金号召消灭苏联共产党，加入新党（称为反共主义人民党），该党的成立会议（据他所说）将于今年 5 月 27 日在莫斯科举行。各种各样的人民阵线、联盟等等的代表也提出了类似的号召。但是，代表大会依靠共产党员、工人和立场坚定的工人委员会没有采纳这些建议。

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劳动者代表会议”的决议，其目的在于把国内独立的工人团体联合起来，一致行动。确定了代表会议宣言和章程，成立了由 58 人组成的代表委员会和由顿涅茨克、克麦罗沃、莫斯科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各出一人参加的协调委员会。领导机关最终将于今年 6 月 20 日在顿涅茨克召开的代表会上成立。

应当指出，成立“劳动者代表会议”为国外工人组织的参加敞开了大门。人民代表沃卡同志在代表大会上起了积极作用，与城市代表团进行了关于确立国内企业和立陶宛在产品供应方面的直接联系的谈判。

代表大会各种不同的参加者迫使大全组织者在政治上做出让步。通过了十几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决议：关于民族关系问题；关于对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态度问题；关于立陶宛问题；关于新切尔卡瑟的事件问题；关于在国家煤炭工业部和整个苏联部长会议没有完成按政府和矿工协议的规定应承担的责任的不满。如果不满足矿工罢工的要求，沃尔库塔市的代表们提议 5 月 25～26 日进行一次为时 2 小时的警告性罢工，这一提议没有得到库兹巴斯代表团的支持，也没有被代表大会采纳。

代表大会的结果有力地证明，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要求苏联共产党拿出有效的行动。

现在必须紧急评估各政治力量的分布情况，弄清它们的目的、社会基础，制定出抗击破坏势力的措施，并以此武装全党。

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员都应该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掌握群众，不使党的这一基本社会基础转到别的立场上去。不能不注意，现在工人退出苏联共产党这一健康核心的现象日益增多。青年实际上也不再大批入党。党在衰老。

支持改革的工人运动比我们党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对劳动人民更具吸引力。因为党的活动拖延或者不能有效地推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不能保护工人的根本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集体反对行政命令方法，反对行业垄断的斗争正波及到党。我认为，故意为此推波助澜的既有极左政治力量，也有阻碍经济改革的力量。

在第一场罢工中（1989年）打击主要落在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头上并不是偶然的。尽管事态扩大的原因更深，存在于部门内部。现在，当许多部门仍旧保持旧貌，而地方政权机关已得到更新，补充了一些积极分子、工人委员会领袖的时候，新的斗争高潮很可能会冲击中央、各部门和政府。作为行动协调机关的“劳动者代表会议”的建立促进了这一情况的出现。

不排除下一个阶段有可能建立新的工人党，它会出现在这一场斗争中。

如果苏联共产党现在不支持工人运动，而是同政府、各部门一起继续延缓改革，实际上不转向工人，那么新党就可能起来反对它。相反，如果共产党员们积极地投入工人运动，支持它的基本目标，那么，它就会掌握真正更新和巩固苏联共产党的最强大的社会基础（因为大多数工人不相信党），在多党制正在诞生，极端主义日益增强的条件下，这是特别重要和必须的。

我是依据库兹巴斯的工人运动状况作出这番评价和结论的。正

像本次代表大会表明的，库兹巴斯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同类现象中是超前的。州党组织和工人委员会、企业技术检查部门、劳动者联合会的共同工作稳定了局势，把工人们的努力转向积极的立场。但是，与此同时，党组织和工人运动内部一些消极现象也在增长，因为，来自外部的对它的错误影响依然存在，如极右的和极左的政治力量，中央各部门存在的妨碍解决劳动集体和地区提出的基本问题的保守主义和官僚主义。

我认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的是，党和政府、地方党机关要采取一整套有效的措施支持工人运动并且使其走上正确的、建设性的轨道。

如果我们错过了机会，并给其他政治力量提供机会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党的阶级基础并且相应地削弱它对国内局势的影响。

可能，我什么地方错了，但是，我感到目前的局势的确如此。

梅利尼科夫[①]

① A.T. 梅利尼科夫，时任克麦罗沃州委第一书记。

№05627

俄罗斯联邦人代会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速记记录

（1990年5月29日）

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计票委员会关于1990年5月29日以秘密投票方式选举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结果的记录。

按照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临时议事规程，计票委员会对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选票数进行了计算，结果如下：

列入秘密投票选举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票，有下列俄罗斯联邦的人民代表：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弗拉索夫；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

瓦连金·佐伊。

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总数为1060人。

俄罗斯联邦得到选票的人民代表数为1038人。

选票箱开箱票数为1038张。

无效选票1张。

选票分布如下：

同意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弗拉索夫当选的467票，反对的570票。

同意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当选的535票，反对的502票。

同意瓦连金·佐伊当选的22票，反对的1026票[①]。

这样，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

① 原文如此。应是1015票之误。

№05631

“苏共民主行动纲领派”关于将苏共财产移作公用财产的决议草案（摘录）

（1990年8月4日）

由105人组成的“苏联共产党民主行动纲领”派于1990年7月10日登记注册，该派是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派。

苏联共产党执政70多年以来，以为人民造福、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宗旨。在这一段时间里，苏联共产党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大量财产资金。

在提交给代表大会代表的《关于苏联共产党预算》的资料中，列举了到1990年1月1日地方党的机构业务管理的固定资产总额为23亿卢布。苏联共产党固定资产的总价值数在资料中没有列出。储备财政资金为49亿卢布。

提供的资料向我们公开了今天苏联共产党聚财的真正来源是独家专营的出版活动。仅在1990年，扣除党的出版社的利润，向苏联共产党预算数额投入了10.76亿卢布。

由于苏联共产党的资金和限额受特权担保，因此苏联共产党卢布的实际购买力要高于国内公民其及联合公司的卢布购买力。例如，在1989年，苏联共产党兑换4400万卢布的外汇，计划在1990年兑换2900万卢布的外汇。

几十年里，苏联共产党使用国家土地、房产和其他财产而没有交付任何租金。苏联共产党的收入，其中包括生产和出版业的收入，也不纳税。

达到颇大规模价值的往往是建筑物和另外一些财产的历史和文化的价值，这些财产是党在执政期间以为党组建国家机构的名义，无代价地将国家财产据为己有的。

在过去的年代里，党用这种方法所没收的人民钱财达几十亿卢布。

代表大会认为，对共产党员来说，从对苏联共产党负责的宣言，转到认识自己对国家和处在当前情况下的人民所犯的重大错误，转到真正悔过承担责任的时机已经来到了。

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将这些钱财归还给人民。应该志愿放弃苏联共产党的财产，交给人民代表苏维埃。

为此，代表大会决定：

1. 将苏联共产党的所有财产，包括楼房、建筑物、企业、出版社、财政资金（除最近 3 个月的党费收入以外）移交为国家和公用财产，同时向有关人民代表苏维埃移交这些财产的支配权。

4.[①] 请求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企业和组织领导、劳动集体对下岗人员的重新安排给予尽可能的协助。

① 原文如此。

№05632

波洛兹科夫[①]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发言

（1991年1月）

第一，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党和人民打算在1985年开始的革新社会主义……扩大民主，提高人们福利的改革都还没有实行。

所谓的民主分子偷换了改革的宗旨，歪曲我党的首创精神。社会陷入了混乱之中。人民丧失了过去，现时遭到破坏，而且谁也说不明白，未来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什么？

应该承认，苏联共产党没有能够及时地看出改革的蜕化，以至允许这个过程加剧。党也没有能立即明白，它已脱离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即首先是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只习惯于平静地对待劳动人民的人为栽培的企业主阶级，这就为政党和运动远离社会主义目的的活动建立社会基础。

在使全人类利益与阶级利益相对立，将世界的价值观置于优先地位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思想起了不好的作用，这种思想的正确性在苏联共产党第28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重申。阶级和全人类利益之间的辩证统一遭到破坏。我们大家都知道，任何时候，也没有任何人认为全人类的利益要高于工人阶级的利益。

第二，现在，自由派，如果准确地说，叫做右派或简称反动派，撕下了民主派的假面具。在宣布反共产主义是他们自己的思想

① 波洛兹科夫，时任苏联共产党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体系之后，便把那些已被推翻阶级的继承人、民族主义者、影子经济的投机分子，即受到苏维埃政权限制的所有人都集合到他们的旗帜下。

我们的假民主主义者在践踏宪法，挑起族际冲突，破坏民主和道德的基本准则。国际资本心甘情愿地支持反共运动，千方百计促使其扩大政治阵地，帮助其巩固物质基础，以各种手段向其主子恭维。

正如前面已说过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拯救改革，保护其免受保守分子侵害，而现在已经是在保护其免受总统及其不久前新组建的内阁的侵害的旗帜下进行的。

民主派使用他们最爱用的手段，诬蔑、中伤、造谣、恫吓——所有这些全是用来反对那些力图对抗他们或者讲真话的人……

第三，现在我们再也不能谈及任何多党制，只有捍卫社会主义改革的苏联共产党。也有为数不多的政治集团的领袖，他们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政治面目，那就是反共产主义。这些集团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是为了与苏联共产党作斗争，是为了夺取政权。

我们没有什么公开性。如果说从前是苏联共产党垄断公开性的话，那么现在这种垄断已归与其对抗力量的一方。正是他们在对社会意识施加自己有腐蚀作用的影响。

现在我们已经不仅是从教科书中，而且是从实际生活中取得教训，那就是当我们谈及权力问题时，知道什么叫资产阶级的脾气、资产阶级的道德，什么卑鄙的方法和手段都可以利用。

……按照我们的观点，既然已经讲到了，就展开理论工作。要知道我们已经公开宣布，我们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要把人们引向何方？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不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把党集合起来，我们就无处召唤和率领劳动人民。

№05633

1989年俄罗斯联邦各行政区居民民族成分调查结果

（不晚于1991年2月10日）

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	民　族	占总人口的%	
		该民族人	俄罗斯人
巴什基尔苏维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巴什基尔人	21.9	30.3
布里亚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布里亚特人	24.0	70.0
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阿瓦尔人	27.5	9.2
	阿古尔人	0.8	
	达尔金人	15.6	
	库梅克人	12.9	
	拉克人	5.1	
	列兹金人	11.3	
	诺盖人	1.6	
	鲁图尔人	0.8	
	塔巴萨兰人	4.3	
	察胡尔人	0.3	
卡巴尔达－巴尔卡尔	卡巴尔达人	48.2	32.0
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巴尔卡尔人	9.4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卡尔梅克人	45.4	37.7
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卡累利阿人	10.0	73.6
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科米人	23.3	57.7
马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马里人	43.3	47.5
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摩尔多瓦人	32.5	60.8
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奥塞梯人	53.0	29.9

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	民　族	占总人口的%	
		该民族人	俄罗斯人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鞑靼人	48.5	43.3
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图瓦人	64.3	32.0
乌德穆尔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乌德穆尔特人	30.9	58.9
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车臣人	57.8	23.1
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印古什人	12.9	
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楚瓦什人	67.8	26.7
雅库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雅库特人	33.4	50.3
阿迪格自治州	阿迪格人	22.1	68.1
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州	阿尔泰人	31.0	60.4
犹太自治州	犹太人	4.2	83.2
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自治州	卡拉恰耶夫人	31.2	42.4
	切尔克斯人	9.7	
哈卡斯自治州	哈卡斯人	11.1	79.5
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	布里亚特人	54.9	40.0
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	科米－彼尔米亚克人	60.2	36.1
科里亚克自治区	科里亚克人	16.5	62.0
涅涅茨自治区	涅涅茨人	11.9	65.8
泰梅尔－多尔干涅涅茨自治区	多尔干人	8.9	67.1
	涅涅茨人	4.8	
乌斯季奥尔登斯基布里亚特自治区汉特－曼西自治区	布里亚特人	36.3	56.5
	汉特人	0.9	66.3
	曼西	0.5	
楚科奇自治区	楚科奇人	7.3	66.1
埃文基自治区	埃文基人	14.0	67.5
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	涅涅茨人	4.2	59.2

№03982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各级党委会和党的机关生产经营活动问题的决定

（1991年7月11日）

第ПБ－10/2Г号

秘密

1. 现授权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共和国党委会、边疆区党委会、州党委会在不违背政治工作利益的前提下可独立自主地解决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问题，其中包括按规定的程序建立、改组和取消企业和经济核算组织。

现规定：在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党委会及党的机关的业务管理的财产可以由上述机构转交使用或完全的经营管理，以及在保留全民所有制权力的条件下作为对所成立的企业和经济核算组织的投资。

2. 为了执行苏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91年）1月联席全会决议，应于1991～1992年采取实际措施，通过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彻底减少党的预算数字，并转向自筹资金。

为此，应扩大出版活动，以及参加党的大众媒体的生产经营活动。

将生产和经营活动的收入用于完成规定的任务以及用于慈善目的。

3. 要严格根据苏联关于“社会团体法”和苏联及各共和国的其他法律开展这类工作。

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和结果，对遵守法规和保护下级党组织的权力与利益的责任由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委会，以及各级党的机关的领导人来承担。建议上述组织按规定的程序成立组织这一活动的经济核算单位（运用科研成就的小企业、公司等）。

4. 建立生产经营活动投资基金，将党的货币资金保险储备的一部分用于这种目的。

考虑到各级党组织的财政状况和对实施生产经营活动的准备情况，批准苏共中央办公厅在 1991 年将约 6 亿卢布用于向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党委会的拨款，为此将委托上述委员会通过关于利用所拨资金的程序及确保资金偿还的决议。

附注：苏共中央办公厅应从基金中拨出约 4 亿卢布用于经过经济及法律鉴定而选择的党的机构、机关和组织的某些高效方案和建议的拨款。在这种情况下，拨出基金应以贷款的形式进行，其利率按照偿还期限、贷款数额和方案的经济效益确定。

5. 苏共中央办公厅应该：

在生产经营活动范围内利用经济管理的现代组织法律形式（股份公司、小企业，吸收可靠的外国伙伴等）；

制定并批准从由党的各级委员会和党的机关从生产经营活动中所获利润和所拨贷款中上缴苏共（中央）的预算款程序；

为对专项利用拨给的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拨款的基金进行检查，为生产经营活动的定额方法、为各级党的机构提供法律和经济鉴定帮助提供保障。

附注：按规定程序制定并提出具体建议：在必要的情况下建立

党的企业和公司、基金和其他的经营或社会结构，以便通过上述单位开展管理党的财产的业务。

解决最重要的生产经营活动问题的业务由舍宁同志、卢钦斯基同志、马纳延科夫同志、韦肖尔科夫同志和克鲁奇娜同志负责。

苏共中央总书记　米·戈尔巴乔夫

№03690

戈尔巴乔夫关于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的申请

（1991 年 9 月 24 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没有反对政变。中央委员会未能采取坚决的立场去谴责和阻挡，没有发动共产党员去同践踏宪法的行为作斗争。阴谋家中竟有党的领导干部。许多党委会和大众新闻媒体支持了国事犯的行动。这将共产党置于错误的境地。

许多党员拒绝与阴谋家们合作，谴责政变并且加入到反对政变的斗争中。谁也没有权利对所有共产党员进行无理指控，而我，作为总统，认为有责任保护他们，作为公民免受无理的指控。

在这种局势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该做出艰难的、但是很切实际的决定：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己决定。

我认为自己不可能继续履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能，并让出相应的全权。

我相信，忠于宪法和社会振兴方针的充满民主精神的共产党员们，一定会主张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够同一切进步力量一起，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继续推行根本的民主改革的党。

№03691

关于独立国家联盟的条约草案

（1991年11月）

本条约的签字国根据它们发表的主权宣言并承认民族自决权；

考虑到其人民历史命运的相近并使其人民和睦友好相处，发展平等互利的合作；

关注其物质福利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民族文化的互补和保障共同的安全；希望建立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可靠保证；

决定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主权国家联盟并商定如下条款。

一、基本原则

第一条：参加本条约的每个共和国都是主权国家。独立国家联盟（ССГ）是一个联盟民主国家，在参加国自愿赋予的全权范围内行施权力。

第二条：保留独立解决所有有关自己发展问题的权利，保障其领土上所有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与文化进步的条件。各参加国将根据全人类财富和民族财富相结合的原则，坚决反对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任何限制民族权利的企图。

第三条：联盟成员国认为符合人权共同宣言和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人权优先权是最主要的原则。保证所有公民学习和使用母语的条件、新闻自由、信仰自由、其他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和私人的权利和自由。

第四条：联盟成员国认为本国人民和每个人的自由和富足是建立一个公民社会最主要的条件。它们将在自由选择所有制形式和经

营方式，发展整个联盟共同市场，实现社会公正和防护原则的基础上极力满足人们的需求。

第五条：联盟成员国独立决定自己的民族国家和行政区域制度，政权和管理机关体系。它们承认建立在人民选举代表制和人民意志直接表示基础之上的民主是共同的基本原则，力争建立一个保证反对任何极权主义和专制的法制国家。

第六条：联盟成员国认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保持和发扬民族传统，国家支持教育、保健、科学和文化。它们将促进联盟和世界各族人民之间在人文、精神财富和成就等方面的大规模的交流和相互补充。

第七条：独立国家联盟在国际关系上是一个主权国家、国际法主体，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继承者。其国际舞台上主要目的在于维护永久和平、裁军、消灭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在解决人类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国家间的合作，保持民族团结。

联盟成员国均为国际法主体。

它们有权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和领事关系，贸易和其他关系，有权与它们交换全权代表，在不损害联盟成员国利益及其共同利益，不违反联盟国际义务的情况下签订国际条约，参加国际组织的活动。

二、联盟制度

第一条　联盟成员资格

联盟成员资格自愿。

本条约的参加国是直接组成联盟的各国。

联盟随时接纳承认本条约的其他民主制国家。联盟接收新的成员国须经本条约所有参加国的同意。

各参加国保留按照条约参加国规定的程序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第二条　联盟的国籍

联盟成员国的公民同时也是主权国家联盟的公民。

联盟的所有公民具有联盟法律和国际条约规定的平等权利、自由和义务。

第三条　联盟的领土

联盟的领土由本条约所有参加国的领土构成。联盟保证参加国的边界不受侵犯。

第四条　联盟成员的关系

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由本条约以及与本条约一致的其他条约和协议调节。

本条约成员国必须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合作、互助、认真履行本条约和共和国间协议所规定的义务的基础上，建立自己与联盟其他成员国的关系。

联盟各成员国必须履行下列义务：不得在相互关系上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不得蓄意破坏彼此的领土完整；不得签署违背联盟的或者反对其他成员国的协议。

第五条　联盟的武装力量

独立国家联盟拥有集中指挥统一的武装力量。

统一武装力量的目的、用途和使用程序，以及各条约成员国的权限在防御范围之内由本条约规定的协议调节。

条约参加国有权建立共和国武装部队，其职能与数量由上述协议确定。

除参加消除自然灾害后果、生态灾难，以及紧急状态法规定的情况外，不得在国内使用联盟武装力量。

第六条　联盟成员国的共同行动范围和多边协议

条约成员国构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地区，在本条约规定的原则及赋予它们的特权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关系。其与未加入独立国

家联盟的国家的关系应建立在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

为了保证条约成员国的利益应规定共同行动的范围，并签署相应的多边条约和协议。

——关于经济共同体的协议；

——关于共同防御和集体安全的协议；

——关于协调对外政策的协议；

——关于协调科学技术共同规划的协议；

——关于保护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的协议；

——关于协调共同生态规划的协议；

——关于动力、交通、通讯和宇航领域合作的协议；

——关于文化教育领域合作的协议；

——关于同犯罪作斗争的协议。

第七条　联盟（国家间）机关的全权

为了实现本条约和多边协议确立的共同任务，联盟各成员国授予联盟机构必需的全权。

联盟成员国参与联盟机构全权的行使必须是他们共同确立的，并通过决定所确立和执行一致的社会程序。

每个条约成员国可以通过和联盟签订协议授予它行使自己的某些特权，而联盟经所有成员国同意赋予某一个或几个成员国在各自领土上行使它的某些全权。

第八条　所有制

条约参加国保护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并保证其自由发展。

条约参加国需将为行使许可的全权所必需的财产交联盟机构支配。这些财产归联合体成员国共同所有，并只能为它们的共同利益，包括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使用。

为了行使联盟机构的全权，利用条约参加国土地、矿藏及其他自然资源时，必须符合这些国家的法律。

第九条　联盟的预算

联盟的预算拨款及其支出部分的监督程序由专门协议规定。

第十条　联盟的法律

本条约和人权及人身自由宣言是独立国家联盟的宪法基础。

联盟的法律根据有关联盟活动的问题，在本条约和宣言赋予联盟的全权范围内制定。法律必须在本协定所有成员国的领土上得到贯彻执行。

如果联盟的法律违反了本条约，条约参加国有权提出异议，并终止其在自己领土上的效力。

如果各成员国的法律违反了本条约，以其最高权力机关为代表的联盟有权提出异议并终止其效力。

争端根据调解程序解决，或者转交联盟最高法院，由它在一个月内做出终审判决。

三、联盟的机构

第十一条　联合体机构的组成

本条约规定的独立国家联盟机构须在各国人民自由表示意志和各成员国享有充分权利的选举基础上组成。

政权、管理和司法机关的组织、权限和活动程序应依据与符合本条约的相关法律确定。

第十二条　联盟最高苏维埃

最高苏维埃由共和国院和联盟院两院组成。

共和国院由联盟成员国各派20名代表其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组成。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可派52名代表进入共和国院。其他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条约参加国，每一个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可追加一名代表进入共和国院。为保证各条约参加国的主权和平等权利，在共和国院表决时采用协调原则。

联盟院由联盟居民分选区以同等选民人数选举。同时保证所有条约参加国拥有自己在联盟院里的代表。

联盟最高苏维埃两院共同接受新的国家参加联盟，有关联盟内外政策最重要的问题应听取联盟总统的意见，批准联盟的预算及其执行报告，宣布战争和缔结条约。

共和国院决定独立国家联盟各机构的组织和活动程序，审理共和国间的关系问题，批准和废除联盟的国际条约，批准联盟政府的任命。

联盟院审理保证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问题，决定除属于共和国院权限范围以外的最高苏维埃权限的所有问题。

联盟院通过的法律须经共和国院的认可后方能生效。

第十三条　联盟总统

联盟总统为联邦国家首脑。

联盟总统保证遵守独立国家联盟条约及其各项法律，统帅联盟武装力量，在与外国的关系方面代表联盟，监督联盟国际义务的履行。

联盟总统由联盟公民按照法律规定程序选举，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第十四条　联盟副总统

联盟副总统与联盟总统同时选出。联盟副总统按照总统的授权行使总统的某些职权。

第十五条　联盟国务委员会

建立联盟国务委员会，协调关系到条约参加国共同利益的内外政策方面最重要的问题。

国务委员会由联盟总统和条约参加国的最高官员组成。

国务委员会由联盟总统领导。

国务委员会的决定所有政权执行机关必须执行。

第十六条　联盟政府

联盟政府是联盟政权的执行机关，服从于联盟总统，对联盟最高苏维埃负责。

联盟政府由总理领导，参加政府的还有各条约参加国的政府首脑，跨国间经济委员会主席（第一副总理），副总理和各条约参加国间的协议所规定的各部门的领导人。

联盟政府由联盟总统与联盟最高苏维埃的共和国院协商组建。

第十七条　联盟最高法院

联盟最高法院决定有关联盟法律和各条约参加国的法律及本条约与人权和人身自由宣言的一致问题；审理跨国性质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包括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案件，是相对于军事法庭的最高审级。与最高法院并行建立检察院，监督联盟法院的执行情况。

第十八条　联盟最高仲裁法庭

联盟最高仲裁法庭解决本条约参加国国际间的经济纠纷，以及在各条约参加国管辖下的各企业间纠纷。

四、最后条款

第十九条　联盟各国间交际语言

条约参加国独立决定自己的国语。各条约参加国承认俄语为联盟各国间的交际语言。

第二十条　联盟的首都

联盟的首都为莫斯科市。

第二十一条　联盟的国家标志

联盟的国家标志有国徽、国旗和国歌。

第二十二条　条约的修改和补充程序

本条约或其某些条款的修改或补充必须经过联盟所有成员国的同意。

第二十三条　条约的生效

本条约须经联盟各成员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认同，并且在其全权代表团签字后方可生效。

对于本条约的签字国，自本条约签字之日起，1922 年关于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条约即视为失效。

第二十四条　条约规定的义务

联盟及其成员国对履行本条约规定的义务负有相互责任，由于违反本条约所造成的损失应予以补偿。

第二十五条　联盟的法律上的继承

独立国家联盟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法律继承者。法律上的继承必须参照本条约第六条和第二十三条实行。

№03692

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共和国首脑声明

（1991年12月8日）

我们，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共和国领导人指出：

关于筹备新的联盟条约的谈判已经进入死胡同，各共和国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客观进程和成立独立国家联盟已经成为现实；

确认中央缺乏远见的政策导致了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生产崩溃，社会所有阶层的实际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注意到在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许多地区，社会紧张局势不断发展，导致了民族冲突不断发生，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意识到对自己的人民和国际社会的责任，以及实际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业已成熟，特声明成立独立国家联盟，三方已于1991年12月8日就此签订了协议。

由白俄罗斯、俄罗斯、乌克兰共和国组成的独立国家联盟向前苏联的所有成员国以及同意本协议的目的和原则的其他国家（都是公开的）敞开自己的大门。

联盟各成员国有意执行巩固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方针。它们保证履行前苏联的条约和协议规定的国家义务。保证一致控制核武器及其扩散。

1991年12月8日于明斯克

№03693

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

（1991 年 12 月 8 日）

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作为签署 1922 年联盟条约的苏联创建国家（以下简称高级缔约方）指出，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政治现实已经不存在了。

根据我们各族人民的历史共性和它们之间形成的各种联系，考虑到高级缔约方签署的双边条约；

力图建立起民主法制国家，着意在相互承认和尊重国家主权、不可剥夺的民族自决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放弃使用武力、经济的或其他任何方式的压力，通过协商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并在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关系；

认为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友好睦邻和我们国家间的互利合作关系，符合上述国家人民从本民族出发的利益，并能为和平和安全事业服务；

承认联合国宪章、赫尔辛基最后决议案和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其他文件；

承诺遵守公认的人权和民族权利国际准则。

在上述条件下，达成如下协议：

第 1 条

高级缔约方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

第 2 条

高级缔约方保证自己的公民不分民族或其他差别，享有平等的

权利和自由。每一个高级缔约方保证他方居住在自己土地上的公民以及无国籍的人员，不分民族或其他差别，根据国际公认的人权法准则，享有公民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利和自由。

第3条

高级缔约方愿意促进居住在自己领土上的少数民族长期形成的独特人文区域技术、文化和宗教特性的发展，将其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保护其独立性。

第4条

高级缔约方将发展自己的人民和国家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保健、环保、科学、贸易、人文及其他领域平等互利的合作，促进广泛的新闻交流，认真、严格地履行相互义务。各方认为签订一项关于上述领域的合作协议是必要的。

第5条

高级缔约方承认和尊重相互间的领土完整并承认联合体各国现有边界是不容侵犯的。

各方保障边界开放，联合体内公民来往和传递信息的自由。

第6条

联合体各成员国将在保证国际和平和安全，采取有效措施裁减军队和军费方面进行合作。各方致力于消灭一切核武器，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之下进行全面彻底的裁军。

各方相互尊重争取无核区地位和中立国家的努力。

联合体各成员国将在统一的命令之下保卫和支持共同的军事战略区域，包括共同控制核武器，其实施方式由专门的协议规定。

他们将共同保障战略武器力量的部署和使用，保障所需物质和社会保证的必要条件。各方必须在军职人员及其家属的社会保护和退休金保证问题上执行一致的政策。

第 7 条

高级缔约方承认，通过联合体的共同协调，规定在平等的基础上协同活动包括：

——协调外交活动；

——在建立和发展共同的经济区、欧洲共同市场和欧洲市场方面，在海关政策方面的合作；

——在发展交通和通讯系统方面的合作；

——在环保领域的合作，加入建立生态安全全方位国际体系；

——移民政策问题；

——同有组织犯罪斗争。

第 8 条

各方意识到切尔诺贝利灾难对全球的影响，必须联合和协调自己的力量以尽量缩小并消除其后果。

为此，他们商定，签订一项考虑到灾难严重后果的专门协定。

第 9 条

有关解释和运用本协议条例的争议应通过有关的谈判解决，必要时应通过政府和国家首脑级的谈判解决。

第 10 条

每一高级缔约方保留中止协议或其某些条款的权利，但必须在一年内将此通报协议各参加国。

本协议的条款经各高级缔约方相互同意，方可补充或修改。

第 11 条

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在各签字国领土上不允许使用第三国，包括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法律规范。

第 12 条

各高级缔约方保证履行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条约、协定，为他们规定的国际义务。

第13条

本协议不涉及各高级缔约方对于第三国的义务。

本协议向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有成员国以及同意本协议的目的和原则的其他国家敞开大门。

第14条

联合体协调机关的正式所在地为明斯克市。

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机关应停止其在联合体各成员国领土上的活动。

本协议于1991年12月8日在明斯克市完成一式三份，每份都以白俄罗斯语、俄罗斯语、乌克兰语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的效力。

白俄罗斯共和国　C. 舒什克维奇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Б. 叶利钦、Г. 布尔布利斯

乌克兰　Л. 克拉夫丘克、В. 福金

№04066

斯米尔诺夫关于不赞成发表列宁文件致苏共中央的信

（1991 年 12 月 14 日）

绝密

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副总书记 B.A. 伊瓦什科同志：

鉴于正在准备第 6 次出版弗·伊·列宁选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业已整理了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部分尚未公布过的弗·伊·列宁文件遗著。

据载于 1990 年 10 月 1 日的资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有 30820 份列宁的文件原件。到现有为止，其中已公布过的有 24096 份。其中剩余的尚未公布过的列宁亲自处理过的文件（即由列宁所写、校阅和口授过的文件）有 3724 份。其余的 3000 份是他作为人民委员会、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所写的国家官方文件。可见，列宁文件遗著可以分为两大类，即：

（1）理论和意识形态性质的材料；

（2）与国家领导人具体的政治活动有关的文件。

至于第一部分文件，那么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领导的意见，应该抓紧时间毫无例外地发表。为此，最好能从 1991 年起在《真理报》、《共产党人》杂志和《苏共中央通报》上开始按选题定期发表列宁的这些文件和研究院主要专家的评论文章。这可以在准

备新的第6版弗·伊·列宁选集时更系统地做到，使第6版选集中的每一个文件在同其他文章中衔接方面会占有自己的地位，文件所包含的内容的真正意思读起来也会更确切。

至于有关列宁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具体的政治活动的文件，它们之中有些文件发表出去会在当前社会政治形势下引起各种各样的不同反应。这首先是指那些在阶级矛盾激烈和内战时期的文件。

比如，有这么一些文件，它的内容可能会被解释为鼓励反对一些主权国家的暴力行动，这些国家有：印度、朝鲜、阿富汗、英国、伊朗、土耳其、希腊等（向某些国家进行革命斗争的部队提供武器和货币援助；给阿富汗的起义者以武器援助；帮助伊朗的革命者；为蒙古的革命活动提供经费；例如还为芬兰的共产党人拨款1000万卢布等）。

有些文件还叙述了苏维埃共和国国家组织工作的某些秘密方法（如关于为外国国民设立的集中营，关于对来到我国的外国代表团监视并破坏其威信的活动的组织，比如对英国工党代表团就这么做过）。

把红军说成很不光彩之处，在寄给列宁的材料中列宁的批注（比如说第1骑兵集团军的分队参加了蹂躏犹太人的暴行之类的）。在一些文件中还谈到国家机构利用族际矛盾的问题（如在外高加索；企图使立陶宛、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苏联化”；关于通过在卡累利阿的枪决行动反对分立主义之类的说法）。

某些文件有鼓励恐怖和镇压政策的内容（比如，“秘密训练恐怖分子：必须速办”）；“要尽量用军事手段惩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比如：依靠巴拉霍维奇在什么地方越过边界，哪怕是1俄里，并在那里绞死他们的100～1000个官员和富人）；“我们‘冒充’‘绿林人’（以后我们就推到他们身上）越过10～20俄里并绞死富农、牧师、地主。每绞死一个人给奖金10万卢布”；要么：有

关把孟什维克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都驱逐出俄罗斯："残酷地驱逐出俄罗斯"："残酷地驱逐几百人"；关于驱逐知识分子等。）

大量文件涉及到当时极其尖锐的外交问题。

现在发表这类文件是不适宜的。

苏共中央直属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　Г. 斯米尔诺夫

№13001

独立国家阿拉木图宣言（摘录）

（1991年12月23日）

阿塞拜疆共和国、亚美尼亚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克兰共和国力图建立民主法制国家，其相互关系的发展应建立在相互承认和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权力平等和不干涉内政，放弃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经济及其他方式的压力，和平解决争端，尊重人权和人身自由，包括少数民族的权利，认真履行国际法的义务及其他公认的原则和准则的基础上。

承认和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现有国界不可侵犯。

认为巩固具有深刻历史根源的友好睦邻关系和互利合作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有利于和平和安全事业。

意识到自己对捍卫国内和平和民族和睦的责任；

忠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的目的和原则；

特作如下声明：

联合体各成员国的相互作用应在平等的原则，对等的基础上，并按照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国家同盟的联合体，而是按照各成员国之间的协议确定的程序发挥作用的协调法规实现。

为保证国际间战略稳定和安全，各方将相互尊重保留联合指挥战略军事力量的联合指挥部并统一控制核武器。各方将相互尊重成

为无核和（或）中立国地位的愿望。

独立国家联合体经所有成员国同意可向前苏联的成员国以及其他赞成联合体的目的和原则的国家敞开大门。

确认忠于在建立和发展统一经济区域，全欧和欧洲市场中的合作。

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再存在。

联合体的参加国根据自己的宪法程序保证履行前苏联的条约、协议所规定的国际义务。

联合体的参加国必须绝对遵守本宣言的各项原则。……

№0369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宣言

（1991年12月26日）

依据阿塞拜疆共和国、亚美尼亚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克兰共和国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意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确认，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国家和国际法主体将不再存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建议联盟各独立国家首脑认真研究以下问题：

关于独立国家联合体建立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家政权及管理机关在法律上的继承问题；

关于建立旨在保持联合体各成员国领土上统一的法律、经济、人文和环境空间的联合体议会问题；

关于联合体建立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签订的国际条约的批准、履行和废除问题。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号召联合体各成员国的政权最高代表机构和首脑采取一切取决于他们的措施，保障人权和人身自由，人民的和平相处，保证其国家机构同世界各国和人民的

友好睦邻关系与合作，保证坚定不移地履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签订的条约和协议规定的国际义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公报

【专题说明】

关于出版古米廖夫学术著作的争论

（1987 年 3～6 月）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1912 年出生，苏联历史科学博士，列宁格勒大学主任研究员、地理学专业学术委员会委员，曾参加过卫国战争。70 年代后期开始，他的学术著作被禁止发表，因为他提出的学术观点——民族共同体不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是与人群适应一定的自然条件相联系的生物界发展的产物——被看成是与资产阶级的地理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地缘政治论，以及唯心主义的“英雄与群盲”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87 年，古米廖夫向苏共中央提出申诉，要求允许出版他的学术著作。其他一些学者也向苏共中央提出同样的要求，认为一名资深的学者甚至无法出版自己的著作来回答自己的对手，还有什么民主和学术民主化可言？经过一番争论，古米廖夫的有关著作终于在苏共中央的干预下得以出版。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王希礼翻译）

№03224

古米廖夫关于学术著作被禁止出版致卢基扬诺夫的信

（1987 年 3 月 10 日）

最尊敬的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①]！

我不得不告诉您，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列宁格勒人，1912 年生，历史科学博士，列宁格勒大学主任研究员，地理学专业学术委员会委员，165 种历史学和地理学科研著作的作者，目前却处于十分奇怪的境况之中。

由于我不清楚的情况，近 10 年来出版我的著作遭到封锁。我只能作出一种解释，那就是我前半生一直无法摆脱的并非因我的缘故而造成的灾难的阴影，现在仍然以看不见的形式继续起着作用。对于我的指控早在 1956 年即已撤销。自 1959 年至 1975 年期间，我的著作，尽管困难重重，还是得以出版，而自 1976 年起，除极个别例外，已经完全不再出版。

这种做法在述及的 10 年内已成为定例。我的一本最好的书《民族起源和地球的生物圈》，30 印张，于 1979 年被全苏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留存。读者征订数达 2000 册以上，因此应当作为一本书在“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全苏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却停止制作副本。

这是直接违反惯例的。

① 阿纳托里·伊万诺夫维奇·卢基扬诺夫，1955 年参加苏共，1977 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民族起源和地球的生物圈》（全苏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1979年版）一书的续集是《黑海周围一千年》，23印张，经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地理系学术委员会赞同；《古俄罗斯和大草原》，35印张，经德·谢·利哈乔夫[①] 院士同意；《历史时期的民族共同体地理》，18印张，经苏联地理学会主席团认可。

具有权威的学者们对我的著作深表嘉许，但是，出版社和杂志的编辑部虽然事先经协商一致约了稿，但后来却把已经接受和通过的文章，甚至从排好的版样中抽下来，不说明原因地退回，有时也付给部分酬金。

这样做的有：《自然界》、《历史问题》（三次）、《新世界》、《星》、《普罗米修斯》（“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年刊）和《列宁格勒大学通报（地质学和地理学版）》。“科学”出版社“东方书籍编辑部”（曾印过我的5本专著）主编干脆表示在《历史问题》刊登我的作品以前禁止我去找他。准备出版的书放在家中。这样从1976年一直拖到现在。

我的作品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是有现实意义的，它们证明：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和相互帮助是典型的特征，而个别的冲突在上千年的过程中只是在共生的总背景下的偶然事件。

我想着我们的未来，而且知道，“家庭和睦——它才能牢固”。任何一个民族的人都会为有人不尊重他的历史和文学而不快，而人们责怪我说，我对我国各族人民忠贞不贰。然而最好还是立论公允，即符合科学的要求，也符合我们祖国的利益。

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我的书在“科学”出版社问世，而对它们的评论并不存在成见。

列·尼·古米廖夫

①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利哈乔夫，苏联文艺学家和版本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

№03225

齐赫文斯基就古米廖夫的著作出版问题致苏共中央的信

（1987 年 4 月 30 日）

1987 年 4 月 30 日，第 14100－1255/190 号

苏共中央

对第 072422 号函的答复

根据商定的意见，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将该部委员会关于列·尼·古米廖夫有关历史民族学课题著作的结论转给科学和学校部。

附件：全文 4 页。

苏联科学院院士、历史学部学术秘书

谢·列·齐赫文斯基①

附　录

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委员会关于古米廖夫著作的结论

学术界、广大读者群对于列·尼·古米廖夫关于民族共同体、

① 齐赫文斯基，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苏联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41 年参加苏共，是苏联远东国家史研究权威。

民族起源问题，关于突厥部落的早期历史，以及成吉思汗后裔帝国建立之前和存在时期草原世界的早期历史等方面的观点广有所知。这些观点在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专著、被留存的手稿《民族起源和生物圈》中，都有陈述，而且一直引起广泛的反响和评论。

列·尼·古米廖夫的观点可归纳如下：

民族共同体（部落、部族、民族），在他看来，不是社会的概念，而是生物学的概念，是人类的生物学分类，是由于不同人群（如同动物的种群）为了适应自然条件而形成的。同时，民族共同体只是在世界上一定的（不知由什么制约的）特殊地区才可能产生和已经产生的，而且和其他生物类群一样，具有从出生到“自然”死亡的生命周期。民族起源和整个民族史的主要推动力量，被认为是个别优秀人物（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穆罕默德、拿破仑等）由遗传因素（突变）决定的“先知性”，即特别心理状态。这类“先知性”，按照列·尼·古米廖夫的说法，成为普通人们（“后知者”们）从种族上实现联合的核心，并在自己的行为中反映了生物学趋势。例如，一个民族共同体“需要”排挤其他民族共同体而扩大自己的分布地区。每一个民族共同体是同一定的“先知者”的基本储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各个民族共同体应当看做为从生物学观点看是相互不能共容的。按照列·尼·古米廖夫的说法，它们之间的接触是不应受欢迎的，因为它们如同“不同频率”的物理场之间的接触一样会导致相互消退。种族之间混和通婚，似乎会产生在基因遗传方面没有生命力的后代；在民族混合基础上产生的国家和社会设置是“不长久”、“不现实的”，等等。

在列·尼·古米廖夫的著作中，有许多毫无根据的、荒诞不经的结论。它们不是以分析资料为依据，而是以“思维的非传统性”为出发点，力求用自己的观点与“官方”的观点相抗衡。例如，这样

的观点有：关于可萨里亚[①] 的突然消失（水淹）的看法，其实并未有过这样的灾难，任何资料也没有反映出这样的事；关于罗斯对于遭受罗斯人突袭之苦的波洛维茨人[②] 的粗暴蛮横的态度的看法，而同时又有关于这两个民族和平友好相处的提法。事实上，双方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说得和缓一点的话，列·尼·古米廖夫关于金帐汗国的侵略“并无害处”，关于征服在历史上有“必要性”，关于对欧亚大陆各民族带来可怕灾难的这种征服似乎曾经有过过分夸大的说法。这些观点听起来十分怪诞。

必须指出，列·尼·古米廖夫的名声给他带来了广大读者群的欢迎，人们被他的小说家似的奋发情绪和显露的才华所吸引，因此很少注意他的论点中的前后矛盾、含混不清和即兴发挥的特点。

从列·尼·古米廖夫立论的不正确的方法论结构看，其中存在有意识形态错误和实际政治错误的危险。这些论点是有机地同过去早就揭露过的各种资产阶级理论：地理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地缘政治论，以及唯心主义的“英雄与群盲”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否认民族共同体的社会环境，忽视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类型学条件的存在，以及其与社会经济形态的联系，将会导致忽视整个社会的社会形态发展。

列·尼·古米廖夫的构想进一步发展下去将达到什么地步，不久前他的追随者 IO.M. 博罗代的文章《民族接触和周围环境》（载《自然》杂志 1981 年第 9 期）对此作了说明。这篇文章又提到，世界各族人民应当各自孤立地生活，因为它们之间的民族文化互动作

① 可萨里亚，泛指可萨人居住的地区和古代的可萨汗国。操突厥语的古代东欧民族可萨人，7～10 世纪游牧于伏尔加河下游、顿河及北高加索地区，曾建立可萨汗国。

② 操突厥语的民族，11 世纪在南俄的草原地带游牧。11～13 世纪曾侵袭过古罗斯，后被蒙古人征服。

用过程是有害的，会导致产生对历史过程具有不利影响的“嵌合体”。种族通婚是不可取的，因为会导致出现心理上不平衡的子女，等等。作者的主张，和他持以为据的列·尼·古米廖夫的主张一样，客观上是同样主张种族隔离和保持“纯正血统”的人们声气相投的。但是，人类种族文化历史的主要发展途径，没有民族接触，没有文化的互动作用和相互影响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观点对于苏联更是荒诞不经，因为在苏联民族接触对于各族人民的相互接近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已经有了数以百万计的族际通婚家庭，等等。

必须说明，博罗代的进一步发挥列·尼·古米廖夫主张的文章形成了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会议专项讨论的议题。1981年11月12日主席团通过的第1369号决议指出：发表这篇文章是错误的，它对民族形成过程作了不正确的解释；同时在广大读者中传播方法论上草率不周、缺乏充分根据和不能成立的有害主张。

没有争论，科学是不能发展的。在学术报刊上就上述问题已多次进行争论，证明列·尼·古米廖夫的以上观点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加以广泛传播则是实际上有害的。这就是不出版列·尼·古米廖夫著作的基本原因。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伊·德·科瓦利琴科（主席）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А.П. 诺沃谢利采夫

历史科学博士　В.И. 科兹洛夫

历史科学博士　С.А. 普利特涅娃

历史科学博士　П.И. 普奇科夫

№03226

利哈乔夫等就古米廖夫的著作问题致雅科夫列夫的信

（不晚于 1987 年 6 月 3 日）

莫斯科，苏共中央

致苏共中央书记亚·尼·雅科夫列夫同志

尊敬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我们写信给您，是建议出版历史科学和地理科学博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的著作，首先是他的宏大科研成果《民族起源和地球生物圈》。这部书多年来只作为留存手稿而存在。

列·尼·古米廖夫在对欧亚大陆和非洲各民族的历史资料进行广泛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了民族（民族共同体）由于他们居住生存的地理环境而形成的独特的发展规律。

依据公认的、目前已成为经典作品的韦尔纳茨基[①] 院士的著作，列·尼·古米廖夫揭示出与民族和部族的经济发展、阶级发展和政治发展形成整体的民族起源的自然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从而证明有关某一些民族具有民族优越性而另一些民族具有民族缺陷的各种种族主义理论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认为，列·尼·古米廖夫的理论，除了重大学术价值和具有独特性之外，可以成为争取和平和各族人民友好的思想斗争中的有力论据。

①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韦尔纳茨基，苏联地球化学、放射地质学科的奠基人，苏联科学院院士。

最后，还应说明，列·尼·古米廖夫的反对者拥有发行学术著作和科普出版物的巨大权力，他们把列·尼·古米廖夫的个别科学论点据为己有或随意歪曲，不仅不惜指责他“不学无术”和“错误充斥”，而且甚至编造流言蜚语加以攻击从而做到了实际上禁止他的著作出版。如果一名资深望重的学者甚至无法出版著作来回答自己的对手，那还有什么民主和学术的民主化可言？

列·尼·古米廖夫是一名学者、爱国者和伟大卫国战争的英勇战士，1987年10月1日就将满75岁了，他的全部科学探索都是在命运处于悲剧性和不公正状况下实现的，既然对他的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公正待遇可以恢复，那么，也该是恢复他的学术公正待遇的时候了。

苏联文化基金会主席团主席、院士、
国家奖和国际奖获得者，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德·利哈乔夫
国立莫斯科大学诺夫哥罗德考古队长、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列宁奖和国家奖获得者
瓦·亚宁
作家、语文科学硕士
Д. 巴拉绍夫
诺夫哥罗德作家协会责任秘书
Б. 罗曼诺夫

№03227

格里戈里耶夫和斯克利亚罗夫就出版古米廖夫的著作呈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7 年 6 月 3 日）

苏共中央

对第 072422 及第 223453 号文的答复

历史科学博士、列宁格勒大学地理研究所研究人员列·尼·古米廖夫致信苏共中央，请求协助他出版自己的著作。这些著作，据他说，是被“科学”出版社，包括《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在内的一系列杂志编辑部并无足够根据而予以否定的。他还认为，中止复制他于 1979 年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所属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留存的手稿《民族起源和地球的生物圈》，也是没有根据的。

院士德·谢·利哈乔夫、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瓦·拉·亚宁等人在写给苏共中央的信中也支持出版古米廖夫同志的著作。

列·尼·古米廖夫同志是关于中亚和中国的历史和民族问题研究的 5 部专著和大量论文的作者。在 1960～1970 年写成的，其中包括在《国立列宁格勒大学通报》及其他杂志上发表的著作中，古米廖夫同志进一步发展了所谓民族起源的生物－地理学构想。按照他的意见，民族共同体（部落、部族、民族）不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是与人群适应一定的自然条件相联系的生物界发展的产物。他的构想的基础是所谓的“先知性”，即个别优秀人物充当民族联合的核心的能力。古米廖夫的观点反映的思想是：不同民族共同体从生

物学观点来看是互不相容，异族通婚有害，把不同民族联合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做法极其困难而没有前途等等（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的资料附后）。同时还应指出，古米廖夫的一系列论点被广泛采用，例如，哈萨克斯坦的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就用它们来为种种民族主义的说法辩护，证明游牧生活方式和牧民比其他民族优越（见A.赛义吉姆别科夫：《会唱歌的圆屋顶》，阿拉木图1986年版；K.萨尔加林：《先祖和后裔》，阿拉木图1986年哈萨克文和其他文版）。

古米廖夫同志的构想多次受到鲍·亚·雷巴科夫院士、尤·弗·布罗姆列伊院士、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约·罗·格里古列维奇、通讯院士基·瓦·切斯托夫及其他著名学者的严厉批判。他送交“科学”出版社和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的著作《民族共同体现象（研究对象和方法论）》（1977年）、《民族学》（1981年）受到苏联科学院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学术鉴定人的激烈否定。为此，这些著作从出版计划中被删去。古米廖夫同志的文章《游牧民族历史上研究较少的几个方 面》送到《历史问题》杂志后，在编委会上经过两次讨论，因该文对于学术资料不予重视和无根据地夸大游牧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作用而未予刊用。文章退还作者请予加工修改。

古米廖夫同志在致苏共中央的信中列举他的新作，并未向“科学”出版社和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投稿。古米廖夫同志的手稿《黑海周围一千年》，是经作者同意由列宁格勒大学编辑出版部留存的。

至于中止复制古米廖夫同志手稿《民族起源和地球的生物圈》一事，已建议全苏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所长博洛申同志根据历史－地理学有关机构和专家的需求重新恢复复制工作。

已责成“科学”出版社社长C.A.奇比里亚耶夫同志、列宁格勒大学校长C.П.梅尔库里耶夫同志、《历史问题》杂志主编B.Г.特鲁哈诺夫斯基同志认真、客观地审阅古米廖夫同志送交的著作。

对于作者在信中提出的问题，已由苏共列宁格勒州委科学和学

校部部长 Ю.А.杰尼索夫同志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对来信的研究结果，古米廖夫同志表示满意。对德·谢·利哈乔夫等人来信的答复已打电话通知他们。

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　B.格里戈里耶夫

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Ю.斯克里扬诺夫

【专题说明】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事件

（1988 年 2 月）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在苏联南高加索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面积4400 多平方公里，80 年代末的人口约 18 万，80％左右是亚美尼亚人，信奉基督教。此外还有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以及信奉东方正教的俄罗斯人和格鲁吉亚人。1923 年以前，该地区属亚美尼亚管辖。1923 年 7 月 7 日，该地区成立自治州，并由联盟中央政府决定，划归阿塞拜疆管辖。对此，亚美尼亚一直十分不满，一有机会就要求联盟中央“纠正”。为此，亚美尼亚不少领导人在斯大林当政年代被作为“民族主义分子”，惨遭不幸。

自 1987 年开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民族主义运动强化起来，以不同方式要求将该自治州归还亚美尼亚管辖。由于此使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两族之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1988 年 2 月，苏共中央发表了公开信，认为现有民族地区布局的任何更改，都有损于民族之间的关系。公开信的内容，立即引起亚美尼亚人的反对，首都埃里温 20 多万人上街游行，抗议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内容。阿塞拜疆的苏姆盖特市也立即发生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游行

和骚乱。本专题收入的文件即苏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当时局势的会议记录。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吴海鹏、高增训翻译）

№07045

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局势的会议记录

（1988年2月28日）

会议主持：米·谢·戈尔巴乔夫

参加会议的同志有：安·安·葛罗米科

叶·库·利加乔夫

维·彼·尼科诺夫

尼·尼·斯柳尼科夫

米·谢·索洛缅采夫

维·米·切布里科夫

爱·阿·谢瓦尔德纳泽

亚·尼·雅科夫列夫

尤·德·马斯柳科夫

尼·弗·塔雷津

德·季·亚佐夫

奥·德·巴克拉诺夫

亚·帕·比柳科娃

伊·瓦·卡皮托诺夫

1. 关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共和国事件的补充措施。

戈尔巴乔夫：我们已采取的一些措施，其中包括直接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公开信，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人们对公开信的反应强烈。这封公开信在修改好的当天夜间就用密码发走了，而我们

是在白天开始起草的。

最近有50多万人聚集在埃里温大街上。那里的一切都已陷于瘫痪，一切都停滞了。附近一些村庄的居民也开始成群结队地涌向埃里温。

葛罗米科：最近是指今天吗？

戈尔巴乔夫：不，是在公开信发出之前，星期五，人特别多。在卡拉巴赫还发生了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的冲突，有两人死亡。在埃里温到处散发着这样的传单：亚美尼亚人停止集会，拿起武器，整死土耳其人。还有人从远处用手枪向当地驻军司令部射击。子弹打在办公室的窗户上，由于已是强弩之末，子弹卡在了窗框里。这就是开始时的情况。我们知道那里有一些极端主义分子。

不过我还是应该指出，即使是在50万人涌上大街时，亚美尼亚人还是保持了高度的纪律性，没有任何反对苏联的迹象，除了那些上街并进行集会的部分人群以外（我稍后再说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而且群众也是在我们的旗帜下行进，举着我们政治局委员的画像。只是极端分子暗中散发了一些民族自决的标语。从所有发言来看，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反对苏维埃或敌对狂妄的地步。

这是群众的表现。但同时也可以从这里看出，他们准备得很好。简直都不用组织：轮流集会，准备好了食物，相互交换。弗拉索夫对我说了这些，他们研究过此事。

集会者在发言中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卡拉巴赫的问题，它与亚美尼亚合并的问题。他们说，斯大林时代对这一问题的决定是错误的，是在众所周知的条件下强加给人民的决定，是不正确的，因此现在应该在民主和改革的框架内解决。

弗拉索夫给我一盘三天以来事件的录像带，是秘密拍摄的。我看了所有发言，全部集会人群。从远处可以看到——近百万人头挨头地站在一起，这是摄像机拍摄到的。在这群人当中，既有青年，

也有老人。众多知名人士诸如人民演员、艺术家等纷纷发表演讲，内容集中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局势问题。他们谈到对亚美尼亚文明不恭的态度，说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族的自治没有权力，没有与故乡的联系等等。所有紧张形势都在亚美尼亚方面。因为，坦率地说，我们政治局通过的决议阻止了阿塞拜疆人。如果我们不做出这项决议，那就会出现稍后我要向你们讲的事。

我在这里，在中央同卡普季基扬[①] 和巴拉扬谈话时对他们说，我们了解问题的全部起因，这是一段复杂的历史。其原因、根源都在国外，在我们境外。是历史、命运使亚美尼亚人民四处漂泊，——这一切我们都了解并十分理解。我个人认为有两条原因：一方面，卡拉巴赫方面本身就有许多疏忽，再加上人民群众容易激动的情感因素，对历史上发生的一切记忆犹新，所以一切有辱亚美尼亚人情感的东西都会引起这种反应。

在卡拉巴赫，过去和现在都给人留下了把柄。比如，斯捷潘纳克特[②] 州委书记在14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去过亚美尼亚，更何况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还是亚美尼亚人的一个自治州[③]，要列举起来疏漏还有很多。甚至通往亚美尼亚的公路也废弃了，文化联系也被破坏。这些都是蓄意干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一直在接收土耳其的电视节目，但却不接收亚美尼亚的电视节目。

---

① 西尔瓦·巴鲁纳科夫娜·卡普季基扬，亚美尼亚女诗人，亚美尼亚功勋文化活动家。作品主要有抒情诗集《我的亲人们》、《中途沉思》，长篇小说《驮运队还在途中》。获苏联国家奖。

② 斯捷潘纳克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行政中心。1923年7月，在没有成立自治州之前，在该地区属亚美尼亚管辖时代叫汉肯德村。1923年7月7日成立自治州，为纪念邵武勉而改名。

③ 1923年7月7日之前，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属亚美尼亚管辖。在该自治州，亚美尼亚人约占居民的80%。戈尔巴乔夫讲的是历史上的情况。

我当时问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①]：您在边界地带采取了哪些措施？他对我说，在纳希切万[②] 国境线经过的地方，有边防军的辖区，那里设有边防哨卡，等等。而边境地区的纵深地带，由当地地方机关管辖，在这种情况下由共和国直接负责。那么他们制定了哪些措施呢？现在，纳希切万全境属于边防地带，禁止自由出入。但要知道，那里埋葬着种族灭绝的牺牲者，他们的坟墓都在那儿。那里还有 90 个亚美尼亚文化古迹，不过现在只剩下了 1 处。就这些。现在不允许任何人以此为借口进入纳希切万，因为这里是边防区，而且，通往那里的公路，就像人们所说的，70 年没修过一回。这些，想想看，大家怎么会接受这一切！

简单地说，他们的情绪十分激动，但我要说，这一切都需要研究，很明显，他们不会去那儿白跑一趟。

这条信息，当然，只说明了事情的一方面，但也说明了这里有值得推敲的事实。还是在昨天晚上，星期三，我曾委托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③] 代表我同卡普季基扬谈话，并要她注意，他们应该表现出应有成熟，说话要有分寸，防止事态的不良发展。雅科夫列夫和她谈了。谈话进行了很长时间，卡普季基扬在电话里哭闹不止，不过她总算答应了，制止不愉快的事件。然后就挂断了。但是她同时还谴责了我们，说我们站在阿塞拜疆人一边，她声明说他们（亚美尼亚人）不是极端主义者，更不是教唆犯。

当我们星期四开会时，她已经坐上飞机回埃里温了。在这里，他们联合上了巴拉扬——作家、《文学报》记者，他是少数民族，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很有才华，已写了 33 本书。在他们那

① 即切布里科夫。

② 指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首都纳希切万市，属阿塞拜疆管辖，于 1924 年 2 月 9 日成立。90% 左右的居民为阿塞拜疆人，此外还有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

③ 即雅科夫列夫。

儿很有名，他有点放荡不羁、自信，而且也很能钻营，很能干。

还是在莫斯科的时候卡普季基扬就老是带着他，并请求我接见他，哪怕五分钟也好。我当时想：干嘛要回避呢，现在应该利用一切可能来解决那里的问题。我说了我的想法，而此后他们就将十分窘迫——我把他们捆到了一块儿。我已经向大家说了，我是晚上着手草拟公开信的，我回想起列宁在出现严峻的形势时是如何工作的——他要亲自过问，亲自发电报等等。于是我就同最不受欢迎的人进行了一次谈话。而这个女人还是她们那里的一个什么卡普季基扬委员会名誉主席，对吧？

我会见了她，我说——阿塞拜疆的局势紧张，您明白，应该制止这一切，那里的人也十分紧张。而她对我说：他们为什么紧张？你们通过的决定对他们有利。我说：不，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们通过的决定对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和整个国家都有利。这次谈话进行得特别困难，她的情绪十分激动，火药味很浓。卡普季基扬说，我们听说您在公开信上签了字，我们对您抱有希望等等。我回答说，我也认为你们寄希望于政治局，寄希望于作为总书记的我，正因为如此我才签了字。

我对他们说，我向你们保证，事情会过去，一切都将按部就班，你们会说“谢谢”，我们阻止了你们，谢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签发了公开信。现在必须制止你们那里的反常现象。问题是有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管它，也不考虑实际情况，到时候这方面就会出更大的事儿，那时全部局面就会拿握在某个人的手里。必须说明，她（卡普季基扬）反对这样，并强硬地声明说领土问题现在就应该研究清楚。她问道，您为什么不愿意成立一个委员会，你们能为一个鞑靼成立委员会，而这还是事关两个共和国的问题，为什么就不愿意成立一个委员会呢？我说：请听我解释，既然我可以在这里接见你，既然政治局和政府正在解决这一问题，那么要这个委

员会又有什么必要呢？现在我坦率地告诉你们，以便大家有所了解，我们已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但不能恢复鞑靼自治州。不过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还是要解决的。

巴拉扬（这个人脑子很快，是个很有城府的年轻人）问道，那我们该向人们说些什么呢？我回答他说，说该说的，说我们党中央、政府从未有过任何有辱亚美尼亚人民的言行，就说中央正密切关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出现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巴拉扬立即就说：您瞧，如果政治局要研究这些问题，就需要一个委员会。直说了吧，一开始就很清楚，为什么他们要跑到这里来，无非是想沽名钓誉，加强自己的影响罢了。坦率地说，我们不能回避同他们会晤，他们都是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老百姓很愿意听他们的。

另外，他们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因此，亚美尼亚人这一方，坦率地说，本应该克制自己，冷静下来，以免使全军都动起来。那么他们俩人对公开信的反应怎样呢？可以说，与我们的要求并非完全一致。我们要求大家都读一读，各抒己见，等等。我刚才看录像带，有一个人的发言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人说："联盟的广播和电视不是真实地反映这里的老百姓说些什么，担心什么，却污蔑我们是教唆犯……"，等等不一而足。

顺便提一句，我在同卡普季基扬谈话时说：决议中绝对没说亚美尼亚人是教唆犯，我们是说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部分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是受了教唆犯的挑唆，是有这样的内容，这是存在的，因为这里既有挑拨离间者，也有人民，我们并没有把他们混为一谈，而且我们对亚美尼亚人民的态度也没有改变。

此后，他们开始读公开信，尔后，巨大的人海变成众多的小组，开始讨论，然后唱歌，然后高呼"乌拉"。一些人分散开去，一些人又汇集过来。人们开始意识到，在公开信发表之后应该冷静下来。以后会怎样呢？我察觉出了他们的情绪，我们考虑的时机很

正确。这里的人民已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和印象之中：他们50万人汇集了起来，但似乎没有人对此做出反应，正如人们所说的，领导层连句好话甚至都没说。就在这时这封公开信到了，并起到了它的作用。星期六人们已开始工作，有一部分人甚至星期五就开始工作了，大部分人已于昨天[①]开始工作。亚美尼亚电台广播说，劳动人民已承担起把失去的时间和损失夺回来的义务。事情就是这样结束的。

不过阿塞拜疆人举家从亚美尼亚逃走的事是有的。当然，统计数字不一样：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报告说55名阿塞拜疆人逃走，而拉祖莫夫斯基说是200人。至于居住在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人，其中有200多个家庭担心被异族驱逐，因此住进了学校。这一数字还会扩大到将近500。

拉祖莫夫斯基（苏共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副部长）：在阿塞拜疆人逃离亚美尼亚时，他们不说是“逃离”，而是说去阿塞拜疆串亲戚，因此，应从阿塞拜疆方面去统计这一数字。他们到了阿塞拜疆之后就直说我再也不回亚美尼亚了。

戈尔巴乔夫：现在我们来说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本身的局势。那里新选出一名州委第一书记，他在那里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看得出，他的确是位有声望的人。所以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叶戈尔·库兹米奇[②]打电话同我说了这些情况，我当时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推举那些确有威望的人担当领导职务。他是州党委委员，曾任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农业。当时拉祖莫夫斯基对他说，你要珍惜这次机会，我们会支持你。问题是有的，也应该解决。但他并没有投进我们的怀抱，不过同意了。中央就支持他吧，

① 即星期日。

② 即利加乔夫。

因为那里确实积累下来了许多问题。他一当选——局势就大乱，情况相当复杂。亚美尼亚方面打电话问他：您了解那里的事吗，全体亚美尼亚人都因为您而行动起来了！

切布里科夫：人们正在从集体农庄向斯捷潘纳克特云集。

戈尔巴乔夫：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①] 今天对我说：斯捷潘纳克特的“炭火还在烧，羊肉串还在烤”，总的说来没有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象发生，不过人们并没有离开广场，大概有 500 到 1000 人的样子。

弗拉索夫（苏联内务部长）：1000 多人。

戈尔巴乔夫：有 1000 多人。一定要控制住局面，可别让“炭火真烧起来”。这表明他们是在受亚美尼亚方面的指使，并一直保持着联系。

现在，阿塞拜疆方面开始有反应了，首先是那里死了人，于是开始谣言四起。阿塞拜疆人由于担心遭到迫害已开始出逃，同时他们声明说，亚美尼亚人不让他们住在那里，于是导致了动荡。再说斯捷潘纳克特也不平静。现在阿塞拜疆那边也开始行动了。我似乎觉得阿塞拜疆的行动也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这在纳希切万表现得特别明显，那里也聚集了成群的人们。好在州委书记来到这里，发表了讲话，半个小时后人群散去。

下面是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②] 通报的来自苏姆盖特[③] 一位将军的报告。报告中说，部队刚好碰上一群年轻人胡作非为，于是驱散了他们，但这些人仍三五成群地继续为非作歹，他们烧毁汽车，行凶杀人，已经有 14 人被他们打死，还有许多人被送到医院。

① 即弗拉索夫。

② 即亚佐夫。

③ 苏姆盖特，苏联阿塞拜疆城市，位于苏姆盖特河下游，人口 20 多万。

切布里科夫：110人受伤。

戈尔巴乔夫：这是暴徒在行凶，在这些暴徒中，有不少是惯犯、累犯，这些都是他们搅和起来的。可是苏姆盖特的警察却熟视无睹。也就是说，这是有预谋的报复亚美尼亚人的行动，他们是要给亚美尼亚人一点“颜色看”。

总之，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那么随时都可能爆发种族屠杀。

昨天晚上，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①]打电话给我说，集会都被取消了，一切都已结束，但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呢？人群是被驱散了，可是他们又结成10人、15人或20人的小团伙，也有50人到100人的大团伙，他们肆意嚣张，强暴妇女，纵火行凶，闯进亚美尼亚人的家里，把家具给扔到外边去。最新资料如何？

弗拉索夫：有14人被打死，其中3名妇女，3名阿塞拜疆人，6名亚美尼亚人，其余两名死者身份正在调查，另外还有71人受伤，其中亚美尼亚人48名；6辆汽车被烧毁；在13座房屋里发生19起纵火案；政治教育所、公共汽车站遭到破坏；强暴案4起；54名警务人员遭围攻；已拘捕47名闹事者，其中有5名是趁火打劫者。

戈尔巴乔夫：在被抓起来的人当中，有两人承认，他们中有一个人打死了5人，另一个打死了3人。从这些趁火打劫者的身上搜出了许多黄金等贵重的物品。

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②]下达命令，迅速把军校学员和其他部队派进苏姆盖特。他还协助空运了3000多名警察到那里。他们立即展开行动，到5点钟的时候已控制住了局势。我对拉祖莫夫斯基说：这一切都十分正确，但我们还要像在阿拉木图一样，吸收公

① 即切布里科夫。

② 即亚佐夫。

民，尤其是工人阶级一起来维护社会秩序。

博布科夫和拉祖莫夫斯基同志的助手已去了苏姆盖特，以便就地组织这项工作。

切布里科夫：这个城市仍然十分动荡。

戈尔巴乔夫：对，对，动荡不安，混乱不堪。

现在据说他们还要到边远的地区搞这些活动，因此，应该尽早有效地予以制止。内务部要行动起来，如果需要补充什么，那就补充，但一定要控制住局势。因为，就像你们所看到的，一夜之间就死了14个人，还要把这些死者送到亚美尼亚，然后安葬，那里必然会有激烈的反应。情况就是这样。

弗拉索夫：苏姆盖特有20万居民。

戈尔巴乔夫：20万，而且居民的平均年龄差不多是22岁或24岁。

弗拉索夫：25岁。

戈尔巴乔夫：25岁。年轻的城市。不过据说大部分都是各种外来人口。

弗拉索夫：是这样，其中五分之一的人有前科。

戈尔巴乔夫：可能，他们先是在那里劳教，获释后就留在当地了。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他们各有各的招数。

简短地说，现在应该控制住亚美尼亚，以免他们有过激的反应。我们原打算我们派往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同志能在星期一回来，这样我们可以在星期四交换一下意见，但现在我想，目前他们还得留在那里继续这一工作，而且还要加强。这项工作在亚美尼亚已经完成，但可能不够全面，尤其是在边境地区，因此这项工作也要在这里继续。现在应该把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都动员起来。我们现在急需情报，但你就是得不到情报。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人隐情不报，老是捂着盖着。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和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都

有个别同志卷入此事，他们不干正事，但是什么都知道。

葛罗米柯：总的来说他们没有全力工作。

戈尔巴乔夫：是在全力工作，只是方向弄反了。他们对这种情绪暗送秋波，并甘当俘虏，现在更是难以自拔。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全会支持公开信，但他们却要求成立委员会。他们现在走得太远了，并且还在不断地煽动人民的情绪。这是事实。但我们还是要理解这一点，并像人们所说的，给他们一次机会。我们就做一些让步，改变一下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但一定要保持局势的稳定。其实，我就是为这件事才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来的，目的是要大家都了解情况。我认为，我们大家都放手干起来，吸收一些党的机构和其他一些地方机构参与这项工作。现在最主要的是——大力吸收人民参与局势正常化的进程，现在就做这件事，趁事态尚未扩大。否则的话，到时需要更多的精力去平息全部事件，现在第一件事——做一切那里所需要做的事。

第二，或许在我们的同志回来之后，还得必须亲自听一听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汇报。这将是更加完整的情报。完整的情报将使我们有可能布置某些具体的任务。现在整个局势的轮廓已基本清晰地显示出来了，事件的原因似乎也已明了，但这一切仍需进行具体的研究。对这一点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在这两个共和国相互关系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关键，它关系着许多问题。类似的磨擦、矛盾随处可见，而如果不予以制止（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正确的立场），那么到时候内讧将会在全国蔓延。因此说，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现在应该再一次重申这一态度，我个人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

第三，大家瞧瞧，他们那里搞成了什么样子：这两个共和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去过对方那里，除了纪念节日，没有一个领导人去邻国走访、会晤，也不交换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友谊关系、族际关系。这是极不正常的。而且，如果哪个人想从阿塞

拜疆去亚美尼亚，或相反，从亚美尼亚去阿塞拜疆，那么他非但得不到鼓励，相反，倒要引起别人的怀疑。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①] 昨天同瓦兹根进行了一次座谈，瓦兹根答应利用自己的全部威信制止反苏联主义倾向的出现。国外许多人经常给他打电话。据他说，他给所有的人的答复都是：不要干预这些事，也不要借此搞任何反苏宣传。只有在这里，在苏联框架内，亚美尼亚人民才能发展。他同时也说是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事件的发生也不是空穴来风。对此，他谈到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他说，有一次他在巴库参加过阿利耶夫的一次招待会，巴库有座亚美尼亚教堂，而在这座城市里还居住着 20 多万亚美尼亚人，于是他请求到这座教堂做祷告，他对这一请求期待了整整 12 个年头，但是他还是没有得到。原来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他们不希望他在那里出现。就这样，这种不断积累起来的情绪一直在刺激着他们。

大家要明白，他们没有任何联系，而此事竟发生在人们开始说话，或接受采访的时候。但愿人们能够在民间的水平上说：我们有几十名各民族的代表在一起工作，但愿一切力量，首先是知识界，都要关注这件事。

但确实存在许多客观事实，这或许会让知识分子们抓住把柄，回避对这些事实的研究是不行的。但是，我认为，不是应该由某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些事实，而是应该由苏共中央书记处来研究，最高主席团和其他一些机关的代表也参加。把一些有影响、有威望的俄罗斯文化界代表也吸收进来，以便他们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去走访。对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就是要心平气和地去做。并且，很明显，这里要有两点要求：一方面要帮助他们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应该把他们一起都叫到这里来，到中央来，当然他们那里也

① 即多尔吉赫。

有地方。要让他们互相走动。现在必须制定出发展各族人民文化联系、人际关系的形式。我们都已经谈到了，他们只有在纪念性节日才乘车走动一下。因此，这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密切联系还不够，这已是更加深刻的问题了。

在我们昨天同叶戈尔·库兹米奇[①]谈话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同志们，我们可能不等党的大会召开，要先就现代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范畴的任务问题召开一次会议。

亚佐夫：格奥尔吉·彼得罗维奇[②]请求晚上在苏姆盖特实行宵禁。也就是说，应该把军队，或是某种部队调入，武装起来。但不能开枪，而仅只宵禁而已，也就是说应该采取一切手段。

戈尔巴乔夫：需要宵禁吗？

亚佐夫：我认为，需要。

戈尔巴乔夫：准备好武器，但不要开枪，否则会打伤这些已经迷乱的人们。

亚佐夫：给部队发枪不带子弹，然后由装甲运输车单独装运子弹。我们来组织操作这件事。

戈尔巴乔夫：好，枪弹分离。

亚佐夫：如果您批准，我就下达命令。

政治局委员们：同意。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这件事必须做，以制止暴行。

马上就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了，送给我的有关大会的材料也越来越多。这一问题，当然，需要更深一步地研究，当一切都发生时，我们甚至还要求助于过去的经验。那时有过很多有意思的事，甚至还有过“国际农村苏维埃”。

① 即利加乔夫。

② 即拉祖莫夫斯基。

雅科夫列夫：是民族农村苏维埃，区级的，后来失去了意义，就解散了，而现在鞑靼人、德意志族人等问题又出现了。

戈尔巴乔夫：而在民族农村苏维埃集中了某一民族，当时大概有5200个少数民族地区。也就是说，当时有着一个灵活的体系，它能笼络各种各样的人，并使他们能够团结起来，进行文化交流。是很灵活。

当然，这些问题总是要发生的。鞑靼人、德意志族人早就在关注这些问题了。我让叶戈尔·库兹米奇整理有关这些问题的卷宗。我们也不止一次讨论德意志族人的问题了，卷宗档案里有政治局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但都没有执行，还有各种其他记录等。我对你们说，这个总是挺有意思。在这次全会的前一天，我曾同阿尔泰边疆区委书记波波夫谈过一次话，我们讨论了库伦达[①]问题。我对他说：或许，在那里建立德意志族人自治区的条件已越来越成熟。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说。显然，对这一问题他连想都没想过。我说，那就等着瞧吧，你会表扬他们——他们都是些好人。而他对我说：那就开始干吧，没有什么妨碍他们。我对他说，但是他们自己也存在着一些具体问题，要知道这里是库伦达，没有人愿意在那儿呆。结果，他还是想都没想就对我说：为什么需要这样？

索洛缅采夫：他们那儿的德意志族人不是从伏尔加河地区迁来的。

切布里科夫：他们不想离开边疆地区而去别的地方，他们在那儿生活的很好。

利加乔夫：德意志族人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开始在这里定

① 库伦达草原，在苏联西西伯利亚的南部，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度在100～250米。境内有苦咸水湖库伦达湖，蕴藏芒硝。卫国战争前夕，斯大林将居住在苏联西部地区的德意志人、波兰人等集体强迫迁往东部地区。40多万德意志人被强迫迁到库伦达大草原上。

居下来的，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享有免服兵役的权利，后来，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这一特权被取消了。定居下来的德意志族人总共有40多万。

戈尔巴乔夫：他们在库伦达生活的很好，我看到大街很整洁，每幢房子前面都有一个小花园，周围都很漂亮，收成也不错。

应该给这些问题排排队。现在应该首先结束亚美尼亚混乱的局势，我们已授权（中央）书记处：着手研究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心平气和地研究，也不要弄明白多少就公布多少。在此要让他们的人也参加，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参加。应该成立一个代表委员会：由学者、知识分子组成，而不要只让党务和政工工作者参加。政工人员总是过多地束缚于分析事实的工作上：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现在应该组建一个更加民主的委员会，指定领导人，让他们去考察、访问、讨论。

葛罗米柯：那么，大概就不是委员会了，而该叫代表团，不然就会同他们老在纠缠的那个委员会搞混了。

戈尔巴乔夫：对，就让书记处找一个适当的形式——这就需要多种材料、统计数字，还要组织旅行和人员交流，然后人才能去。准备工作本身就应该使大家相互接近。我们还应该掌握其他一些工作方法，尤其是在处理这种敏感的问题时。

说句粗话，当他们一开始“狗咬狗”就应该制止他们，让他们多想想主要的，他们是邻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一起。

一旦你集中某种思想，你就会捕捉到所有的细微敏感之处。一位阿塞拜疆指挥家说：我的舒沙[①]。这位指挥家出生在卡拉巴赫的舒沙，他说，这是东方艺术的中心等等，这是他们共同的摇篮。你怎么能让他离开这里呢？而亚美尼亚人却是另一种说法——“我们

① 地名，位于斯捷潘纳克特市东南。

的”。不要破坏这一切，大家都一起度过了几个世纪了。

亚美尼亚在阿塞拜疆境内也有其自治的地区——这里也有辩证法，但是，应该确保自治，并享有一切自治权力。这就是应该从中找出答案的地方。但是他们应该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了解到这一意义，否则他们又要骚动起来了。这就是结束局势应该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昨天我们进行了一次谈话，我们可能不等党代会和关于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召开（这次全会今年是开不了了，因为9月份还要召开一次关于农业问题的中央全会），当这些情绪平息下来之后，先开另一个会，进行一次必需的工作讨论。州委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执委会主席都参加。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把自己锁在官僚主义的小圈子里，就像我们所说的，邀请知识分子参加，这样讨论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更加可信。如果不是在中央，还有哪里可以让大家都讲出真话呢。

葛罗米柯：全苏会议。

戈尔巴乔夫：对，全苏大会，在中央开，但要有领导机关的代表和各共和国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参加，以便作家、学者都能发言。不要把这次会议搞成官僚主义形式的。如果我们这样决定的话，那么，当然，最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不能再少了。同志们，看来我们还必须进行一次这样的讨论了。另外，在这项工作的过程中，还将积累下来一些中央全会所要解决的问题，将进一步弄清这些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四月下旬，就全面着手这项工作，至于说到中央全会召开的时间，不能迟于1988年。

受我的委托，助手们已就这些问题约请了布朗利院士，他在我们这里从事人种学研究以及其他一些与此相关问题的研究。他马上对我说：坦率地说，很明显，没有人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自己只是建立了一个室，这需要仔细斟酌。中央全会将做出决定。全苏会议

也会对此做出反应。这是事关国家的重大问题。当我阅批关于这些问题的汇报文件时，我发现在这方面积累下来的问题太多了。

当然，中央全会也将是复杂的，全会有很多东西要讨论，我们在民族事务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它超过了一切，这是基础，是运用改革和民主化阶段可以解决尖锐问题的基础。

很明显，我们就应该这样安排工作，现在就立即结束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事件，分析其中的原因等等，仔细讨论。如果中央必须通过一项关于卡拉巴赫的决议，那也要等到共和国自己就其社会经济问题请求我们出面时再做。

4月份准备全苏会议，全面动员，积极工作，抓紧处理手上的问题。

葛罗米柯：我认为您说的完全正确，大家都不会忘记您现在所说的话。如列宁那样提出附带的意见。列宁认为，问题总是存在的。他说：最好是制止这一切，制止住。他没有说：这正确，那不正确。显而易见，列宁当时顾不上这些。因此，确实存在着某些问题。

戈尔巴乔夫：我们现在了解到，列宁那时已因病不再过问具体的事。但是现在我们应该从当今的现实出发。

葛罗米柯：我认为这一思想是正确的，深入研究事件的原因，再派工作组、代表团去那里，总之，要按您的指示开展工作。不要老是持消极、拖沓的态度：一味地催促别人。这两个共和国的领导站得都不够高，他们对此事参预到什么程度？十分有限。

戈尔巴乔夫：插一句，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和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都知道，当我同卡普季基扬和巴拉扬谈话时，就出现了这一问题。

他们声明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听说，有人想解

除杰米尔强[①] 的职务。我回答说，这是谣传，我不能证实这一点。这时，巴拉扬立即插话说如果现在就这样决定，那在这些事件之后，我们马上就把他树为民族英雄。这当然不行。而且他们两人都对杰米尔强持批评态度。他们说，有一段时间他是做了很多事。但最近一段时间就不能这样说了。我声明说，我们现在不想撤他的职。当我说完这句话时，巴拉扬立即回答说，但是也不应拖延这一问题。现在，阿利耶夫[②] 的名字在目前的局势中频繁出现，在他们关于卡拉巴赫的声明中也重复出现，这些声明说卡拉巴赫永远是阿塞拜疆的。

我们所通过的决议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不能用这种愚蠢的包装，大家要明白，这是挑衅。

葛罗米柯：领导怎么能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呢？

戈尔巴乔夫：叶戈尔·库兹米奇，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工作队，派人去，然后同他们座谈、讨论，然后再全面分析这一问题，委托人做工作。他们还说，他们给我们寄来了不少信件和呼吁书，这些信件都到哪儿去了？他们说，没人对他们作出反应。既然没有人管，那就应该走上大街，这样就会有人反应了。

利加乔夫：我看了不少信件，都是与杰米尔强有关的，印象不怎么好。

戈尔巴乔夫：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信函呢？

利加乔夫：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件我没有看过。我们已商定对杰米尔强预先采取措施。

---

① 卡列·谢洛波维奇·杰米尔强，1955 年参加苏共，1966 年任亚美尼亚共产党埃里温市委书记。

② 盖达尔·阿里·扎奥雷·阿利耶夫，1945 年参加苏共，1967 年任阿塞拜疆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69 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4 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副主席，1976 年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戈尔巴乔夫：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最近几年的事情。现在，在这些事件之后，一些事情已经很清楚，那么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情况是怎样的呢？

利加乔夫：是关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情况，对吧？

戈尔巴乔夫：对。就从最近二三年的事件开始，就三年吧，4月份以后就着手这项工作。

利加乔夫：是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吗？

戈尔巴乔夫：对，是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还应该询问一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政府，全面检查。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你们自己也考虑一下。因为亚美尼亚人一直在抱怨。他们说，他们的请求无人理睬。但事实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收到，更没有看到。

利加乔夫：我也没看过。

戈尔巴乔夫：是没看过，还是没人向我们汇报？

利加乔夫：不过我经常看简报，告杰米尔强的信很多。

戈尔巴乔夫：告杰米尔强的状，对。

叶戈尔·库兹米奇，那么，工作就这样安排，就由你负责全面研究这个问题，深入分析一切原因，等确定派谁去，由谁牵头之后，我也想参与这项工作。不过在确定人选时，要挑选有思想、可信赖的人。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们委托你来准备这次全苏会议的材料，还有拉祖莫夫斯基和卢基扬诺夫。

既然决定，那就抓紧这件事。

亚佐夫：也就是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苏姆盖特并不是实行戒严。

戈尔巴乔夫：不是，是宵禁。

亚佐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那就趁局势还没有进一步

恶化，坚决执行这条路线。应该派军队去维持秩序。反正这是一个孤立的地区，不是有数百万人口的亚美尼亚。顺便说一句，或许这对别人也能起到清醒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①] 和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②] 同志，你们说的“别人”是指可能闹事的巴库或列宁纳坎，还是指亚美尼亚境内的这个……城市？

弗拉索夫：是基洛瓦巴德。

戈尔巴乔夫：基洛瓦巴德。

弗拉索夫：这里只是一些玻璃被打碎，仅此而已。

戈尔巴乔夫：必须考虑到，那里还不知道在苏姆盖特发生的事件，一旦知道了，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谢瓦尔德纳泽：这就像一根导火索，如果亚美尼亚那边知道死人了，那就可能在当地引起复杂的局面。

雅科夫列夫：那就赶快报道，说由于在苏姆盖特发生刑事案件，犯罪分子已被逮捕。这对平静他们的情绪很有必要。苏姆盖特的地方报纸应该果断而迅速地报道出来。

戈尔巴乔夫：现在主要的是，应该立即吸收工人阶级、民兵参加打击破坏社会秩序等违法行为的斗争。这一点我要说，一定要制止一切流氓行径和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就像当年在阿拉木图一样。这十分重要，军队已被激怒了。

索洛缅采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军队的出现会引起另外一种反应，而如果再加上工人纠察队的队伍，那就会是完全另一回事了。在阿拉木图，极端分子和流氓团伙就是被工人纠察队抓起来的。那天晚上，我根据您的指示飞到阿拉木图之后，凌晨 3 点，

① 即弗拉索夫。

② 即亚佐夫。

我们把共和国的积极分子集合起来，而到4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又组织起了工人纠察队，于是，他们就把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抓起来了。

戈尔巴乔夫：昨天晚上，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给我打过电话之后，在谈到是否使用军事手段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也说过这件事。然后我一再提请拉祖莫夫斯基同志注意，一定要把人民发动起来。更何况，你们看到，结果怎么样？警察站在那里，而这些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就在他们背后闹事。要让人民明白，事情要向哪个方向发展。

拉祖莫夫：在阿拉木图，一切都是由工人阶级解决的。当时那里是另外一种局面，工人纠察队驱散了人群，而工人纠察队队员基本都是俄罗斯人。

戈尔巴乔夫：我们给军队、内务部下达的命令和任务都不变，在基洛瓦巴德只派空降兵，其他的都撤离，当然，按惯例，这些伞兵都要是俄罗斯人。

亚佐夫：应该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并且投入哪怕是一个伞兵或空降营的兵力，在斯捷潘纳克特再组建一个警察大队，以便驱散那里的人群。目前聚集在广场上的这500人是煽动群众情绪的“振荡器”。

戈尔巴乔夫：我有一个这样的请求，同拉祖莫夫斯基、巴基洛夫和波戈相商量，应该了解他们的意见。

昨天，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还有拉祖莫夫斯基，也持相同的意见。这些都要正确执行：既不要浪费时间，又要避免适得其反。波戈相曾要求让拉祖莫夫斯基离开那里。我感觉到，亚美尼亚的动机是想让斯捷潘纳克特“燃烧”起来。必须同波戈相谈，直接问他：是他们自己能结束这一切，还是需要帮助？

切布里科夫：现在埃里温正在布置任务，让斯捷潘纳克特召开

全体会议。他们的借口是：埃里温已召开过全体会议，而斯捷潘纳克特还没有开。因此可以推断——在斯捷潘纳克特尚未召开全体会议之前，聚众人群不会散去，因此，他们还要持续 10 到 15 天的时间。但是又必须采取措施，把斯捷潘纳克特广场上的这些人赶走。他们组织的很好：从国营农场运来粮食，食堂为在广场集会的人准备食物，他们也有睡觉的地方，一直在轮流上阵。

戈尔巴乔夫：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反正只要他们还没有破坏社会秩序，就先做他们的政治工作，而不要动用部队驱散他们。

切布里科夫：不驱散他们，只是在那里实行小规模的执勤包围。

戈尔巴乔夫：如果他们表现得一直比较平静，那么政治工作就要做到底。难道我们还非要动用军队不可！

雅科夫列夫：但苏姆盖特应该派军队去，有必要在那里显示一下“权力之手”。

戈尔巴乔夫：如果他们还不散去，还是应该进一步做他们的工作，但不要强行驱赶他们。如果他们表现平静，并且没有什么流氓举动，那就不要用军队驱散他们。但这里派执勤部队封锁，以免其他的人再聚集到这里来。

亚佐夫：现在司机开始上班了，但是不开车上路，他们害怕，但是还得把粮食从居民点运到城市。没必要让他们进入斯捷潘纳克特。

拉祖莫夫：学校还没有开课。他们在广场的行动很有组织。

戈尔巴乔夫：也就是说，让拉祖莫夫斯基留在巴库，而让杰米切夫去斯捷潘纳克特抓紧处理这件事。但是，同志们，如果他们表现出克制和平静，就不要动用军队压制他们。这不合适，我们要把这一点当作一条原则。

在亚美尼亚，当人们看到军队出现的时候，他们收敛了很多。

他们明白，权力就是权力。但同时要注意，谁都不要对他们指手画脚，他们自己会做出评价。

亚佐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安巴尔楚米扬[①]曾打电话给科切托夫[②]，他说：你为什么来这里？科切托夫回答说：因为，这里是外高加索军区呀。然后安巴尔楚米扬院士接着问道：那你的任务是什么？

戈尔巴乔夫：你们瞧瞧，你们瞧瞧！

亚佐夫：现在有人企图在战士中间散发传单。

戈尔巴乔夫：如果这里也出现像苏姆盖特那样的情况，一定要采取坚决彻底的措施。

利加乔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要知道那里有五分之一的人被判过刑，也就是说，那里有100，200或300多不可救药的人，应该立即把他们迁出苏姆盖特。

戈尔巴乔夫：正确，把他们抓起来。德米特里·季莫费耶夫，你说说，他们是如何行凶杀人的。

亚佐夫：两名妇女的乳房被割掉，一名妇女的脑袋被砍下，还有一个小姑娘的皮被扒了。真是太凶残了！有几名军校学员一看到这种惨象当时就晕倒了……。

切布里科夫：亚美尼亚人住宅里的家具全被烧毁了。

戈尔巴乔夫：这完全是土匪、抢劫犯。在逮捕他们时从一些人身上没收到很多金银细软。

利加乔夫：应该立即对他们进行审讯，不要拖延调查取证，像过去那样，一弄就是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应该果断地处

① 维克多·亚马查波维奇·安巴尔楚米扬，苏联天体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亚美尼亚科学院院士、院长。1940年参加苏共，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② 科切托夫，时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理。

戈尔巴乔夫：总而言之，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错过了时机。

利加乔夫：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发生在新切尔卡斯克[①]的事件。当时，一个师的部队被派到那里。我当时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斯捷潘科夫在那里，还有几位中央书记也在。我当时是副部长。那次行动极为庞大，一切，一下子就都结束了。当一个政权软弱无力，不能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安全时，——就是在消极行事，人民本应该得到保护。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呢？我相信，这件事也强烈地吸引着工人。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通报的情况更说明了这一点。应该本着这一思想解决问题。

戈尔巴乔夫：大家都行动起来，一定要控制住这座城市。至于那些刑满释放犯，可能正像你们所认为的那样是那里“根本不可救药的人”。

葛罗米柯：应当把他们拘留起来。

亚佐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现在，犯罪分子已被抓起来了。但在一天的时间里，在被逮捕的20人中，有16人又被释放出来了，还剩下4人。这是在军队进驻该城市之后，那里已经逮捕了一些特别危险的罪犯。

戈尔巴乔夫：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应该把那个无能的警察局长撤掉，立即撤，不要像你们平常那样还要进行长期正式的调查。既然他对所发生的事熟视无睹，那就干脆把他撤了，再任命别的人当警察局长。是否从巴库调一个能干的人呢。

雅科夫列夫：难道不对这两名确认犯有刑事罪的凶手快些进行公审吗？

---

① 新切尔卡斯克，苏联罗斯托夫州城市，建于1805年，是顿河哥萨克军区的行政中心。1988年约有20万居民。

戈尔巴乔夫：应该。叶戈尔·库兹米奇说的就是这件事。

应该封锁交通，不让汽车和飞机从埃里温开出等等。

我们还得就刊登亚美尼亚一些企业已开始工作的消息一事征求一下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和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的意见。顺便说一句，昨天当地电视台的转播相当出色。他们播放了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的图像，大家的情绪都很好。

索洛缅采夫：《时代》节目也播放了这些镜头，还有斯捷潘纳克特一座工厂的画面。播发了埃里温工人的发言，他们谴责所发生的事，表示要努力工作，把被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戈尔巴乔夫：同志们，就这样决定吧？

政治局委员们：就这样决定。

戈尔巴乔夫：我现在和大家交换一下关于群众工作的意见——做人民群众的工作——这是基础。

决议通过。

形成了关于在苏姆盖特实行宵禁的决议和对近三年来有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的信件整理成专辑的任务的备忘录。

【专题说明】

思想理论和党组织工作状况

（1988 年 3 月至 1991 年 8 月）

本专题选编的 3 份文件，都是关于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剧变前夕的思想理论界状况，以及党组织工作状况的文件，反映的问题和状况均十分突出。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张建文、高增训翻译）

№07012

国家安全委员会
关于国内不安定情况的汇报

（1988年3月21日）

第458－4号

1987年，国内实行经济改革，扩大民主化和公开性措施，使有反苏、民族主义和政治敌视内容的匿名材料散发量同去年相比减少了29.5%。但是参与制作散发上述材料的人数却增加了9.4%，其原因是在哈萨克和拉脱维亚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青年中团伙背景作案有一定的增加。

否定苏联对阿富汗实行国际主义援助的内容和所散发的材料数量减少了77%，而亲法西斯的口号及象征性符号则减少了24%。

一年间对所散发的具有下列内容的匿名材料作了登记：对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发出恐怖主义言论的有44起；威胁要对地方党和苏维埃积极分子代表及负责人员实行肉体惩罚的有108起；民族主义的、主要是反俄罗斯言论有309起；不同意在国内对苏联社会实行改革措施的有46起。

大量的匿名案件还发生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1987年发现制造传单、信件和标语的作者有1312人，其中33人扬言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实行恐怖主义行为，67人威胁要对地方党和苏维埃积极分子代表及负责人实行肉体惩罚。

在被查出的作者中，37.2%是大学生、中小学在校学生、职业技术学校学生，18.6%是工人，16.8%是职员，9.5%是退休人员，17.9%是其他各类公民，其中有在劳教机关服刑期满的人。

在被发现的作者中有苏共党员和预备党员 59 人，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361 人。

制作和散发匿名材料的原因是：民族主义情绪 248 人；对加强纪律和同酗酒及嗜酒现象作斗争不满的 187 人；对居民食品供应中存在的缺点，以及对某些工业品价格提高不满的 43 人；住房和日常物质生活困难者 41 人；流氓动机 238 人；自私自利目的的 86 人；精神病者 170 人；某些地方领导人粗暴对待下属人员、形式主义地对待公民的申请、违背行为的道德规范等方面所表现的非法行为 23 人。

其他 276 人制造匿名材料的原因正在调查。

经相应检查后已对大部被查出的作者（55.6%）采取了预防措施，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加盟共和国法典总刑事条款，已有 66 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安全委员会正采取措施，预防和及时杜绝与散发敌视性内容的匿名材料有关的消极现象，以及提高查处匿名材料作者及散发者的工作效率。

特此报告。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切布里科夫

№03654

苏共中央关于改革问题的全苏思想理论工作者会议速记摘录

（1990年10月11～13日）

Л.И. 阿尔巴金（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第一点，像这样的市场我们并不需要，市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高效的经济，以人为本的经济，能迅速利用科技新发明，能满足不断变化和社会需求的经济。

……第二点，市场应以社会为导向，市场不应只面向军工企业，而应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

大家都在说，让我们用用“私有化”这个概念吧，从直意上说，私有化即建立私有制。然而并非消灭国家所有制就意味着建立私有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国有砖厂租赁或转卖给集体。要知道这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有制。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苏联总统就曾采取过一项有力的举措——将苏联科学院研究所、实验室、机关的财产转为特殊所有制。从那时起，它们就不再是国家所有制，而是科协所有制。

В.Е. 奥斯特罗任斯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学校的人文主义思想基础在悄悄地遭受冲击，新近出现的政党、青年组织、教会都放肆地、强劲有力地影响着学校生活。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比如乌克兰西部地区……就连苏联国家教委本身对教育的非意识形态化和非政党化也含糊其词。照我们看来，我们

应当明确地将国家任务和党的任务区分开来，在美元教育正在成长的一代的问题上，全体人民教育工作者都应当执行统一的国家政策，而不管他们属于那一个党派。如果我们的国家不想自取灭亡的话，就应以苏联体制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全人类的价值观及理想为出发点制定这样的政策。

Ю.С. 达维多夫（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书记）：

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许多观点，为我和我党所不敢苟同。正如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阿尔巴金）所说："我们要求把市场作为改善劳动人民社会状况的手段。"但问题是市场作为一种手段，不仅仅只会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它同时也可能使人民生活进一步恶化，因而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此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是思想理论工作者。明天库德里亚夫采夫院士要作讲演，可能要讲，我们必须建立市场经济意识形态。若说到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它究竟该是怎么样的呢？

人们现在设想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即这样的意识形态，它能保护人，而我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者，还记得：市场经济意识形态是用"人以人为狼"的原则来培养人，而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

……我们面临着"五百日计划"，让我们听听里面是怎么说的："转入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发展企业主之间市场关系的重要格局创造必要的条件"，让我们继续往下读："非国有化的基本形势应通过分期付款的办法将企业拍卖给私人或团体……"等等。对不起，非国有化应理解为消除垄断，还是应理解为私有化？

同志们，请记住，改革起步时期，即 1985 年春。我们说，应当回过头来实行列宁时期的粮食税。据我看来，实现这个想法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于，生产者与国家算清账后，最大限度地获得独立。我们要使这一原则付诸实现，用不了 500 天，我们现有的法律

条文就可保证这一想法的正确实现。

H.C. 苏丹诺夫（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研究所所长）：

……有人认为是到讲清关系的时候了，起先是一种简单的消息，然后是一种“力所能及的想法”。比如索尔任尼琴的想法，这位被戈尔巴乔夫称之为伟大人物的人，这我并不反对。也许他确实是一位伟大人物，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土地的划分将是巨大的灾难，喝这杯苦酒的无疑首先是全体人民，而不是索尔任尼琴。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以和平手段解决土地争端的先例，它们总是以流血战争而结束。曾有过胜利者，但在21世纪前夕，从民族冲突和领土划分中将不会再有赢家，而只会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灾难。哈萨克斯坦民族成分十分特别。如果说外高加索、中亚的冲突主要在两个民族间展开，那么在哈萨克斯坦发生的冲突将卷进许多民族，影响将波及全国。

B.E. 贡恰鲁克（利沃夫区党委书记）：

……4月份，大家都知道列宁诞生在4月份。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消息报》上刊载了列宁给莫洛托夫的密信。信中谈的是宗教问题。这之后，考虑到我区复杂的宗教状况，这封信只非正式地发行了几千册，以此庆祝列宁的生日。后来怎么样呢？列宁雕像的周围聚集了6万人，整个大广场上拥满了人。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呢？出现了小规模的混乱，有人给雕像泼了颜料，掷了苹果等等，差点儿引起大规模斗殴。利沃夫苏维埃主席当时在场，不过后来他隐瞒了这件事，因为没人愿为此负责，后果极其严重，内务部对此也毫无办法。我想对大家说，我们那里的形势很是严峻。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我们城市中，有四位中学校长，都是党员，被召参加会议并让他们表态，要么校长，要么党——请君任选其一。他们不得不参加，这是我们自己的人，竟然说需要法律保护。社会应当保护

那些忠于党的思想的人们。

……这使人想到公民和谐的社会，但目前我们却形成这样的局势。在被称为乌克兰起义部队中，我说一个数字，共有20万人参加。如果以每个家庭4人计，乘以这个数目，将得出100万人，他们同情起义部队。如今，老一辈慢慢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冲突开始在年轻一代中展开。应该及时想一想，如何走出这种状态，要么公民和谐，要么别的什么。

Б.Я. 基比列夫（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区委书记）：

……8月份，我们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过程，经过两轮选举，从21名我们的库班老人中选举了原克格勃的卡卢金将军为苏联人民代表。让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遭到了失败。综合起来，有三个原因：一、这是人民对卡卢金经历作出的一种反应……即人民对中央所制订路线的一种反应；二，因为卡卢金支持力量的极强的组织性和行动的积极性。我们几乎一半的人民代表都去支持他。其中有格德梁、伊万诺夫、格列勃亚库宁、塔季扬娜、科里亚金娜等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把整个库班河都搅动了。当时所面临的背景是——遭到批评、唾骂，然而人民听他们的。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我们的党组织在刚开始的时候不敢将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21位候选人，都有自己中意的候选人，于是出现这样的结果。

现在我们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局势。出现了库班哥萨克组织。这是十分辉煌的东西——文化、道德、爱国精神——这一切都很好。那儿当然有歌剧的标志物——彩色饰条、马刀。我也出身于哥萨克，明白它的来源和价值。但是，同志们，问题在这里。他们声称，他们将划分土地，分配土地，成立平行的政权组织、集团、首领会议等等，肉价上涨更加恶化了这种形势。现在我们这里的肉价每公斤高达10卢布，因为实际上只有20公斤的肉是国家补贴，其余都得在市场上买。当然，这将导致党组织的工作开展越来越困

难。

彼得罗夫（托木斯克区委书记）：

……因此我想讲讲这种，可能是不平常的状况。这种状况下不仅今天我们党存在，而是从1917年就是这样。从那时起我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是这样的。他不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科学，而是一种人民文化。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导致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平庸陈腐的混乱状况，“没收剥削者的财产”、“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失去的只有镣铐”、“物质第一，精神第二”。你们任何一位学者、工程师、大学生，他们除了说物质第一、精神第二之外，对马克思主义再说不出什么更好的东西了。这种口号今天还继续存在。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化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着资本主义化和经济多元化的事实。我们还抱着这样的口号，简直是谬论。在1917年这种荒唐还可以，但现在就不可忍受了。但是我想重复一下，今天我们的智力水平就是如此，因而无法摆脱这种危机状态。

№03983

苏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俄罗斯联邦党组织工作的通报

（1991 年 8 月 13 日）

第 CT－37／1 号

1．决定传达关于这一问题的通报。根据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交换意见的情况，向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共和国党委会、边疆区和新的党委会发出有关的指导方针（附后）。

2．指出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关于停止各政党和群众运动的组织机构在国家机关、机构和组织里活动”的命令的破坏性影响，随着有关机关对这一文件作法律评价的拖延，这种影响在不断加强。

3．积极对待各级党委会和基层党组织在团结广大党员、巩固党员在劳动集体中的阵地、提高政治积极性方面所作的原则性决定及所采取的实际步骤。

苏共中央（1991 年）7 月全会决议和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1991 年 8 月 6 日）决议，应该在企图实行各集体非常化的条件下，成为各级党委会和党组织今后实际行动的政治基础。决议维护了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地位和就这一问题提出的有关建议。

成立由 Ю.А. 马纳延科夫同志、И.И. 梅利尼科夫同志和 А.Н. 伊利英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并委托工作组研究基层党组织在

劳动集团中活动的有关进程，系统地就这一问题向苏共中央和党的地方机构作出报告。

4. 如实记录。苏共中央各位书记应同苏联有关的部长会晤，阐述苏共中央对非常化问题的观点，讨论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在劳动集体中活动的问题。

5. 向联合苏联和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的党组提出建议，出席最高苏维埃的有关代表大会和会议时提出建议，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保障各社会团体和运动的合法活动。

6. 提请党的报纸和杂志注意报道在非常化条件下具体的工作经验，在建立多党制道路上的困难和障碍，支持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组织的书记在劳动集体中的活动。

7. 委托苏共中央办公厅尽快提出关于提高在基层党组织、区党委会和市党委会工作的党的工作人员工资的建议。

苏共中央副总书记　B. 伊瓦什科

附　录

第37号

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共和国党委会、各边疆区和州的党委会：

1991年8月13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在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1991年7月20日命令生效的条件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党组织工作的情况报告。

根据所收到的材料判断，许多党委会和基层组织都已利用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劳动集体非常化条件下如何行动的建议，并正在寻找自己改革党的生活的办法。

中央书记处认为，鉴于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行将审理这一问题，各级党的集体和广大党员为了保存党的结构而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就是在今后，也应利用各种手段去揭露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7月20日命令反民主的实质。因此，党的集体应当使关于召开公开的党的会议的建议更有效力，继续运用各种形式进行公开的抗议，做中央和地方人民代表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应该继续会晤企业界和机关的领导人，更详细地研究基层党组织开展活动的办法。例如，在列宁格勒市举行的会晤就使行政当局认识到，在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作出结论之前，不通过任何有关取消或转移党组织的决议是合适的。在450位应邀前来苏共莫斯科市委员会的领导人中，只有两位赞成停止党组织的活动。苏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就这一问题同联盟各部的领导人举行会晤。

苏共中央书记处对匆忙决定取消基层党组织，并把党组织迁出企业和机关之外，其中包括为了加强区域的工作等做法提出警告。应该有批判地对待“民主派”报刊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和某些推进非党化进程的活动家的声明。截至1991年8月12日，莫斯科市的1万个基层党组织中有55个党委会奉指示撤出劳动集团之外。在国内还有返回的经验需要彻底地搞清楚：劳动集体中要不要党组织取决于党组织是怎样参加共同的工作和它是否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

现在的立法能够比较灵活地解决保留党组织的地位和职能问题。例如，伊万诺沃建筑工程学院依靠“社会团体法”实行共产党员派驻学院（党组织不是学院的党组织，而是学院所属的党组织）。某些领导人根据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企业和企业家活动法”第32条将集体和党组织的相互关系的问题转给签订集体条约的代表会议去解决。

苏共中央书记处重申，关于改组那些遭受企业和机关排挤的党

组织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任何根据去通过取消基层党组织的决议，一些边疆区和州在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民警法”颁布后就是这样做的。例如，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沙雷波沃市护法机构的共产党人就建立了“维护法制和法制秩序”的区域性党组织。

灵活地支持区域组织结构是形势所迫，这主要是指使党组织的活动最大限度地接近劳动集体的任务。例如在莫斯科出现市政府区级机构的时候，市委就着手准备成立某种区委会分部，区委会还成立所属的工业、建筑、国民教育和其他的组织团体的党委会。党组织委员会书记在这里积极开展活动。

由于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警察机构的非常化，通过关于暂停苏共党员资格的决议的实践具有相当广泛的范围。而且这一决议有时仅局限于党员的个人声明或会议表决。在这种时候，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民警法”颁布后作了说明。苏共中央书记处认为必须指出，根据党员个人的声明，只有退党的问题是可以研究的。至于处于受迫害和执行公务时出现法律障碍形势下的党员，为他们建立特殊地位的问题只可由上级党委会（区委会、市委会）依个人的要求加以研究。

我们认为必须特别注意保存基层、区和市一级党的脱产干部。苏共中央打算在最近解决提高上述人员的工资问题。同时也应该采取紧急措施，利用地方的潜力，在必要的情况下改为对兼任行政和党的职务人员的补贴。

应将本文件的内容传达到党的区委会、市委会和基层党组织。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专题说明】

关于历史案件的平反（二）

（1988 年 12 月）

从 1930 年至 1953 年初的大清洗中，苏联究竟制造了多少起冤假错案，镇压了多少人？对这个问题，苏联学者，尤其是欧美各国学者，进行过大量调查研究，提出过多种数据，彼此差别较大，长期难有定论。本专题选编的文件是苏共中央政治局 30 年代至 50 年代初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关于大清洗调查结果的简要报告。报告对大清洗的开展和进程涉及得不多，但是对大清洗的结果，却有详细的统计。文件指出：从 1930 年至 1953 年斯大林逝世，苏联共制造了 2578575 起“案件”，涉及 3778234 人，其中的 786098 人被处极刑。值得注意的是，在被镇压的人中，2478406 人，即占 65% 以上是由非执法机关审理的；656548 人，占 83.8% 是被非执法机关判处死刑的。苏联党和政府从 1954 年起就开始对这些案件进行重新审理和甄别，但直到 1988 年底，尚有 1575958 件应该重新审理而还来不及重新审理的“案件”，其中涉及 2192130 人。该委员会对于余下的这个“大尾巴”提出一个彻底而简便的解决办法：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这些审讯为“违反苏联宪法”。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赵宏翻译）

№03685

苏共中央政治局
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

（1988年12月25日）

绝密

特别卷宗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三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镇压事件材料复查委员会继续进行着为这几十年中被无辜判刑人员平反的工作，分析档案材料，审查大量有关请求告知亲属下落及其死亡日期、埋葬地点的公民申请书和诉状。地方机关也进行着类似的工作，分析和审查自始至终在地方处理的案件。

此项工作促进了新的道德氛围的形成，唤起了对法制、秩序的社会需求和对宪法、法规的尊重，为成千上万清白的人恢复了名誉和尊严，消除了无根据的指控和嫌疑的重负。现已重新审理了涉及到1586104人的1002617件镇压性质的刑事案件。根据这些案件1354902人获得平反，其中包括非执法机关案件的1182825人。

除了恢复社会和法律的公正之外，这方面开展的工作还促进了对长期强烈影响国家社会发展并使其变形的无法纪和专横的根源——内部机制的深刻理解。

与此同时，委员会的工作经验提出了几个问题，正像所表现的一样，要求从原则性的政治上和宪法的角度作出评价。只有现在，在社会民主化的条件下，才开始暴露出镇压及其不法程度的实际规

模，从而全面分析和评价这些现象的工作也就具有社会政治和法律的意义。

在这方面需要着重研究和评价以下四类问题。

一、关于“三人小组”、“两人小组”、特别会议、名册等等的反宪法性和反法律性。镇压案件相当大的一部分判决正是由这些非执法的和反宪法的机构作出的。

研究国家安全机关的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 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 3778234 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 786098 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有 1299828 人（其中枪决 129550 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有 2478406 人（其中枪决 656548 人）。

现在尚未重新审理的案件有 1575958 件，涉及 2192130 人。在这些案件中非执法机关受理 738866 件，判处 1097293 人（其中枪决 339125 人）。

苏联最高法院领导和多数法律学家注意到，对 1930～1953 年间由非执法机关作出的判决的上诉进行审理具有鲜明的合法性。因为它们的建立、活动乃至存在本身都是违背宪法的，没有依据当时的任何法律条文。既然此类机关一开始就是不合法的，那么任何由它们作出的判决都不可能被认为是合法的。

类似的立场既以法律为依据，也以道德政治为依据。因此，倘若苏联最高苏维埃作出决定，宣布所有被列举的非执法机关不符合宪法，显然将是正确的。

因此，所有非法院判决的受害者将自动恢复名誉。

与此同时，这种决定不应扩及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的抢劫、掠夺、强盗袭击行为及其他刑事犯罪案件的特殊审理程序，当时此类罪犯不经法院和法院调查就地枪决。

二、关于斯大林及其左右对组织和实行大规模镇压，推行反法律、反宪法活动的个人责任。他们的大规模镇压活动和违法行为对党和人民犯下的罪过是巨大的、不可饶恕的。越深入地研究，越能清楚地发现，这一罪过不仅具有道德和政治性质，而且具有直接的法律和刑事性质。社会舆论合理地要求对此做出应有的评价。

首次大规模的镇压发生在30年代初。根据以安·安·安德烈耶夫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强制迁出富农委员会的决定，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构在1930～1931年间将356500农户、总人数1680000人从苏联的欧洲部分强制迁往北部地区和西伯利亚。其中一部分人被迁往监禁地，另一部分被迁往专门移民区。在1929～1933年间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构仅逮捕被划为富农者就达519000人，并追究其刑事责任，还不包括数万名被没收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分子和被判为流放的人。

在这些年代里，正是根据拉·莫·卡冈诺维奇的建议成立了所谓的“三人小组”。改变法律、最大限度地简化政治性案件的逮捕和侦查条件导致了镇压的扩大化。从30年代初开始简化法院诉讼程序，同时非执法机关采取的惩罚措施更为严厉。

当时，逮捕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专门指示信中（1933年5月）指示，在拘留所关押的人数不应超过40万人。制定了逮捕人数和被驱逐出境人数的通知单。

30年代初对各种知识分子团体的代表执行了伪造的政治诉讼程序。30年代后半期镇压规模之大骇人听闻。遭到镇压的有党的、苏维埃的、经济方面的积极分子，以及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阶层。

斯大林是不经法院和侦查而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枪决、成千上万的人被驱逐出境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犯罪的行为泛滥成灾，表现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清单，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或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审理，而且“惩罚”已事先确定。这些名单呈送斯大林本人。其中确定了三种惩罚：第一种，枪决；第二种，监禁 8 到 25 年；第三种，8 年以下监禁和驱逐出境。现在只发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呈送斯大林本人的一部分名单。即发现了 1937～1938 年期间的 383 份，列入其中的有 44000 名党的著名工作者、军事活动家、经济管理人员。这批人员中有 39000 人应判第一种惩罚，5000 人应判第二种，102 人应判第三种。在这些名单上有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的亲笔批示。在 383 份名单中斯大林签字的有 362 份，莫洛托夫签字的有 373 份，伏罗希洛夫签字的有 195 份，卡冈诺维奇签字的有 191 份，日丹诺夫签字的有 177 份。还有米高扬、叶若夫和斯·柯秀尔的签字。政治局委员们不仅同意提出的镇压建议，而且还批字鼓励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人员进一步镇压，而在个别人姓名的上面有批字：“杀－杀”。

最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内务人民委员部日常工作中对被逮捕的人采用体罚、拷问、严刑拷打，迫使无辜的人做出所谓的“心服口供”和诬告。而凡此种种都被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公开批准。根据文献判定，斯大林亲自监督过镇压活动。

除斯大林之外，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安德烈耶夫、斯·柯秀尔、苏斯洛夫对镇压和违法行为也负有直接责任。他们都亲自作过指示，逮捕、审判和枪决大量党的、苏维埃的、军队的和经济方面的干部。为了扩大和加强地方的大规模镇压活动，为了加深紧张关系和彼此间的猜疑，政治局委员们经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陪同下去地方党组织。通常，他们每出行一次，就

会有一批州委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被撤职和逮捕，党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被镇压。

维·米·莫洛托夫作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从1930年到1941年）在30年代参与组织和进行大规模性镇压中极为积极。首先，他对镇压苏维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负有责任。其中大部分是根据他个人的建议被逮捕并枪毙的。1935年进入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有20人在镇压年代里丧命。活下来的只有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李维诺夫和莫洛托夫本人。1938年初人民委员会28个成员中有20人很快被镇压。仅在半年内，从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底就有约2000名苏联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捕（不包括国防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

1937年8月叶若夫准备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大规模镇压波兰族人员行动的所谓的“军事”命令。在该命令上有下列签字：“同意——约·维·斯大林、维·莫洛托夫、拉·卡冈诺维奇、斯·柯秀尔”。仅从1937年8月至1937年12月底，在这次行动中就有18193人被镇压。莫洛托夫经常在被监禁的人的姓名上方加上：极刑。1949年莫洛托夫批准逮捕了许多被指控进行特务活动、反苏活动的苏联公民和外国公民。现在其中大多数人因没有犯罪事实已恢复名誉。

拉·莫·卡冈诺维奇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全部经历都同背信弃义和镇压活动联系在一起。合作化年代他在乌克兰、沃罗涅日州、北高加索、西西伯利亚的活动留下的严重后果尽人皆知。正是他在30年代初提出建议成立非常超司法机关——所谓的“三人小组”。

卡冈诺维奇在1935～1939年大规模镇压年代中扮演了一个瘟神的角色。经卡冈诺维奇批准以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罪名逮捕了铁路交通部门和重工业部门的许多负责人和普通干部。然后，根据伪造

的材料判处他们极刑和长期监禁。卡冈诺维奇批准逮捕1937～1939年间被镇压的1587名铁路工作人员的亲笔信有5册。从卡冈诺维奇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公函往来中可以看出，一些情况下，他批准逮捕那些他感到诋毁材料涉及的人，另一些情况下，他自己就是逮捕的主使人。为组织大规模的镇压活动，卡冈诺维奇到过车里亚宾斯克州、雅罗斯拉夫尔州、伊万诺沃州和顿巴斯。他一到伊万诺沃就立即发电报给斯大林："初步了解的材料表明，必须立即逮捕州委书记叶帕涅奇尼科夫，还必须立即逮捕州委宣传部长米哈伊洛夫。"当伊万诺沃市委书记瓦西里耶夫在州委会全体会议上对被逮捕的州委会工作人员搞敌对活动这一说法表示怀疑时，卡冈诺维奇要求把他开除出党并指示逮捕他。卡冈诺维奇为扩大大规模的镇压，在他所到的其他州里，也是这么干的。在他从伊万诺沃回来后，仅仅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批准，就有297人被镇压。

安·亚·日丹诺夫实际上长期担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之职，他对组织大规模镇压活动负有直接责任。1936年9月，他与斯大林一起在给政治局的电报中要求加强镇压。根据他们的建议，由叶若夫主持内务人民委员部。日丹诺夫应对组织镇压一些地方，首先是列宁格勒州党组织中的党和苏维埃积极分子负责。1935～1940年间在列宁格勒镇压了68088人。仅凭日丹诺夫亲自签字的名单就镇压了879名列宁格勒人。

为扩大大规模的镇压活动，日丹诺夫到过巴什基尔、鞑靼和奥伦堡州的党组织。在奥伦堡州，从1937年4至9月5个月的时间里就镇压了3655人，其中一半人被判处极刑。尽管如此，日丹诺夫于1937年9月初来到奥伦堡市后，认为这些镇压还不够。根据他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又逮捕了州委第一书记米特罗法诺夫，接着又在奥伦堡市、奥伦堡州逮捕了许多人。仅根据日丹诺夫返回后政治

局审阅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名单又镇压了598人。

日丹诺夫来到巴什基尔后逮捕了州委第一、第二书记，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送交政治局的名单逮捕了342名党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

日丹诺夫“清理”了鞑靼党组织后，逮捕232人，而且他们几乎全部被枪决。

日丹诺夫在1938年镇压团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以政治局的名义的发言中把团中央几位书记说成是“祖国的叛徒，恐怖分子，特务，法西斯分子，政治上腐烂透顶，在团内执行敌对路线的人民的敌人，一伙反革命匪徒。”中央全会的决议是根据他的措辞通过的，决议肯定了上述评价。

日丹诺夫是荣获列宁勋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1948年8月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在1948年7月10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他确切简明的建议，成为8月会议决议的基础，并为迫害大批生物科家家奠定了基础。日丹诺夫是迫害和排挤许多苏联文化艺术和科学代表的主使人。

克·叶·伏罗希洛夫积极参与了组织镇压的活动。经他批准，许多红军高级军事长官和政治工作人员被枪杀。30年代5位元帅中3人被枪杀，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15人被枪杀，67名军长中60人被枪杀，199名师长中136人被枪杀，4名海军高级将领全被枪杀，6名海军上将全部被枪杀，15名海军中将中9名被枪杀。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副政委及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名牺牲。

1937～1939年根据伪造材料许多红军的著名军事家和指挥官被指控参与了所谓的“军事法西斯阴谋”，伏罗希洛夫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他在1936～1940年任国防人民委员和红军人民委员期间镇压了36000多人。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馆发现了由伏罗希洛夫签署的300多份逮捕红军著名军事长官的批准书。

1937～1938 年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与伏罗希洛夫关于批准逮捕和开除参加“军事法西斯阴谋”的苏联工农红军指挥官的呈送和批复函件共 60 册。在许多情况下，伏罗希洛夫本人就是逮捕和镇压红军著名指挥官的主使人。其中包括费坚科（伏罗希洛夫的第一副手）、奥尔洛夫（海军司令）、斯米尔诺夫（海军人民委员）。

尼·谢·赫鲁晓夫在 1936～1937 年任莫斯科州委员会和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38 年起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期间，亲自同意逮捕大量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档案馆里保存有证明赫鲁晓夫在战前年代参与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委、乌克兰大规模镇压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他亲自签发的建议逮捕莫斯科苏维埃和党的莫斯科州委领导干部的文件。仅 1936～1937 年间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莫斯科州的机关就镇压了 55741 人。

从 1938 年 1 月起，赫鲁晓夫开始领导乌克兰的党组织。1938 年在乌克兰逮捕了 106119 人。镇压一直延续到以后的几年。1939 年逮捕了近 12000 人，而 1940 年约 50000 人。仅 1938～1940 年间在乌克兰就逮捕了 167565 人。

1938 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加强了在乌克兰的镇压的原因在于，赫鲁晓夫的到来使右翼托洛茨基秘密的反革命活动迅猛增强。经赫鲁晓夫本人批准，数百人被镇压，他们被怀疑组织恐怖活动反对赫鲁晓夫。

1938 年夏天，经赫鲁晓夫批准，逮捕了大批党的、苏维埃的、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其中包括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人民委员、副人民委员、一些州委书记。他们全部被判处极刑或长期监禁。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呈送政治局的名单，仅 1938 年一年就批准镇压了 2140 名加盟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积极分子。

阿·伊·米高扬在这场大规模镇压中负有直接责任。经他批准，逮捕了成千上万的苏联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系统的工作人员。米高扬不仅批准逮捕，而且本身就是逮捕的主使人。如他在1937年7月15日给叶若夫的信中，建议镇压苏联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全苏渔业和海洋科研所的大批干部。对苏联外贸人民委员部一些机构的工作人员，米高扬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1937年秋，米高扬去过亚美尼亚清洗该加盟共和国党和国家机关里的“人民的敌人”。在这场运动中成千上万名党的干部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丧生，同米高扬前往的有马林科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小组。米高扬和马林科夫直接活动的结果是1365名共产党员被捕。

米高扬领导过公诉著名党员反革命活动委员会。他与叶若夫都是联共（布）中央关于布哈林案件（1937年）——3月全体会议的报告人。正是米高扬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隆重纪念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各机关成立20周年的积极分子大会上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名义发了言。他在颂扬了叶若夫的活动，说明了大规模非法镇压活动的正确之后，用下面的言辞结束了自己的报告：“在这段时间里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得非常出色！”——他指的是1937年。

马林科夫担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干部部部长期间，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中央和地方党的领导干部采取的大部分行动有直接关系。他不止一次地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一起前往党的地方组织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活动。比如，1937年马林科夫同叶若夫一起去了白俄罗斯，真正毁灭了该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不少情况下马林科夫亲自参加审问和刑讯被捕的领导干部。马林科夫同贝利亚一起又如法炮制了亚美尼亚的反革命组织案。

马林科夫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一起去萨拉托夫、坦波

夫和其他一系列州组织镇压党的积极分子。

审查证实了马林科夫在伪造“列宁格勒案件”中的罪恶作用。

安·安·安德烈耶夫是政治局委员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他亲自参加组织了对中亚，其中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许多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镇压，对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许多州和边疆区的党组织的镇压。就在安德烈耶夫从萨拉托夫党组织回来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名单，批准对430名州工作人员，乌兹别克斯坦440名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塔吉克斯坦344名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处以极刑。

应该单独说一说米·伊·加里宁。他作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签署了斯大林和叶努基泽准备的1934年12月1日决议《关于修改现行加盟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这项非法决议放手采取镇压措施，允许缺席审判，剥夺递交请求赦免申请的权利，并规定立即执行极刑判决。在1931年到1946年主持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诉讼案件侦查判决委员会期间，加里宁置被镇压人员的请求赦免于不顾，实质上纵容了非法的、大规模的恐怖活动。

斯大林及其周围人员的专横致使其他人员也专横起来，其中包括地方领导人。这种专横把违法和犯罪变成政治手段，把违反宪法和法律变成准则，其恶果要完全消除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检察院、法院的机关都变为大规模镇压的工具。地方党机关的领导人也被卷入镇压运动中。

大规模的镇压到30年代末仍未停止。直到伟大的卫国战争后，涉及大批党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代表的案件仍被接连不断地捏造出来。单凭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就非法镇压了数千人，其中包括党的著名活动家、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组织局的成员。

由于“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一大批苏联知识分子被

镇压。这次镇压活动的实际发起者是米·安·苏斯洛夫。1946年11月26日他呈送斯大林一个便函，其中充满了对该委员会的诽谤诬陷。这封便函成了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进行侦讯的依据。根据“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140人被判刑，其中23人被判处极刑，20人被判处25年监禁。

苏斯洛夫在担任罗斯托夫州委书记期间是大规模镇压的参加者。他在成为奥尔忠尼启则边疆区党委会第一书记后，不仅强烈反对释放一系列无辜被判刑的人员，而且坚持进行新的逮捕。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会1939年7月报告贝利亚说，苏斯洛夫不满意内务人民委员部边疆区管理局的工作，因为它太温和，太粗心大意。苏斯洛夫直接说出了必须逮捕的人员。因此，在1939、1940年边疆区的镇压加强了。作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立陶宛局主席，苏斯洛夫对镇压和非法将大批人员强制迁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负有直接责任。苏斯洛夫是追捕和迫害苏联文艺界、科学界知识分子著名代表人物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三、关于大规模镇压运动的受害者的埋葬地点和对他们的永久纪念。

最近，大众新闻传媒、社会团体呼吁书以及公民的申请书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坚决地提出关于寻找被镇压人员埋葬地点及永久纪念的问题。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中没有说明所有具体埋葬地点、被埋葬人的姓名和人数的文献资料。根据对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询问和从当地居民中获得的信息，弄清了部分埋葬地段。据初步估计，这些地段埋葬近20万人，埋葬时间也不确切。

伸张正义问题现已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社会舆论及无辜受害者的亲朋都在等待着为他们完全恢复名誉和永久纪念他们。这样的举措将会在日常生活中促进实际树立起人道主义准则和理想，将会

提高苏联在世界上的威望。

四、关于恢复被无辜驱逐出境人员的历史公证。

在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提出撤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的问题，根据这一决议40年代和50年代初用行政强制手段将某几类公民从这些共和国境内迁出。

在40、50年代将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塔吉克斯坦的某几类公民和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系列州和自治共和国的一些整个民族用行政强制手段迁出。总共有23个不同民族的人被强行迁往国家的东部地区。

驱逐出境的决定涉及到这样的公民，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和地方政权的结论，他们是地区内社会危险分子或者可能当地区局势复杂化时成为潜在的社会危险分子。他们没有被控告刑事犯罪，没有进行任何法律规定的或其他护法机关代表参加的侦查，也没有进行必须的法庭审理就将他们强行迁出。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以下措施是适宜的：

——建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法令承认“三人小组”、“二人小组”、“特别会议”的决定和行动，名单和其他形式的大规模镇压都是与苏联宪法、社会主义原则以及道德规范相矛盾的。宣布所有这样的法令都是非法的，而由此产生的限制公民权利、损害公民利益的法律、政治、民事的后果不具有法律效力。这样，所有被迫害的人，其中包括没有亲人在世的人将获得彻底平反。

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继续审查执法机关已经判决的刑事案件。

苏联检察院、苏联最高法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司法部和苏联财政部必须保证按照规定程序对被恢复名誉的人给予物质补偿工作的进行。

以上所列各项不得扩及祖国的叛徒、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的特

务、纳粹罪犯、民族主义匪团组织者及其同谋、伪造刑事案件的人员以及进行蓄意谋杀和其他一般刑事犯罪者。对上列类型人员应采用法律规定的程序申诉和审理对他们的判决。

——建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其他地方权力机关撤消所通过的以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加里宁、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名字命名的位于相应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的城市、军队、轮船、学校及机关团体的种种命令和决议。同时建议取消关于永久纪念上述人员的所有其他法令。

——建议苏联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的将以上述人员名字命名发给各类学校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助学金更名和改建。

——委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的边疆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建立由党的、苏维埃机关的、检察院机关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社会团体的代表，组成永久纪念镇压运动牺牲者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必须进行下述工作：查明并修整牺牲者的埋葬地、建立纪念碑和纪念堂。

纪念镇压牺牲者的一切费用当由国家支付，为此应责成苏联部长会议为这些工作筹出所需资金。国家准备承担这些费用不应该被认为是妨碍社会人士永久纪念镇压牺牲者的独立主动性。这方面努力集中国家和社会的资金和力量是适宜的。

——建议人民代表苏维埃、内务部和检察院、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机关，制定和实施保护镇压牺牲者墓地的措施。禁止私自挖掘和掘尸检验。同时应规定上述机关有责任吸收社会各界的代表，对每公顷预测存在这种埋葬地点的申请进行细致的审查工作，并通过地方大众新闻传播工具公布审查结果。

应该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严格遵守宪法、诉讼法和符合其他

现行法律、法规要求的条件下，大张旗鼓地实施上述措施。此项工作应该成为培养群众法律意识，使他们在法律和政治上成熟的学校，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法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此问题作出的决议，应当以转述的形式刊登在报刊上，决议全文和简要报告摘要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消息报》发表。责成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法律部和意识形态部负责监督法令的执行情况。

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法令草案和见报通知。①

A. 雅科夫列夫
B. 梅德维杰夫
B. 切布里科夫
A. 卢基扬诺夫
Г. 拉祖莫夫斯基
Б. 普戈
B. 克留奇科夫
B. 博尔金
Г. 斯米尔诺夫

① 收集的档案中无此附件。

【专题说明】

第比利斯的动荡

（1989 年 4 月至 1990 年 4 月）

1989 年 4 月初，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发生了群众性要求民族独立的游行和示威、集会。游行和集会的规模愈来愈大，演变成几千人在政府大楼前静坐，甚至绝食抗议。4 月 9 日，苏联政府出动了武装力量，使用橡胶警棍、军用小铁铲、催泪瓦斯及其他有毒气体，甚至使用火器，驱赶集会群众，演成大规模流血冲突，导致 19 人当场丧生，几百人受伤，受毒气毒害而危及健康的更多。苏共中央在事后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对这次事件的发生、经过和后果进行调查，并作出了结论。本专题选编的 12 份文件，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这一事件的全貌。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孟韵怡、唐松波翻译）

№07586

帕季阿什维里就第比利斯局势致苏共中央的电报

（1989 年 4 月 7 日）

密码电报收文第 217 /W 号，发自第比利斯
1989 年 4 月 7 日 20 时 40 分收到

最近共和国内局势极为紧张，实际上已经失去控制。起因是今年 3 月 18 日在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① 雷赫纳村召开的一次大会，该会上提出了关于自治共和国脱离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问题，然而事件已经超出了上述范围。

极端派分子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号召罢工和不服从政权当局，组织骚动，破坏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威信，在已形成的这种情况下，应当采取一些非常手段。

我们认为有必要：

1）立即追究那些打着反苏维埃、反社会主义、反党的旗号的极端派分子的刑事和行政责任（对此有法律依据）；

2）借助于内务部和荣膺红旗勋章的外高加索军区的补充力量在第比利斯实行特殊制度（宵禁）；

① 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位于苏联外高加索西北部，面积 8600 平方公里，人口约 50 万，其中 2/5 是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不足 1/5，此外还有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属格鲁吉亚共和国管辖。1921 年成立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31 年成为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属格鲁吉亚共和国。行政中心为苏呼米。

3）依靠党、苏维埃、业务部门积极分子的力量采取一系列政治、组织和行政措施以稳定局势；

4）制止以联盟和共和国的大众传播手段发表使形势复杂化的报道。

第1、2、4条请求批准。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Д.И. 帕季阿什维里

№07587

帕季阿什维里就第比利斯局势致苏共中央的电报

（1989 年 4 月 8 日）

密码电报收文第 219 /W 号，发自第比利斯
1989 年 4 月 8 日 20 时 50 分收到

现在我向你们报告，第比利斯的形势仍然十分紧张。

在政府大楼附近不断举行着成千上万人的群众集会，主要口号仍和以前一样："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消灭自治"等等。

在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内举行了一次 3000～5000 人的格鲁吉亚人的大会，反对将阿布哈兹从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划分出来。

在一些高等院校中，部分学生为支援参加大会者宣布绝食，在总体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府和各地方党和苏维埃的机关在掌握着局势，正在采取一些稳定形势的必要措施。

昨天，4 月 7 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举行了会议，今天共和国党员活动分子也举行会议，这些会议通过了党、苏维埃和法律维护机关为在劳动人民和居民群众中加强政治、组织及教育工作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同时并通过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及部长会议向共产党员和劳动者的呼吁书。

特别是已决定在格鲁吉亚共和国所有地区举行一次有格鲁吉亚

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参加的党基层组织活动分子的会议。会上，为进一步发展预定的措施，制定了一些具体的行动计划，通过电视、无线电广播和报刊组织了一系列共和国著名科学家、文艺活动家、工人阶级和农民代表的发言，在各高等院校不断举行着“圆桌会议”，青年人的集会，讨论格鲁吉亚社会生活的迫切问题，反对右倾行动的危害、对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措施，以及为进一步发展民主和公开性而加强纪律和巩固秩序的必要性等问题。

活动分子会议之后，所有人都到地方上去，参加到劳动人民集体中去解释会议精神，党在当前情况下的政策，在实现改革任务中党和人民的一致性等问题。

在第比利斯111个企业和机关内建立了维持秩序和加强组织性的工人战斗队，参加人数共4685人。和内务部及荣膺红旗勋章的外高加索军区一起制定并正在实行一些保卫法律秩序，必要时，为防止无秩序和反右倾行动而发生的极端措施的具体行动，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党中央、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第比利斯市委会和市执行委员会等各机关都准确地各司其职，在人民群众和与会者中积极工作着。

目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不需要对以前采取的措施采取另外的补充措施。

以情报形式报告。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Д. 帕季阿什维里

№05634

苏联内务部部队
关于驱散人群的作战命令（摘录）

（1989 年 4 月 9 日）

1．4 月 6、7、8 日三天内，在第比利斯市政府办公大厦附近举行了由极端分子团伙组织的非法集会，企图加剧城市及共和国的不健康情绪。4 月 9 日夜间，集会形势急剧复杂无法控制。参加集会的 8000 多人号召罢工，号召公民不要服从政府。他们提出了民族主义和反苏性质的口号，号召推翻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建立共和国临时政府，并要求脱离苏联。人群中响起了镇压共产党员的恫吓声。所有通往广场的道路都被极端分子们用装满碎石和扎透轮胎的载重汽车堵截。

2．部队任务是：与 3219 部队协同，执行驱散参与大规模动乱人员的特殊作战任务，制止反苏、反社会团伙，清理政府办公大厦附近的广场。驱散人群的工作沿鲁斯塔维利大街到共和国广场进行。尔后切断所有通向广场的路段，禁止公民进入广场。

……

6．根据上级作战首长的决定，采用 17P－73 型装备。禁止对妇女和未成年人使用橡皮棍。为了对人群施加精神影响，驱散小组使用了配备战斗技术装备（БТР－60пб）的装甲输送车。根据上级作战首长的决定，在遇到非常紧急情况时，还给驱散小组配备的消防车上安装了水龙头，但禁止向妇女和未成年人使用水龙头喷射。

3419 部队驱散和清理小组组长　A.M. 巴克拉诺夫中校

部队驱散和清理小组参谋长　A.H. 克列伊梅诺夫少校

№07588

帕季阿什维利关于使用武力致苏共中央的电报

（1989年4月9日）

密码电报收文第220/W号，发自第比利斯
1989年4月9日10时25分收到

1989年4月8日晚上，在第比利斯，9点钟之后，尽管共产党、苏维埃和维护法律的各机关采取了许多措施，共和国政府大楼附近有15000人参加的集会和城市其他一些地方的集会的局势，却开始由一些极端派分子挑动得激烈到极点并失去了控制。除一些反苏维埃、反社会主义和反俄罗斯的号召之外，极端派分子开始呼吁对共产党员、共和国领导及其家庭成员进行肉体上的摧残。参加集会的人中，不少是醉汉和使用麻醉药品的人，他们号召组织共和国全体居民参加罢工和不服从法律，并迫害那些不支持他们的人。一些极端派分子团伙和参加集会者，向共和国周边城市和地区派出代表团。在鲁斯塔维市，这些人就夺取了一个冶金厂。

所谓“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首领们开始宣读夺取共和国政权的计划。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保证社会安全并防止发生不测的后果，凌晨4点钟做出决定，使用武力清除政府大楼旁广场上参加集会的群众。按照权威机关预先制定的计划，动用了共和国内务部和外高加索军区小分队的力量。随着渐渐走近集会会场，共和国领导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党和苏维埃的活动家们以及格鲁吉亚

东正教总主教伊利亚二世都不断地号召集会参加者（此时他们的人数接近 8000）停止集会并安静地散去，但与会者对此并没有响应。相反，集会组织者们把大家的情绪激发到狂热的程度，号召大家不惜牺牲鲜血和生命来反抗当局的武力。

内务部和外高加索军区部队的小分队并没有使用枪炮和冷兵器，他们严格遵守关于小心对待妇女和青少年的指令。极端派分子使用棍棒和石头进行疯狂反击，在此情况下前几排的集会参加者不停地向前逼近，于是人群失去控制，朝着已宣布绝食躺在人行道上的青年人冲去。此外，人群中还有不少挑衅者使用了白刃，在一片拥挤中有 16 人丧生（13 个年轻妇女和 3 个男人），100 多人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其中有 22 人是军人（13 人送入医院）。对受伤者给予了急救。

目前市府大楼广场已清除了集会人群，广场已由部队保护起来。正在采取拘留和逮捕暴动发起者和制止新的集会和暴行的必要措施。鉴于所采取措施造成的悲剧性后果，成立了以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奇赫伊泽为首的政府委员会。

预定今天召开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已造成的局势并确定与此相应的措施。

为防止群众性暴乱及维护时局的稳定，特请求准予从即日起在第比利斯实行宵禁。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帕季阿什维里

№07589

苏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使第比利斯局势正常化措施的决议

（1989年4月10日）

1. 同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向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发出的呼吁书[①] 全文。

2. 在实行使第比利斯市局势正常化的措施中，要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思想为指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① 戈尔巴乔夫的致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员呼吁书1989年4月13日发表。

№07590

卡普托等人关于下发维护法制的通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9 年 4 月 10 日）

由于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治形势的恶化，我们认为将下述建议（附文）转给各地方党委会是合适的。

请予以批准。

卡普托[①]

拉祖莫夫[②]

帕夫洛夫[③]

附　录

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委员会、州委员会

今年 4 月 10 日塔斯社报道的关于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治局势的尖锐化情况，又一次表明了各地方党、苏维埃和维护法律各机关适时地采取预防措施的全部必要性。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和各边疆区及各州党组织注意，必须对每个地区正在形成的局势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析，必须

① 卡普托，时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

② 帕夫洛夫，时任苏共中央国家法制部部长。

③ 拉祖莫夫，时任苏共中央党的建设和干部部第一副部长。

进行有效的、杜绝各种反社会现象的工作。

党的委员会和基层党组织应保持高度警惕，在对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评价中不允许温情主义和无原则性，坚决杜绝任何旨在动摇国家基础的谰言，不放过任何一次违背法律的行为。

应当在劳动集体中和居民点更加坚定地进行群众性政治工作。要敏锐地捕捉人民群众的情绪，干练地对他们的需要和要求做出反应，根除官僚主义和拖拉现象。要特别注意在青年学生中组织教育工作。为达到这些目的，必须动员党、苏维埃和共青团的全体积极分子。坚决要求领导干部对每个集体的政治形势负责，要他们亲自参加教育工作并对劳动人民和青年们做公众演说。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别强调，为了对正在发生的事态进行客观阐述并形成正确社会舆论而采取的群众性情报手段的重要作用和责任性。

维护法律机关必须集中注意力对那些违反社会主义法律，以自己教唆性行为挑起民族纷争，把群众推上无政府主义和混乱的道路的人采取及时而果断的措施。

鉴于以上情况，党委会和维护法律机关的领导们应当利用大众传播的各种手段，通过大量思想教育工作，宣讲并深入研究报刊上发表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这些命令号召大家更加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从法律上捍卫苏维埃宪法体系和民族平等的各种手段，从而能够与各种极端派分子进行更加积极的斗争。

建议各党委会仔细研究执委会关于竭尽一切努力巩固每个地区的纪律、秩序和组织性的补充措施。

№07591

帕夫洛夫建议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第比利斯事件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9 年 4 月 29 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第比利斯市一些事件问题

有关被极端派分子团伙挑起的并于今年 4 月 9 日导致一些人丧生的第比利斯市事件已有大量的公民呼吁书和大众媒体的评论报道。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对上述事件的原因和状况进行研究，以便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报告。

我们认为吸收那些以前没有参加检查这一非常事件的同志们参加此项工作是合理的。

委员会成员可包括下列同志：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塔拉泽维奇同志（主席），苏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谢尔盖耶夫同志，苏联民事防卫局局长、苏联国防部副部长戈沃洛夫同志，苏联克格勃副主席皮洛什科夫同志，苏联内务部副部长杰米多夫同志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克维利塔娅同志。

克维利塔亚同志的委员会成员候选资格是由古姆巴里泽[①] 同

① 古姆巴里泽，1989 年 4 月至 1990 年 12 月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志建议提出的。

随函附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草案[①]。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家法律部部长　A. 帕夫洛夫

① 参见本专题文件No07592。

№07592

苏共中央关于第比利斯事件的决议

（1989 年 4 月 29 日）

文件号：CT100 / 105ц

绝密

兹委托委员会成员 Г.С. 塔拉泽维奇同志（主席）、Г.В. 谢尔盖耶夫同志、В.И. 戈沃洛夫同志、В.П. 皮洛什科夫同志、Н.И. 杰米多夫同志和 О.В. 克维利塔娅同志对今年 4 月 9 日在第比利斯市发生的一些事件的情况进行研究，并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汇报。

表决结果：

В. 切布里科夫赞成

А. 雅科夫列夫赞成

В. 梅德维杰夫赞成

Н. 尼科诺夫赞成

Е. 利加切夫赞成

Л. 扎伊科夫赞成

Э. 谢瓦尔德纳泽赞成

О. 巴克拉诺夫赞成

Н. 斯柳尼科夫赞成

№07593

卢基扬诺夫关于转交格鲁吉亚电报给博尔金的便函

（1989年12月5日）

根据研究今年4月9日在第比利斯市发生事件情况的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的请求，请您研究一下将4月7、8、9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解密并转交给委员会的问题。

A．卢基扬诺夫[①]

① 卢基雅诺夫，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

№07594

诺维科夫关于转交格鲁吉亚电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9 年 12 月 6 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根据卢基扬诺夫同志的请求，我们认为可以将 1989 年 4 月 7、8、9 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密码电报副本解密并转交给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随函附上[①]）。电文叙述了 1989 年 4 月在第比利斯市发生的事件。

请予以批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共部部长　诺维科夫

① 参见本专题№07586、№07587、№07588 文件。

№07595

苏联人代会委员会关于第比利斯事件的决议

（1989年12月9日）

一、前　言

研究1989年4月9日在第比利斯市发生的事件的委员会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代表大会组建，其成员有24人，其中有9个加盟共和国的代表、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著名学者、作家、军队和教会代表。A.A.索布恰克被选为委员会主席，阿斯米亚埃、戈利亚科夫、托姆库斯被选为副主席，秘书是斯坦克维奇。

遵照代表大会的委托，委员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弄清今年4月9日晚间在第比利斯市发生事件的真正性质，发生悲剧的原因，各级党、国家和军队领导所做的与此事件有关决定的合理性，评定上述事件的一系列后果。在委员会工作过程中，产生了回答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的必要性：关于为维护社会秩序而动用苏联军队小分队的条件及允许范围。

委员会的成员熟悉了调查过该事件的各个委员会——以塔拉泽维奇为主席的委员会、苏联国防部委员会（主席是医务少将索弗罗诺夫）、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委员会（主席是沙夫古利泽教授）——所提供的文件，也熟悉了一些材料（密码电报、查询资料、报告摘要、会议速记记录等等）。这些材料是下述机关提供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苏联国防部、荣获红旗勋章的外高加索军区司令部、苏联内务部、格鲁吉亚共和国内务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格鲁吉亚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检察院及其他一些国家机关和社会。

委员会会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同志。

委员会听取了下列同志的报告：政治局委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利加乔夫同志和切布里科夫同志，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同志，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卢基扬诺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拉祖莫夫斯基，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内务部长巴卡京，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一些负责人员，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领导人，苏联国防部、苏联内务部、格鲁吉亚共和国内务部、苏联克格勃和格鲁吉亚克格勃的领导人，军事总检察院和格鲁吉亚共和国检察院的代表，还有荣获红旗勋章的外高加索军区司令部、苏联军队的部队和小分队指挥部、参加过 1989 年 4 月 9 日行动的内勤部队和医疗队等等。和事件见证人进行了谈话，他们是：格鲁吉亚共和国警察局、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和救护组工作人员，空军大学和苏联军队的军人，社会各界代表，以前的国际主义战士，神职人员（其中有格鲁吉亚驰名教堂的主教，格鲁吉亚都主教伊利亚二世）格鲁吉亚人民阵线和非官方组织代表，某些公民，其中有正在第比利斯各医院接受治疗的受害人。

研究了许多在定期刊物上发表的材料和全国各地公民给委员会寄来的大量信件和电报。

在工作过程中，委员会成员们来到第比利斯市，会见了共和国社会各界代表和荣获红旗勋章的外高加索军区的代表，拜访了医院和参加过新发生事件的部队。

为正确评定1989年4月9日发生于第比利斯的事件，必须本着这样一个出发点，即国家已经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民主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如果不经常表现出各具形式的人民的社会积极性，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积极的基本内涵，就是渴望以合法途径，在严格遵守社会秩序限度之内表达自己的利益，现实地、建设性地参与民主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国家政权和维护法律机关的义务——就是为这种积极性提供现实的保证和保护。

但在此过程中，当然，可能也有些行为具有反社会的、非法的暴力性质，而此时，国家政权的义务——就是表现强硬性，在必要的限度内使用武力。

在此情况下，客观地评价局势便具有原则性意义：政府不对暴力和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反击，是不可原谅的；但对和平集会和游行使用武力而导致牺牲，也是不可原谅的，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对改革和民主的打击。

在对所发生事件进行评定时，委员会考虑到，改革唤起了民族自觉意识和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愿望。目前不仅格鲁吉亚，而且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的社会－政治环境，都带有这些特点。1989年4月9日发生在第比利斯市的悲剧性事件的前提条件，是长期形成的。在这些事件中，表现出涉及格鲁吉亚共和国和全苏联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中许多范围的危机现象。

委员会指出，在民主过程中，在新发表的观点和号召中，在对共和国和全国未来政治发展方向、道路和形式的评价中，都产生了许多不可避免的分歧与极端性。除一些致力对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行民主革新的社会运动和组织之外，在共和国内还产生了一些非官方组织，在他们的纲领中，也包括一些反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性质的原则。他们的活动，与改革背道而驰并使共和国的政治形势严重尖锐化。

在这种条件下，在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的面前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很好地完成自己政治和思想上先锋队的作用，以改革精神去行动，以自己的信念去影响群众的情绪，而且自己不能脱离共和国政治变革的现实发展方向。然而，格鲁吉亚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未能找到与社会各界的接触点，调整好与他们的对话，继而，随着社会变革的发展和非正式组织的日益扩展，领导便走上了对立的道路。对于下面的情况，只能部分地做以上的解释：申请破例召开群众集会的请求，按照惯例遭到了拒绝，于是，不事先告知政府当局而举行非法集会便成了现实。这样，共和国领导便逐渐失去了对政治局势的控制，减弱了党对群众的影响力，降低了它在广泛阶层民众中的威信。这种情况早在1988年的事件中就已表现出来，当时亏得有格鲁吉亚人民的呼吁，才得以缓和局势，而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领导人，那时便已倾向于使用武力。

遗憾的是，在格鲁吉亚领导人以后的立场和活动中，并未出现什么应有的变化。

委员会认为，诸如格鲁吉亚共和国领导的自我孤立，对具体形势不完全适当的，有时是大惊小怪的评价，不能用政治手段正确引导形势等事实，乃是最终导致今年4月9日在第比利斯市新发生悲剧性后果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4月9日事件发生前夕共和国的局势和机械地通过关于制止集会的决定

1989年3月末4月初，由于阿布哈兹共和国发生的事件，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政治局势变得严重尖锐化起来，阿布哈兹的事件成为许多非正式组织一连数日在第比利斯市府大楼前举行群众集会的原由。但是到了4月6日，集会猛然改变反阿布哈兹的方向（由于格鲁吉亚共产党撤换了阿布哈兹区委会的领导人），并提出了关于格鲁吉亚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极端要求。与此同时，

在集会上讨论了许多激动社会人士的迫切性问题。数千人（从早晨到深夜）参加了集会。成百上千的与会者夜里仍滞留在市政府大楼旁。这一切导致市中心交通中断，一些国家机关工作停顿和首都社会秩序的破坏。由共和国电台、电视台播发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呼吁书，对集会参加者没有产生正面的作用。集会的组织者派遣代表到劳动集体、高等学校和中小学去，号召大家开始罢工并参加到集会群众行列中去。他们还组织了纠察队。许多大学和一些中学都停了课。

但必须强调，格鲁吉亚首都绝大多数工人和职员都不支持这些号召，而是继续工作。

在集会过程中，不时传来一些不负责任的号召，号召大家拒绝服从政府当局的合法命令，人们还提出一些带有民族主义、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性质的口号，其中有："打倒共产主义制度！""打倒俄国帝国主义！""苏联——是各民族的监狱！""打倒苏维埃政权！""取消阿布哈兹自治！"等等。集会组织者们继续使形势尖锐化，号召大家把集会、罢工和绝食继续到4月14日。

这样一来，第比利斯4月9日事件前夜的政治局势变得很不寻常，这就要求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和格鲁吉亚共和国政府领导人做出急切而负责的决定。

但是，委员会强调，调查中没有发现任何恐怖行动，没有查明证实要夺取政权的现实企图，也没发现出于政治动机和对苏维埃和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共产党员或作为格鲁吉亚民族的公民使用暴力或进行迫害的情形。

具有代表性的是，集会伴随着像宣布群众性连续绝食这样的消极形式的抗议（在市政府大楼旁有100余绝食者）。

此时，必须制止这个非法群众集会，但这一任务应当而且能够

由那些在法律上承担着保证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共和国内务部的一些机关来解决。委员会指出，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和第比利斯市内务管理局没有完成他们所肩负的制止非法集会的任务，虽然照格鲁吉亚内务部和负责工作人员的话来说，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向共和国领导人提出过关于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武装力量来制止发生在政府大楼前的群众集会并恢复首都正常状态的问题。但是共和国领导人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因为他们担心这会使群众性运动变得复杂化，照他们的看法不大可能凭借现有的内勤和监察的武装力量使运动得以平息。

共和国领导人认为，那样的措施可以在实行宵禁的条件下实现，而为实行宵禁，必须吸收补充部队的小分队。

所以，他们通过了向联盟机关求援的决定。本年 4 月 7 日 20 点 35 分，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了一份由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草拟并由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帕季阿什维里签字的署名的电报。按照委员会的意见，电报中对格鲁吉亚共和国政治局势的估计与现实情况不完全相符，而且也没有把部队小分队集中在第比利斯市并实行特别措施（宵禁）的充分根据。

委员会确认，在决定并施行制止 4 月 9 日前夜在第比利斯市政府大楼旁举行的群众集会过程中，联盟方面的机关和共和国的机关都存在严重失误和违背法律的问题。

1989 年 4 月 7 日，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政治局委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利加乔夫的领导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者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麦德韦杰夫同志、斯柳尼科夫同志、切布里科夫同志；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卢基雅诺夫同志、拉祖莫夫斯基同志、亚佐夫同志；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同志、苏联内务部副部长特鲁申同志和苏联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一些负责人员，研究了格鲁吉亚的形势问题。

会议内容没有做记录，会议的结论也没有以文件形式固定下来。关于所制定决议的内容，只能根据参加会议者的解释来推断。在会上，事实上曾同意了共和国领导关于调拨内勤部队和苏联军队小分队的口头请求。在此基础上颁发了苏联国防部总司令部的指示和苏联内务部关于派遣适当的部队小分队前往格鲁吉亚的命令。

会议建议共和国领导人集体讨论所产生的情况并利用政治手段找到摆脱复杂局面的出路。

事先曾经警告过，必须保持极为慎重的态度，只有在非常形势下才动用军队，用电报通知了共和国领导人。关于使用派遣到格鲁吉亚的部队的具体决定，共和国领导人应和外高加索军区司令部一起根据形势做出，同时建议不在此时刻在第比利斯市实行特殊措施和宣布宵禁。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4月7日晚上11时从国外访问回到莫斯科，并了解了格鲁吉亚的情况，当时他便建议派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两位同志前往格鲁吉亚。次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讨论格鲁吉亚形势的第二次会议。会议由政治局委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切布里科夫主持，出席会议成员和1989年4月7日相同，利加乔夫同志因休假除外。出席会议的还有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同志和苏联内务部长巴卡京同志。和前一天晚上一样，会议内容没做记录，且所通过的决议没有用文件形式记录下来。此时收到由帕季阿什维里签字的1989年4月8日的密码电报，告知第比利斯市的局势已经稳定，正处于管制中。谢瓦尔德纳泽同志和帕季阿什维里同志通过电话交换了意见，鉴于7日到8日夜间的局势已经稳定，帕季阿什维里认为谢瓦尔德纳泽同志和拉祖莫夫斯基不再有必要飞往格鲁吉亚，这

一点得到了与会者的同意。

因此，派遣内勤部队小分队、苏联军队医疗部队和特别分队前往格鲁吉亚之事，是经过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4月7日和8日上述两个会议同意的。这一点和现行立法有矛盾：按照现行立法，这种问题的决定权不属于党的机关；而是属于相应的国家机关；这种通过决议的方式会导致苏维埃政权立法机构实际上的无所事事，正如目前这种情况一样。

在共和国一级，关于使共和国局势正常化措施的计划，包括动用外高加索军区部队来实行特别措施的计划，起先是由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而后得到1989年4月8日举行的共和国党的会议的赞同。在此次会议上对局势进行了评价，通过了使局势正常化应采取措施的计划，通过决议让所有参加会议者前去参加群众大会并努力说服与会者停止集会并使局势正常化。但会议参加者并没有完成这一最重要的决定。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不止一次地讨论了关于制止非法集会的问题，制止集会的决定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于今年4月8日通过的。在同一天召开的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虽然该委员会对这些问题并没负有全权，执行任务的时间是后来由少数人的圈子所定（帕季阿什维里同志、尼科利斯基同志、科切托夫同志[①] 和罗季奥诺夫同志[②]），考虑到凌晨时留在广场上的人数最少，一般不超过200人（绝食者及其亲属）。

委员会指出，在格鲁吉亚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和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所通过的决定，并没有及时地以应有方式

① 科切托夫，时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② 罗季奥诺夫，时任外高加索军区司令。

正式写出来，这便给参加会议者以机会否认自己曾参加过制止政府大楼前群众集会这一决定的通过。

领导准备并执行制止群众集会的军事行动的工作和军事行动计划的制定，都落在外高加索军区司令罗季奥诺夫身上，按照军衔他最高，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做出决定，授予他全权，为整顿城市秩序而派出的全部武装力量和物资都由他调配。

委员会认为，当时留在第比利斯市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的负责工作人员（洛布科、布亚诺夫、谢利瓦诺夫）本可以帮助共和国党的领导人正确评价已造成的形势并以政治手段稳定并整顿局势。

1989年4月8日傍晚，颁发了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命令，由格鲁吉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奇赫伊泽签署。根据这一命令，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在动用内勤部队和苏联军队的军事服务人员情况下采取措施使集会人群离开政府大楼前的广场，这是惟一的一份不是由党的机关，而是由国家机关通过的有关制止第比利斯市非法群众运动的文件。然而，命令所说的关于调动军人完成这一任务的指示是不合法的，因为共和国政府并未被授予这种全权。

委员会同时指出，格鲁吉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为切尔凯齐扬），在当时的局势下逃避了做出必须的立法决定的职责。

集合部队和制止非法群众集会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是按以下方式进行的。

在1989年4月7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后，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大将立即口头命令科切托夫将军和罗季奥诺夫将军赶赴第比利斯市，按照当时形势自己决定如何行动。就在那一天（1989年4月7日16点50分），总司令部首长莫伊谢耶夫大将以国防部名义发布命令，派伞兵陆战队前往第比利斯，去警戒一些最

重要的目标并在进出第比利斯市的一些主要道路上组织稽查，同时命令第比利斯驻防军三支部队处于完全战备状态。

按照苏联内务部副部长什洛夫的命令，还从各地区调来内勤部队小分队和特种警察分队，总人数2000余人。

当日晚上，科切托夫将军和罗季奥诺夫将军抵达第比利斯后会见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帕季阿什维里和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在这次会见中，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又一次坚决请求实行宵禁，这一点没有得到科切托夫和罗季奥诺夫的同意，他们借口部队数量不足。但当时做出了不合法的关于举行部队游行的决定。

1989年4月8日晨，有三个军事直升飞机航空大队低空飞过城市，将近中午时，一支武装技术部队在第比利斯市三条主要街道走过，并经过集会群众。

这一举动起了挑衅性作用。作为报复，个别一些集会群众做出进一步破坏法律的行动：他们抢了一些交通工具，用这些车辆堵住了鲁斯塔维利大街的街口和通向附近几条街的街口（一共用了29辆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和大型载重汽车，其中六辆车的轮胎被放了气）。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涌向广场。到傍晚时分，在帕季阿什维里住的房子周围召开了妇女大会，要求将军队从第比利斯撤出。没有人同她们对话，之后这些妇女们（大约有700人）便走向广场，参加到集会人群中去。这样，武装部队游行的直接后果，便是参加集会的人数急剧增加，在这种形势下，比较合理的应该是不急于做出用暴力制止群众集会的决定，但当时共和国党的领导人已经失去对所发生事件做出客观评判并进行控制的能力，除使用武力外，他们看不到任何摆脱困境的其他办法。

罗季奥诺夫将军委托苏联内勤部队司令部作战指挥部首长叶菲

莫夫[①] 将军制定如何将集会群众从政府大楼前广场上赶走的具体行动计划，叶菲莫夫将军是1989年4月7日赶来第比利斯的。

行动计划和部队行动草案由叶菲莫夫将军和格鲁吉亚内务部长戈尔戈泽签署，然后得到罗季奥诺夫将军的批准。

向个别一些小分队分派任务的命令是早上发出的，分队的指挥官们没有进行勘察。

制止群众集会的军事行动于4月9日凌晨4点钟开始并以悲惨的结局告终。委员会指出，根据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于4月9日晚在第比利斯实行宵禁这一行为，既违反了通过该决定的程序，也违反了执行这一决定的程序。

三、制止群众集会行动的实际进程

根据该行动的领导者罗季奥诺夫上将批准的决定，今年4月9日3点30分之前，一些部队便集中在列宁广场，他们所肩负的任务是把政府大楼前广场和沿鲁斯塔维利大街直到共和国广场上的集会群众赶走。这支部队由下列分队组成：特种任务独立摩托射击师第四摩托射击团，莫斯科市——650人；特种任务警察部队，彼尔姆市——120人；特种任务警察部队，沃龙涅什市——40人；高等警察学校，高尔基市——450人；第八摩托射击团，第比利斯市——650人；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250人；空军陆战团——440人。

参加行动的共2550人，6个装甲运输纵队，8辆作战运输车，4辆消防车和两辆救护车。

在行动开始之前，由叶菲莫夫少将向各分队指挥官口头下达了下列任务：

第四摩托射击团——火速沿鲁斯塔维利大街前行，从列宁广场

① 叶菲莫夫，时任苏联内务部部队副参谋长。

直到共和国广场，把集会群众挤到边界——“伊维里亚”旅馆。

按照叶菲莫夫的书面解释——此解释得到以副部长特鲁申为主席的内务部委员会的承认——给第八摩托射击团提出的任务，与决定中所写的有些不同，具体是：

第八摩托射击团——行动一开始，派两个营沿奇塔泽街和奇奇纳泽街前往政府大楼前广场，将绝食者与广场基本群众隔断。

高等警察学校（高尔基市）——跟随第四摩托射击团前进，封锁由附近几条通往鲁斯塔维利大街的街口。

给特种任务警察部队提出了类似的任务，给消防部队指挥官提出了灭火任务，如发生火灾的话，指示要特别注意伴随部队的装甲车。决定中还提到用水笼头驱散集会群众的任务，但后来这一任务又由叶菲莫夫和戈尔戈泽取消。

空军陆战团（两个营）——跟在第四摩托射击团之后，负责警卫政府大楼广场、鲁斯塔维利大街和附近几条街，准备好在必要时给第四摩托射击团以支援。

为完成所交给的任务，内勤部队以下述方式装备和武装：头盔、装甲背心、橡胶棒，50％的成员都有盾牌，军官拥有他们应具备的个人武器（ПМ式手枪）和两夹子弹；在第四摩托射击团的队伍中有一个使用特殊武器“稠李”[①]的炮手班，直接听令于这个团暂行代理指挥官职务的A.M.巴克拉诺夫中校。

1989年4月9日2时50分，第比利斯内务局局长Р.Л.格文查泽上校对集会群众讲话，号召他们在部队使用武力之前解散。据他讲，集会群众不让他在麦克风前讲话，于是他只好使用手提式扩音器。在行动开始前45分钟，格鲁吉亚都主教伊利亚二世对集会群众讲话。群众静静地听都主教的讲话，在他号召大家采取明智态

① Черемуха，一种释放有毒气体的武器。

度之后，有七、八分钟的沉默，随后大家一起祈祷“我们的圣父”。集会群众保持了秩序和安静，没有明显的害怕迹象：许多人唱歌跳舞，之后有一个非正式组织领袖采列捷利讲了话，号召大家不要离去，不要反抗，保持安静，最好是坐下（“不打静坐者”）。许多人都听了他的话，主要是在政府大楼台阶一带。他于3点59分停止号召。4点整，罗季奥诺夫上将发布了开始驱逐行动的命令。

委员会指出，当时广场上的实际情况是集会群众（有近一万人在场）表示出想要继续下去的决心，这就要求在做出开始行动的决定时要特别小心谨慎。但是，帕季阿什维里和罗季奥诺夫3点30分通过电话交换意见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些情况，上述两位负责人表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不负责任态度——无条件地认可了早先做出的决定。

4点零5分，在鲁斯塔维利大街政府大楼附近出现了4辆装甲运输车。它们横着排满整条大街向前行进，人们毫无阻碍地给它们闪开路，一部分人退到政府大楼前，一部分人退到艺术宫大楼和卡什维特教堂前。走在装甲车后面的是部队行列，他们于4点7分停在边界：艺术宫大楼的门口至政府大楼前的右面草地。这时，基本的集会群众还停留在政府大楼的楼梯附近。

巴克拉诺夫中校通过扩音器建议参加集会的人离开鲁斯塔维利大街，并警告说如果拒绝便要使用武力。应该指出，从广场一角做出的这些警告，许多人未曾听到。

部队来到进攻出发地时，集会群众便开始离开广场，但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解散时间，同时也未曾注意到，几乎所有广场的出口都被车辆堵住，也就是撤退的通道极为有限。3分钟后，从广场赶走人群的行动又继续开展。

第四摩托射击团的部队行列开始逼迫集会群众向政府大楼和沿着鲁斯塔维利大街退去。这时，政府大楼左侧的大部分集会者仍然

坐在原地不动，不由地妨碍了从前面被逼后退的人们自由通过。与此同时，第八摩托射击团第一营根据叶菲莫夫少将的口头命令，开始从奇奇纳泽街向广场前进，这便使形势严重恶化。一方面，由于军人队伍的前进，另一方面，由于人群越来越拥挤，引起集会群众的反抗，在左边草坪上便发生一片拥挤，正是在这里，人民群众的伤亡数目最大。受伤者中，也有不少警察局工作人员和军人。

在这一阶段，一部分集会群众实际上陷入了重围，也就是被挤在军人和未来得及走出去的游行者之间，发生了猛烈的冲突，在粗暴地违反指示情况下使用橡胶棒和其他有毒物质，在驱赶集会群众时使用步兵小铁铲，实际上都构成了对苏联人民的残酷镇压。

委员会在对所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之后坚决认为，在从广场驱赶集会群众的行动中，官方动用了苏联军队空军陆战团的一个连。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可以为这件事的合理性辩护。

据叶菲莫夫将军解释，当部队行列沿鲁斯塔维利大街前进的时候，由于在政府大楼一带道路展宽，左翼仿佛暴露出来了；据叶菲莫夫讲，这样便不仅给集会群众向军人后方转移造成了威胁，同时也对他们的周围造成威胁。

为了消除脱节现象，根据叶菲莫夫将军的请求，罗季奥诺夫将军派出空军陆战队的一个连，这样一来，便把苏联军队的军人拖进来完成与他们不相适应的使命，粗暴地违反了总司令部关于仅赋予军队小分队保卫特别突出对象这一任务的指示。委员会的意见是，在这种形势下，并不存在驱逐集会群众行动脱节现象的现实威胁，也不存在派遣空军陆战连的必要性。

到 4 点 21 分，清除政府大楼前广场的任务已告结束。第八摩托射击团第一营合并到第四摩托射击团的队伍中，继续驱赶集会群众。

在行动的这一阶段，内勤部队为了反击被挤到鲁斯塔维利大街

上集会群众的奋力反抗，竟使用了特殊手段“稠李”；据特殊手段内勤部队领导人报告，使用范围为：第一条界线——从杰尔吉阿什维里街到乌克拉英卡街；第二条界线：从卢那恰尔斯基街到恰夫恰泽街；第三条界线：在通讯大楼前。

在走近共和国广场时（出口被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挡住），由于反抗越来越厉害，巴克拉诺夫中校擅自发出使用不能动用的K－51产品的命令，该产品含有有毒物质Сц－Эс，使用了4个手榴弹，其中一个未爆炸。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巴克拉诺夫中校擅自做出使用K－51产品的决定，以后又隐瞒了使用这一产品的事实。

指示使用有毒物质界区的准确性引起了疑问。根据有毒物质受害者大量的证词，他们是在比较靠前的道路上受到毒害的（就在政府大楼和卡什维特教堂附近）。

在驱逐行动将要结束的阶段，发生了用枪射伤一个参加集会者头部的事件。

委员会指出，特殊物质的使用，是由第四摩托射击团在违反现行条令情况下实施的（见苏联内务部1970年第0507号命令第1号附录）。从使用特殊物质的第一条界线起一直到鲁斯塔维利街尽头都有住宅（从“第比利斯”旅馆开始）。在条令第3章第23条中讲到关于在使用特殊物质前应事先告知和平居民的内容，甚至还包括居民的疏散问题。然而，叶菲莫夫将军却无视这一要求，发布了在居民区使用“稠李”的命令，在以后的几个界区内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有情报表明，个别军人还潜入居民住宅，在那里使用了“稠李”特殊物质。

委员会特别惊心地指出，内勤部队领导竟采取了一些措施，企图掩盖使用有毒物质这件事本身。

使用特殊物质“稠李”之事，他们是于今年4月13日正式承

认的，那也是在无可否认的罪证压力下才被迫承认的。

这之后，才一步步承认了使用各种形态的“稠李”和 Сц－Эс 毒气（产品 К－51）的经过。

很长时间，苏联军队指挥部的代表们也一直否认使用步兵小铁铲的事实。

值得指出的是，指挥官和政工人员们在给参加行动的军人们下达指令的时候就已经把关于群众集会参加者和他们的意图的情报给歪曲了。

因此，一方面由于最粗暴地、近似犯罪性草率地违背现行法律、章程、指示和指令；另一方面也由于组织者和一部分集会参加者的违法行为，这次行动终于以悲惨的结局告终。对这件事的调查工作，是搞清批准这次行动的领导者和直接执行者以及做了违法行动的那些集会参加者的犯罪程度。

四、对 1989 年 4 月 9 日事件参加者健康损害程度和死亡原因的评定

委员会熟悉了格鲁吉亚共和国卫生部各机关和组织的第一手医疗文件（病历卡、门诊卡、法医鉴定书等）、苏联卫生部委员会的证书和证明材料、苏联国防部委员会的报告、格鲁吉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委员会下属医务委员会的结论、苏联卫生部法医学院的结论、国际红十字会驻格鲁吉亚共和国代表关于医疗任务的报告，以及一系列有关今年 4 月 9 日在第比利斯发生的事件医疗效果的其他文件。

委员会组织了专家，对此进行了补充性科学研究和咨询。

对现有资料进行的分析使得有可能确定与驱逐集会群众行动有关的的医疗损失的范围及性质。

没有精确统计出在政府大楼和电视台大楼一带有限的地段内参加集会者的人数，但根据近似的估计约有 8000～10000 人。妇女的

人数约近50%。还知道参加集会者中有很多青少年和中老年人。气象环境特征是：空气温度为温暖（+9°C），高湿度（90%），无风。

事件发生地点被街灯照得很亮，参加集会者的拥挤程度，在广场周边接近政府大楼前面台阶的地方增大起来，绝食者（100余人）和集会领导人都在那里。

从4月9日起，在艺术宫大楼里便有市卫生局的医疗点在工作。

“驱逐”行动是在夜间（当地时间4点至5点）执行的。这一情况必须要特别强调，因为在夜晚时间，根据生物规律的自然本质，人的反应、他对有害因素作用的耐受力会大大降低。

已确认，在用“暴力驱赶”集会参加者时，曾使用了橡胶棒、“特殊物质”——有刺激作用的有毒物质、步兵小铁铲以及有一次（根据法医鉴定）还使用了火力器。另一方面，集会者随着反抗力越来越增加，为反对“驱逐暴力”他们也使用了顺手的工具。

根据医疗站工作人员提供的资料，第一批参加游行者的伤员——妇女、少年和成年男人——是“暴力驱逐”双方接触开始之后5分钟到达的。在以后的5分钟内，受伤者已是纷至沓来。医疗站的诊所很快挤满了人，所以许多人是在街上接受治疗的。由于这种情况，还叫来了补充急救队和救护车。

记录了下面这种见证材料：一些军人阻止医务工作者救护伤员；第比利斯市救护队汽车场的证明材料记录了6次袭击救护车并将其损毁的情况。

事件的许多参加者：普通老百姓、警察局工作人员和军人都在不同情况、不同程度地受了伤，悲惨的结局是16个集会参加者当场死亡，另有3人很快死在医院中，军人和警察局工作人员都未见

死亡。

准确确定游行者和军人及警察局工作人员的受伤人数遇到一定困难。但与此同时，委员会掌握足够的材料从整体上来判断4月9日事件中造成的医疗后果。

根据格鲁吉亚共和国卫生部的材料，在驱逐行动进行时和行动之后几小时内，前来第比利斯医院就医者共有251人，其中183人住院治疗。之后的一些日子里，需要急救的人数呈波浪形上升（4月13日、21日、27日和5月5日）。总的来说，从4月9日到5月9日这段时间，到各医疗部门就诊的人数总共有3000～4000人。住院治疗的有近500人。到目前为止，登记防治和治疗中的人数有将近1000人。

根据格鲁吉亚共和国内务部的统计材料，在事件过程中有37名警察局工作人员受伤，其中22人是被军人打伤的。根据苏联内务部的材料，受外伤的军人共有69人，而在苏联国防部委员会的报告中则援引了这样的资料：一共有152个军人受到外伤（内务部132人，苏联军队20人），其中26人住院治疗（内务部22人，苏联军队4人），据苏联检察院通知，在这些事件中有189名军人受害。

委员会确认，在国防部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提到的20名苏联军队的军人，实际上，在所研究的事件过程中只有3名军人受伤。

4月9日事件参加者的健康损坏，表现在外伤、有毒物质或其化合物的中毒，以及各种“大规模惨祸综合病症”型心理——情感上的紊乱等方面。

参加集会群众中，受伤人数达290人：青紫伤占40%，颅骨内伤——30%，外伤——20%，各种骨析——10%。

对病历进行抽样分析和询问部分受害者之后确定，大多数外伤（其中包括头部外伤）都是被用橡皮棒打的，有21人——受伤与使

用步兵小铁铲有关。受熏伤者常常也涉及到有毒物质的中毒（综合疾患）。

因中毒而请求救护的人们的病历，分析起来就十分困难。

委员会特别强调，隐瞒4月9日使用有毒物质这一事实，之后对此问题不做全面报告（关于4月13日使用Cu，5月3日使用Эс之事），滞后而且不够系统地取样证实出事地点有毒物质——这都造成极为不良而且很紧张的社会环境。

这一情况以及一些令人惊慌失措的传言、隐瞒使用有毒物质、诊断中缺乏信心以及公开发布的叫人们前去就医的号召——所有这些和其他一些状况，都使得在以后的一个月内到医院就医的人数呈波浪状。

在这一系列现象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的是“第二次中毒效应”的事实——如今年4月28日将政府大楼前的花搬到教堂去之后又突然有大批患者就医。与这件事有关的情况，至今尚未完全搞清楚。

委员会认为，即便是在抱怨健康受到损害的基本上只是一些接触有毒物质的受害人，那也有足够根据可以把这些情况鉴定为“对大规模惨祸反应的综合病症”。

一共登记了近300个有毒物质中毒患者（军人有19人，警察局工作人员有9人），基本的受害群众是4月9日在政府大楼前广场上和在鲁斯塔维利大街其他几处地方中毒的人。根据诊治上受害程度，这些人（根据苏联卫生部委员会的证明文件）可以做如下分类：严重受害者——2%，中等程度——7%，轻伤者——91%。

关于受害者中毒地点、使用有毒物质的类型和受伤性质的资料相互矛盾，不过，根据对空气、土壤、植物、死者的衣服和身体组织等样品进行仔细研究的结果，同时也对受害者及见证人进行了询

问，委员会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查清这些问题。根据接受特殊防治的受害者提供的证明，化学物质中毒的地点是：直接在政府大楼前——49%；在鲁斯塔维利大街到奇塔泽街一带——15%；第一中学附近——9%；在“鲁斯塔维利”电影院旁——3%；在卡什维特教堂一带24%，小部分集会群众在鲁斯塔维利大街毗邻共和国广场和通向几条中等街道的地方中了毒。

根据这些资料得出结论，主要使用有毒物质的地方是政府大楼前和卡什维特教堂地区，这一点与行动领导者们所指示的几个使用有毒物质界区相符。

正如苏联国防部委员会做出的报告所指出，事件发生3个星期后，在鲁斯塔维利大街上，在从少年宫到通讯大楼这一段地带上发现了有Cц和Эс存在于土壤中，而在第二批试样中甚至存在于大气中（在地下通道里），这一点可以间接证明使用了相当数量的有毒物质。

通过“稠李”使用苯氯乙酮并在K－51型手榴弹中使用Cц－Эс（刺激性易燃物质）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

第比利斯国立大学的共和国色谱质谱分析中心对在鲁斯塔维利大街政府大楼（附近）和卡什维特教堂附近一带所取的4个土壤样品进行研究，也发现了三氯硝基甲烷（一种有窒息效应的有毒物质）。何以在这些样品中存在这种物质，尚未找到解释。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使用所谓的“警察有毒物质”的经验表明，在确定规则范围内使用这些物质，不会导致严重后果。严重中毒的情况极为少见，而死亡的结局——则是绝无仅有的。第比利斯市集会参加者中毒的这种场景，和往常使用这种有毒物质的情况截然不同。

这种中毒的特点是群众性、相当数量的中等程度和重度中毒、具有一定的临床表现特征，表现出“嗜神经组织”效应的一些特

征。

委员会认为，这可能是各种情况和因素的结果：

1. 气象特征——湿度高且无风，致使毒气云团不能很快消散，从而造成高浓度毒气。

2. 在没有可能离开出事地点的密集人群中使用易燃物质。

3. 根据目击者和受害者见证，从极近的距离内使用气溶胶这种形式的有毒物质，可能会造成有毒物质的极限浓度。

4. 中毒与外伤和精神压力相结合，以致加重了受伤者的临床症状（“嗜神经组织效应”）。

5. 由于在夜间人体的抵抗力下降，故而使易燃物质对人体毒性作用的程度增大。

应当指出，一些实际上的证据和上面所引的一些看法，不足以完全排除一部分人中了其他不同性质有毒物质毒气的可能性。

委员会将很大一部分工作放在搞清19名集会参加者的直接死亡原因这一问题上。

委员会收到的材料和各种专家组做出的结论，对导致受害者死亡的因素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鉴于这种情况，委员会组织了一个病理解剖学和法医方面的学者、专家小组，该小组研究了所有现有材料之后得出结论，所有死亡者的直接死亡原因，除一人带有严重颅－脑外伤外，都是窒息（绝息）。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在窒息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同时起作用——身体的挤压和吸入化学物质，相应的宏观材料和显微镜检测材料都指出这一点。吸入化学物质与身体挤压相结合，更加大了它的负面效果，并且，按照专家们的意见，构成了受害者死亡的原因，有两人发现还伴有其他疾病的补充情况。

同时，根据所掌握的材料，不可能精确地判定，对每个具体人来说，在窒息发展过程中到底是哪一种因素起了主要作用，专家们

的结论送交苏联检察院。

五、结论和建议

1989年4月9日在第比利斯市发生的悲剧，许多无辜人们的不幸死亡，在苏联人民的心中和意识中引起深切的悲痛。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的成员们同样感到十分沉痛，并向死难者家属和亲友，以及在这个悲痛的4月的早上所有的受害者表示真诚的慰问。

4月9日的事件，给改革带来沉重的打击，震动了我们整个的社会。暴力的表现、对健康的摧残、剥夺人们神圣的上天赐予的生命——这些都和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和财富不相容。

委员会向全国公民呼吁——生活在我们面前提出最尖锐的问题、冲突和误会，只能用政治方式，只能通过对话和劝说去解决。

委员会号召全体苏联人民，不要让4月9日发生在第比利斯市的事件被人利用，来激起对苏联军队的军人们的不信任和仇视态度。

委员会号召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首先应制定并通过一套严格规定在国内使用武力细则的立法条令。

根据现有材料，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得出下列结论：

1. 1989年4月9日发生在第比利斯市的悲惨事件，其原因在于：在对我国社会实行整个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条件下共和国领导人未能领导格鲁吉亚尖锐的、活跃发展的改革过程，正确估计共和国的形势并做出与之相应的政治决定。

前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帕季阿什维里和尼科利斯基对1989年4月9日发生在第比利斯市事件的悲惨后果负有政治和其他责任。

2. 政府大楼前非法群众集会的组织者（采列捷利、加姆萨胡

奇扬[①]、策图里扬[②] 和非正式组织的一些其他领导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刑事、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人在集会过程中破坏了各种社会秩序，号召群众不执行政府当局的合理要求，这样，也就没有试图阻止事件的悲惨结局发生。

3. 关于往格鲁吉亚派遣内勤部队、苏联军队的小分队和警察局特殊小分队的决定，是在1989年4月7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主席是利加乔夫同志）之后，根据苏联国防部总司令（莫伊谢耶夫同志）和苏联内务部的命令（希洛夫同志）做出的。由于事情不仅仅是涉及到部队的重新部署，而实际上是关系到在第比利斯市的各个进出街口实行稽查，对最重要的一些社会和国家机关的建筑物及其他一些目标实行警戒，从而在第比利斯市在某种程度上实行特殊情况下的制度的行动，所以，应当承认，做出上述决定是对法律的粗暴破坏。

4. 1989年4月8日，格鲁吉亚部长会议（奇赫伊泽同志）关于将集会群众从政府大楼前广场赶走和涉及动用内勤部队和苏联军队小分队的一系列其他维护社会秩序措施的命令，是违背法律的，因为现行立法没有授予共和国政府这种全权。

5. 在清除广场行动的准备和进行过程中严重违犯了法律，表现在行动计划没有根据实际形成的局势进行校正。各分队指挥官没有对该计划进行仔细研究，未进行过勘察，没有足够地吸收第比利斯市执行委员会内务管理局的力量和设备参加行动；违反苏联国防部的命令，不是将伞兵陆战队小分队用来保护目标，而是用他们驱赶集会群众；粗暴地破坏了使用特殊设备的制度，尤其是使用了非

① 加姆萨胡尔季阿，格鲁吉亚作家K.C.加姆萨胡尔季阿的儿子。20世纪50年代末，即开始积极参与持不同政见的活动，是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② 策图里扬，格鲁吉亚民族民主党领导人之一。

值勤用的特殊设备（产品 K－51），非法地使用了橡胶棒和步兵小铁铲。

科切托夫将军、罗季奥诺夫将军和叶菲莫夫将军对上述违法行为和导致悲惨后果的失误负有个人责任。

格鲁吉亚内务部长戈尔戈泽擅自不执行自己的直接任务，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6．根据委员会意见，下令于 4 月 9 日在第比利斯市对参加集会者使用特殊设备和技术的一些负责人应该负职务上和其他形式的责任，这些特殊设备和技术，按照现行条例，“只能在非常情况下，为了制止伴随着在规模暴乱、破坏、杀人放火、胡作非为的群众性骚乱，为了打退对各社会组织的办公楼、行政大楼和办公室和其他重要目标进行的群体攻击，以及在破坏社会秩序的暴力行为威胁着公民、内勤部队和民兵生命和健康情况下才得以使用”。委员会确认，1989 年 4 月 9 日在第比利斯市使用上述措施没有根据。

7．在制止群众集会清除政府大楼前广场和鲁斯塔维利大街的行动过程中，给集会群众、内勤部队和苏联军队的军人们和警察局工作人员造成了严重程度不同的肉体伤害（包括由于使用特殊设备——催泪瓦斯——所致的伤残）。19 名参加集会者死亡（基本上是妇女）。委员会认为必须对犯有将一些人迫害致死或使之身负重伤罪行的一些具体人追究刑事责任。

8．还必须解释以下人物的责任问题：

——破坏了内勤部队战斗条令第 59 条的规定：禁止对妇女、少年、儿童和在一些其他特殊情况下使用特殊设备“稠李”；

——破坏了严禁对妇女、儿童、老人、带有明显特征的残疾人使用橡胶棒并严禁打击面部和头部的现行条例。

——在驱逐集会者行动最后阶段使用了催泪瓦斯“Сц－Эс”，

这些武器禁止在内勤部队使用。

9. 委员会对一些人提出责任问题，这些人在第比利斯市实行宵禁，破坏了公民受保障的权利和合法利益。

10. 那些隐瞒或歪曲了有关1989年4月9日事件情报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以及那些企图隐瞒使用特殊设备“稠李”和含有“Cu－Эc”毒气的K－51型产品的内勤部队小分队的指挥官们都应负政治、道义方面的责任，而在必要情况下也要负法律上的责任。

11. 委员会指出，在定期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以谣言、猜测，以编造的通报为根据并且歪曲了事件发生真相的材料。其中有一些还被用于官方文件中：如说，委员会没有找到根据，可以证明在广场上有几支由极端分子特别组成的战斗队存在并进行活动，也不能证明首批伤亡者好像是在部队和集会群众接触之前就出现了。

同样也不能证实一些广泛流传的消息的真实性，说有一大批人仿佛在4月9日以后失踪了，并说集会参加者使用了专门准备好的白刃和枪弹。

委员会查明，不存在那样的事实，可以证明罗季奥诺夫将军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声明是正确的，这份声明指出：到4月9日前，“存在着夺取共和国极其重要的一些目标的现实威胁”。在克格勃各机关的报告中，在共和国内务部的官方通报中以及其他什么文件中，都没有包括类似的具体事实。

委员会指出，在解决在第比利斯市实行宵禁时公民和军人之间冲突中，正确的一面是前阿富汗人－国际主义者们的有组织行动，这一点有助于形势的正常化。委员会同时指出，许多警察局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在复杂的不寻常条件下，不仅协助医护人员疏散受害者，而且他们自己还给那些受伤和绝食的公民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最后，委员会提出下列建议，供各级主管国家机关研究：

1．党的各机关，相应地同意或在联盟一级或共和国一级做出关于派遣部队并进行本行动者，其行为违背了常规法律，显然与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关于必须限制党和国家机关职权的决定相背驰。在法制国家中，任何级别党的机关的决定，只有当这些决定在国家主管机关的法律条款中、在法律或政府的决定中得到体现之后，才能对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包括军队在内，具有强制意义。

根据这一点，必须刻不容缓地通过对现行立法和相应的党的文件进行必要的修改来加速党和国家机关职能的具体分工。

2．今年4月9日在第比利斯市发生的事件表明，在现行立法中和在做出关于实行特殊制度或非常制度（宵禁），关于动用苏联军队小分队来维护并恢复国内社会秩序，特别是直接在党的机关，而不是在国家机关决定的基础上做出关于使用武装力量来解决国内冲突这一类最重要的国家决定的实践中，存在着明显的漏洞。

要求对实行军事制度（在武装冲突时）、特殊制度（国内发生骚乱时）、和非常制度（遇到灾害时）的内容和方式做出明确而详尽的立法上的规定，在第比利斯市造成的局势排除在外，当时在实行宵禁中派了苏联军队小分队去完成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而这一问题本来应该只靠内部的武装力量去解决。

3．应该对主要在合乎职业要求基础上增加内勤部队的数量和对内勤部队进行增补问题进行研究。必须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出使用共和国编制和苏联编制的内勤部队小分队的制度和机制。

4．必须以立法形式禁止动用苏联军队来制止大规模动乱，事先规定出，为上述目的，仅仅作为例外，在通过法律直接规定出来的情况下使用军队小分队的可能性——即每个具体情况都要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决定，并随后通知苏联最高苏维埃。

5．需要把警察局和内勤部队的成员在执行涉及制止违法行动

和大规模动乱任务时的权利和义务，以立法形式巩固下来。

6. 委员会注意到，有必要加强这一案件的侦讯小组，可以吸收格鲁吉亚共和国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来参加，并采取其他一些补充措施，以便尽快完成由1989年4月9日在第比利斯市发生的事件所引起案件的初步侦讯工作。

7. 需要以立法形式巩固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建立的国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全权，特别是，必须事先规定出负责官员向各委员会提供伪证应承担责任。

委员会仅向国家和社会各组织，同时也向协助委员会工作并帮助弄清事实真相的所有公民和负责官员表示谢意。

委员会主席　А. 索布恰克

委员会副主席　Х.Ю. 阿斯米亚埃

А.И. 戈利亚科夫

В.П. 托姆库斯

委员会责任秘书　С.Б. 斯坦克维奇

委员会成员　安格罗纳季、别赫捷列娃、博罗维克、瓦西里耶夫、加津科、戈沃罗夫、利哈乔夫、鲁金、马尔季罗相、米罗什尼克、纳扎尔巴耶夫、涅恰耶夫、奥格日耶夫、萨格盖耶夫、托尔彼日尼科夫、费戈托娃、申格拉娅、舍季科、雅科夫列夫

№07596

吉连科关于致格鲁吉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全体劳动人民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90 年 4 月 4 日）

正值第比利斯悲惨事件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同时由于舆论的广泛要求，格鲁吉亚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将 1990 年 4 月 9 日宣布为共和国全国举哀日。

考虑到共和国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特建议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同志的电报送交格鲁吉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共和国全体劳动人民（附上电文）。

我们认为最好将电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同时也在 1990 年 4 月 8 日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共和国报刊上刊登出来。

请予以批准。

A. 吉连科[①]

① 吉连科，时任苏共中央书记。1963 年加入苏共，1972 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81 年当选苏共中央候补委员。